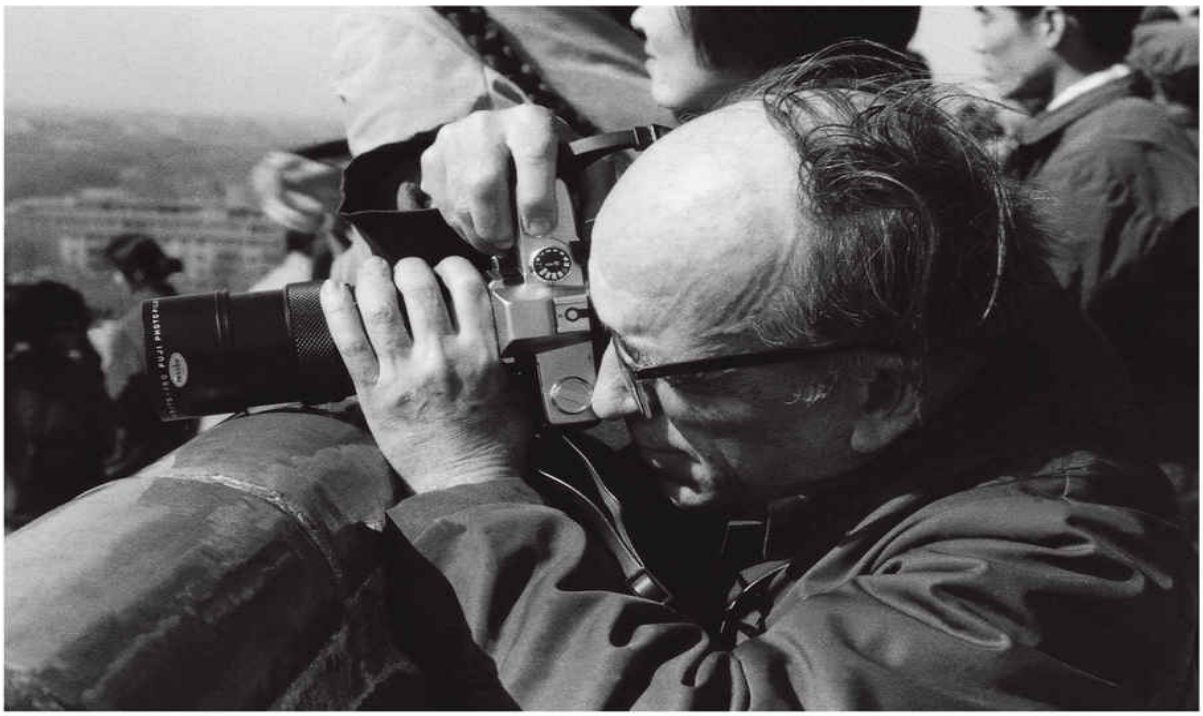


Israel Epstein

爱泼斯坦作品集

见证中国
爱泼斯坦回忆录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著**　　沈苏儒　贾宗谊　钱雨润 /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爱 泼 斯 坦 作 品 集

见证中国
爱泼斯坦回忆录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著　　沈苏儒　贾宗谊　钱雨润 /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1

（爱泼斯坦作品集）

ISBN 978-7-5133-1862-4

Ⅰ．①见…　Ⅱ．①爱…　②沈…　③贾…　④钱…　Ⅲ．①爱泼斯坦（1915～2005）—回忆录　Ⅳ．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351号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著；沈苏儒　贾宗谊　钱雨润　译

顾　　问：黄浣碧

策　　划：孙志鹏

责任编辑：孙志鹏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郜琳琳

版式设计：魏　丹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正文用纸：瑞典进口全木浆轻型环保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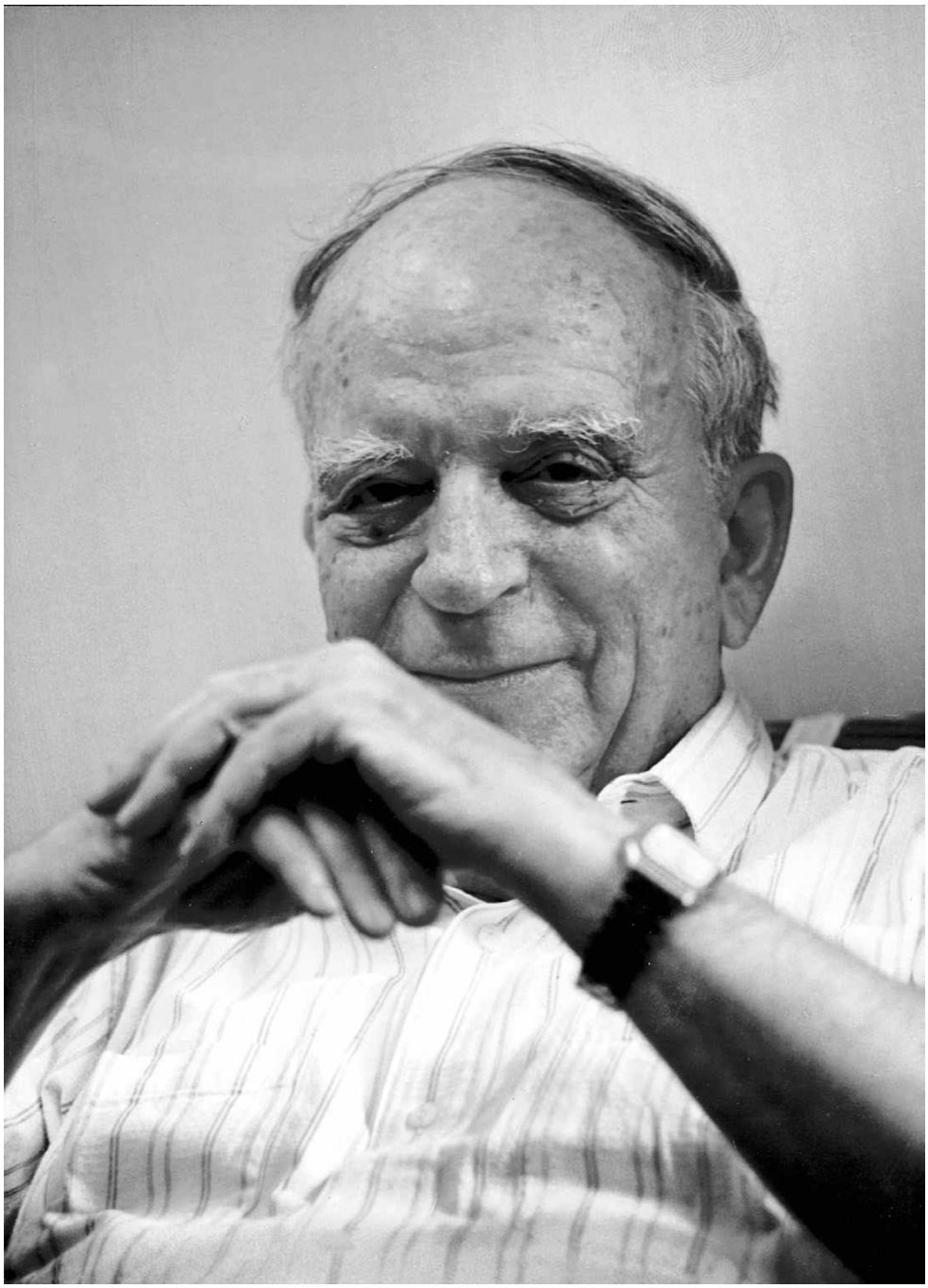
字　　数：381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862-4

定　　价：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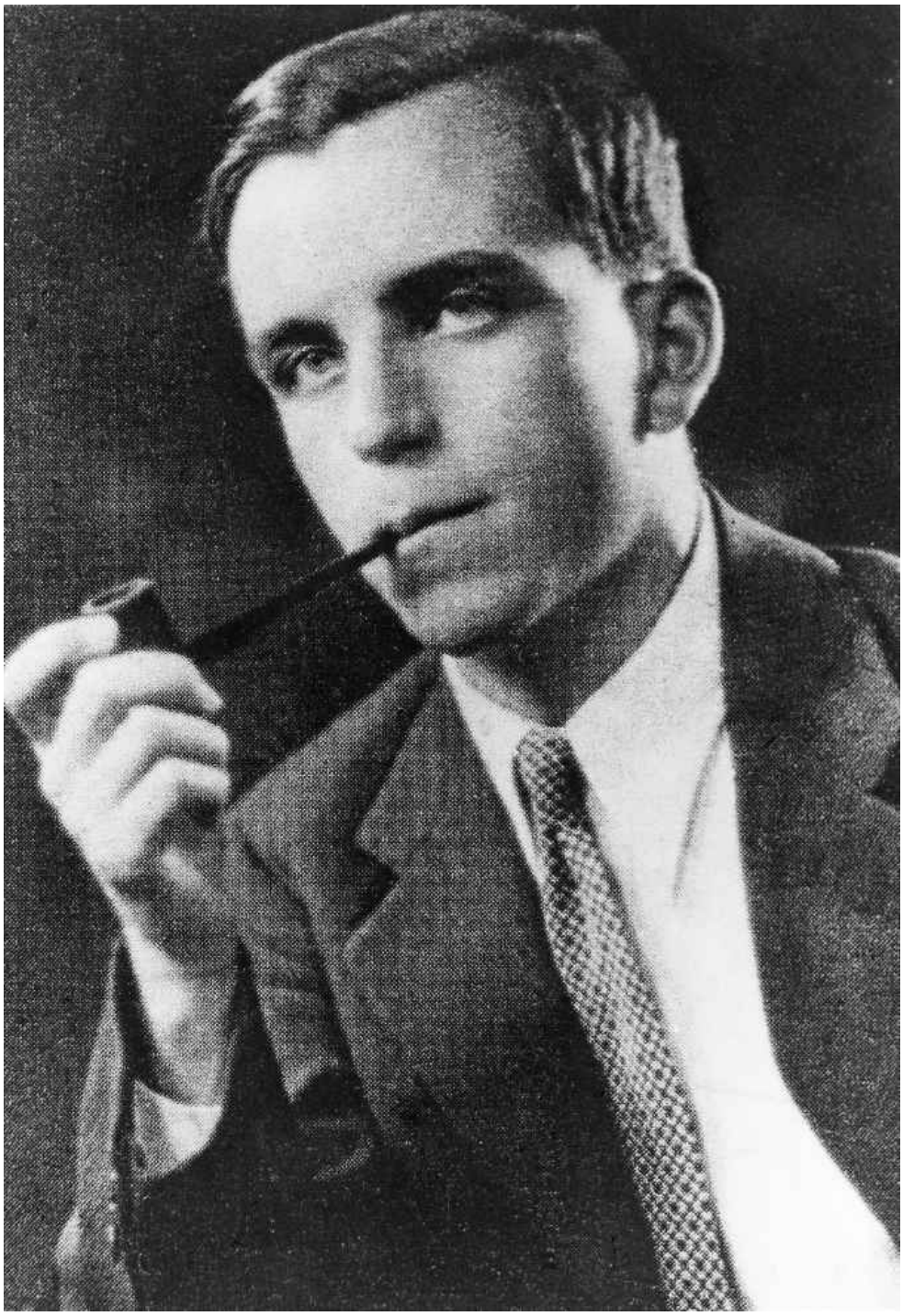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20年迁居天津，爱泼斯坦与父亲拉扎尔·爱泼斯坦在北戴河度假。

1921年，与母亲索妮娅在一起。



1934年，青年爱泼斯坦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

1934年，爱泼斯坦与第一任妻子伊迪丝结婚。

1946年，爱泼斯坦与第二任妻子邱茉莉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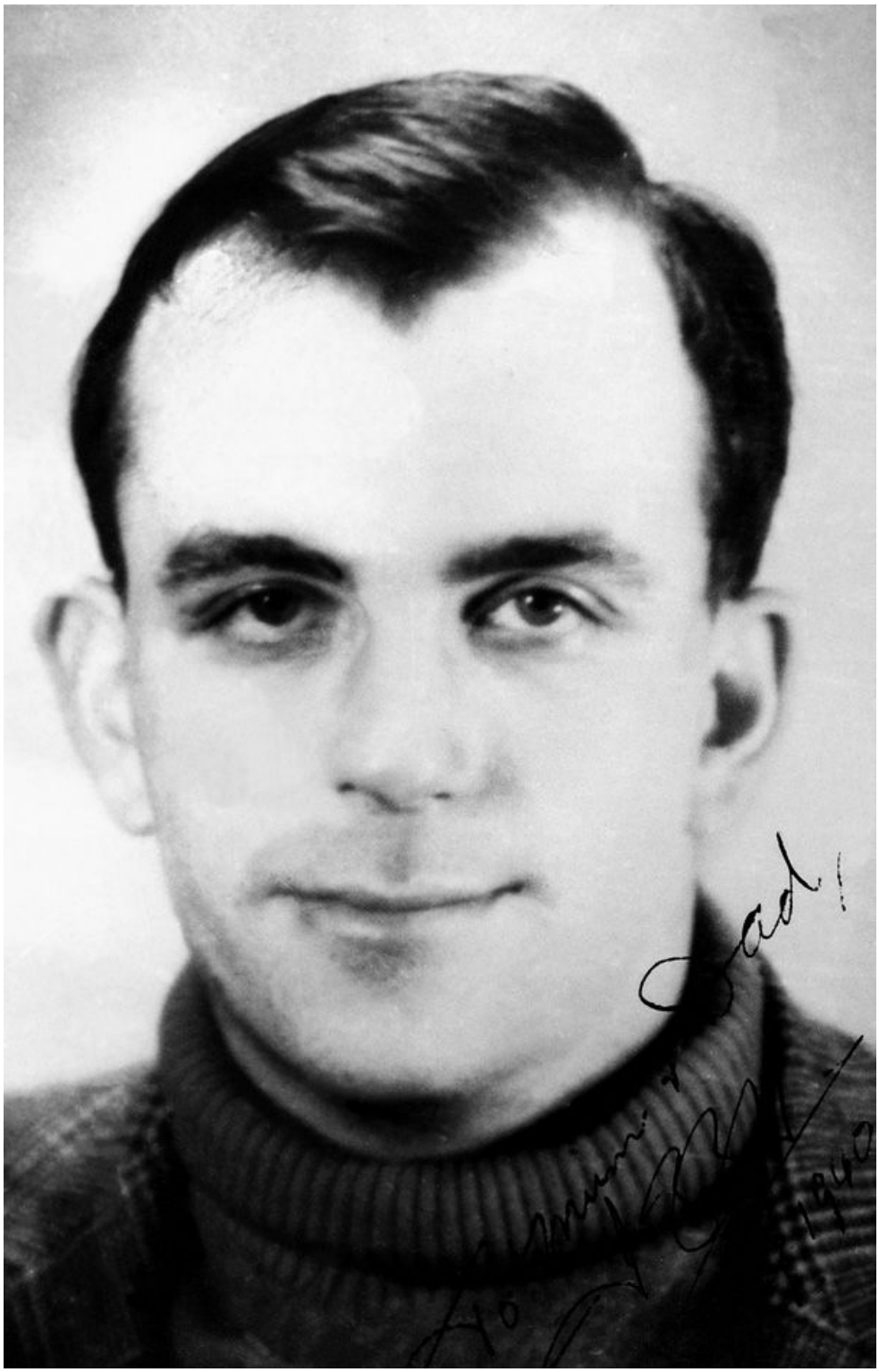
1938年，广州遭日机轰炸时爱泼斯坦（中间拍照者）赶到现场采访。

1938年，爱泼斯坦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图为爱泼斯坦（左）与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佐里士·伊文思（右）及其助手约翰·福尔诺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留影。

1938年，爱泼斯坦拍摄的活跃在广东中山县的抗日自卫队。

1938年，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1938年，香港中外新闻文化界人士合影。左起：叶浅予、斯诺、爱泼斯坦、金仲华、张光宇、丁聪、陈先生。



1940年，在重庆继续从事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新闻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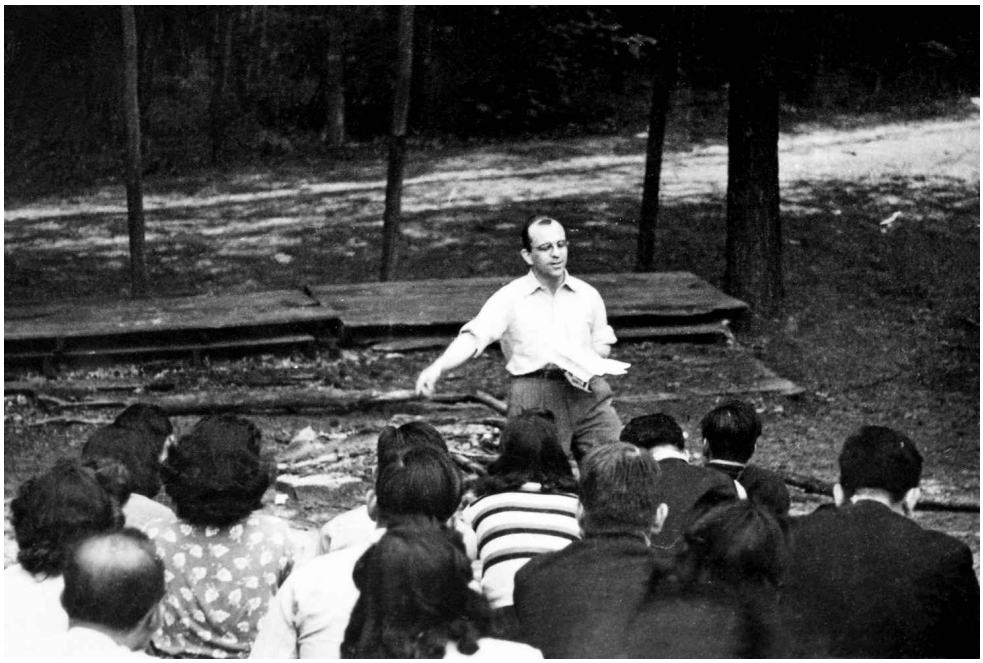
1942年香港沦陷，爱泼斯坦被关进香港日本拘留所。这是他出逃后的样子。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采访团”的一员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采访。

1944年在延安，毛泽东（后排右一）会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其他外国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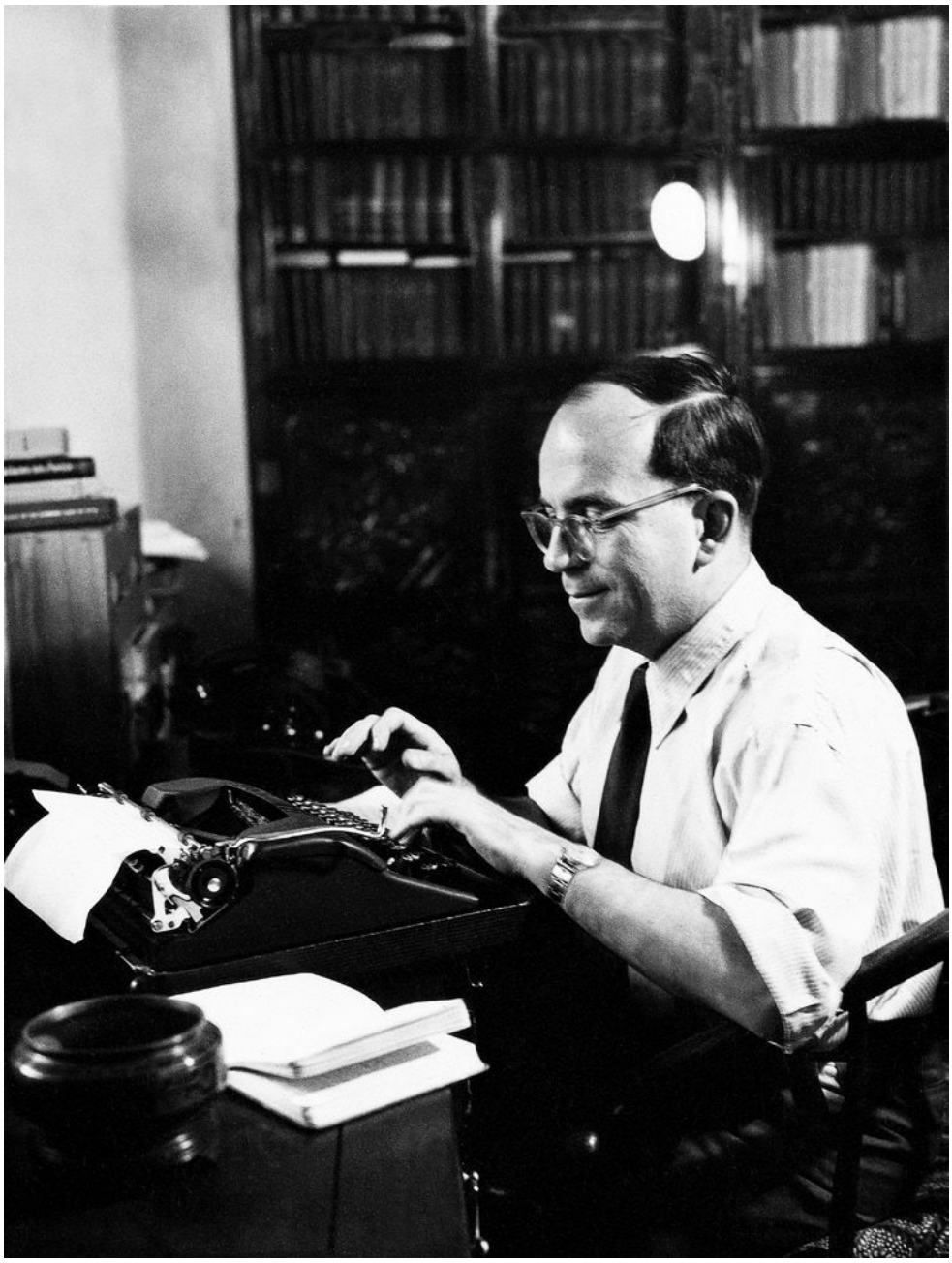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爱泼斯坦采访之后，将一幅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这幅画一直挂在爱泼斯坦家中。

1944年访问延安时，查看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指挥刀。



1948年在美国，向中国留学生介绍中国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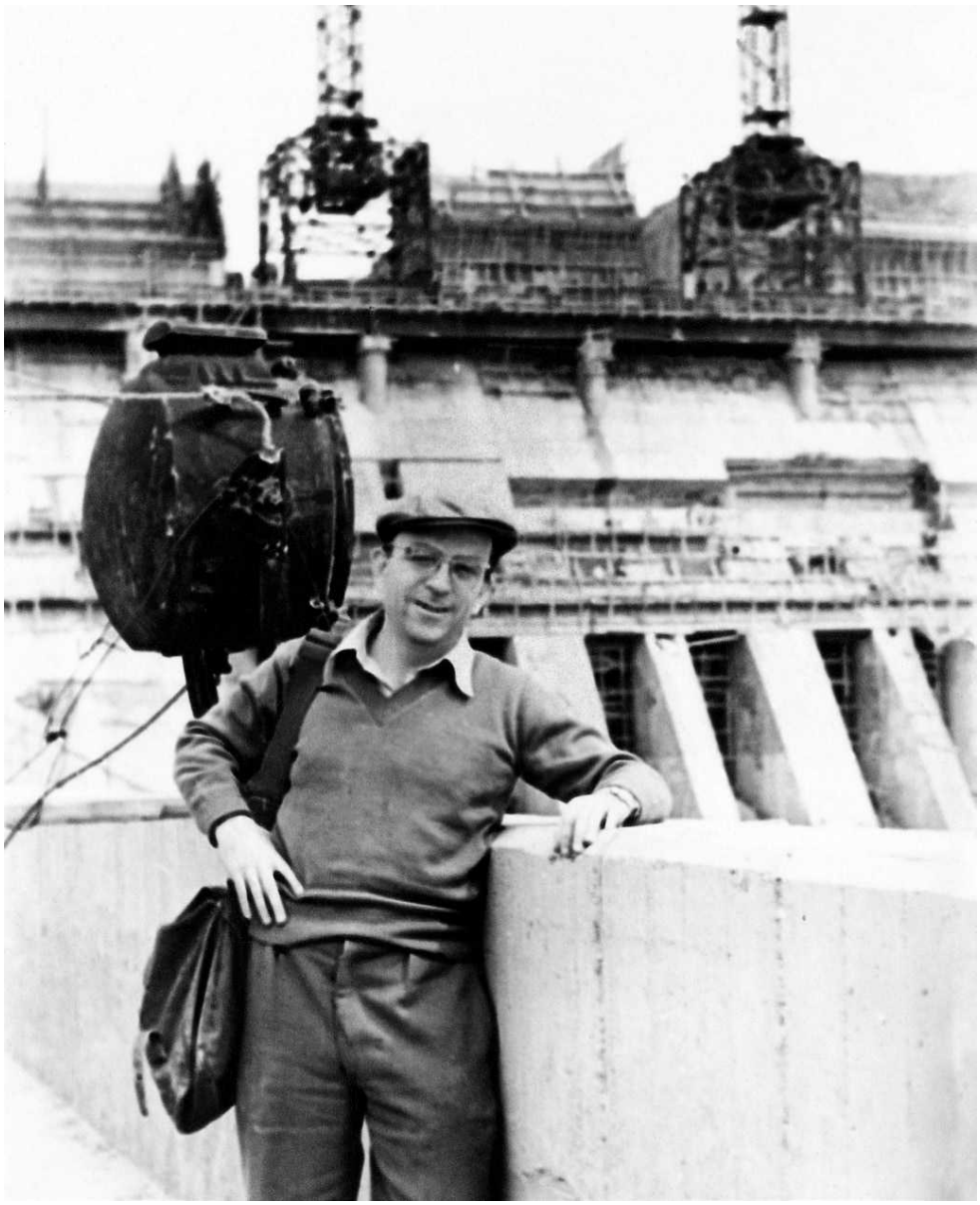
1964年，毛泽东（右三）接见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工作的专家，左三为爱泼斯坦。



1956年，爱泼斯坦撰写《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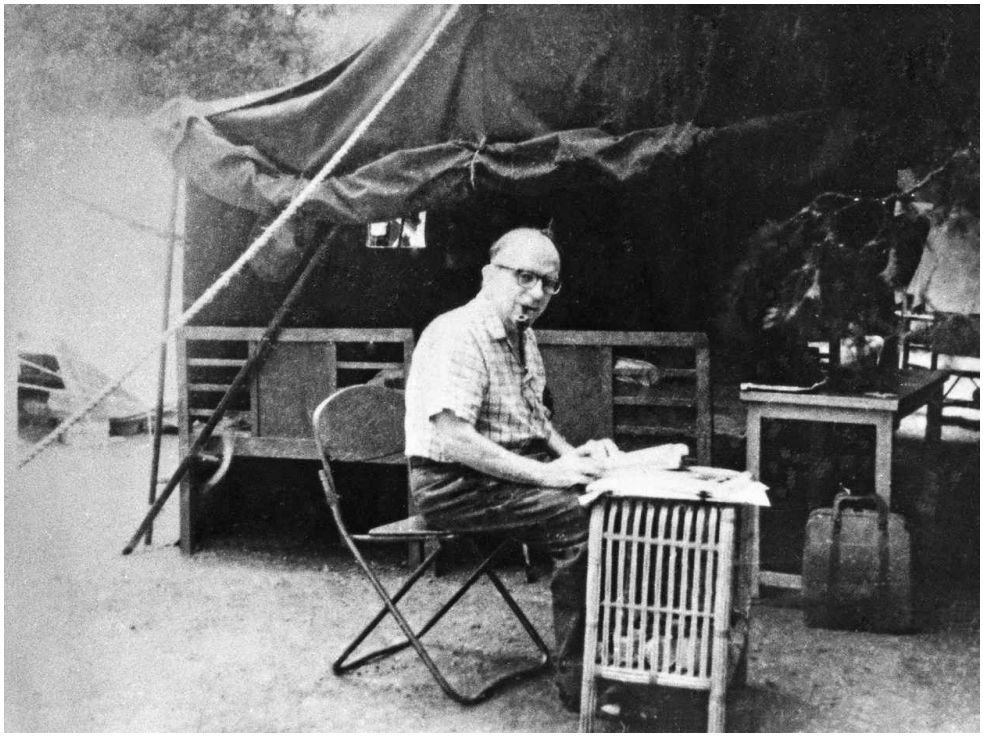
1964年，毛泽东（左三）会见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左四）、柯弗兰（右二）、艾德勒（右一）等外国专家。

20世纪60年代初，采访大寨后与陈永贵（右四）等合影。



采访黄河三门峡水电工程。

1962年，周恩来（前排左一）、宋庆龄（后排左十一）、陈毅（后排左十三）、邓颖超（后排左九）等在《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时，亲切会见编辑部工作人员。前排左二为爱泼斯坦。



1976年，在外文局地震棚中撰写《西藏的变迁》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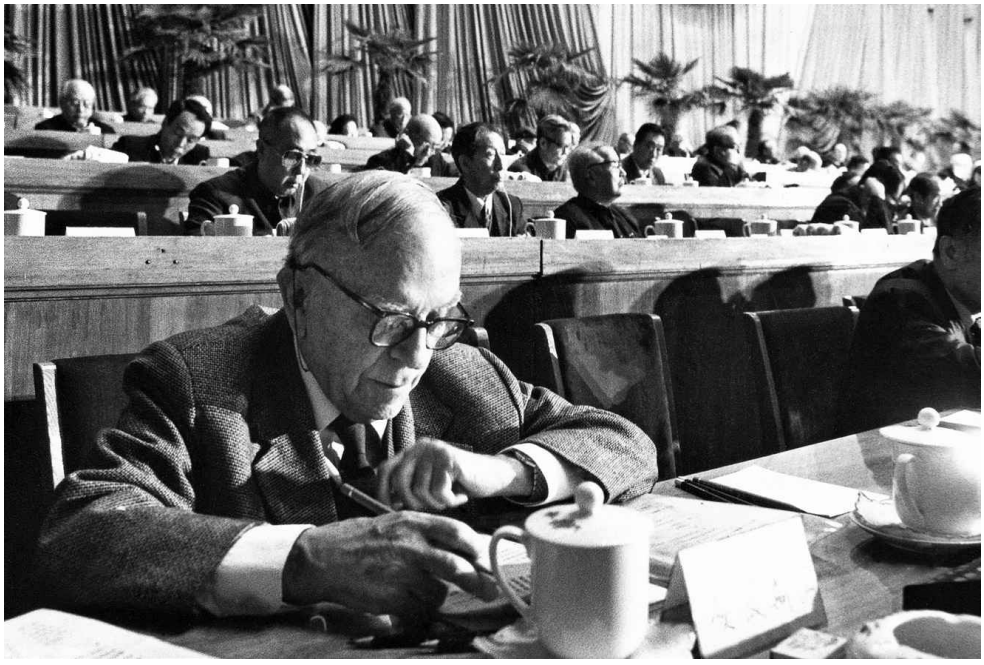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爱泼斯坦以七十高龄第四次进藏采访。右一为黄浣碧。

1982年，重访台儿庄。

1985年重访山西，在黄河畔与孩子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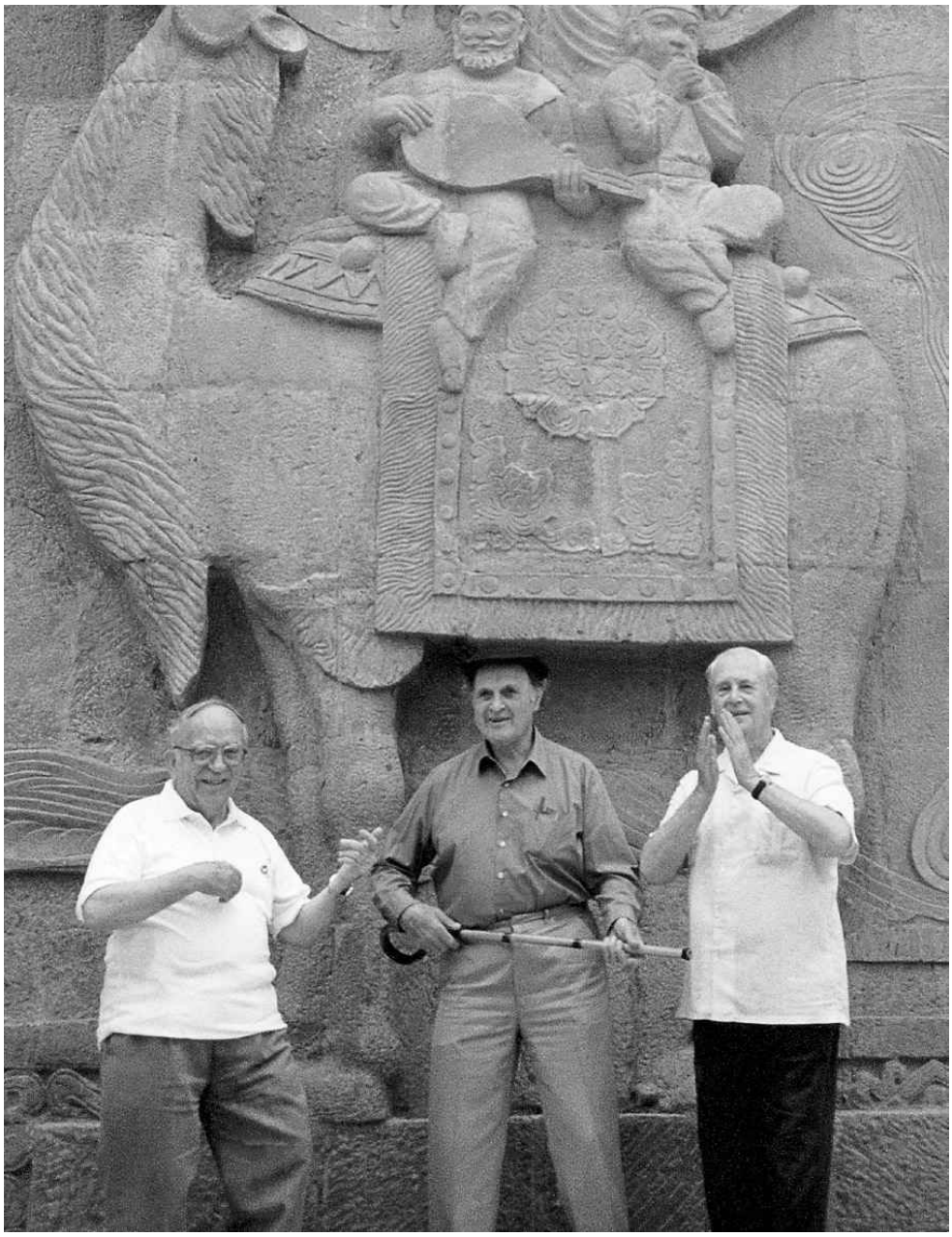
1980年，宋庆龄会见爱泼斯坦。宋庆龄与爱泼斯坦是一生的挚友，她生前仅授权爱泼斯坦为其作传。经过十年艰辛，年逾古稀的爱泼斯坦最终完成了《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

宋庆龄生前喜爱和平鸽。图为爱泼斯坦在宋庆龄故居撰写宋庆龄传记的闲暇，与故居工作人员一起喂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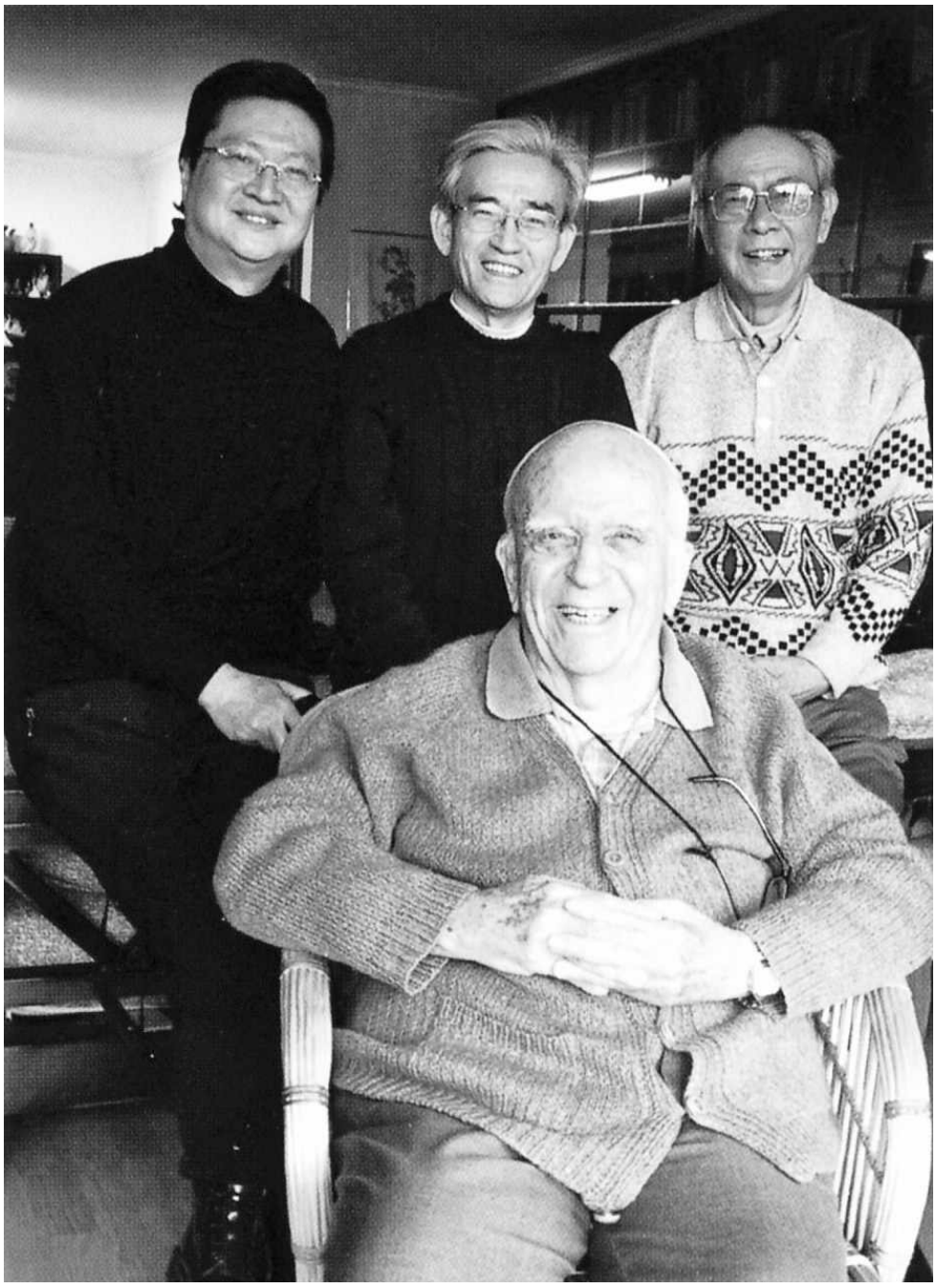


1991年，爱泼斯坦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与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会议的外国裔委员在一起。左起：李莎、陈必娣、爱泼斯坦、叶华和魏璐诗。



1994年，爱泼斯坦与柯鲁克（中）、沙博理（右）在一起。



2003年，与本书译者沈苏儒（右）、贾宗谊（中）和钱雨润（左）在一起。

与妻子黄浣碧在一起。

目　录

第一章　十字路口——西行·东归
第二章　我的家世
第三章　邱茉莉的家世和成长历程
第四章　在哈尔滨的童年生活
第五章　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
第六章　初任记者
第七章　战地记者（一）：南京
第八章　战地记者（二）：武汉、台儿庄
第九章　战地记者（三）：广州
第十章　在香港同宋庆龄共事
第十一章　内陆之旅
第十二章　重庆序幕
第十三章　逃出香港日本拘留营
第十四章　“范达”号的航程
第十五章　再到重庆
第十六章　从重庆赴延安
第十七章　访问延安（一）：新中国的胚胎
第十八章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第十九章　访问延安（三）：在敌后
第二十章　途经印度
第二十一章　英国：一九四四年
第二十二章　美国五年：在逆境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第二十三章　波兰见闻

第二十四章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第二十五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第二十六章　四访西藏
第二十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第二十八章　狱中岁月
第二十九章　重获自由
第三十章　我失去了邱茉莉
第三十一章　夕阳之歌
译者后记

第一章　十字路口——西行·东归

在西方，罗盘据说是指向北方的。发明罗盘的中国人却称它为“指南针”。指北或是指南并不影响它辨明各种方向的功能，但它确实会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对性和观念的多极性，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甚至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用语之中。比如英文里的“How much？”或“How many？”在中文里就成了“多少？”任何东西的长度都说成“长短”。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

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在这一章中所写的是我和已故妻子邱茉莉在婚后生活中处在时空十字路口的一段经历。离开中国到“西方”去，却使我们更紧密地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我们回归中国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无论从地域或社会根源上说，我们两人都不相同，但我们受到了同一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使回归中国成为我们两人的选择——或者说，历史为我们两人所作的选择。

时间是1944年。地点是重庆——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我和邱茉莉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刚开始不久。我们正要动身到美国去，途经

她的家乡英国。她是英格兰人，出身于一个地主绅士家庭。我是一个无国籍犹太人，在波兰出生，在中国成长。

在我们的道路上横亘着一座规章制度的大山。我需要有签证，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难获得签证的。英国长期实行一种大男子主义的野蛮立法，一个英国妇女如果嫁给一个外国人，那么她就丧失英国公民资格，并应该去取得她丈夫所属国家的公民资格。这一规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上台才取消。所以邱茉莉嫁给我就有丧失她自己的英国护照甚至英国国籍的危险。但她以我无国籍为理由，要求保留她自己的英国国籍。即使我“无国籍”这一点也还要查验。重庆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官对她嘀咕道：“那个人总有个出生地吧？！”

多精明的小子。我当然有出生地——华沙，1915年。但在官僚政治地理中这算是什么地方？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波兰的约200年中，华沙地区属于沙皇俄国。直到我出生之后，华沙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首都……

更有甚者，从种族上讲，我又不是波兰人。在“二战”前，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犹的政府（大学里犹太学生须分坐就是一例），所以我也没有波兰的身份证件。

最后总算有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这个波兰政府（当时是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在重庆有个大使。对他来说，我的犹太血统、我的政治倾向以及我本人对他都毫无用处，所以他乐于证明，从法律上讲，我不是波兰人。这对邱茉莉来说是意外的优待，她可以因此而保留她的英国国籍了。对我来说，虽然从法律上讲我什么人也不是，但因为我有一个合法的英国籍妻子，所以我有资格作为配偶去访问她的国家。

但有一个条件，即：我只能在赴美国途中（我们都已有美国的入境签证）在英国作短暂的过境停留，这样我就不可能赖在英国了。

几十年后，从公开的档案中我了解到，当年在是否批准我入境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有一个官员暴戾地批示：无任何理由准许入境。另一个官员态度比较温和一些，他写道，因为我刚从延安回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结束的对日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即使如此，他仍写道：“当然，爱泼斯坦是彻头彻尾迷上了延安的。”

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而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　※　※

那么，出身截然不同的邱茉莉和我怎么会成为终身伴侣，而且是在中国？答案不仅在我们本身，还在20世纪的历史怒潮中。

这个历史怒潮使我的父母带着刚出世不久的我在1915年来到了中国。他们是从维尔纽斯来的，这个地方在他们出生时是俄国统治区，后来成了波兰占领区，今天则是立陶宛的首都。作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沙皇统治下都坐过牢或被流放过，罪名是参加了同流产的1905年革命有关的活动，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后来，他们成了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先在西欧各地，最后来到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把我的父亲吹到了日本。他的职业是会计，在俄属波兰一家同西欧做生意的贸易公司工作。因为原来的

商路被德国战线隔断，原有的贸易不得不舍近求远，转移到太平洋转口，经常是通过日本的港口。因此，父亲被派到了神户。这时，德军正向华沙挺进。为了避免家庭长期分离，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日本同父亲团聚。

1917年2月，俄国的沙皇专制政权被推翻。父亲马上从日本赶回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去同老同志们会合。当时在海外的俄国人和俄国属地的臣民，同后来散居国外的“白”俄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大多反对沙皇制度，所以都兴高采烈地纷纷返回革命的祖国。

父亲想把母亲和我也接回国，所以叫母亲到中国的哈尔滨暂住，以便坐火车回去。但等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白”军在西伯利亚造反，切断了铁路交通。到20年代初期，苏维埃政府修复了西伯利亚铁路。但这时苏维埃政府同我父亲所属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之间的分歧扩大。这样一些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在中国住下来了。

我们从哈尔滨移居天津——一个“通商口岸”，城里有各国“租界”。英、美的影响力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都如此。我从五岁起就在外国学校上学，使得英语成为我运用最方便的语言，最后又成为我所选择的职业——新闻——所用的工具。

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思想同我所受的殖民主义类型的学校教育是截然矛盾的。它使我对于外国主宰中国的种种现实感到不合理和不公平。加之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前驱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父母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

史”了。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以及伴随着的种种恐怖行径——发生在我身边、为我耳闻目见——使我觉醒，对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产生越来越深的同情。这一革命浪潮既表现在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抵抗中，也表现在1935年北京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中。

这些行动是全球性反法西斯浪潮的一部分。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以及德、意对西班牙法西斯叛军推翻共和国的武装支持，都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正在增长。西班牙和中国是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及其盟国日本武装侵略的两处最早的战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难感觉到的，它们赢得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的敬佩和援助。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

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紧跟着一段繁荣时期（它被吹嘘成西方将无休止地不断增长、繁荣下去）之后，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失业人数打破历史纪录。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苏联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苏联是唯一一个为阻止法西斯主义而努力的大国。亲苏的情绪扩大到共产主义运动以外。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于许多没有亲历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古老的、模糊的历史陈迹，所以需要在这里回溯一下。

邱茉莉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长受到同一历史气候的普遍影响，使她在成年以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她学过农业，曾在英国约克郡务农，后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接着她去接受职业培训，当过职

员，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并且认同这个群体，有时参加他们的抗议游行。这一经历，加上她早期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威廉·莫里斯(1)的激进思想），使她左倾。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想去美国或苏联。这是政治社会体制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她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因为她的政治观点尚未定型，而是因为她觉得在这两个国家里，妇女的地位都比当时的英国要好一些。

后来，由于机遇和家庭的关系，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见到了殖民地（现在称作“第三世界”）的种种景象。后来，她在这个学会的纽约总部工作，这里的学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触中，她发现左派学者更开明，同她更投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中国人，给她的印象很深。他们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如果当局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就不会让他们出国，还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西方，如果暴露出共产党身份，他们就很难在学术团体找到工作。

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同情日益扩大，邱茉莉在美国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支持者。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后来我们一同被关在日本人设立的外国平民拘留营里。我们决心同另外三个朋友（他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并取得了成功。

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我正在同前妻办理协议离婚的手续。她当时在美国。我同她有一些共同的观

点，但我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希望我们在美国建立家庭，长期居留。我想留在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我选择留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1938年我父母移民去美国时我留下了——这同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通常总是年轻人先走，然后把父母接去。

我同邱茉莉不但相互选择了对方，而且选择了同一条生活道路。我们是1943年结婚的。40年来，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直到癌症把她夺走。

※　※　※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1944年离开了中国呢?

我刚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回来。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我想就这两方面写成一本书，但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很难做这件事。在采访过程中，我所有的电讯报道都要通过重庆发出。尽管我这些电讯都是发给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的，仍然免不了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乱删乱砍，即使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难以幸免。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消失。蒋介石根本不去同日本作战而是坐待盟国打败日本。很明显，他要把他的精锐部队和美国供给的武器保存下来，以备将来打共产党之用——共产党一直在不停地对日本作战，并且代表了全民族建立一个强盛中国的希望。在蒋介石的地盘里、在即将发生的内战阴影之下，这些也是很难写出来的。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得胜利，当时我们正在伦敦。在之前的两个来月里，我们经历了纳粹V－2飞弹对伦敦的最后轰击。

7月，这是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我们到达纽约。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了美国拘捕谢伟思的新闻。谢伟思是美国派到中国工作的最有见识也最坦率的年轻的外交官之一。他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史迪威生性直言不讳，知识渊博，他很了解中国，曾任驻华美军司令，主张既同共产党领导的也同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抗日。谢伟思赞同他的长官的主张。为此，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史迪威被召回。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此后，美国政府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蒋介石，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准备并且实行内战。派驻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中绝大多数反对这一决策，认为对美国不利、对将来的美中关系不利。为此，他们在华盛顿被诬为“不忠”，因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有的被调到尽可能远离中国的岗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先见之明的人受罚，对形势一无所知却执持偏见的人则受赏识。

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历史转折的一部分。如同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重新发动内战，标志着美国和世界政治从反法西斯战争转移到了“冷战”。事实上，打败蒋介石的是中国人，是中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虽有美国供应的全部武器和巨额金钱，仍不免于失败。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却引起了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运动，似乎中国曾经是美国所有的，或者俄国人把中国吞食了，或者中国人在群策群力洗雪了受外国欺凌的百年耻辱之后（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经实现），中国仍然应该为某一外国所有而不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有。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嚣声里，人们可以感觉到麦卡锡主义的第一阵阴风。在国际上，它导致了所谓“遏制”和“打退”中国革命的努力，从而出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22年之后，在以上这些冒险行动相继失败之后，美国才迈出了同屹立

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第一步。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

※　※　※

历史潮流涨退，邱茉莉和我面临着另一种选择。在我们居留美国的五年中，我们的选择是帮助那些反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人，这一政策完全无视眼前的现实。如同在国民党中国时一样，我们的这一选择使我们为美国官方所不喜，我们当然也不喜欢美国官方。虽然我们暂时置身于太平洋彼岸，但我们的精力仍然如同在太平洋此岸一样倾注给了中国——起初是据理驳斥杜鲁门的亲蒋政策，后来是参加一个运动，促进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和贸易”。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下文将再详述。我在这里只谈到我们在这些年里所作出的两次重大抉择及其历史背景。第一，离开中国，以便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呼吁（我所著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在美国出版，从历史的前因后果来介绍中国革命）。第二，回到新中国来生活和工作，这在1951年实现了，并且是永久性的。这样就结束了我们西去东归的这一个大圈子。※　※　※

现在让我再简短地回叙一段1944年我们离开中国时的情况。我们离开重庆之前去拜访了周恩来。

他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同国民党维持着久已摇摇欲坠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使统一战线复活起来，以便在战后避免内战、在过去几十年灾难的废墟上加速国家建设，中共赞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除国共两大党外，其他较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也都参加。我们问他：“您真的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吗？”

“是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管他参加还是不参加。”这里的“他”，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他不参加”是说，如果蒋抛弃合作、选择内战，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孤立境地，脱离非常广泛的全民族主流民意，包括他自己党内的成员。

我们远离中国，有时信息也不通，但我们从未忘记周恩来的话。他的话已为1944年到1949年间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的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

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邱茉莉的骨灰安息在中国，只有一部分送去英国。

我到2000年已年满85岁。在这个年纪，我试图更详尽地忆述我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交织的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我希望我的这些忆述能为未来——必将更趋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沈苏儒　译）

(1) ［译者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先驱者，19世纪伟人之一。

第二章　我的家世

在父系方面，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祖父戴维·爱泼斯坦据说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那·贝弗，她的家庭从事于出版希伯来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使他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因为他必须用多种文字来写邮包上的地址和提货单。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了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虽然他的经济收入从未超过中下水准，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了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祖父和祖母在许多方面都是鲜明的对比。祖父矮小、结实，思想和行动都深思熟虑。祖母比祖父高出一个头，又瘦又黑，鼻子尖尖的很好看，说话做事干脆利落（她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她有一颗“部长的头脑”）。但他们相处和睦，生育了九个子女，有的高挑，有的中等，有的矮小，其中有两个驼背，可能是患了佝偻病。

但正是这两个孩子——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它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孟什维克（社会党）。

“同盟”成了他俩的生命。由于他的一位老师的引导，父亲大约从12岁起就为他的党服务。像他这样小个子又驼背，别人是不大会怀疑

他秘密传递革命情报的，而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姑妈丽贝卡又能干，又热心，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她成为工会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学接受培训。她被选为维尔纽斯犹太人社区理事会成员。她终生未嫁，但关心热爱儿童，不断地参与学校、幼儿园的事务。

她最终被德国纳粹杀害。据说，即使在列队走向可怕的死亡时，在一种旨在彻底剥夺一切人类尊严的环境中，她仍然尽量伸直她佝偻的背部站立着，并且还帮助他人。

沙皇的宪兵常常来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亲和姑妈的证据。每到这种时候，祖母总是显示出她的大无畏精神。她会不失时机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证的文件藏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们被捕了，她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监狱里去。

190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六次大会，父亲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参加，当年他还不满21岁——在那个年代，革命者都是在年纪很轻时就参加工作的。那次大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参加了，被称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总结了1905年俄国革命初期迅速发展、最终惨重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作出这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求整合1903年以来两派分裂的局面。列宁出席了，还有托洛茨基和当时尚鲜为人知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称“斯大林”）。孟什维克的主要人物普里哈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也都出席了。

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叶落归根”。意思是说，到衰老死亡时，人们总会回到他们的老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受依地语(1)教育的东欧犹太人的一代——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些“叶子”在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下

已早早地被摧残或分散了，“树根”被不人道地拔掉了。因此，幸存下来的那些“叶子”退而求其次，只能去相互依存了。

我的父亲在过90岁后不得不住进了纽约的养老院。他选择了位于布朗克斯区(2)、由工人团体开办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住着不少幸存下来的“犹太劳动同盟”会员。

他进院时，有一位早已在那里的同时代人同他打招呼，对他说：“我听过你的讲演，1906年在明斯克一座楼房的阳台上！”

住在立陶宛和波兰的我的家族成员，有几十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只有一个活了下来——我的嫡堂妹比巴。她被关进一个专关妇女的纳粹集中营，在德国即将战败时，集中营中幸存的一些人被赶上开往波罗的海的一条船，船底装着一枚水雷。但这枚水雷没有爆炸，船上的人获救后被送往瑞典。经过长时间的探寻，我的堂妹比巴总算同住在纽约的我的父亲联系上了。父亲把她接到了美国。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同丈夫、子女、孙子和孙女居住在洛杉矶。

在我父亲这边，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三个姐妹埃玛、索妮娅和安娜以及一个弟弟亚历山大——他们很早就去了苏联。姐妹们在学校教书，弟弟则死于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

另一个弟弟艾萨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在新泽西州当餐馆侍者，死在那里。他不问政治，渐渐脱离了犹太人的圈子，跟意大利裔美国人混在一起。他好吃喝，有多少钱都吃光。他在当地的人缘不错，关于他的故事也很多。他十分矮小，在开车时，别人常常看不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他，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当一辆空车滚过来时，人们就会说：“艾培(3)来了！”

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迹象表明他希望安葬在犹太人墓地里。据说，他那位忠贞的、信天主教的女友坚持要这样做并且履行了正规的仪式，使他能同他的疏远已久的上帝和好。

※　※　※

在母系方面，母亲的家庭较为富庶，但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犹太劳动同盟”。

我的外祖父莫舍·埃毕兹是维尔纽斯的一位皮革商。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在东欧犹太人中盛行的这一思潮，以正统的宗教为基础，但通过多种不同方式接受现代思想。后来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类似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既要建设现代工业和国防，又要保持他们的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在基本态度和时机上同东欧犹太人的“启蒙运动”都是相仿的。但两者也有相异之处。中国的维新派主要是官员，他们力求挽救他们的封建国家，使之适应时代。犹太人没有官员，没有国家。所以我的外祖父不用去考虑财政预算、行政制度或者国防军备。

在宗教生活方面，作为犹太教割礼[(4)]执行人，他的现代化思想就是主张并采用卫生的方法以取代传统的不卫生的方法（一个老式的割礼执行人会把一个男婴的生殖器含在嘴里，以求止血）。所以我的外祖父所追求的是取得一定的进步，但不逾越犹太居民世代相传的规范。

这位老人在性格上也是很开放的，实际上是那种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他子女众多，妻子一共生了16胎，存活的有七八个——年龄相差悬殊，当最小的孩子还年幼时，长子已是“一家之主”，为挣钱养家而

劳累了。我母亲回忆说，这位长子（也就是她的大哥）是严厉的当家人，而他们的父亲则温和仁慈。外祖父对他的长子实在是不公平的。当他自己年逾七十、长子四十多岁时，他还在嘟嘟囔囔地抱怨这位心事重重、严肃拘谨的长子，说：“那个老家伙让我厌烦。”更适合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性格的是他那几个年轻一些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外祖母去世后，他又同一个好朋友的寡妇结婚，使大多数家庭成员都很气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87岁，仍然健朗……

但没过多久，德国占领维尔纽斯，他就完了。他是死于纳粹的毒气室，还是被一个冲锋队员或德国兵打倒在地又猛踢致死（许多老年犹太人都是这样死去的），或者他仍留在犹太人居住区，因饥饿或疾病而死？没有人亲眼见到。

现在再回叙早些时候的事情。说来似乎矛盾的是，外祖父“受人尊敬的”商人地位反而导致我母亲第一次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那时她才16岁，刚参加“犹太劳动同盟”的青年组织。因为外祖父的家似乎较为安全，所以她的同志们把马克思主义书籍藏到她家里，但很快就被人向沙皇宪兵告了密。我母亲被投入监狱，过了几个星期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纳雷姆。

那时被流放的人都是在监护下一站一站地行进，先坐火车，接着乘轮船，最后是步行，晚上则关在沿途设置的牢房内。

母亲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似乎没有觉得那是一场苦难，更多的是感到兴奋和开阔眼界。在步行途中以及后来到了纳雷姆，她都是同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知识丰富、信念坚定，她把他们视作老师。他们大多数比她年长，也有只比她大几岁的，后来在苏联都成为显要人物，瓦莱里安·古比雪夫就是其中之一。古比雪夫曾主管苏

联经济，逝世后有一个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二战”中成为苏联的临时首都。在母亲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信念的、非常英俊的、能言善辩的青年。

在“犹太劳动同盟”的组织中，我父亲是母亲的上级。他们虽然过去并不认识，但他处处呵护她，因为她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他在几十年后曾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维尔纽斯城外一处森林公园里，青年组织成员在这里聚会。她正因一次少女初恋的失败而悲伤，泪流满面。

这个公园名叫波拿里，在40年代的大屠杀中，这里成了纳粹的杀人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

我父亲虽然只比母亲大五岁，但比她经历过更多锻炼。他已经过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1905年革命的考验、被捕过（前后共被捕五次），并曾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秘密前往伦敦。同我母亲相识时，他的职业是一家商业公司的雇员，正要出差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去。

柯尼斯堡曾属于德国的东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苏联，改称“加里宁格勒”。

他问我母亲要带点什么东西给她。她说，要一把普通的折叠伞，这东西在德国有，本地却买不到。等他出差回来时，她已被关进监狱，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打听到她那间囚室的窗户虽有铁栅栏却是临街的，他就到街对面那一边走来走去，把折叠伞举在头上，让她看到后知道他并没有忘记她的嘱托。

后来，她到了西伯利亚。他们通信，他帮助她脱逃。

母亲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父亲寄给母亲一本书，附了一张字条，说这本书的装帧很好。她领会了这一暗示，就把书的封面和封底划开，发现在封面里层是给她用的一张护照（那时这种身份证件没有照片，护照上虽不是她的名字，但其他项目都同她相符），在封底里层则是一些大额钞票，是外祖父给的。有了这两样东西，她就找了个空子，溜出她的指定居住区，一个劲地往前走去。

她能脱逃是由于这样几个因素。第一，对她的判决是“行政性流放”，而不是像对其他“政治犯”那样，坐牢或苦役。她只是一个年轻姑娘，没有“历史问题”，无须加以特别的监管。第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管辖好几个村子，经常出去巡回督察。像许多农村地区的小官僚一样，他在那些由他监管的知识分子面前似乎矮了一截。他恭敬地请这位教他儿子数学，又请另一位教他女儿弹钢琴。这些流放者实际上成了他的管家——他们甚至于趁他出巡时在他家召开秘密会议。第三，这位局长的女儿同我母亲年龄相仿，她教我母亲怎样雇到一辆马车、到什么地方去换乘汽船，使我母亲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第四，我母亲身上有证件（在旧俄，人们必备的三样东西是：“身体、灵魂、证件”），又有足够的钱供旅途之用。她就这样经由水路、陆路、铁路横跨俄国并且到了境外——巴黎！她很高兴能逃出来，只有一点不放心——不知那位局长和他的女儿会不会因为她而遇到很大麻烦。在巴黎，由于“犹太劳动同盟”和其他流亡在外的革命者的帮助，她找到了一份工作——为犹太诗人阿弗拉姆·兰辛当秘书。她随同阿纳托里·卢那察尔斯基——未来的苏联文化部长——去博物馆和画廊，担任高水平的团队导游，大大开阔了眼界。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那时已在

中国）常常翻看我母亲带回来的那本厚厚的Petite Larousse法文字典，增长了一些关于法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识。

其实法国不是我母亲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大约在12岁时她曾随外祖父去过伦敦，外祖父是去做皮革生意，母亲在那儿上了一阵英语学校。

过了些时候，我父亲也到了巴黎。此前，他在沙皇监狱里蹲了一段时间。我父母在境外重逢，友情发展成了恋情。他们一起去瑞士卢加诺湖度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们回到维尔纽斯结婚。我母亲本着她“人人都应有一技之长以服务于人民”的信条，接受了担任助产士工作的培训。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依地语（Yiddish），或作意第绪语，为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2) ［译者注］布朗克斯区（Bronx）在纽约市，为普通住宅区，居民中有工人，也有黑人。

(3) ［译者注］艾培（Eppy）是对姓爱泼斯坦（Epstein）的人的昵称。

(4) ［译者注］犹太教对初生男婴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行礼时，用石刀割伤阴茎包皮，作为神和人缔约的象征。伊斯兰教、基督教少数派别也有类似活动。见《辞海》“割礼”条。

第三章　邱茉莉的家世和成长历程

现在来说一下邱茉莉[(1)]的家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有的是她在不同的时期讲给我听的，有的是在命运把我们永远结合在一起之前，我所知道的。

她的父亲休·费尔法克斯-乔姆利（1864—1940）是英国约克郡勃兰斯比村的乡绅，继承了几处农庄，但后来大部分都卖掉了。就英国的乡绅阶层而言，这个家庭是不典型的。因为他的祖上信奉罗马天主教，所以300年来这个家庭的成员与仕途和军职无缘，而正是这两者使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成为英国保守势力的柱石。

到了休·乔姆利手上，虽然他本人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其他家庭成员仍继续信奉天主教），但并没有使他同当时流行的社会习俗更加合拍，倒是离得更远。从大学时起，他就倾向于激进思想，具体表现在他那条鲜亮的红领带上，正派人见了都会摇头。家族中有这样一个传闻：他的一位脾气古板的姑妈命令她家的门房，如果她的侄子戴了这样的红领带，就不准他从大门进来，让他跳篱笆，从后院进来。她是很愿意见到这个浪荡公子的，但又不想惹来邻居们的议论。

这个青年自己则从志愿到“托因比大厦”慈善机构为伦敦的穷人服务开始，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他对威廉·莫里斯渐生敬慕之心，并且常常参加萧伯纳这样的人物所组合的社交圈子。

在主持家政方面，他也不按老一套规矩办事。直到快40岁时他才同他家一个园丁的女儿艾丽斯·莫弗雷（1885—1963）结婚。她就是邱茉莉的母亲。为了使她能够担当这个家庭女主人的角色，从她12岁起他就让她受教育并指导她的学习——如同“皮格马利翁”[(2)]的故事那

样。举行婚礼之前，他把她全家从农村送到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当时还是郊区），并在那里给他们置了一所房子。由此可见，他也仍然不能彻底摆脱老规矩的束缚。

作为一位乡绅，他是家长式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村里搞了一套小型的自来水设备并设了一部公用电话（附近的地主们为此大为恼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佃农们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为了开阔佃农们的眼界，他建了一座红砖小会堂，取名“乔姆利馆”，每个星期日下午让佃农们到这里聚会，听他念《曼彻斯特卫报》——自由主义者的喉舌。邱茉莉回忆道，这件事情可不像自来水那样受到佃农们的欢迎，因为他们星期日上午要上教堂，下午就想干点别的事情。但对她父亲来说，他这样安排正是为了要使这些《卫报》社论对上午刚听到的牧师们正经的布道起一种消毒的作用。他虽然仍然遵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但不虔诚。

宣布脱离天主教后，休·乔姆利自己去参加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礼拜——这是时兴的事。但他不喜欢本地的教区牧师，所以对勃兰斯比村的教堂实行抵制。每个星期天他都要乘坐他的二轮轻便马车，“铃儿响叮当”地驶过本村的教堂去邻村的教堂。

这位英国“怪人”——他既是托尔斯泰型的，又是叛逆型的——很有艺术天赋。他是个很好的男中音，能唱许多英国和意大利民歌，常常抱着吉他自弹自唱。音乐是他留给女儿们的遗产的一部分。邱茉莉学会了大提琴，她最小的妹妹罗莎蒙德会拉小提琴——她们常常参加四重奏演出，水平相当高。

邱茉莉一直记得从绿色的、农业的英国传下来的许多古曲老歌，在我们婚后她曾教给我一些。在重庆，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位老歌迷，

他常带着他自己的吉他到我们住处来一起唱歌。他就是李约瑟教授，“二战”时任英国驻华科学代表团团长，他后来所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碑式的学术巨著。

另一件事邱茉莉要感谢她父亲的是他决心使子女们——不光是儿子，女儿也一样——受到良好教育，使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并对此十分关心。当时，社会地位较好的年轻女子，上了几年学之后，大多就准备出嫁了。但他要她们准备自食其力——后来确实也是如此，因为家里的田产大部分卖掉了，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钱财。

邱茉莉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后来她到海峡区的北福芝德私立女子中学念书，以后又到雷丁农业学院学习饲养奶牛。她的小妹妹罗莎蒙德则在伦敦大学接受培训，成为医院膳食营养师。

关于邱茉莉的幼年和少女时期，我只有一点零碎的文字资料。

大约在七岁时，她写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没有日期），这封信不知怎么一直留了下来。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圣诞老人：

请你给我一辆自行车；一个大的洋娃娃，穿长衣服的，我会照顾她；还有一本童话故事书，随便什么都行；我还想要一盒纸牌、一盒颜料和一个球，我要玩。

很爱你的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如果你看不清地址，那是：22 Montpelier Crescent，Brighton．这地方不在勃兰斯比村。

Brighton（布兰顿）是她家曾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邱茉莉要圣诞老人把礼物送到那里。勃兰斯比村在约克郡，是她祖辈世居之地。她在这样小的时候说话就那样明确具体，这个特点她一直保持着。

下面两封信是在她去世后她的中学女同学写的，内容都是回忆往事。

有一位老同学这样写道：

我一见她就喜欢她。我知道她不寻常……她常有一种使人向善的感染力……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或者是想要使自己变得更好……别问我为什么……有时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对方是怎样一个人……能认识她我觉得非常幸福——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人。她是这样充满人情，却又是这样纯真。

另外一封信的作者回忆了邱茉莉爱玩又爱反抗的性格。她写道：

我们（三个同学加上邱茉莉）被称为“四剑客”，因为我们都反对统治势力……我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学校，使那些“老婆婆”式的女孩子感到骇异，她们大多在最后一学期结束时哭哭啼啼，而我们却开怀大笑，还私下里开“派对”。

我们称呼邱茉莉“花儿”，因为她一感冒，鼻子就红。她常对我们说，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们说，农民家厨房里总是挂满火腿的，她真的搞来一只火腿，挂在钩子上，跟大家开玩笑——她有很强的幽默感。虽然我这么多年没见她了，我肯定她始终保持着这种幽默感。

她的猜想是对的，邱茉莉确实始终保持着这种幽默感。

邱茉莉25岁时，她经营的农场因大萧条而失败，就去伦敦找工作。她父亲在这时给她写过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感到她父亲在她进入劳动者行列后仍然对她有影响，并且仍然想把他的价值观传授给她。他在信中对于当时英国保守派报业巨子比弗布鲁克勋爵和罗瑟米尔勋爵这样挖苦道：

> 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坏家伙。我想罗瑟米尔是更大的坏蛋，但我不敢肯定。他们中的一个想得到鲍德温首相的关照，升为贵族，并为他的儿子在内阁中安排一个位置，被拒绝后就怀恨在心，大骂鲍德温。

另外一封信讲的是个人方面的事情。他建议邱茉莉努力成为作家，但她表示不想接受这个建议，他也就同意了。这封信的措词反映出父女两人的个性。他在信上说：

> 你认为除非你有什么话要说，否则你就写不出东西。所有其他的写作都是毫无价值的，即使掌握了“说空话”的艺术……正因为这样，所以你应该多读书、培养自己对世界性问题的见解并且使自己对重要事物及人性产生兴趣……
>
> 就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而言，他们的地位越高，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就越广泛……你会发现，像雪莱、拜伦这样的诗人，他们深深地、严肃地关心改良运动，甚至还关心当时的政治。即使像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画家也有不容置疑的对知识性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兴趣。不论别人，就说威廉·布莱克这位神秘的理想主义者，也十分熟悉政治和社会问题。你不可能想出什么有价值的

主意，除非你用心去深入地——不是浮泛地——研究问题。但一旦你这么做，主意就会迅速地出现……那时你如有表达的能力，要写就很容易了。

他提到的作为模范的作家都是进步人士，就雪莱和布莱克而言，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派。布莱克有以下的传世名句：

我决不停止我的思想斗争，
也不会让宝剑在我手中沉睡，
直到我们建设起耶路撒冷，
在英格兰绿色的、欢愉的土地上。

布莱克是邱茉莉一生中最喜爱的诗人。这位18世纪的伟大理想家的诗作和刻画艺术都非常有力量，只要有新的版本出版，她总会去买来，我们两人一起阅读。

在兄弟姐妹中，邱茉莉同她父亲是最亲近的，谈话最多，吸收他的思想最多，在实践中则比她父亲走得更远。她童年时同佃农们结下的友谊一直维持到老年。她对合作社的兴趣也来自她父亲。早在1894年，即邱茉莉出生之前十年，她父亲就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车辆及其他设施，以帮助他们把奶牛场的产品远销出去（这所合作社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存在）。邱茉莉在中国抗战时期也参与了“工合”运动。

在政治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父女对英国统治制度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们一起阅读由克劳德·科伯恩主编的《周报》。这是一张激进派的“时事通讯”报（一种小型的、仅在有限范围内流通的小报），常以事实为根据，揭露上层社会中反动的、亲法西斯倾向。

但到30年代末期，年逾七旬的父亲认为内维尔·张伯伦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有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缔造和平”，女儿邱茉莉却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尽管她对“老爸乔姆利”的爱从未减退。

总的说来，邱茉莉的成长同我一样，也是受到同一时代世界潮流的推动，虽然从地理上或社会地位上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很不同的。1929年后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毁掉了她在约克郡所经营的奶牛场。她在伦敦学习文秘专业，但仍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出于对日益增加的英国失业大军的同情，她参加过几次他们的抗议示威游行。因为在英国，妇女的就业机会比男人更少，男女同工不同酬。她曾想移居美国或者苏联，那里对妇女的歧视较少。

1935年，她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到许多国家旅行的机会。这个机会来自她的家庭同上层社会的关系，但却使她更加坚定地左倾，最后使她来到中国，来到我身边。

她的父亲曾托他的一些有办法的朋友为她找份工作。有一个朋友正参加接待“太平洋关系学会”全球考察团。这个学会虽然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实际上却是美国主办的。它的秘书长爱德华·C．卡特为了改变一下它的形象，想找一个英国人来参加工作。他听说邱茉莉出身英国乡绅家庭，而且又是双姓（美国人往往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它表示门第高贵），觉得可能是适当人选。但他先要他的夫人艾丽丝·卡特见一见她。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看见邱茉莉身材高挑、容貌端正、没有娇气和架子、有教养而又坦率，觉得挺合适，就点头了。邱茉莉有点挖苦地告诉我说，这次重要的会见是卡特夫人在伦敦一家美容院里做头发的时候完成的。

但经济上碰到了一点困难。按照“学会”的规定，雇员本人要负担一部分旅费，但邱茉莉和她父亲都付不起。幸亏一位富有而热心的姑妈出手援助，她才算得到了这份工作。

她受雇后就陪同这个代表团继续它的全球旅行——到日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都有附属于这个学会的团体。后来她成为这个学会设在纽约的“国际中心”的正式工作人员，具体职务是学报《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秘书，这个学报当时由著名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主编。

这次意外的、足迹几及全球的远征扩大了她的视野。在印度，她看到了大英帝国华丽外表下本地居民的苦痛；在中国，她看到在外国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下，人民如牛马般地劳动。在日本，虽然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崛起，她遇到了谨慎而坚决地反对这一进程的人士，如学识渊博的康夫博士和来自贵族阶层的西园寺公一——后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二战”以后他住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在纽约以及在学会的国际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游胜地“优山美地”举行），她结识了为学会工作的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冀朝鼎博士和陈翰笙博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公开身份，因为在蒋介石统治下，中共党员不但不能出国，还随时有可能被杀害。

1937年，日本开始了企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力量站在中国一边。邱茉莉成了妇女界抵制日货运动的积极分子。日货主要是丝，用于制造女用长筒

丝袜（那时尼龙尚未出现）。日本对美出口丝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油、废钢铁和其他军需品。

她还参与了“美国救济中国战争孤儿委员会”以及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作（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看来，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斗争的两个前线）。

她在学会内部帮助成立工会。前面提到过的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像许多雇主一样，原来是同情职工的，但一旦职工的行动侵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就变了。他感到他那种家长式统治被触动了，由此认为邱茉莉——这位由他雇来的出身高贵的“英国小姐”——不知恩图报。

1939年，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英文名字叫“苏西”）去香港，名义上是为“学会”做出版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争取援助。因为中共虽然与执政的国民党结成了战时统一战线，但它的部队不但得不到军用物资，甚至连医药用品也没有供应。

这时，邱茉莉同陈氏夫妇已成为最好的朋友。她取得了“学会”委任她的一项任务，到中国内地去研究传统的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这在战时是很难进行的，所以她到香港后并没有去内地而是在陈翰笙领导下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工作。“工合”运动是使日本占领区内的技术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转移到抗日地区。她还同陈翰笙合作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报，报道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初名《内部参考》(3)，后改名《远东公报》，主编者用了“伊迪丝·克伦威尔”的假名。

正是在香港，通过上面说到的一些共同参与的工作，我们相识了。最初我们只是因工作关系而认识的一般朋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脸色苍白、金发的英国妇女，比我高出一头，工作勤奋，不大爱说话，年纪大概三十多岁（我才二十多岁）。据她后来告诉我，她觉得我只是一个矮个子、有点害羞的年轻人，“眼睛长长的，老往上翻”（可能因为她比我高很多，所以我要往上看）。除了好奇之外，我们彼此心里都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同第一个妻子仍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她也有她自己的私生活。

我第一次对她动心是1941年在香港街头同她的一次邂逅。她满脸愁容，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黑眼圈中。她刚经历过一段热恋——据她后来告诉我，不但是她一生中欢乐的巅峰，并且看来已达到了彼此的理解——最终发现被人欺骗了，被粗暴地抛弃了。

我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平时看来是非常能够自持的，现在却使人意外地感到她是如此的脆弱和伤心。但我当时仍没有想到或察觉到我们以后会结合在一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在此之前，我们在志愿为中国战时救济服务的工作中重逢。她的情绪显然已全恢复正常，在“中国平准基金会”找到了一份新的正式工作。这是由中、美、英三国联合组成的一个机构，任务是维持中国正在贬值的通货，使之免于崩溃。她到那里去工作是由于冀朝鼎的推荐。冀朝鼎同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同乡，他家的一个老朋友又同孔有关系，因此他成了这个“基金会”的中国代表之一。邱茉莉在她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使英国代表霍尔-帕奇大为恼怒，因为

她不是站在英国代表一边，而是支持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曼纽尔·福克斯和所罗门·艾德勒——他俩都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进步人士。

在18天的香港之战中，她不止一次到南华早报社来看我，我当时任该报副主编。每次她都需镇静、勇敢地从“山顶”高级住宅区——她从原住处搬到这里来同一位女友做伴——弯弯曲曲地一路下坡，这一带经常受到敌人的炮击。那时她参加了战时工作，帮助中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出版一种名为《香港战时快报》的新闻传单。

我们在一起谈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平准基金会”的文件。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员已匆匆乘飞机撤往重庆，冀朝鼎临行前给邱茉莉留了个条子，嘱咐她办这件事。我陪她到冀所住的“香港大酒店”房间里，把他来不及销毁的片纸只字都放进一个钢制废纸篓中烧掉。她还偷偷地告诉我，她和她那位住在“山顶”区的女友把一个马口铁箱子埋在花园肥料堆的下面。

我们还谈到如何使“中国工合”的档案不落入日本人手中——由她和同事们加以销毁。我还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同事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讨论香港陷落——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后，我们如何才能逃脱日本人对我们的报复，因为我们为中国的抗战效劳，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据我们了解，中共地下组织有一个帮助统战对象及积极分子撤退的应急计划。香港的自由主义报纸《大公报》的文学编辑杨刚是地下党员，她会告诉我们撤退的时间和地点。

日军攻占九龙半岛并进而在香港岛登陆这段混乱的日子里，我和邱茉莉失去了联系。她后来告诉我，她去当了一名志愿护士，工作地点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军队医院，设在十分时髦的“香港大酒店”酒廊里。她按照医生的嘱咐，尽力去做。伤员越来越多，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地板上，有的奄奄一息，有的痛苦不堪。我能想象她在工作时的样子——强壮的身体、不倦地劳动、对伤员无比关爱，尽管如她懊丧地对我所说，她所受到过的医疗训练只限于兽医急救，那是在雷丁农业学院学习时以及在奶牛场实际工作时所学到的。

但这时她在外表上一点也没显示出那一年早些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她对危险的回应是行动而不是忧伤。

我们的撤退安排由于香港的过快沦陷成为了泡影。我们再次相见是在日本人所设的赤柱平民拘留营，赤柱（英文名字是Stanley）位于香港岛的最南端。

她是随同住在“山顶”区的英国人一道来的。她用讥讽的口吻告诉我，住在“山顶”这个特权地区的英国人都是官方或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他们最初曾请求日本当局允许就把他们拘留在他们所习惯的这个有名地区内，彼此以君子之礼相待。但经过几次谈判，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所以他们成了进入赤柱营的最后一批外国平民，剩给他们的住处是条件最差的——营里的人说他们活该。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同意他们乘卡车来，所以他们带来了“席梦思”床垫、装得鼓鼓囊囊的箱子、食物，还有准备在营里买卖的各色物品。这些东西在拘留营里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因为早一些进来的人都靠步行，只能带一点点随身的衣物。

邱茉莉本来不属于这批人之内，只是因为作为一位住在“山顶”的女友的客人同她做伴，就意外地跟着这批人一块儿来了。

我一眼就看见她和她的那位女友在一辆卡车上。我帮助她们卸运行李。我虽然个子小，但腰腿是硬朗的。

在营内，我们住在不同的区域，她在英国人区，我在美国人区（我在营里用假名，并说是美国传教士）。

为了逃避日本人因我们帮助中国而对我们进行报复并且希望尽快继续这一帮助中国的工作，我们共同的脱逃决心又使我们聚在一起了。初时是共同策划，后来，在经历了共同行动和共同脱险之后，我们成了夫妇。

这是以后要讲的事了。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已故夫人的中文名字邱茉莉，是她的姓Fairfax-Cholmeley后半部分的拟音。她的英文名字是埃尔西（Elsie）。按通行的音译准则，Cholmeley应译作“乔姆利”。

(2) ［译者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钟情于一座女神雕像。罗马诗人奥维德据此进行创作，将主人公改成雕刻家，钟情于他所雕刻的一位理想女性，爱神维纳斯应他之请，给予这座雕像生命。1913年，萧伯纳又据此创作了一个剧本，主人公改成教师，他把一个操伦敦土语的卖花女培养成谈吐文雅的上流社会妇女，并且爱上了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

(3) ［译者注］原文为拉丁字Internos，意为“只限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

第四章　在哈尔滨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母带着我在哈尔滨虽然只住了三四年（1917—1920），但这座城市当时的面貌仍然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里——我现在已经年过87了。

哈尔滨那时的气氛是俄国味道的——特别是西伯利亚味道的。不像其他许多中国城市，它没有古老的历史，而是在20年间一下子兴旺起来的。直到19世纪末期，它还只是在松花江畔的一个渔村。据说哈尔滨这个名字来自满语，意思是“晒网之地”。

后来，快速的铁路建设使一座新兴城市在这里诞生。这条铁路是为了沙俄——当时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强国之一——的需要而兴建的。

我们所住的房子就是俄国式的，木结构，房间外有带檐的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院中大树参天，成群的乌鸦在这里栖息、喧闹。城里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的(1)。我们的房子位于“邮车街”和“炮队街”（现名“通江街”）的交叉路口，前一个路名来自铁路兴建以前这一地区的交通工具，后一个路名则反映了近期沙俄的军事占领。还有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路名，如“哥萨克街”“警署街”等。

在哈尔滨，如同在当时的东部西伯利亚，多数道路在夏天都泥泞不堪。有一种俄国式的敞篷四轮马车，由鬃毛长长的老马拉着，供人雇用。到了冬天，路上积雪被压得结结实实，公共交通工具变成了马拉的雪橇，它的底部装有很大的弧形铁滑板。

离我家不远处就是树木葱茏的“市立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公园里的主要建筑是一座有着洋葱头式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此外还有一些木板搭建成的商亭，出售茶水或冷饮（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泡沫很多，是用黑面包发酵制成的）。我在公园里玩时，常常碰到一座由人做成的公园“建筑物”——一位肥胖的、满脸通红的俄国老妇人，穿着无数条裙子，因为肚子里的伏特加酒太多而站立不稳，不是靠着大树坐着，就是趴在地上打呼噜。如果大人把她吵醒了，她就嘟嘟囔囔地骂人，对小孩子们，特别是当我们叫她“老奶奶”时，她就醉眼蒙眬地对我们微笑。

我那时交谈、理解和思维都是通过俄语。学英语是以后的事。尽管我们在种族上不是俄国人而是犹太人（我们以此为荣），而且我们的居住地是立陶宛和波兰（在沙皇统治下，很少有犹太人能住在俄国本土），但在我父母这一代，俄语和俄国学校教育仍然是使我们能摆脱犹太人圈子的束缚、接触外部世界进步思想的途径。我们不但通过俄语书籍读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也从俄文译本读到了卢梭、伏尔泰、左拉、雨果、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通过俄语，我们同俄国的反沙皇运动建立了联系。

在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中文译本接触到先进思想的，而且由于他们所熟悉的外语以英语为主，所以他们正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来获得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统治的武器。

※　※　※

哈尔滨这座城市同俄国动荡的现代政治史（包括帝制末年的革命活动）有关联。它是中东铁路的枢纽——这条铁路是沙皇建造的，通过中国的东北（当时称“满洲”），使联结俄国东西两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有了一条捷径。在铁路沿线两侧，是一个特殊的地区，由俄国管理和警卫，很像巴拿马运河区由美国管辖一样。前者早于后者若干年，据说是后者的榜样，这一情况现在已无人记得了。

同巴拿马运河区十分不同的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也起了剧烈的变化，驻守的俄军仿效俄国国内许多旧军队的榜样，很快就升起了红旗。不到两星期，根据列宁的直接指示，1917年11月2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一个地方苏维埃，由中东铁路工人、职员及驻军士兵组成。12月12日，它取代了原有的行政机构。但到12月26日，在西方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的军阀政府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并把他们遣送出境。

在以后西伯利亚内战时期，白军在美国、日本和中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下，控制了这个地区。在哈尔滨，原中东铁路总管霍伐斯将军和高尔察克海军元帅（他得到西方的支持，自封为“全俄最高行政长官”）制造出了第一个宣称全国性的、合法的白色政权。对白党来说，哈尔滨成了物资和人力供应的基地；在他们被苏维埃政权击败之后，则变成了他们集体的避难所。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已模模糊糊地懂得上述这些事件，特别是我父母的政治观点和经历。

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之后，也就是十月革命发生前半年，当时在日本神户工作的父亲赶回俄国以迎接那里的新秩序。母亲按照父亲的嘱咐带着我来到哈尔滨，准备坐火车回去。但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

时，西伯利亚的内战切断了铁路交通。几年后铁路恢复通车，这时父亲所属的“犹太劳动同盟”同处于胜利者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则越来越坏，因此我们只好都留居中国。

据我所知，“犹太劳动同盟”的立场比孟什维克左，比布尔什维克右，既不属于“第二（社会主义）国际”，也不属于新成立的“第三（共产主义）国际”。父亲自己对“第二国际”有很多责备，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的党都站在本国资本主义政府一边；在战后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唆使镇压左翼“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并杀害其领袖人物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都是父亲所敬仰的。对“第三国际”，他无法接受它对所属党的某些纪律约束。因此，有一段时期，他倾向于那个被称为“第二半国际”的、短命的由维也纳领导的中间派。俄国的白党认为他是“赤党”，而“赤党”又认为他“赤”得不够。

我在幼儿时期常常闹病，被关在家里，所以常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对他们所说的政治词汇也听惯了。所以在我的字母卡片上，“B”字就注明是“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的“B”，“M”是“Menshevik”（孟什维克）的“M”，所画的图像也不是平常幼儿园里常画的那些形象。

尽管那么小，我也不能不感受到哈尔滨外侨中政治风波的汹涌。有一次在市政厅内举办儿童联欢会，我认识了一个二十多岁的俄国犹太人新闻记者，名叫亚历山大·切尔尼亚夫斯基，在他父亲所办的左倾自由主义报纸《生活新闻》工作。他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在我小小的心田里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但几天之后，这个瘦削的年轻人就成

了一具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白俄军官们发现他在采访他们的公开聚会，就把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杀害了。

这是我听那些到我们家（我家只有一间屋子）来的目击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的。我还听说，那些哥萨克白军在日本支持的“首领”谢米诺夫的率领下，在俄中边境的格罗杰科沃、波格拉尼奇内等火车站上，把犹太人或“赤党”嫌疑分子从车上拉下来，剥光衣服拷打，然后用刺刀或开枪杀死。

我还听到过关于“疯狂的贵族”温琴·施特恩贝格的极端残忍的暴行。他也是日本支持的“白党”，一度占领了当时称为“外蒙古”的地方，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自居。在蒙古主要城市乌迦（现在的乌兰巴托），他下令对亲苏维埃嫌疑分子、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当然还有犹太人，均须处死——处死的方法使他们越痛苦越好。他最喜欢用的一种刑罚是把要处死的人放进一个木箱子里边，箱子的大小使他们既不能躺下，也不能站立或坐下，只开一个小孔，供他们伸出手来取食。这在蒙古是一种最残酷的传统刑罚。他的手下又想出一种新花样，供他们消遣。这些行刑者把食物放在“犯人”手臂够不着的地方。在蒙古，冬季的寒冷仅次于北极，“犯人”手臂伸出的时间一长就会冻僵，只要拿棍子一敲，就会在“犯人”的哀号和行刑者的狞笑中断成两截。

几十年之后，1956年，我参加了一个由中苏两国提供技术修建的新铁路的通车仪式，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位苏联新闻工作者告诉了我关于温琴·施特恩贝格末日的情况。1921年他被红军抓获后，在西伯利亚赤塔受到公审。那时这位苏联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少年，目睹这

个“疯狂的贵族”在被告席上已完全失去了骄横之气。他被判处枪决，比受他折磨的人死得容易多了。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父母那个圈子里的人，谈起这样的暴行和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都表现出愤怒和悲哀，但没有恐惧。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一种注定要被历史灭亡的旧秩序的最后挣扎。他们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在内战中，他们是完全站在红军一边的。

在西伯利亚的最东部，曾经建立过一个由苏维埃政权支持的临时性缓冲国家——“远东共和国”，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执政，利用日本和美国干涉军之间的矛盾，挫败日本支持的白军。我父亲曾被邀请在这个国家担任一个部长级的职位，管理经济工作。他虽然拒绝了这一邀请，但去过一趟海参崴，秘密会晤了红军游击队领袖谢尔盖·拉佐。拉佐后来死难的情状十分惨烈。他被日本人抓获后落在给日本人充当走狗的哥萨克人手中。他被一点一点地塞进火车机车炉膛内活活烧死。他成了我幼年时崇拜的英雄之一。

关于哈尔滨的经济方面情况，我们是通过父亲的会计工作和我家的房东皮尔勃拉耶这个犹太人家庭了解到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个犹太人家庭的年迈家长是做大豆生意的，中国东北当时是全世界生产大豆最多的地方。他经常说的是大豆的价钱、装运大豆用的麻袋以及作为饲料出口的豆饼。但他的子女以及他们那些常到家里来的朋友却瞧不起商人，满脑子政治。女儿娜佳是个高个子，拖着两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后来在苏联当工程师。娜佳的女同学吉达·苏勃特尼克后来去了美国，同欧文·波塔西结了婚，波塔西是左派的“皮革工人工会”领导人，富有战斗精神，又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哈尔滨是在中国，但我童年记忆中能表现出这一点的只是逢年过节时中国人的踩高跷表演，以及伴随着的民间乐器声和爆竹声。我那时还只是个四岁的孩子，要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们绑在高跷上的两腿。东北人本来就长得高大，表演者穿上大袍子，更显得十分魁梧，在众人头顶上走来走去，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巨人。为了看这场表演，我们必须到哈尔滨的“中国城”傅家甸去。一个在中国的“中国城”！在中国遭受殖民侵略的那个世纪里，这样的奇异景象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存在过。

※　※　※

我不记得我父母在我面前谈起过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些事件的。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学生运动开启了一场知识界的革命，并使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要促成“民族自决”，但在《凡尔赛和约》中，名义上是协约国之一的中国却未能实现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被占领土及权利的期望——这些领土和权利被转让给日本了。当然，也没有一个成为胜利者的“强国”，像中国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自动放弃它们在中国所侵占的利益以及令中国蒙羞的“领事裁判权”，只有新生的苏联这样做了，归还了旧俄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及相关特权。由此，中国人民在对西方民主国家失望和愤怒之余，对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关注迅速增长，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

在沙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哈尔滨发展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在松花江畔的“码头”商业区（现为“道里区”）；另一个是

称为“新城”的行政区（现为“南岗区”），这里有宽阔的马路和军政机关的高楼大厦，中东铁路局也在这里；最后一个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傅家甸”（现为“道外区”），是本地居民区，房屋破旧，地位低微，这里的居民见了俄国人，不管是谁，都恭而敬之地称呼“甲必丹”（Kapitan）（“长官”“老总”之意）。

在建筑风格上，这三个区域也不相同。“新城”是一座有纪念碑意义的堡垒，表现出扩张主义者的能量。正是运用这种能量，沙俄建设了横贯西伯利亚的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并且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架起了参与肢解中国的跳板——大连港和旅顺海军基地。但沙俄帝国这两处前哨阵地并没能保持多久，因为这个帝国本身已走到了灭亡的边缘。1905年，日本击败了沙俄的陆军，击沉了它的主力舰队。同年，俄国国内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历史已经证明，它是1917年埋葬沙皇制度的革命的一次彩排。

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的高潮中，新的、革命的俄罗斯宣布废止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地位，这些本来是帝俄同其他列强所共同享有的。

在中俄边境的俄国一边，以及在俄国欧洲部分的领土上，中国工人组成的队伍本着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精神，同红军一道英勇奋战。

※　※　※

在哈尔滨，我接受了一生中仅有的一点俄语教育。我所在的那个幼儿园是由革命诗人谢尔盖·阿里莫夫（这位诗人为远东的红军游击队所写的歌词享有盛誉）的前妻创办的。在园长和母亲的教导下，我学会了俄语字母并且很早就开始看书，从而使我保持并扩充了关于俄语

的知识，尽管后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所受的学校教育都是用英语。

俄国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多。犹太方面如何呢？在宗教上没有任何影响，我的父母虽然都出生在虔诚信教的家庭，但他们很早就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了。我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第一次进入一个犹太人会堂（哈尔滨有几处，但我从未去过）。我也从未学过希伯来文。

我父母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希伯来教徒，但他们喜爱依地语。这种语言当时已成为散居东欧各地的普通犹太人的大众语言，并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产生出有生命力的依地语文学和依地语报纸。但因为我们家住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所以他们始终未能教会我说依地语。

※　※　※

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早在希特勒出现之前。那时全世界犹太人中间正在兴起的政治倾向有三种：占少数的有钱人大部分主张同化于其他民族；工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数尚少。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正逐步让位于这三种倾向。

1920年，我们家从哈尔滨迁往天津——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本章中关于哈尔滨地名及俄国历史中人名的翻译承哈尔滨医科大学薛民表教授惠予协助，谨此致谢。

第五章　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

在哈尔滨住了三年多，我家搬到了天津。在这里，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并且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国式的，在天津则是西方式的（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的、最便于表达的语言。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

天津不同于哈尔滨，后者是随中东铁路的建设而兴旺起来的新城市，而前者则是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城市。到了近代，天津又成了大小列强像一群恶狼似的一口一口分食中国的最鲜明范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舰队的大炮轰平了防卫海岸的大沽口炮台，打开了从海上直通首都北京的捷径。从此，天津被分割成许多由外国人管理和警卫的“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城里的一条主干道经过三个不同的租界，分别取了三个不同的路名，在法租界的一段叫“大法国路”；在英租界的一段以英女王命名，叫“维多利亚道”；在德租界的一段以德国皇帝命名，叫“威廉街”。在其他各国的租界里，日租界有“旭街”，俄租界有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命名的“尼古拉路”，意租界有以意大利国王命名的“伊曼纽尔路”。(1)还有不少街道以外国侵华战争将领或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的名字命名，如英国的西摩尔海军上将、埃尔金伯爵，法国的格罗男爵(2)等等。这些路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进行羞辱和伤害。

在19世纪60年代，还曾一度有过美租界，但很快美国就放弃了。这件事常被美国人引用来证明它对中国没有实行殖民主义。对此，中国的第一任共和国总统孙中山早已提出过质问。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把它这个租界归还给中国而是给了英国？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没有它自己的租界，为什么美国在天津不但有一艘海军战舰，还有步兵第15团（代号为“能干”，英文为“Can Do”）长期驻扎？20世纪初叶在这个团服役的军官中有一些后来成为有名的将领，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马歇尔（五星上将、“二战”中任美国参谋总长，战后先后任美国总统驻华特使及国务卿）、史迪威（“二战”中任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矛盾，被美国政府调回，改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军军长）以及李奇微(3)和迪恩这两位“冷战”（其实是在朝鲜的“热战”）中的将领。

还有一个问题：当其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时，为什么美国只是坚持“利益均沾”，要求中国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使它享受到同样的特权？答案是：在19世纪的远东地区，在军事上和商业上，美国不是英国的对手，也不是俄国在军事上的对手。它坚持在这些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等于是爬在后者的背上，分享其侵略成果。美国这种做法，作家拉铁摩尔俏皮地称之为“还有我呢……”式的帝国主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得同其他列强同样强大了——或者比它们更强大了，它才走上领导的地位。

※　※　※

1920年我家搬到天津时，有三处租界已经没有了。俄租界是十月革命后新的苏维埃政府交还给中国的；德租界和奥匈租界是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后取消的。但另外五个外国租界依然神气十足地存在着。

我们最初住在意租界的“利玛窦路”（俗称“营盘小马路”，后改名为“光明道”）。利玛窦（1552—1610）是意大利人，明朝末年在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领袖。后来我们搬到了前德租界的“威廉街”附近。这条路在德租界取消后没有改用一个中国名字而是改名为“威尔逊街”，表面上似乎是尊崇那位宣布“民族自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实际上是使人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战胜国中的“老大”地位。但同时也会使人想起这位总统同意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这个古老的省份曾是孔子的故乡）的权利不是交还给中国而是转给日本，从而引起中国人民的失望和愤怒。

最后我们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4)住了下来。我们家离开英租界工部局所在的“戈登堂”不远。这是一座仿哥特式建筑，有塔楼，是为吹捧英国军官戈登而命名的。戈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参与焚掠北京圆明园，后来又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　※　※

我在天津居住和生活从1920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这一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它起初包围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最后把敌对国家在租界的权益和财产全部吞没。

虽然在租界这个“密闭器”中看起来一切安静得近乎麻木状态，但那些年里四周的环境不论远近都十分动荡。

在中国，20年代初期军阀混战；1925—1927年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军事大革命；1927年的反革命逆流导致国共十年内战和1934—1935年红军长征这一历史的里程碑。其间，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中国东北，促使中国抗日运动的兴起，发展成1937年开始的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在外部世界，1929年，随着一直景气的美国股市的垮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开始了。有好几年，几乎只有苏联的工业明显增长。欧洲的反动势力促使法西斯主义兴起。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力求摧毁共和国政权。在西班牙，欧洲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力量兵戎相见。

我这一代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记忆犹新，但我这一代人现尚健在的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在上面把一些主要事件综述一下。

在那些年里，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些事件的意蕴，并同我已有的传统影响相结合，确定了我成长和生活的道路。

在我22岁的时候，我不是从天津走出中国，而是走出了中国国内那个外国人的“密闭器”，进入中国的内心，进入中国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一生的选择。

※　※　※

现在我再来回叙在当时那个半殖民地的天津，我受教育和成长的一些情况。

我在五岁时开始接受用英语进行的学校教育，最初是在法租界内的“圣母得胜堂”（现名“望海楼天主堂”），实际上只是上幼稚园，因为那里的小学不收男生——也许认为女修道院里出现大一些的男孩子不大合适。

每天早上我们面向十字架，齐声高呼三次：“圣约瑟为我们祈祷！”谁要是调皮捣蛋，那些古板的修女们就会用她们手指上的金属“图章戒指”敲打他（她）的脑袋。虽然教学用的是英语，我们表现好而获得的金边微型奖状上却是用法文写的“Billet d'Honneur”（“荣誉证书”(5)）。为了法国的光荣，我们全校学生曾在1921年（或1922）集体到法租界的公园里去参加一个特殊的仪式。正在天津访问的、留着白色小胡子的霞飞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总司令），在这里为若安达克铜像揭幕，这位法国女英雄手持出鞘的宝剑，是胜利的象征。

在幼稚园里，我第一次感到宗教上的反犹主义的气息。一个希腊籍的小同学对我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钉在那里的。他说这话并无对我的明显恶意。我碰到有疑惑时总是去问父亲，父亲对我解释道：“这样的事情是罗马统治者干的，不是犹太人民。耶稣是犹太人，耶和华，他被处死是因为对罗马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发出挑战。十字架上所刻的四个字母 INRI是拉丁词缩写，意思是‘拿撒勒的耶稣(6)——犹太人之王’，这种嘲讽的话不可能是犹太人刻上去的。”

福音书上说，犹太传教士怂恿罗马人这样做。有可能。绝大多数高级传教士，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都是在外国的或本国的领主面前俯首帖耳的。这是我们家不信宗教的理由之一。

我们不参加犹太教徒集会，在“赎罪日”（犹太历7月10日）不禁食，不遵循犹太人的食规，不在“逾越节”按规定食谱进食。我到13岁时也未举行一种称为“bar mitzvah”的男性犹太教徒成年仪式（在仪式上诵读希伯来文《圣经》，表示从此担负起成年人的道义责任）。

但我们这个无神论的犹太人家庭，在世俗事务上却完全是犹太式的。父母亲用依地语谈话，他们喜欢这种语言。我幼小时所听到的催眠曲也是用依地语唱的。我从很小时候起就听说“逾越节”的故事，认为摩西是使犹太人走出埃及脱离奴役的勇敢的解放者，而不是把他作为宗教上的先知。不论信还是不信上帝，我们不崇拜“金犊”(7)。在“普林节”（一译“普洱节”），我们吃一种称为“哈曼塔希”（hamantash）的饼，这种饼用罂粟籽做馅，以庆祝古波斯大臣哈曼被处死——据《圣经·旧约全书·以斯帖记》的记载，这个哈曼阴谋把国内的犹太人全部消灭。在古代，我们犹太人对压迫我们的侵入者总要进行反抗。在每年的“献殿节”（或作“光明节”），我都要听人讲述在公元前二世纪时犹太人马卡比家族反抗叙利亚暴君安条克·埃毕方斯的令人激动的故事。我还听说过巴勒斯坦犹太人领袖巴尔·库克巴于公元一世纪时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爱国斗争的故事。我也听说，当我们上古的王者悖德败行时，我们的先知们就无情地予以斥责（但应该说明，在他们的话里很难发现对本地其他非犹太居民的同情心）。在中世纪，十字军杀害我们，宗教法庭把我们活活烧死。帝俄时代的大清洗对我们进行烧杀掳掠。到了近代，反犹分子在法国以叛国罪诬陷德雷福斯(8)；在俄国以莫须有的所谓“血罪”诬陷门德尔·贝利斯(9)。纳粹的超级恐怖行为——反犹太屠杀还是以后的事。

我们家里对于“我们是犹太人”这一点从不否认或讳言或含糊其辞。我从未改动我的英文名字“Israel”(10)（伊斯雷尔），把它改成

Isidore或Irving等等。我的姓Epstein（爱泼斯坦）也没有改动使之英语化，变成Stone或Epworth。同时，父母从未教我对非犹太人抱持任何偏见，而是告诉我，在非犹太人中有许多人不但反对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歧视，而且反对对我们犹太人的压迫和歧视。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唤起全国人民来保卫德雷福斯；在俄国，托尔斯泰、柯罗连柯(11)、高尔基和列宁都谴责帝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排犹主义。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和革命派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非正义的行为。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反动势力一边。这些思想都是我父母一点一滴灌输给我的。他们教导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应该怎样做——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而是要与人平等相待；既不以正统自居，也不主张同化于其他民族。有神论我们已经抛弃了；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我们的信仰。但我们对犹太人民怀着深情——从历史方面或从社会方面——并且把现代犹太社会主义传统看作是犹太人民所能达到的高峰。

我在十几岁时曾听父亲讲过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性批判。他的理想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犹太人都应同本国其他人民和谐相处并参加他们争取进步的斗争。如果在巴勒斯坦专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认为将为犹太人招致危险，而不是使问题得到解决。我所记得的他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的：

·巴勒斯坦已有土著居民。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殖民者国家的性质，这在我们这个20世纪里是不合时宜的，对犹太人和本地居民都是不可取的。

·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叉路口，几百年来引起十多个帝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不断发生战争并先后为不同的帝国所占

领。它将继续为列强所争夺。

·在那里建立的一个犹太国家能保持独立和强大，但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个争霸的帝国的前哨阵地或充当其爪牙。

他用许多史实——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来说明他的这些论点。但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料到，这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尽管如此，而且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是50年来的历史事实，他所预见到的复杂问题仍然存在。只有通过与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共存和共同发展，解决这些问题，以色列才能平静地进行建设。

※　※　※

虽然我父母没能教会我依地语，但母亲常唱的一些东欧犹太穷人的依地语民歌，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首歌《我送给他们一条羽绒被》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妇女送给一家富亲戚她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结婚礼物，却仍然受到怠慢冷落，因而发出如泣如诉的歌声。歌末的合唱词中说：“贫穷不是好事，贫穷不是好事，但让我们不要为一脉相承的自己的躯体感到羞耻。”

在政治上，我知道犹太劳动同盟的依地语盟歌《贫穷劳苦的兄弟姊妹们……》，它最后的反复句大意是：工人的红旗，用他们的鲜血浸染，悲愤地挥舞着，号召我们去战斗！

犹太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被看作是所有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我所学过的革命歌曲也是多民族的，其中有一首是用俄语唱的1905年革命进行曲：

我们要同旧世界一刀两断，
从我们脚上扫清它的尘垢，
一切涂金的偶像都对我们怀有敌意，
沙皇的宫殿多么可恨！
我们要同受苦受难的兄弟们站在一起，
我们要走向贫苦饥饿的人们，
使他们的咒骂指向作恶的人，
唤起他们同敌人战斗！

当然，我很早就听到过，后来学着唱过《国际歌》——最响亮的革命号角。

※　※　※

我带着以上所说的这些思想影响，在1922年七岁时转到“天津美国学堂”上学。我父母之所以选择这所规模很小、由社区居民主办的学校，大概因为他们认为在天津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它最民主、最少殖民主义气息和狭隘的地方观念。在我这个孩子眼里，这里有许多新东西。学校里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像。我父母向我介绍说，一位是使美国人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另一位取消了奴隶制度，他们都是革命者。在我父母的价值天平上，这是最高的评价。但在教室墙上装饰的美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如“鹅妈妈”“兔兄弟”），那时我看不懂，我父母也看不懂。(1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天平上，英国和其他老牌国家在华的影响已逐步为美国所取代。这一点也反映在天津的外国人社区内，儿童也不例外。

像我这样的少年儿童，还从未到过美国，有的也许永远不会去美国，但我们已在经历远距离的“美国化”过程，“化”的程度仅次于已在美国的移民。美国货如潮而至，其品牌声名大著。有些家庭虽然以前同美国毫无来往，也学着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一贯做法，向“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订购货物，这个公司是当时从太平洋彼岸进货的主要邮购供应商。

美国影片这时已在本地影院中处于主流地位，它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和形象灌输给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并且才开始学习英语。戴维·格里菲思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宣扬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美化三K党。卓别林和杰基·库根的《寻子遇仙记》散布了欢笑和温情。当我看到卓别林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街上读纽约出版的依地文日报《前进》（我们家订阅这种报纸）时，内心激动不已（有人因此说卓别林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和巴斯特·基顿让我们笑得肚子疼。看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影片时，我们这些小男孩一见那些煽情的爱情场面就嘘他，姑娘和妇女们却很开心（瓦伦蒂诺在20世纪20年代被崇拜为“伟大情人”）。朗·钱尼的《歌剧院的幽灵》是恐怖影片的先导，我们看得毛发直竖。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基什姐妹、格洛里亚·斯旺森、波拉·内格里的名字和面孔我们都很熟悉(13)。那些惊险故事系列片每一集总是在危急关头或出现一线生机时结束，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非看下一集不可。我们常去的影院有恩派亚、巴埃奥格拉菲等等。那里的日场票价只要一毛钱。(14)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影片，如法国影片《马西斯特》，它是同英语片《人猿泰山》(15)同时映出的；还有从德国来的莱辛的影片

《智者纳旦》[16]，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影片（伊万·莫斯佐金主演）。苏联影片是后来才来的。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黑白片。

过了几年，有声电影来了，引起了轰动，如乔尔森的《爵士乐歌星》[17]。彩色片的出现则更晚一些。

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不是平庸就是迎合低级趣味或者简直就是“文化垃圾”，但它也确实曾给天津银幕一些有思想、有启发作用的片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影片：《西线无战事》《小人物》《光荣的代价》《军士格里萨的案件》以及《百老汇旋律》和它的插曲《记住我那被遗忘的人》《兄弟你能不能省下一毛钱》。这些都是有深度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进行反思。

我们看到的苏联优秀电影有：《生活的道路》——讲述革命胜利后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的收容教养；《夏伯阳》——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游击英雄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复杂经历；艾森斯坦的历史性巨制《“波特金”号战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地同我的家史有关，所以使我的印象加倍深刻。在档次较低的苏联影片中有一部给我思想上冲击较大，片名为《寻觅幸福的人们》，叙述犹太人在新建的比鲁比詹苏维埃自治区的情况——这一实验看起来似乎是成功的，其实不然。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此之多，却想不起来曾经看过——哪怕只有一部——中国影片。中国电影院里外国影片充斥，但在供外国人娱乐的电影院里从不放中国影片。

在美国影片中，在后来那部制作态度相当严肃的《大地》之前（此片根据赛珍珠[18]同名小说改编，由保罗·茂尼[19]和路易斯·雷娜联

合主演），中国人都被描绘成邪恶的（如“傅满洲大夫”）或是可笑的。有一个可称是“半”正面人物——大侦探“陈查理”，却是由一个西方人华纳·奥兰扮演的。华裔美国女演员安娜·梅·黄（黄耐霜）虽然既不邪恶也不可笑，但她只能演一些二等角色，并且场景是西方的。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在我十岁以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这种传播媒介的威力。

那时，看电影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儿童票，虽然影院的开销里边还要包括对院内乐师的演奏报酬。我几乎总是在周末去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场。除了满足思想上的需求，影片还总使我感到欲罢不能——下一集会怎么样？那时演的还都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剧中人物的对白，所以也不要求院内安静。我们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时就欢呼，出现坏人时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无聊场面——在我们孩子眼里是如此——就嘲笑，也没人来干涉。我们不但觉得银幕上那些滑稽动作很好玩，自己也干一些恶作剧来寻开心。我们这些男孩子常常从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把纸折的小飞机或飞镖（头上粘了嚼过的口香糖）向楼下观众的秃头上投去。

在八岁时，有一次我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银幕上将要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有点神思恍惚，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倒，左边大腿股骨断成三截。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意外事故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卧床的几个月中，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　※　※

同美国在电影业中的霸主地位相对照，文化领域的其他“进口货”仍然要数欧洲的水准最高。剧院经理A．斯特鲁克邀请许多世界闻名的音乐家到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外国租界来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家海菲茨、克莱斯勒、埃尔曼和津巴利斯特，钢琴家莫伊塞维奇(20)和利奥·西罗塔，歌唱家阿米莉达·加利·柯希（女高音）、夏里亚宾(21)（著名俄国男低音）等。俄语社区的人对夏里亚宾非常崇拜，即使音乐会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十分昂贵，也要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唱。对犹太人来说，如果来演出的艺术大师也是犹太人（这样的情况很多），那么去出席他（她）的演唱会就几乎像参加一种典礼、一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的活动。

关于夏里亚宾，我还记得他的魁梧身材、萧萧白发和戏剧性的动作，虽然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轻的时候，但他所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跳蚤之歌》依然震撼人心。我当时还听到过关于他和著名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轶事。这两个农村青年曾一同在旧俄罗斯各地流浪，他们身无分文，真的当过“伏尔加船夫”，在这条大河上给逆流而上的船只背纤，累得筋疲力尽。在一处市镇上，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一位当地传教士正为他的教堂唱诗班招募歌手。但在试听发声后，传教士只录取了高尔基，却不要后来成为全球声乐大师之一的夏里亚宾。这两个青年朋友不愿分离，于是继续流浪。

在天津的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包括钢琴、小提琴、舞蹈），俄国教师可以说是包揽了全局。“天津公学”英国女生佩吉·胡卡姆师从俄国老师沃伊腾柯夫人学习芭蕾舞，后来以“芳廷”(22)的艺名享誉全球。

我自己从8岁到14岁（或15）学过钢琴，老师霍拉奇金娜夫人曾就学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钢琴家莱谢蒂茨基(23)。有三四

次，她让我在年度学生汇报演出中登台，主要是演奏肖邦的序曲，我很喜欢这些曲子，她也认为我在演奏这些序曲时表现出了一些音乐家的天赋和技巧。但我的其他兴趣和经历使我长久地远离音乐，现在我完全不会弹了——但我仍然保留着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

租界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子哥儿”在文化知识方面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来自东欧的穷光蛋们。他们最典型的兴趣所在，除了做生意和社交之外就是体育运动。我有一个美国同学老是对我讲美国的棒球联赛，虽然我向来同棒球不沾边，很快也会随口说出一些棒球明星和明星队的名字，如鲁思、科布、马修森、霍恩斯比[24]和一些著名的球队如“道奇队”“扬基队”“圣路易斯红鸟队”（红鸟队有一年获世界联赛冠军，使我大感兴趣，因为我有表兄妹住在圣路易斯）等。但当我对那位美国同学谈起“作曲家”时，他却问我：“那是什么？”我解释说，“写乐曲的人，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都是。”最后他老实承认：“这些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你是说像保罗·怀特曼这样的人吗？”这一次轮到我问他“那是谁”了。

尽管我的大多数同学和朋友对音乐都这样无知，却也有非常突出的特例，那就是我在“美国学堂”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和朋友约翰·赫赛。他在天津出生，父亲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了解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跟当地一位俄国老师学小提琴，一心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虽然后来他转而爱好文学并且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小说家，他对音乐的热爱却始终如一。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安东尼亚塔》所描写的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迪瓦里[25]为达到他的艺术巅峰——一把真正完美无缺的小提琴——所投入的热情。

很奇怪的是，赫赛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向同我在疗养腿伤期间的兴趣转向联系了起来。

他在半个世纪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在我养伤期间到床边来陪伴我的情形。他说，虽然我的身材“很小”，看起来却“精神焕发”，“一个高高的前额”仿佛是“一座奇妙的思想堡垒”。对于这样一种高度颂扬和夸大其辞的评价，我自己从未想到过。但我既然给了他这样一种形象，那就无怪他把我病床上的牵引架描绘成“一架神奇机器”。在这架机器里，我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精巧地连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看到这些，使他“真希望自己变成艾培”。他接着写道：“过了几天，我的妒忌心达到几乎无法抑制的地步，因为我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星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编写两卷本世界历史》。我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写世界史的事是我想入非非地告诉这家小报专写社会花絮的记者的。）为了赶上我，赫赛打算写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

但赫赛确实成了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具有如此优秀品质的作家，如果我有助于促进他的转变，我会为之高兴。他的《广岛原子浩劫记》是一部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和反核斗争的经典作品。他的《大墙》所描写的是在华沙犹太人集中区的抵抗运动，对纳粹暴行进行了凌厉的控诉，对犹太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的英勇抗争表示了崇高敬意。

赫赛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幼小时所得的一种印象。他曾这样记述道：“有一天，我和艾培在院子里玩跷跷板，他告诉我关于犹太人

的一些事情。我有许多《旧约全书》，都是教会的‘主日学校’里分发给我的，但第一次使我心里出现这一被剥夺的流浪种族的活生生的形象的则是艾培。”

※　※　※

我大讲俄语，也贪婪地大读俄文作品。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教学，但我母亲教会了我，此后我也一直没有丢掉过。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凡是俄国人的作品，只要我能找到原著就决不读译文。我坚持这个原则，从儿童读物开始，然后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先是短篇《高加索的囚徒》、《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最后是《战争与和平》（我养成一个习惯，每隔五年就读一遍这部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后来我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26)等人的作品。再后来是列宁、斯大林和许多苏维埃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俄文出版物。绝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天津犹太人俱乐部（KUNST）的很好的图书馆里借来的，这个俱乐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长期由我父亲担任。

我阅读的英文书，属于自己的很少，大多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我经常埋头阅读附有大量插图的20卷《知识全书》，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儿童百科全书，还有当时美国出版的青少年杂志《圣尼古拉斯》和《青年之友》。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第一次为一些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华盛顿·欧文、爱德加·爱伦·坡、费尼莫尔·库珀和马克·吐温，我也——很不幸地——为赞恩·格雷(27)的作品迷住，他写了许多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把这些种族灭绝的暴行写成英雄的行为。有一次，老师要求把格雷的作品从书架上搬下来，一些

男同学表示抗议，我也参加了。后来我才懂得，我们错了，那位老师是对的。

夏天，我们到北戴河去避暑，那里也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传教士们办的，但其中的儿童读物却是G．A．亨戴之类所写的一些非基督教义的（更准确一点说，是宣扬帝国主义——基督教义的）冒险故事，这些作者的殖民者心态不亚于格雷。另一个是北京市立图书馆的假期阅览室，它同前面说的那个图书馆形成了对比，是很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去那里借阅的时候更多。我借了不少大部头著作，消磨空闲时间，其中有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史》，威尔·杜兰特的《哲学史》，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英译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莱昂·福伊希特凡格、雅各布·瓦塞尔曼等人的作品（英译本）。(28)

※　※　※

但在我读书和学习的范畴中没有中国的作品，这在半殖民地时代的在华外国人中是很典型的事。我从美国各州的地形上，一眼就能说出这个州的州名，也能顺序或倒序背出美国历任总统的名字，却说不全中国的朝代和省名。

但中国的现实开始冲击我，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我十岁之前，中国连年内战和饥馑，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有的流着眼泪讨一口饭吃，有的出卖亲生孩子，因为给人家当奴婢总比活活饿死强。一个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

上，在一家门洞里看到一个同我差不多年纪（12岁）的孩子的尸体，他蜷缩着，已经冻僵。他想在这门洞里躲避刺骨的冬夜寒风，但躲不过去。

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下发动的大革命。根据孙中山同苏俄达成的协议，在苏俄顾问和武器的支援下，革命军从它的基地广州出发北伐。当时提出的口号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耕者有其田、改善劳工地位等，因此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我们一家认为这次革命是正义的、必要的——在天津的外国人家庭中持这样观点的极为罕见。还有一层，在我父亲看来，孙中山本人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我父亲一直强调他自己的理想是具普遍性的，很早他就告诉我，世界上有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中国人，在现代是孙中山，在古代是宋朝11世纪时主张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王安石。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我父亲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黑暗的、血腥的叛变行为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卡芬雅克将军(29)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指挥官，但当支持他的工人们起来要求社会和公民权利时他就下令屠杀他们。加利费将军(30)也是以在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的，他不分青红皂白，对男女老幼进行无情杀害。更近一些，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原来也是社会党人，他用行刺、毒打、灌蓖麻子油等残暴手段来对付他以前的同志。但父亲教导我说，从长期来看，残酷镇压阻挡不了历史的进步。他从不对我长篇

大论地说教，他的话总是很简洁，但紧密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可以按照他那些少而精的话语自己去读书和了解。

这样，在我年幼的心灵中，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态一点一点地相互联系起来。我在学习选择自己的立场，并且使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年，也是美国处死左派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的一年。这个案件(31)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因为对他们的犯罪指控并没有证据，是反共者歇斯底里把他们送上了电椅。远在天津的我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我的日记本上以示悼念，并用我自己稚嫩的文笔写下了抗议辞。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在“美国学堂”念六年级或七年级时，有一天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说，缩写词IWW的原意是“I（我）Won’t（不愿）Work（工作）”，我大为气愤，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是美国西部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劳工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缩写，这个工会的会员都是英勇可敬的（在英语里称他们为“wobblies”）。我的这一理解来自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体格魁梧、说话滔滔不绝的萨姆·布利伟斯，他曾经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并把工会发的一本《小小红色歌曲集》送给了我（当时在中国这大概是唯一的一本）。萨姆是俄国犹太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在美国各地从事体力劳动，有一段时间在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铁路枢纽站上充当机车司炉工。在移民到美国之前，他是俄国“犹太劳动同盟”会员，到美国后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并参加过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乔·希尔(32)的名字。乔·希尔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和一些优秀歌曲的曲作者，在美国犹他州被判处死刑，执行

枪决。他还提到另一位工会组织者弗兰克·利特尔，在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被一伙暴徒阉割并私刑拷打。还有另外一些在美国劳资斗争中不屈不挠的牺牲者。所有这些人决不是像那位老师所说的“我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奋斗的劳动者和战士。

萨姆特别喜欢乔·希尔创作的民歌《传教士和奴隶》(33)。大意是：“长头发的传教士每晚起来（告诉劳工们）干活和祈祷，饿了就吃草，天上有馅饼，死后可吃到。”歌曲最后有力地唱出了最强音：“这是谎言！”这首歌加强了我的无神论思想——萨姆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是从生活的血泪中产生的，而不像我父亲，他的那种无神论思想来自知识。

萨姆小时候住在乌克兰一个犹太人的小村子里。有一次他推小妹妹荡秋千，小妹妹不慎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他不禁对上帝狂嚎：“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本村的希伯来语宗教学校中，他又被犹太圣经教师责打，因为他老在动，不老老实实坐在木板凳上。他在时隔50年后对我讲到这件事时还感到气愤：“我怎么能不动呢？！那个教师的老婆养的鸡到处乱走，啄我光脚趾上的疮疤！”他当时想，为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这种情况，不让这个苛刻的教师发一点慈悲？起初，萨姆每一想到他在怀疑上帝，就感到内疚。直到十多岁，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后，才明白过来。他说：“没有任何宗教，事情就变得清楚多了。”

在苏联时期，有一个俄国青年也对我具体地描述过类似的自我觉醒过程。他说，当他还是一个农村孩子时，每逢听到打雷，心里就怕得要命，总要跪下来画十字，祈求上帝不要为了他犯的某种罪孽把他

劈死。革命干部教导他，打雷闪电都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天神发怒示警，这样才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负担。

究竟是命运中的什么奇迹最后使萨姆作为一个皮货收购商来到天津，并且经常来往于美国和天津之间，我一直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在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生活和思想时他曾谈到过他的生意。

※　※　※

我同萨姆作这些谈话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西方列强正纷纷派兵来华，其中有在天津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列强派兵的总的目的是想阻挡1925—1927年反对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大革命。

关于这次大革命，我除了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外，还亲眼见到过这样一幕：在天津以前的德租界里，军阀政权那些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失魂落魄地把枪支扔在营房外面的地上，因为当时响应革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正在他们后面紧追。

在全国范围内，大革命在看似即将胜利之际，形势却突然逆转。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向左派力量开刀，大规模杀害共产党人和工农联盟的成员。

集结起来准备阻止革命浪潮席卷华北的外国军队没有施展他们的拳脚，因为他们的任务已经由中国自己的反动派代他们完成了。

有趣的是，在准备进行干涉的美军部队中，甚至于有几位高级军官也对派遣他们来支持腐朽的中国军阀感到不安。驻津陆战队司令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是一位老式的平民党(34)人，他对于多次奉派到国

外去制止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已深感厌烦。十年之前，在俄国1917年革命后被派到西伯利亚去的美国干涉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本来应该反对“赤党”支持“白党”，但结果他对“赤党”的印象反而比“白党”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巴特勒将军晚十年，史迪威将军发现蒋介石更热衷于囤积军火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而不是去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作战——共产党却在对日军进行艰苦而有效的战斗。

在这些美军指挥官的心中，美国自己的革命传统还留着一丝火星。但是，最后的决策权不在他们手中。直到退休之后，这三位将军才对当年要求他们达成的目标公开发表或留下他们的批评意见。

上面提到的巴特勒将军以尖刻的语气总结了他自己的军旅生涯：

> 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我国最机动灵活的军事力量——服现役共计三十三年零四个月，从少尉一直干到少将。我是为大企业、为华尔街效劳的打手——简言之，我是为资本主义进行敲诈勒索的歹徒……
>
> 1914年我竭力使墨西哥成为美国石油利益集团的安全地区。我竭力使海地和古巴成为花旗银行那些家伙搜刮钱财的好去处。我还竭力在1910—1912年的美国“布朗兄弟国际银行”把尼加拉瓜清洗一番。我在1916年又为了美国糖业巨子的利益使多米尼加共和国重见天日。(35)1927年，我力求做到使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扩张顺利进行。
>
> 在那些年里，如同那些在幕后的大亨们所说，我是一个得力干将。我被授予荣誉、勋章和更高的官阶。回顾过去，我觉得我也许能给（大流氓头子）艾尔·卡彭一点教益。他最多只能在一个

城市的三个区内敲诈勒索，而我们海军陆战队却是在三大洲里行动。(36)

※　※　※

以上说的就是在外国势力统治下天津的状况。这同今天相比是何等的不一样。今天，在中国的外国儿童中，有不少人进了中国学校。不同国籍的孩子们最常用来相互沟通的共同语言是汉语。这是中国从不平等迈入平等这一伟大变革的标志之一。

尽管我在年轻时没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多种影响，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传统对这些影响起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为这些影响所淹没。

同时，我同中国的现实日益接近。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使我受到震撼，这时我已16岁并已开始工作。

这些事情在下一章关于我早期新闻工作的经历中再继续讲述。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大法国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正路”，1949年解放后又更名为“解放北路”；“维多利亚道”先后更名为“中正路”“解放北路”；“威廉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消德租界，更名为“威尔逊路”，解放后又更名为“解放南路”；“旭街”在抗战胜利后更名为“罗斯福路”，解放后更名为“和平路”；“尼古拉路”后更名为“六纬路”；“伊曼纽尔路”俗称“大马路”，后更名为“建国道”。

(2) ［译者注］西摩尔（Baron Thomas Seymour，1508—1549），曾任英国海军大臣、舰队司令。埃尔金（8th Earl of 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曾先后任英联邦牙买加、加拿大、印度总督，1860—1861年任英国派往中国的全权代表，并联合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胁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格罗（Baron Anotonine-Jean Gros，1771—1835），以描写拿破仑晚期军事生涯的历史画知名。

(3) ［译者注］李奇微（Mattew Ridgway，1895—199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名将之一，1950年任驻朝鲜的美军第八军团司令。

(4) ［译者注］巴克斯是19世纪英国对中国的一个侵略者。“巴克斯道”即今之“保定道”。

(5) ［译者注］法文名词的翻译承《今日中国》老同事、原副总编辑郭安定教授协助，谨此致谢。

(6) ［译者注］拿撒勒（Nazareth），以色列北部地区首府，历史名城。首见于《圣经》，为耶稣童年时期的活动地，后为其第一次行神迹（在迦拿变水为酒）的出发地点。

(7) ［译者注］金犊是古代希伯来人在公元前13世纪及10世纪所崇拜的偶像，《旧约》的《出埃及记》、《列王记（上）》均指此事为严重叛教行为。

(8) ［译者注］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为犹太商人之子，法国军官。他被诬陷于1894年向德国人出卖法国军事机密，被判犯叛国罪，终身监禁，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左拉名作《我控诉》就是为此而发。诉讼一直迁延到1906年，他始获昭雪，晋升军阶。

(9) ［译者注］1911年，俄国犹太人门德尔·贝利斯被反革命组织“黑色百人团”诬告以基督徒鲜血用于犹太教仪式上，以便激起反犹暴力行动。俄国许多民主人士及革命派群起抗议，法庭迫于舆论压力，在被告律师的有力辩护下，于1913年宣判被告无罪。

(10) ［译者注］这个英文名字与现在的以色列国名是同一个词，是犹太人、犹太民族、希伯来人、希伯来民族的总称。基督教《圣经·创世纪》载，神赐名“以色列”给雅各，而“雅各的后代”即指犹太民族。此词在宗教上意为“上帝的选民”。

(11) ［译者注］柯罗连柯（Vladimir Galaktionovich Korolenko，1853—1921），俄国小说家，因参加革命活动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五年后获释。1885年发表著名小说《马卡尔的梦》。十月革命后因不愿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合作，返回乌克兰，写作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未完成。

(12) ［译者注］在本章及下一章中有关天津的地名及若干专名的翻译承天津武警医学院外语系赵秀明副教授惠予协助，谨此致谢。

(13) ［译者注］本章中有关美国影人和影片的翻译曾向《今日中国》老同事、后任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主任的林德彬同志请教（他早年曾做过美国电影的翻译工作），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德彬不幸于2003年病逝，不及见到本书出版，谨致悼念。

(14) ［译者注］本段提到的美国影人简介如下：

格里菲思（David Griffith，1875—1948），美国电影界先驱人物。《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以南北战争为题材，1915年摄制，技术多有创新，但因片中充斥种族主义思想而受到谴责，票房价值则依然很高。

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英国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和导演，世界知名的幽默大师。1919年他与好莱坞童星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1914—1984）合演的《寻子遇仙记》（The Kid）誉满全球。

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生于意大利，1921年后成为好莱坞明星，许多妇女对他倾倒，他青年早逝，葬礼举行时万人空巷，甚至有妇女悲哀自杀。

钱尼（Lon Chaney，1883—1930），美国著名性格演员，《歌剧院的幽灵》（Phantom of the Opera）摄制于1925年。其子亦为演员。

璧克馥（Mary Pickford，1893—1979），美国最早的电影明星之一，极盛时期为全美国最富裕、最有名的女人之一。她是范朋克的第二个妻子，曾同演《驯悍记》。

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电影演员、制片人，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之王”，其子小范朋克亦为较知名的演员。

基什姐妹，姐姐丽莲（Lillian Gish，1896年生，卒年不详）是美国最有创造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也是舞台剧演员。以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一片中的演出而蜚声世界，后加盟米高梅公司，1971年获奥斯卡荣誉奖。妹妹多萝西（Dorothy Gish，1898—1868）也是影剧双栖演员，有喜剧天才。《多萝西及丽莲·基什》一书于1973年出版。

(15) ［译者注］“泰山”（Tarzan）是美国作家E．R．巴勒斯笔下生活在原始荒野中的人物，1912年开始出现在杂志所载的故事中，后来编制成系列电影《人猿泰山》，有十几名演员主演过这个角色，以世界游泳冠军韦斯摩勒所饰演的最受欢迎。

(16) ［译者注］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第一位不朽的戏剧家、评论家、哲学家、美学家。影片《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摄于1927年。

(17) ［译者注］乔尔森（Al Jolson．1886—1950），生于俄国，后移民美国，为著名歌星。《爵士乐歌星》（The Jazz Singer）摄于1927年。

(18) ［译者注］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美国女作家，因描写中国生活的小说而著名，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地》（Good Earth）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一个中国农民和他的奴隶般的妻子为争取土地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1931年出版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

(19) ［译者注］保罗·茂尼（Paul Muni，1898—1967），出生于波兰犹太人家庭，1902年移民美国，为戏剧及电影演员。

(20) ［译者注］以上音乐家简介如下：海菲茨（Jascha Heifetz，1901—1987），生于立陶宛，美籍小提琴家，12岁即蜚声欧洲乐坛。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1875—1962），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1888—1889年在美演出获得极大成功，1943年入美国籍。埃尔曼（Mischa Elman，1891—1967），生于乌克兰，美籍小提琴家，1908年起曾在美、欧、远东

巡回演出。津巴利斯特（Zimbalist），“匈牙利大洋琴”演奏家。莫伊塞维奇（Benno Moiseiwitsch，1890—1963），英籍俄国钢琴家，擅长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

(21) ［译者注］夏里亚宾（Fydor Chaliapine，1873—1938），俄国歌剧演唱家，多才多艺、富有表现力的独唱演员，生于俄国喀山，卒于巴黎。

(22) ［译者注］芳廷（Dame Margot Fonteyn，原名Peggy Hookham），1919年生，1939年以演《睡美人》中奥罗拉一角出名。1954年曾任英皇家舞蹈学院院长。

(23) ［译者注］莱谢蒂茨基（Leschetizky，1830—1915），波兰钢琴家、教师、作曲家，卒于德国。本节中关于音乐家名字的翻译承中央大学老同学丰陈宝（丰子恺先生之女）帮助，谨致谢意。

(24) ［译者注］鲁思（Babe Ruth，1895—1948），美职业棒球运动员，首批入“美国棒球名人堂”的五人之一。科布（Ty Cobb，1886—1961），美职业棒球运动员，曾获击球比赛九连冠。马修森（Christy Mathewson，1880—1925），美职业棒球运动员，首批入“美国棒球名人堂”的五人之一。霍恩斯比（Rogers Homsby，1896—1963），美职业棒球运动员，著名的右手击球员，仅次于科布。

(25) ［译者注］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1644？—1737），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多有革新，后世奉为典范，其两子均承父业。

(26) ［译者注］以上作家简介如下：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俄国最伟大的诗人，近代文学奠基人。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俄国第一流浪漫派诗人、小说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俄国最为人知的作家、改革家，道德思想家，所著《战争与和平》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Fydor Dostoyevski，1821—1881），俄国小说家，所著《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白痴》《群魔》等使他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安德列耶夫（Leonid N．Andreyev，1871—1919），俄国小说家，后期又创作戏剧。

(27) ［译者注］以上作家简介如下：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最伟大成就为《见闻札记》。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成名作为1845年发表的诗歌《乌鸦》。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边疆及海上冒险小说创始者，成名作为1821年出版的《间谍》。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美国最孚众望的幽默小说家，名作《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1885）享誉至今。格雷（Zane Grey，1872—1939），著有八十多部描写美国西部生活的浪漫主义小说。

(28) ［译者注］本段所述作家简介如下：

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1874—1948），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以从经济角度阐述美国制度的发展而享盛名。

杜兰特（Will Durant，1885年生），美国哲学家和讲师，著有《哲学的故事》《文化的故事》。

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1920年以《大街》一书一举成名。

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1906年出版的《屠场》为其成名作。

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美国现代作家，其最成功作品为《美国的悲剧》《嘉莉妹妹》。

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1866—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其著名小说为《约翰·克里斯朵夫》，共10卷，1904—1912年写成，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小说家，作品抨击德国专制的社会结构，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1900年以《布登布洛克一家》一举成名，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福伊希特凡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以写作历史传奇闻名，生于犹太人家庭，1940年逃亡美国。

瓦塞尔曼（Jacob Wasserman，1873—1934），德国小说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声名显赫。1928年出版的《毛里求斯案件》久享盛名。

(29) ［译者注］卡芬雅克（Louis Eugene Cavaignac，1802—1857），法国将军，1848年革命期间的最高行政官，因对巴黎起义工人实行镇压被称为“六月屠夫”。

(30) ［译者注］加利费侯爵（Marquis de Gaston-Alexandre-Auguste，1830—1909），法国将军，1871年奉命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以残酷闻名。

(31) ［译者注］萨柯-万泽蒂案（Sacco-Vanzetti Case）由1920年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起抢劫案引起，他们两人被控参与抢劫并杀人，1921年7月由陪审团裁定有罪，社会党人提出抗议，认为陪审团是因两人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定罪的。案件拖延到1927年4月，两人被判死刑。世界各地纷纷示威抗议，但州长富勒拒绝赦免，两人终被处死。

(32) ［译者注］乔·希尔（Joe Hill，1879—1915），出生于瑞典，“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组织者，流行歌曲作曲家。1914年1月因涉及一起抢劫凶杀案，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死刑，上诉无效，于1915年11月被处决。1925年，为纪念他，诗人海斯写了以他的名字为题的著名歌谣。

(33) 多年以后，我曾听我的朋友、出身工人家庭的美国激进派作家史沫特莱深情地唱过这首歌。更晚一些时候，我又听美国海员范内斯唱过。我同范内斯在太平洋战争后曾一同被关进香港赤柱拘留营，后来又一起出逃成功，结下了深厚友谊（详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34) ［译者注］平民党（Populist）是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及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谋求通过各种立法，促进农民利益，1896年与民主党联合竞选总统失败后渐趋消亡。

(35) ［译者注］美国在1916年出兵占领多米尼加，至1924年撤军；1965年再次出兵占领，镇压革命。

(36) 据当时报刊所载巴特勒将军的谈话。

第六章　初任记者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我们家里有许多报纸。我第一次高兴地看到我写的东西登在报纸上是在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我从天津发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刊载在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儿童专栏”里。这张报纸我父亲订阅了多年，编辑部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他在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劳动同盟”的同事。报纸主要用的是依地语，但“儿童专栏”用的却是英语，因为像我一样，许多犹太移民的后代不会读写依地语。这个专栏的编辑是吉恩·利西茨基，她因为能收到一封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一个在中国的犹太孩子的信件而十分喜欢。我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大喜过望，所以至今仍记得她的名字，但她究竟作何评论、我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14或15岁时，我同“天津公学”的校刊有了些关系。我在校刊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还帮助做些编辑和版面设计工作。

这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改装过的、当时最有名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又“雇用”我给他长期主办的一本商业性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忙。供这本刊物用的有些材料是不懂英文的人写的，有些已译成英文，但质量很差。我的“任务”是润色文字，父亲给我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洋”12元。

当时中国使用的银元也称“墨西哥鹰洋”，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中国银元的重量和含银量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相同，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又是照著名的西班牙“八里尔”银币仿制的。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同西班牙有密切关系，西班牙“八里尔”银币在

奥地利称为thaler，这个词被“美国化”后成为dollar。美国改行金本位制后，中国的银元定价为相当于二分之一美国金元——按此计算，我当初的工资值6美元。

在“天津公学”上学时，我赢得了作文和知识比赛奖，是由英国人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主编威尔弗雷德·V．彭内尔评定的。他是我家的老相识、老邻居，所以他打算将来雇用我，一是我写东西不费劲，又写得快，二是我可以作为“当地雇员”——外国人“当地雇员”的待遇虽然比中国人雇员多一倍，但只及从英国雇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还有，所有在海外雇用的人员，他们来华的旅费要报社承担，还可按规定享受定期的“带薪回乡假期”——如果雇用我，这些就都可以省了。

但实际情况是，我最早的——然而是短暂的——“成人”新闻工作却不是在一家英文报社，而是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日报。我的工作是把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当时在天津已另有两家“白俄”流亡者的报纸，但《晨报》同它们不同，持谨慎的亲苏立场。这家报纸的主编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名叫列夫·马尔科维奇·比霍符斯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太太却是态度生硬、要求严格，戴一副夹鼻眼镜，天天坐在报社的入口处检查所有雇员是否都按时上班（我有时因为迟到挨了她好一顿批）。唯一的一个排字工人名叫罗森茨韦克，体格魁梧，脸色红润，说话很慢，干起活来却很利索——他完全靠手工操作。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体力劳动者。印刷机是中国造的平版机，报纸只发行几百份。

报社的常客是一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俄罗斯人，名叫斯克伏尔卓夫，他还常牵着他那条法国种的狗。他为“英亚通讯社”工

作，这是一家苏联的企业，有一个英国合作伙伴。另一位来宾是天津德文报纸《德华新闻报》主编沃尔德马·巴特尔斯。他留着小胡子，人很瘦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被控从事反对德日两国的活动，死于日本监狱。

彭内尔雇用我为《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是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当时俄文《晨报》关了门，我实足年龄刚过15岁。这张报纸为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所有，是他们的喉舌。从1914年到1930年，它的主编是H．G．W．伍德黑德，一个顽固分子，对中国的蔑视是根深蒂固的（英租界上层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此）。他的继任者彭内尔在内心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是较为尊重的，实际上还有点喜欢。

伍德黑德和彭内尔代表了在华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两代人。前者于1902年来华，那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刚被外国武装镇压下去。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并且非常留恋那个时代。彭内尔则是在出现许多新变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看一看他们两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

伍德黑德认为中国在1911年从帝制改为共和是一个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力图使中国摆脱中立，站到协约国一边，后来中国果然“参战”，其实中立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英王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他坚决维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人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对中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讽刺孙中山，把孙中山看成是魔鬼，是中国民族和社会革命的化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前后20年中主编的《中国年鉴》英文版（每年出版厚厚的一册）被绝大多数西方人当作最标准的、最可靠的有关中国的手册。他从理论上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行径，特别是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植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评功摆好。但是，一度依附于英国的盟邦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把英国的势力逐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这个他曾为之吹捧的日本让伍德黑德饱尝了铁窗之苦，而不是像其他敌国平民那样只是关进拘留营。最后他是在交换战俘中被遣回的，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彭内尔同伍德黑德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于1912年来华，才21岁，这时中国刚从帝制改成共和。他1916年到《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在他主持编务期间，他表现出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左派，有时甚至对中国红军的同情。同伍德黑德相反，他站在中国一边，反对日本。

但是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他却异想天开地支持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1)，从工党左翼到“英国法西斯同盟”——这个组织宣称支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赞成的“合作国家”因而吸引了他，但他并不全盘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彭内尔夫人是犹太人）。

在“二战”期间，我曾同他在印度重逢。他在英国新闻部任职，为反对日本而努力工作，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提法仍然嗤之以鼻。“二战”后，他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主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终生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友好，特别敬慕周恩来，他从1919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开始就知道了这个名字。他后来活到高龄，退休后回到西班牙，在那里终老。

※　※　※

作为在职培训，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张报纸每天出版16至20页（包括广告及已打好的纸型），编辑部一共只有七名工作人员。我那时18岁，看校样、做标题、排版式、写本地新闻（从婚嫁、丧葬到警察和法院办案），还要担当体育报道和音乐戏剧评论的任务。有时彭内尔身体不适或外出，我甚至于还要代他写社论——在我写的社论中显示出我的一些已经颇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在较早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社论中，我提出疑问："是谁的新政？"是要离弃造成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那种经济体制，还是想努力保住它？在另一篇评论"技术官僚政治"（被认为是另一种克服经济衰退的万应灵药）的文章中，我批评它对社会力量的忽视。1932年，古巴的马查多(2)独裁统治为巴蒂斯塔中士（他那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民主）所推翻，我在社论中把这次事件同俄国的十月革命相比，就因为后者也是由军士来指挥新组成的军队的。这当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巴蒂斯塔后来变成了另一个反动的、半殖民地的独裁者，在1958年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推翻。1933年，我在社论中对在德国新上台的希特勒进行攻击，天津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攻击而勃然大怒。

彭内尔对我写的东西从不审查。1934年我19岁，结了婚。他把我的工资加了一倍——每月100银元，相当于50美元（仍然只是从英国国内请来的大多数低级职员工资的一个零头）。但不论是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廉价劳动"，最后都未能使我在《京津泰晤士报》待下去。报社经理有一次看到我的口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就把我开除了。彭内尔在一份为我准备的推荐信中大事夸奖我对报纸工作入门之快，但却为自己开脱道："……爱泼斯坦的观点适宜于持自由主义或激进观点的报纸。"在半殖民地中国，这样的"推荐信"无异于一张"不宜雇用"的证明书，所以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　※　※

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期间，我开始同几位年轻朋友（犹太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有）聚会，大约每周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事。我们阅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苏联出版物、R．帕姆·杜德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及约翰·斯特雷奇(3)的《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等书籍。但是，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说来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的约三年时间内，我也没有专门写过关于中国的报道或社论。同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是我写的两篇书评，一篇是评论欧文·拉铁摩尔所著的《到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另一篇是评论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远东前线》。这是他们早期的著作，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作家。斯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红星照耀中国》，我同他很快建立了长达40年的友谊。我同拉铁摩尔也成了老朋友，虽然我们的交往不是那么经常。

※　※　※

脱离了《京津泰晤士报》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处于失业状态。我同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一项商业性的翻译服务，主要是把俄文译成英文，天津的俄国商人很需要这项服务。我自己还翻译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出版，其中最长的是一篇关于中世纪蒙古法律（成吉思汗统治及以后一段时期）的论文，作者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俄罗斯教授V．A．里亚萨诺夫斯基（后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任教）。这篇论文先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评论》上连载，后单独成书。另一篇较短的东西是一本政治经济小册子《中国和

白银》（中国刚放弃银本位并把白银卖给美国），作者是M．格里维奇，曾在莫斯科大学任讲师。40年之后，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卡片中居然发现在我的名下有这两本书的记录，使我大为惊喜。

这种双语转换工作在一些新的方面扩大了我的俄语和英语词汇。但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都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中外文的翻译——这是租界生活封闭性的又一表现。

尽管身处殖民地环境，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情心促使我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站在中国和中国人一边。其中的一件事是我同《京津泰晤士报》老同事安妮·伯内特对天津的“英国市民图书馆”拒绝中国人入馆阅览和借书抗议无效，愤而退出。

这个图书馆虽然为殖民官员们所有，但藏书丰富，管理完善。我在这里浏览了许多种百科全书，并且多年来借阅了各种各样的书刊——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学、学术流派，从左到右的政治派别，从古典到近现代都有。我不可能去购置那么多的书籍，但在这里我几乎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它有助于我接受教育，我也认为它很有价值。

但是，它的藏书虽然十分广泛，关于入会的规定却表现出典型的褊狭心理——中国人不准参加。在一次年会上，在中国成长的安妮要求修改这一规定，我表示支持。但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同一座石墙打交道。反对的理由是可笑的，大多数还带有侮辱性。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欧亚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甚至于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如果图书馆的书进了一个中国人的家里，谁知道会把什么样的细菌带出来传染给我们！这次会议之后，安妮和我退出了这家图书馆，她组织了一个“书虫俱乐部”来取代它。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拿出书来相互借阅，

并开会讨论。华人会员中有黄佐临，他是关于萧伯纳和布莱希特(4)的青年专家，后来成为杰出的剧作家。外国人会员中有两位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莉迪亚·约翰逊和伊丽莎白·希斯，她们都有进步思想。

※　※　※

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起初我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向国外出版物投稿，常用笔名，因为我“无国籍”，极易受到伤害。最早是一组简短的连续报道，发表在马尼拉的《菲律宾自由报》上，作为该报的一个流动记者，描写个人旅行中所见的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满洲）。

接着我在纽约出版的刊物《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一个朋友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巴黎出版的一张日报《不妥协者》上。关于长征，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消息来源，我是从蒋介石办的报纸上看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错误）。这些报纸经常刊登一些红军在某地被“击败”或“消灭”的报道，我就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做上标记，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战斗前进。历史已使我相信，中国的革命不论遭受何种挫折，总是不可摧毁的。

我的这篇报道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几乎给我带来麻烦。但我当时一无所知。1935年初，在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起了一场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报刊”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我在《民族》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份刊物就是由J．B．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它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救星。

当时斯诺挺身而出，为我辩护。他在1935年4月1日写信给《民族》和《新共和》这两个刊物，信中写道：

……传教士们因为你们的态度而大为沮丧……正在策划使你们正确地认识到“有关中国赤党的实情”。

目前，在华北正在进行一场嗜血的搜捕行动，要找到这个冒名为Crispian Corcoran的人，因为他被怀疑为那个正在误导你们的最坏的坏蛋……我偶然碰到过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印象是，他的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

这里提到的Crispian Corcoran是我的化名。我不久前还在阅读少年刊物《儿童报》（或《好友报》，我现在记不太准），上面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叫Crispian，另一个叫Corcoran，我的化名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拼成的。

关于斯诺为我辩护的那封信，也许登出来了，也许没有登，我是从罗伯特·法恩斯沃斯那里知道的。这位斯诺传记的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写本。在我和斯诺数十年的友情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多做好事、做了不说的性格的典型表现。

后来，我在中国的另一家报社有了一份工作。在从事翻译和自由撰稿的同时，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署名是“本报通讯记者”，不登姓名）。这是一张在北京（当时改名“北平”）出版的英文日报，想在天津扩大发行。虽然我的任务只需要报道天津外国人社区

的活动，但我却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也没有署名），讲述日本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包藏政治祸心地扩大毒品贸易（主要是海洛因）。销售的渠道是一伙称为“洋行”、以“日商”名义经营的小商店——按照不平等条约，外商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开始时，这些商店向顾客免费赠送香烟，他们在这些香烟里偷偷塞进海洛因，等到吸上瘾，就非花钱去买不可了。这些商店在门面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糖果到自行车都有，后面的一些房间则是临时性的吸毒室。我曾经到这些地方去看过，只见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白面”）。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时要把烟卷竖立起来，所以被称为“高射炮”。这两个词随着毒焰的蔓延而成了当地的常用语。

去这些窝点吸毒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小职员，还有少数学生），他们很快就变得贫病交迫。较富裕的瘾君子则在家里过瘾，所吸的毒品较精致，毒性也不那么剧烈。整个散布毒品的安排据说是由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为了销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意志、招募为他们服务的汉奸特务、纠集一帮以供给毒品为报偿的“支持者”，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北平时事日报》为中国人所有，但职员大部分是外国人。编辑部对我写的报道颇为欣赏，对我提出了另一个工作建议。这张报纸的新闻主编塞西尔·泰勒是澳大利亚人，要定期回国休假。在航空运输还不发达的时代，往返旅程加上休假通常要六个月时间，而他每隔三五年就要休假一次。“你是否愿意在他离京期间代行他的职务？他在北京有一所四合院，雇着仆人，你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愿意。关于待遇问题——在《京津泰晤士报》时我的月薪是100银元，《北平时事日报》因我是兼职，人又在天津，只付给我半数，现在要我在北平全职

工作，我要求付给我月薪300银元。报社总经理张明威（译音）代表报社老板（中国国民党人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北京住下来，过着同当地一般外国记者和学者同样的生活。这座美丽的中国古都（蒋介石把政府迁到了南京）比起天津租界来更适合我，并且使我更接近中国——尽管仍然要通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人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同中国有关的学术或新闻、政治方面已经或即将享有盛名。

费正清当时是在中国深造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特别研究员，他后来成为全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拉铁摩尔的经历更加“全面”，从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到“二战”时由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战后又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备受恶毒中伤（费正清也曾被麦卡锡主义抹黑，但他更灵活一些，所以幸免于难）。伊罗生曾一度无畏地援助中国共产党，但后来左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后来又右转为新保守主义派。艾达·普律德出生于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工作部当主任，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利用自己的条件掩护了许多在地下活动的中国爱国者，后来在斯诺夫妇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那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为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募集海外捐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是新中国坚定的朋友，直到九十多岁逝世。

另外两位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同事。F．费希尔的本职工作是合众社记者，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帮忙。我到北京几个月之前，他曾支持1935年12月的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珍珠港事件”后，他出任美国战时新闻局(5)中国办事处主任。“二战”后，他留任政府官员，以为这比在新闻界工作更安全、更清静一些。但他在这两方面都估计错了，麦卡锡主义的大棒并没有放过他。后来他总算保住了原来的职位，不

过从此以后他再也升不上去，没有机会在公众中露脸，同中国事务更是完全不沾边，他也想努力为自己洗刷，但无济于事。

杰克·贝尔登是一个毫无城府的人，热情、认真，在写作方面才华横溢。他刚从美国来，是以在船上打工充抵票价的办法搭船来的，在报社当校对，收入微薄。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他先后任美国合众社和《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他不是光在司令部或军官俱乐部待着，而是深入到士兵们作战和牺牲的第一线，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珍珠港事件”后，他随史迪威将军从缅甸撤退，备尝艰险。后来，他为《生活》杂志采访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作战，负了重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重返中国，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这本书作为新闻著作可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提并论，作为文学作品其地位则在后者之上。由于麦卡锡主义扼杀了它的发行，这本好书不大为人所知。在“冷战”的年代里，贝尔登靠打工谋生（包括当出租车司机），有时靠失业或老年救济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巴黎去世。美国的一个重要人才就这样被可悲地浪费掉了。

※　※　※

《北平时事日报》的内部结构和主要人员也是很有意思的。年事已高的主编谢尔登·里奇虽然也是英国人，但与《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伍德黑德很不一样。他在中国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多年，早在1915年他就对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加以痛斥，从而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现在他已白发苍苍、步履维艰（据说是年轻时当橄榄球队队员时负的伤）。他的编辑工作作风也很特别。他不管报纸的其他版面有些什么内容，每星期连续四天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字（送到办公室里去的饭菜往往原封不动），然后一瘸一拐地出来，面色苍

白，满脸胡子。他登上汽车，开到北京郊外幽静的西山去休养三天。他写的或选出来转载的东西占据每期报纸中心对开的两页，并且每栏宽度大于其他版面，使其他版面的稿件不可能“闯进”他的这片“神圣领土”。在这里，每逢周末总要登一篇他的说教文章，栏目取名“静谧时分”。

但在这些怪癖的表象下面覆盖着他性格中坚毅和忠诚的品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报纸办下去。在无情的日本侵略者的恐吓下，邮局和报贩都不敢再经售他的报纸，他就开着他那辆黑色的老轿车把报纸亲自送给订户和读者。“珍珠港事件”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不清楚，如果被关进日本的拘留营，那就一定会吃足苦头的。1946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报社新闻部的一位中国同事是Y．C．孙，他同时在路透社兼职，但两处的收入仍然不够他这个大家庭（他有六个孩子）的用度。另一位中国同事王公达（译音，英文名“乔治”）活泼、机智，很会享受生活，同国民党很接近。他们两位负责有关中国的全部新闻报道。外籍工作人员只在办公室工作——按照国外英文报纸的模式改稿、设计版面。

报纸是国民党办的，通过张总经理进行监督。有关技术性的问题以及外国通讯社电讯的处理，编辑部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国内报道上就没有了。我在处理一条国民党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来源一再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首领已经死亡（他们造谣说毛泽东已到肺结核病晚期）或在战斗中被击毙。因此，我为这条新闻做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张总经理对我一直是友好的，对我的工作也称赞过。但我做了这

个标题之后不久，他就通知我，报社不再需要我了（他没有说明理由）。我不记得这条得罪了人的挖苦标题是登出来了，还是被发现后“枪毙”了，反正对我的报复是来得挺快的。在《北平时事日报》上，反日倾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鼓励；批评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却绝对不行。

我再度失业，又回到了天津外国租界内那个文化上死气沉沉、商业气息浓厚、人们心胸狭窄的世界中。

但北京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哪怕时间不长）的人都这样。它的建筑和城市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它对于中国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敏感，即使是最洋气的外国人也不可能使自己完全置之度外。它在外表上很平静，但正如最近发生的1935年的学生运动那样，它会爆发出充满朝气的爱国热情，使全国为之震动。它也会显示出这个国家当前所患的内在病症。

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社上完夜班骑自行车回家，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我走在没有路灯，但我很熟悉、通常很安静的小街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士兵（这里平时是没有士兵的）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的刺刀离我的脸部只有几英寸。他只有十几岁，显然是个新兵。他被派到这个地点站岗是为了执行一次紧急宣布的宵禁，并预料可能会碰到麻烦——究竟是什么麻烦，上级没有告诉他，但他对黑夜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疏忽大意。我看到他的身子和他手中的枪都在不住地抖动。我承认，当时我真被吓得够呛，比后来在真正的战争中吓得还厉害。没有什么比一个患恐惧症的新兵更可怕的了——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刺刀是准备刺杀的姿势，都正对着你。幸亏我们两人很快都发现

不用害怕，松了一口气，不再发抖。这种情况那时在天津的租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四周的边界、特别是人们的心理状态，使天津租界免受中国地区动乱的影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但很快就要起变化了。

※　※　※

虽然我没有直接报道过中国的事情，但我在北京的居留使我开始了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原来我只写一些关于那个蚕茧似的租界内外国人社区的、也是供他们阅读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我转而写作以中国为主题的东西，供更广大的读者群阅读，包括海外读者和中国读者。

我很快为两个英文刊物写稿，一个是北京的《民主》，另一个是上海的《中国呼声》。两刊的主要读者（也是最热心的读者）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它们都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编辑，作为外国企业登记，所以不受蒋介石政府部门的检查。两刊是在1935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和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创办的。

《民主》月刊的创办人是斯诺夫妇，它首次披露了毛泽东的声明，这是斯诺在他那次开拓性的中国之旅中带回来的。它的编委中有的还义务为它写稿或编辑，其中之一便是有才华的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他是刚从牛津大学学成的“罗兹[(6)]奖学金学者”。他正在写《中国的危机》一书，这是同时代外国人所写的有关1936年“西安事变”的最佳著作。

担负主要编辑工作的有休伯特·梁、伦道夫·塞勒和哈里·普赖斯（他们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教授，都支持学生

运动）、张东荪（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约翰·利宁（一位英国青年，来华前在牛津大学参加工党和反法西斯的政治活动）。

在编委会中有一位来自政治上右翼的大红人——著名的教会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后来的历史发展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虽然长期以来敬慕蒋介石，但赞成国民党停止反共内战并同情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尽管他希望蒋介石能成为团结抗日的象征和领袖）。这就是斯诺和司徒雷登能同时参加《民主》编委会的历史机遇。在创刊号上，他们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分别对毛泽东和蒋介石表示赞扬。十多年之后，曾为1935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他向司徒雷登发出了邀请，请他作为燕京大学和校友们的贵宾到北京访问（当时许多燕京校友在中共领导的机构内都有显赫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有意接受邀请，但美国国务院坚决说“不”，从而破坏了已所剩无几的一条中美沟通渠道。

我应斯诺夫妇之邀，成了《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为它写稿，在天津帮助推广，并在它的最后一期版权页上被列为编委会成员，我那时刚满22岁，是编委中年龄最小的。日本人是1937年7月占领北京的，这本刊物随之被扼杀了。

在经济上，《民主》是由斯潘塞·肯纳德神父支持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解放神学家”（这个名词是在他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他先前是在日本的一位传教士，在那里办了一本宗教性的和平主义刊物，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赶了出来。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他来华时带来了一笔各方捐献的余额，约有1000美金（在20世纪30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并且决心把它用于反法西斯的目的。《民主》出版后很快受到

了欢迎，中国学生以及其他懂英语的爱国人士争相阅读，因为它所刊载的材料是在中文报刊上看不到的。该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它敦促美国大使馆对之采取行动。日本人对这本刊物也感到不安，企图从全市销售书刊的地方见一本买一本，然后集中销毁。

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的第一位夫人）当时对《民主》的工作非常积极。她在1984年出版的《我的中国岁月》一书中（那时她已步入晚年），对这本刊物的起源和命运有过一段古怪而有趣的叙述。

《中国呼声》刊行的时间同《民主》是一致的，即1937年上半年。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它出现在上海，由两位美国共产党党员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编辑。它同《民主》一样，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在天津的中介人，我应邀为它写稿，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因为我在《民主》发表文章是用真名的。就我记忆所及，我和其他投稿人都是尽义务的。通过我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宋庆龄知道了我，但我那时还没有见到她，更没有想到我会同她一起工作达数十年。

同这两家刊物或其中之一有关系的还有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位革命作家，她曾经一度由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任为驻华特派记者。艾黎是新西兰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检查员。史沫特莱用假名“Rasty Knailes”为《中国呼声》写稿，艾黎用的假名有好几个。两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地下的共产党有密切的接触，把共产党秘密交通员掩护在他们家中，艾黎家中还收藏了一部秘密电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艾黎同斯诺夫妇及中国友人一道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把敌占区的工人和技术转移到工业不发达的后方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在与《中国呼声》有关系的人士中，我认识了朱伯森、张纪（译音）和曹亮，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当时我并不知道。

朱伯森（我们都叫他“约翰尼·朱”）身材瘦削，戴着眼镜，一派中国文人那种文雅风度。他是一位博学而专注的《红楼梦》研究者。但在这副外表下，他却是一位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有时以涉足赌场舞池、附庸风雅的伪装，周旋于权贵富豪之间。他的伪装是如此成功，使他不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在“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下也能长期潜伏。一旦被发现，他肯定是要被无情地用酷刑杀害的。但他生存下来了，在以后新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他担任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这是他胜任的愉快工作。

张纪也是瘦高个，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攻读采矿工程。他在那里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加入国际纵队的“林肯小分队”，不幸负伤并在养伤期间得了肺结核。我后来在香港碰到过他，但关于他在“二战”中的生死我始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曹亮矮小结实，圆圆的脸，是上海基督教会办的麦特赫斯特学院备受敬爱的教师。他在积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时，向学生们（大多数出身富裕家庭）灌输抗日思想，其中不少人付诸行动，也有一些人成为共产党员。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中有美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曹亮和艾黎都在内。小组除定期聚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外，还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曹亮去了大后方，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后来他到了香港，通过一家航运公司，运送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进入解放区，他在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任职。

但曹亮本人却在50年代早期遭到了厄运。他在地下工作中的老上级、勇敢机智的潘汉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被错误地怀疑为叛徒，无端受辱并被关入监狱。曹亮和他的妻子也受牵连，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25年，最后始获平反。潘汉年虽也获平反，但已在平反前死去。

曹亮的品格从他对另一个囚犯的影响中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他发现同沈醉一起被关在一间囚室里。沈醉曾是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专门猎捕共产党人的老手。他怀疑和跟踪曹亮，想抓住曹或使之致残或者干脆予以消灭，就像他对其他共产党人所做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彻底坦白，服刑期满，政府因他揭发立功，让他在新社会重新做人。但在“文革”中，他又被投入监狱，对他的特赦被取消，他又丧失了自由。只是从过去他要猎捕的对象曹亮身上，处于绝望中的他才重新产生了希望。曹亮无缘无故地被囚禁的时间比他还长，但曹亮不但对革命事业保持忠诚，并且还使沈醉这个过去的敌人重新稳定了对革命的信念。

沈醉在最终获得释放后写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历。曹亮的释放和平反晚于沈醉。我看到曹亮时，发现他对革命事业依然乐观，充满了信心。在自由生活中，曹亮和沈醉保持了友情。

※　※　※

我回天津不久就结束了失业的生涯，在美国合众通讯社（UP）天津分社有了一份工作。那时合众社属于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是美联社（AP）这个新闻界庞然大物的世界性强劲对手（在50年代后期，它与世界第三大通讯社、属赫斯特报系的国际社（INS）合并为合众国际社（UPI），两者在传媒领域中此时都已渐趋式微）。

稍后，斯诺派史沫特莱（自称“罗杰斯夫人”）到天津来看我。我想，那时我已大体上读过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女主人公叫“玛丽·罗杰斯”）和另一本著作《中国红军的征程》，所以对她有所了解。她要我为对华友好人士办的《今日中国》杂志（在纽约出版）写稿。这是我同她在中国长期友谊的开始，我们的友谊后来在美国仍继续下去，直到她1950年去世。

《民主》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国左派的机会。在天津，为了推广这本杂志，我去访问了位于法租界内的“知识书店”——这是中共华北局秘密开设的，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我才知道这一点，是当时在这家书店工作的叶笃庄告诉我的（叶是把达尔文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当时华北局的领导人是林枫，但我直到1944年才见到他。他时任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我去访问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了这个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

我是通过《民主》开始在政治上脱离隐蔽状态的，因为我同意在刊物的版权页编委名单中列入我的真名。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又是使我兴奋的。不久，更加实在的战争危险出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那天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了炮声。如同卧佛那样，我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攸关的大风暴，听而不闻。人们习惯了长期的紧张生活之后，会觉得炮声似乎也更遥远了。我结束了这次田园式的家庭度假之后，不是直奔武装冲突的现场而是回到了我在天津合众社的工作岗位。在这里，随着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进行，我开始了几年的战地记者工作。

我个人所受到的战火洗礼开始于7月底。我奔走于天津古老的海河大桥（原称“万国桥”，现称“解放桥”）两侧。桥西是安静的、“中立”的西方国家租界，我从这里发出新闻电讯。桥东在进行战斗，一方是数千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另一方是约600名中国准军事部队“保安队”，只有步枪和机关枪。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正规军不得在天津各处驻扎，30年代中期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不得驻军的地区。这条海河大桥在作战区内，但嗖嗖飞过的步枪子弹并没有使我感到危险，直到我看见刚刚倒下的许多新的尸体——如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写的“在被扭曲了的耻辱中的死者形态”——才觉得浑身发凉。同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正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看来他们最恨的是爱国学生。

我一直保留着在日军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所谓“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是日本发言人惯用的官方语言，指的是所有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国人。

“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个记者说。

“但那里的建筑物都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

“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这位日军上尉真的光火了。“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那么，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请原谅。”

※　※　※

至于天津那些穿黑制服的武装警察（“保安队”），尽管老百姓在平时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他们的作战却是英勇的，提高了市民的士气，也使敌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深厚的民族精神。虽然总的来说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敌人，有一支保安队包围了火车站上的日军，直到日本援兵开来把他们救出。还有一支保安队勇敢地冲进飞机场，企图摧毁敌机，牺牲了半数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侵略者丧胆。在战斗进行中，那个年轻的、会说英语的日军司令部发言人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晚上也许会被杀掉！”

保安队在抗击中得到许多学生和其他青年的支援。许多人被日军枪杀，其中有的纯属无辜。战死的中国士兵脸色黝黑、中弹处各不相

同，而这些人脸色苍白、中弹处都在头部，显然是被枪决的无辜牺牲者。这是可怕的、更是令人愤慨的景象。

当天津的600名战士在奋战时，另一场战斗在距北京城仅几公里的通州爆发。这是1933年国民党签署了投降主义的“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在这里，日本人所组织的保安队对他们的主子实行起义，杀死了几百名日本人。

日本人曾经把通州的伪政权吹嘘为华北在日本监护下实行“自治”的范例，所以这次起义对他们的打击特别沉重。在天津，日本发言人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喊：“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通州保安队反抗的对象是他们在几小时前还宣称要为之服务的国家（日本）以及用友谊的纽带同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人民（日本人）。”

但我们早已听说，在通州城里原有一小队象征性的中国驻军，日本人解除他们武装之前曾说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后就把这些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全部枪杀了。在保安队里有爱国分子在秘密活动，保安队同中国驻军常常在一起吸烟聊天，所以日本人残杀中国驻军的暴行，使保安队无法再对日本人表示“忠诚”，而是要为被害的中国兄弟们报仇雪恨。

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尝到的苦果是：他们决不能期望中国人为了他们而不再做中国人。通州的起义队员撤出城外，消失在乡村之中。天津的日本侵略军邀请外国记者到通州去现场观察他们那些被“残暴屠杀”的同胞——那些人的尸体没有按日本习俗立即火化，而是仍然存放在那里展览。他们没有提到以前被杀的那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驻军士兵，那些士兵的尸体早已被匆忙运走。

由于连绵的阴雨加上夏季暑热，日本人后来自行取消了这次让外国记者观察尸体的旅行。

※　※　※

到1937年7月底，日本人已占领了天津——西方国家的租界除外，其中面积最大的英租界成了不愿意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人们的主要避难所。从这里，人们乘外国航轮，可以先到敌军尚未占领的沿海港口，然后去大后方。由于这一情况，在租界里找住处很困难，买船票就更困难了。

起初，斯诺夫妇介绍几个学生来找我帮忙寻住处。接着，斯诺本人和贝特兰乘火车从日本占领下的北京来到天津。他们护送来两位年纪较大的妇女和一位男士，他们告诉我，这三位都是想离开日占区的爱国人士。如果有中立国家的外国人同他们一起走，他们装作是这些外国人的雇员或随从，可以免去被车上的日本宪兵扣留或遭遇更大不幸的危险。事实上，这几位中国人的地位比我所知道的重要得多，他们处境的危险也大得多。

年纪较大的那位妇女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中共中央的一位高级干部。她秘密到北京来治疗肺结核病（长征时所得）。斯诺为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收集材料时认识她，那时她穿着八路军的制服。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有一天她穿着城里时髦妇女的服饰来到斯诺家里找他，斯诺一下子认不出她来了（在来天津的路上，她改穿最朴素的衣服）。

那位矮矮胖胖、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是王世英。斯诺说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实际上他是一位在国民党地区活动的、饱经风霜的中共地下

工作者。

年轻一些的妇女是张晓梅，也是中共党员。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她是邓小平第一位夫人（为国民党杀害）的妹妹。他们三人当时用的都是假名，我对他们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光知道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爱国人士，这就足够了。我把王世英安顿在我当时的岳父母家中，他们正好回美国度暑假去了。他们是美国公民，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他们的住处较为安全。我为两位妇女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孚中饭店找了个住处。

斯诺问我能否帮他们买到去上海或其他未沦陷港口的外轮船票。正好我也想走，因为我写反日文章的事已经公开，我又无国籍，出了事得不到任何保护。幸运的是，我父亲的业务中有一项是为出口货物办理保险，所以同英国的太古洋行(8)关系不错。我把他们三人说成是同行的职员，买了和我同一条船的船票。那个年轻的英国售票员倒确实是问了我一句："你肯定他们不是坏人吗？"说时露齿一笑。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但我不说话，也只对他笑了一笑，他就不再问下去了。也许他还乐于让日本人受一回骗，因为日本人对于一向居于主导地位的英美势力正在步步紧逼，引起后者越来越强烈的愤恨。

我们顺利地从英租界内的海河码头乘上汽艇，开到大沽口，一艘在沿海航行的客轮正停泊在海上，将开往上海。当我们起锚时，许多日本登陆艇在周围出现，它们运来了更多的日军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

让他们来吧——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中华民族到底起来抵抗了。侵略者将发现，他们来时容易，要脱身就难了，最后势必在失

败中被赶出去——虽然时间可能不会太快。我这几位久经锻炼的同行者一定也在这样想，不是出于年轻人的热情，而是出于他们长期以来不怕挫折、终获胜利的经验。

我们都没有到上海。我们航行的第二天，船上的无线电收音机就传来了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消息（1937年8月13日）。船长宣布，船在烟台和青岛停靠后将直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那里我们谁都不想去。

我的中国同伴在烟台下了船——后来我知道他们去山东省的铁路枢纽站潍县，转道到西安和延安。我在青岛下了船，去南京继续我在合众社的工作。

多年以来，不论是在我知道真相之前或之后，我从来没有对人谈起过这一帮助三人脱险的插曲。就我所知，他们三位也没有对人说过。我确实在1938年又在较远的距离见到过一次邓颖超，她同周恩来在一起（那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还在发展，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但她的形象和处境同在天津遇见时相差太远，所以我的脑海里没有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我作为记者同周恩来见面时，他也没有暗示过这件事，不过我猜想他一定知道，因为他通过他的部下对我的新闻报道工作给了很大帮助，使我及时掌握了战时情况的新发展。

直到1973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十年中，在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前燕京大学校园，斯诺在这里多年从事教学和支援学生运动）的仪式上，邓颖超走到我面前，追述1937年在天津出险的往事——这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能听到。这次见面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的。我在“文

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几近五年，这时刚被释放，一些人见了我还故意回避。不难想象，她何以要选择这个时机来同我谈话，而她这样做对我又意味着什么。

1985年，在我70岁生日的时候，她更加公开地谈起这些往事并让这些往事见诸报端。

我和王世英的重逢要更早一些，只隔了七年——1944年在延安。我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外国记者准备亲自去访问并报道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位高级干部来带队。他见了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惊喜地喊道：“在天津见到的就是你吗？”他穿着灰色军装，我真认不出他就是斯诺带来的那位穿着西装的“教授”。我确实也长大多了，不是他最初见到的那个22岁的小子了。我们谈了很多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事情。

张晓梅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妇联主席。

但他们两位都未能在“文革”中活下来——令人伤心的人才糟蹋。

※　※　※

从以上的叙述可见，在1937年，历史的潮流已将我从旁观中国革命转变为卷入中国革命并在未来的岁月中越卷越深——虽然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沈苏儒　译）

(1) ［译者注］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1896—1980），初为英国保守党，后加入工党，1929—1930年在工党政府任职，1932年创立“英国法西斯同盟”，“二战”开始后被拘禁，1943年因病释放。

(2) ［译者注］马查多（Gerardo Machadoy Morales，1871—1939），古巴独立战争中的英雄，1920年任自由党领袖，1924年当选总统，1928年再度当选总统后实行独裁统治，1933年被迫流亡国外。

(3) ［译者注］斯特雷奇（Evelyn John Strachey，1901—1963），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工党政治家，1924年主编党刊《社会主义评论》，1929年及1945年两度进入议会，1946年任粮食大臣。1932年至1938年相继出版了《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怎么办？》等著作。

(4) ［译者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戏剧改革家。代表作有《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1955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5) ［译者注］美国战时新闻局（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为美国新闻处（US Information Service，后改称US Information Agency）的前身。费希尔于1942年在重庆筹建该局中国办事处时，为便于向中国受众宣传报道，设立了中文部，并请刘尊棋任主任。费希尔在北京任合众社记者时，刘尊棋任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翻译并在《北平晨报》工作，因而相识。本书作者爱泼斯坦也是在这一时期同刘相识并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在1994年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称刘“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中国对外宣传和国际文化交往事业的杰出人物之一……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6) ［译者注］罗兹（James Ford Rhodes，1848—1927），美国商人和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荣誉学位，189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7) ［译者注］萨松（Siegfried Lonnaine Sasson，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而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军官，在法国战场上两度负伤。

(8) ［译者注］旧中国的沿海航运业几乎为英国的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和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所垄断。

第七章　战地记者（一）：南京

我离开了天津，但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更深地卷入了战火。由于无法进入上海，我被合众社派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从那时起，我从前线和后方两个方面报道战事动态。

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尝到了挨炸的滋味。其实，我在天津就已经不是空袭的旁观者，而是亲历了南开大学被轰炸的苦难。此后，我经历轰炸的场面达数百次之多。

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合众社的办事处过夜。半夜，我突然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我忘记了危险，一骨碌爬起来到窗前观看，只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搜索着敌机。后来我下楼到外面去，看见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四肢不全，有的还完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在宵禁的空袭声中睡觉，合众社在上海的总部还不时打来电话，我习惯了在忙乱中偷闲打盹。我再也不会由于担心害怕而终夜坐着，不敢入睡。不管怎么轰炸，我照睡不误。这个本事对应付以后的许多危难是很有用的。

日本对南京的轰炸起初只是偶尔为之。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进行恫吓，另一方面谋求休战，以求达到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在国际上，它请德国的外交官进行调停；在中国内部，它利用汉奸和失败主义者。在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它在9月份发出最后通牒并加紧空袭，有时日夜轮番轰炸。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有意识地对一家红十字会大医院进行轰炸，那里住满了当地的病人和来自前线的伤兵。他

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打击南京的士气，告诉所有有关的人：即使伤病员也不能幸免，也会在病床上被炸得血肉横飞。

我看到过一些伤兵，他们成为国际上禁用武器的牺牲品。芥子气把他们的皮肉腐蚀成许多像干酪似的小洞，并深深地进入躯体，疼痛难忍。日本人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我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许多。后来查明，他们还在中国试用过传播病毒的生物武器，散布了像鼠疫、炭疽等致命的病毒。

但是，南京的人民没有被吓倒。每当敌人的轰炸机被中国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冒着火光和浓烟栽下来并爆炸成碎片时，欢呼的人群总是不顾危险，冲向现场。有一次我还看见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站在敌机的残骸上。作为航空委员会的头头，她似乎是在工作。她倒不缺乏勇气。

但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像上海那样的群众性战地服务团体却很少见。在军政机关密集的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和林阴大道，处理紧急情况是由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的。每当响起空袭警报，他们立即静街，命令行人进入新建的公共防空洞里。这些所谓的“防空洞”，结构简陋，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顶棚的堑壕而已，防备飞来的弹片和玻璃还可以，对直接扔下来的或者在附近爆炸的炸弹就不中用了，即使是轻型炸弹也不行。轿车和卡车都用绿色植物伪装起来，停在路边的树阴下。

在南京市中心，乍看起来，似乎瞅不见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衣衫褴褛、补丁摞补丁的穷苦百姓。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样的人，原来他们住在涵洞管道里，或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窝棚里。

即使如此，炸弹似乎也不放过他们。侵略者试图保留那些最豪华、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以便他们占领以后居住。在那些既有漂亮宫殿似的建筑物，又有简陋木屋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

不过，社会气氛慢慢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有两个南京。一个是趾高气扬的新首都，那里有宽阔的林阴道，有衣冠楚楚、戴着白手套的军官，自命不凡、懒洋洋地坐在名牌轿车里的高级官吏以及住在美式豪华套间里的大腹便便、忙忙碌碌的商人。另一个南京是老南京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穷。现在，被击落的每一架敌机都是老南京和新南京的共同胜利，特别使穷人和难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穷人遭受战争灾害最大，由于家园被毁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难民最恨侵略者。

1937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六周年，战时的南京举行了首次全市规模的群众大游行。来自北京和其他不久前被占领城市的学生们被允许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呼吁更加坚决地武装全民进行抗战，而不仅仅是依靠职业军人作战。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铿锵有力、具有动员力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那个情况复杂的9月份，我还观看了北京和天津学生会话剧团的一次演出。他们来自沦陷的城市，在前线巡回演出。他们那些富有鼓动性的独幕“活报剧”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保卫卢沟桥》描写了战争的爆发；《北京之夜》是沦陷后一家地下报纸创作的；《大鼓词》是在地道的农民音乐的鼓点下发出的爱国号召，它是早期用民间艺术反映时事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尝试，它在后来中国的战时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战争不时被舞台以外的真实战争所打断——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投掷炸弹。一位歌手满不在乎地说：“在卢沟桥，我们经常听到敌人的炮声。”一颗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震得建筑物摇摇晃晃。他的反应是高呼：“听听敌人的暴行吧！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直到我们把敌人赶下海！”

在听众中间，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员，其中包括宣传部长邵力子。他们的轿车停在外面，随时可以开往他们专用的钢筋混凝土防空洞。但他们也巍然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过其中有一个人神色不安地把帽子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就连那些监视会场、防止“颠覆活动”的便衣警察也没有去躲空袭。

然而，在这种新气象的背后，过去人们非常熟悉的那种情况依然存在。

我想采访学生领袖，记下了他的地址。一两天以后，当我去找他时，话剧团的一位女团员对我说：“他在宪兵司令部。”宪兵把他召唤去，借口是这个学生会没有登记注册，至今还没有放他回来。

这就是当时南京的情况，有好，也有坏。一方面，面对日本的侵略，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出现了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迹象；另一方面，当局专横霸道，肆意镇压。不过，比以往略有收敛，这倒也是事实。以前，学生一旦被捕，可能无限期地被拘禁，严刑拷打，甚至被秘密杀害。如今，他们被捕后，常常过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

不幸的是，这种缓和的局面仅仅在战争的第一年维持下来，后来就不行了。

※　※　※

由于同国民党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代表。虽然它的存在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们不愿意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尽可能不让好打听的新闻记者们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具体驻地。

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十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

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叶剑英，他曾任红军

参谋长。（后来我才知道，博古曾经同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矛盾，并由于在领导长征方面犯有错误而被贬职。我很惊讶于我们当时谈得那么投机。）

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 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将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十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
> 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们采取这个政策以后，便把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责为叛徒。在他们看来，利用革命的口号和传统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局面，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卑劣的政治诡计。他们认为，谁用这种办

法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所有阶级和所有党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谁就是托派……

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国民党所要求的那样自行解散。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　※　※

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

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红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真空地带就是敌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动员群众，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数目超过了正规军。

从战略角度来说，国民党的考虑是用中国的正规军对日本的正规军。在这一对抗中，在海陆空方面都有着精良装备的日本显然占有优势，上海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考虑是：中国军队加上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入侵的日军作战。在这一对抗中，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为中国军民所包围，他们可以

采取伏击、迂回和逐步消耗敌人的战术。平型关的胜利显示了这一点。

国民党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并不断壮大力量，所以尽量冲淡平型关的胜利，起初甚至避而不谈。蒋夫人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向她问到改编后的中国红军取得的这场胜利，她拒绝作答。她有很深的政治偏见。

但是，继上海沦陷之后，首都也在1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演说称：

> 中国长期抗战之基础不在南京，也不在大城市和城镇，而是在全国广大乡村和全国人民之决心。

嘴上说说是一码事，而怎么做则是另一码事。共产党长期以来为农民谋福利并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能够把蕴藏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巨大力量调动起来。而长期以来剥削农民的蒋介石政府既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动员农民的力量。蒋介石政府虽然临时请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人担任游击战的教官，但只是给它的部队以技术上的培训。游击战的开展有赖于武装起来的人民和正规军协同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有悖于统治阶级利益的。

上海沦陷后，日军越来越逼近，到11月中旬，南京的撤退开始了。

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我乘坐政府包租的一艘船前往武汉。按照设计，这艘船只能载客几百人，但却上了3000人。中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双铺船舱里，更低级的官吏则

挤在简陋的隔间里和甲板上。在统舱里，伤兵们乱七八糟地躺着，你压着我，我挤着你，由于高烧、疼痛或寒冷，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我凑合着住在船上一间邮政局的小办公室里，同屋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国民党侨领和他七岁的小女儿。这个小姑娘不停地起劲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现在已广泛传开了。

船上拥挤不堪，以至于甲板上的一位乘客站在船边小便时，不幸被挤得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幸而我们没有挨炸，因为天气一直雨雪纷纷，雾蒙蒙的。寒气袭来，冻得人发抖，所以人们宁愿冒空袭的危险，希望天气放晴，太阳出来。

如果我当时没有乘坐这艘船的话，也许会像合众社的年轻同事维尔登·詹姆斯那样，坐美国的“帕奈”号小炮艇离开。人们原以为它可能比较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它也挨了日机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伤亡。日美两国当时还不是交战国，这次突然袭击，使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然而这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日本同样也空袭了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造成的损失比较少，伦敦作出的反应甚至比华盛顿更加温和。日本是故意发出信号，试探它们的反应，意思是：不要挡我的路。这些低调的反应可能使日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把英美两国推一边去，它们最多不过抱怨几声罢了。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用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

进长江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塞尔斯·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暴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记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　※　※

这里我简单地谈谈那个时期在南京的外国媒体。当时来自美国的有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来自英国的有路透社，来自苏联的有塔斯社，还有德国的通讯社。总的来说，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没有被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所取代），都支持中国抗日。他们彼此之间很友好。其中有些人是长期的单身汉，有些人是暂时的单身汉，包括我在内。大家在《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的公寓里的一个集体食堂吃饭。德丁的房间有一架钢琴。他会弹琴，我们跟着合唱。在轰炸还不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凑份子到中国饭馆“打牙祭”。我们常去的一家饭馆位于夫子庙地区，它的汤很有名，据说，它

的汤锅不断续汤，一直煨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有点像伦敦的切希尔奶酪咖啡馆的牛肉腰子馅饼，报馆聚集的“舰队街”的新闻工作者非常喜欢吃它。由于我们都无法跑遍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交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情况。当然遇到有独家新闻时，我们就秘而不宣，等到抢发以后才会谈论。如果空袭警报响了，而我们还在外面吃饭，大家便会跳进各自的汽车，迅速返回办事处。

在我们这些常驻外国记者中间，最有意思的是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他三十来岁，出身于哥萨克家庭，体格魁梧，老是乐呵呵的。他小时失学，直到12岁才上小学，革命以后上的大学，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地理学，接着又学了中文。顺便说一句，当时俄国记者的英语很差，西方的同仁往往瞧不起他们。但他们都会中文，因为必须学会中文，才可能派到中国来，而大多数西方记者则不懂中文。在外国人中间，这个喜欢交朋友、有说有笑的罗果夫却同一般的苏联人不一样。我开车是个新手，技术很差，一不小心，把合众社汽车的一个轮子陷到了沟渠里，体格强壮的他二话没说，跳下去，把肩膀放在底盘下面，一下子就把车子扛到了路上。

在临时派来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位吉拉宁勋爵，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爱尔兰贵族。他被派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记者业绩，而是沾了那个头衔的光，因为对某些读者来说，“勋爵”的头衔是颇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他为人是很谦逊的，尽管陪他一起来工作的东欧籍助手总是称呼他“勋爵老爷”。吉拉宁后来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当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另一个也是贵族出身的来访记者是安东尼·詹金森爵士。他的世袭爵位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他的一位同名祖先是英国早期派驻俄罗斯

的使节之一，传说沙皇伊凡雷帝有意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求婚，要他把这个信息带回英国，但是没有成功。他长得瘦而高，脸盘很小。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像当时的许多学生一样，思想“左”倾。若干年后，他参与创办了《联合劳动新闻》并兼任主编，直言不讳地坚持反帝立场。后来我也曾为该报工作。当时我们都直呼其名“托尼”，省去了他的贵族头衔。他作为快艇运动员，成绩不凡，曾经同世界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一起围绕加勒比海航行一圈，在报道中对当时这个地区盛行的右翼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

在南京，除了政府各部门和外国使馆外，我们经常去打听新闻的外国人中还有端纳。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干脆把他叫做“中国的端纳”。他是澳大利亚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他就已经是战地记者了。1937年，他担任蒋介石和蒋夫人的顾问。一年以前，他由于协助解决“西安事变”而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西安事变”中，少帅张学良和另一位将军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经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调停，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后，他被释放。

到南京以后，我这个22岁的愣小子，竟然要求端纳安排我单独采访蒋介石。那里的老记者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端纳把话岔开，引导我采访了他自己。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为中国做的许多事情。他特别谈到他是如何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的。他一一讲述了曾经准备颁给他的许多荣誉、奖章和勋章，但都被他谢绝了。我从来没有听人如此详细地谈论过自己的谦逊。

他讲的事实大概是准确的，端纳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爱说假话的人。应该肯定，他是诚心诚意支持中国抗日的。1940年，当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倾向于同日本屈膝媾和并企图恢复内战的时候，他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顾问职务。

他后来的经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他同他的中国籍秘书李小姐一起，正乘坐自己的小游艇，泛舟于茫茫的太平洋上——这是他喜欢的休息方式。这时，一直在海上巡逻的日本海军舰艇抓到了他。日本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如实地讲了。抓到这样一个人物，似乎应该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给中国大人物当顾问的这个著名的澳大利亚人肯定是日本最希望抓到的人之一。然而，日本人以为，端纳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或者在外国的某地访问。不论是日本军舰的舰长，还是日本的整个情报系统，都不会想到他竟然在大洋上驾船消遣。上岸以后，他被交给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个平民集中营看管起来。登记注册时，他用的仍然是真名——日本人以为他同“中国的端纳”同名同姓，没有查出他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端纳”。日本投降后，他被释放。后来，他患了癌症，在夏威夷的病床上平静地去世。

（贾宗谊　译）

第八章　战地记者（二）：武汉、台儿庄

从南京到武汉的转移是地理上的撤退。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进步。根据我的经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继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之后，南京也陷落了。中国遭遇到它漫长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但是，“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是由“危险”的“危”和“机会”的“机”两个字组成的。

武汉面临着“机会”：国家和人民有着团结起来、求得生存、最后夺取胜利的潜在能力。这种信心铸造了自尊心，它不仅表现在国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个人的言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

虽然昂扬向上的“武汉情绪”在国民党区域里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它却被人们长期怀念着，不仅中国人怀念它，而且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外国人也怀念它，包括用英文写作的大部分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从左派的史沫特莱到中间派和右派的外国大媒体记者都是如此。(1)

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不仅怀念武汉，而且希望在别的地方找到民族希望的中心。他们更加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些根据地主要是通过游击战在敌占区的后方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武汉的气氛比南京要自由得多。在南京，由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人们不大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在武汉，情况大不一样。1938年是国共两大政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一年，也是形势最好的一年。武汉的书店公开出售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关于长征和红区的著作，如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

导人的著作，特别是关于抗日战略的著作，可以公开购买和讨论，而过去有这样的书是可能掉脑袋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这类书。

云集武汉的不仅有来自南京的官员，而且还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教授、学生、进步作家和编辑。他们在武汉市建立了许多开明的和左翼的出版机构。他们出版的图书，质量优良，充满朝气，备受读者青睐，而国民党或保守派、唯美派的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由于毫不涉及当前的紧迫问题，因而不受欢迎。

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宣布为非法，受到围剿。国共合作后，它在南京亮相，但它在武汉的地位比在南京要显著得多。它在武汉的官方代表团由于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坐镇而得到加强。在名义上，它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实际上，它是在战时同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有一次，我独家采访了脾气急躁的叶挺，他是通过两党谈判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支军队，它是在华中、华南坚持斗争的中国红军部队的基础上成立的。红军的主力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第八路军。

1938年初在武汉，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了自1927年以来它的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不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是面向全国的大报。它创办的时候，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了，我也到场，并且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右翼分子采取了种种手段来阻挠报纸的发行工作，包括恫吓销售《新华日报》的报童，甚至还故意制造了一起骚乱事件，但是，它的零售量和订阅量都蒸蒸日上。

在武汉的统一战线阵容中，虽然国民党把所有的部长席位都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但还是让周恩来担任了新改组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副部长。这表明了国民党承认中共部队作战方法、特别是在部队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有效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左翼作家郭沫若担任了负责宣传政工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日本流亡十年，刚刚回国。他在19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中，在部队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再现，使人想起国共合作取得了胜利，而1927年的流血分裂则导致了民族灾难。这两件事，武汉都是见证者。

在第三厅工作的，有许多知识分子，既有共产党人，也有进步的爱国人士。我作为记者，通过这个渠道，并通过他们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

总之，武汉感受到了新的机会，因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而是再度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前途而奋斗。早在20世纪初，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爆发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这个城市有许多地方，记录着为全国的统一和进步而奋斗的史迹。这是使武汉产生乐观气氛的因素之一。郭沫若本人是一个大诗人，他的诗集《武汉的希望》表达了这种气氛。

此外，同南京（它后来转化为军政官僚的巢穴）相比，武汉始终是一个工业重镇，工人阶级在这里经历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许多胜利和挫折。1926—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工会的影响和实力达到了顶峰。在群众接管武汉前英国租界的斗争中，工会是主力军。自从19世纪中叶外国在中国开辟租界以来，这是收复租界的第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运动经受住了1923年的军阀镇压，但是，在

1927年国民党右翼的大屠杀以后，它多年受压抑。现在，它又重新蓬勃兴起。

作为气氛发生变化的一个迹象，1938年5月1日，武汉11年来第一次庆祝了它的国际劳动节。在全市最大的公园里，广大工人群众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人王明的讲话。王明当时仍然居于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他一度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如今在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方面仍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伙伴，而是奉为领导者。关于他，我以后还要讲到。

※　※　※

最重要的是，1938年的武汉燃起了乐观主义的火焰。这种乐观情绪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形成的。这些胜利虽然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便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证明，革命的激情不仅可以帮助克服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而且也有助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有效地反击敌人，削弱他们的力量，尽管许多城市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

在广袤的乡村地区，节节前进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虽然前进的速度比较慢，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有希望的。

国民党军队除了领导无能之外，还习惯于防守和打阵地战。这样的打法，有利于日本人，因为他们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还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因而占了上风。

共产党军队则不然，他们看准了日军战线拉得太长有鞭长莫及这个弱点，在防守力量薄弱的敌人据点之间有广大的空隙地区可以打游

击战和运动战。敌后辽阔的农村地区就这样逐步成为解放区。正规军对正规军，当然日本侵略者占优势。侵略者的正规军对付保卫自己家乡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就不同了，后者专门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往往以优势兵力和高度机智打败敌人，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和装备，武装自己。

一支武器装备很差却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可以打败武器精良却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军队。这一点在十年内战期间已经被中国红军所证明，他们打败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正如毛泽东所挖苦的那样：蒋介石成了红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把欧美供给他的武器装备运送给红军。后来的长征则证明，被迫的退却也可以转变成胜利。

当年在武汉目睹1927年革命岁月的外国人中，许多人持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持同情态度。在这些持同情态度的外国人中，1938年仍然在武汉的只有美国新教的洛根·鲁茨主教。周恩来十几年以前就认识这位同情革命的公正老人，现在又找到他了。这位主教的宽敞住所很快就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个“哨所”。左翼外宾中有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斯特朗1926—1927年也在武汉，后来离开了这里。史沫特莱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当地的外国人给鲁茨的住所起了个外号：“莫斯科—天堂轴心”。虽然斯特朗当时定居莫斯科，但这个地点跟莫斯科毫无关系。不过，这里的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同武汉的外国军政官员进行接触的社交桥梁。人们可以在他的院子的草坪上喝茶，同周恩来和他的随员，以及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武官助理弗兰克·多恩和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等在一起。卡尔森刚去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视察归来。后面这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了将军。关于卡尔森，我要多谈几句。

1937年12月，我刚到武汉不久，卡尔森来看我。他长得又高又瘦，脸上布满皱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嘴上叼着烟斗，穿一件羊皮夹克，挎着一个帆布背包。他带着斯诺的一封介绍信，信中说，他是一位亲华反日的军官，想亲自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斯诺在信中问我，是否可以带卡尔森到八路军的武汉办事处去。他还带着另外一封斯诺给八路军的介绍信。

我带他见了叶剑英将军和董必武，他们是在周恩来之前到武汉的。他们同延安进行了联系，很快就安排他到敌后游击区根据地去访问。

他访问游击区归来后，满怀热情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切。他在正式报告中谈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还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讲了这些情况——这一点是许多年以后才公开的。在他奉派来华时，罗斯福曾要求卡尔森直接写信给他，讲讲真实的情况。卡尔森同罗斯福的友谊是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夏季白宫”建立起来的，罗斯福曾长时间在这里休养，卡尔森担任“夏季白宫”的警卫长。

卡尔森巡视游击区前线归来后，还在武汉公开地讲过他的印象。我听过他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人参加的集会上的讲演。他说，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对抗日最积极，在部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把他同美国历史上的人物作了对比，说他“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2)。当他谈到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封锁对八路军的军事供应，而且阻挠供给在抗日战斗中伤员的医疗物资。这个反共的死硬派将军不否认这件事，他对卡尔森咆哮道：“你不了解。他们的死活，我们是不在乎的。我们要他们死。”

这些经历促使卡尔森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来中国以前，他对一切左派的东西充满了偏见（他曾经参与美国对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迪诺的武装干涉）。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效率倍加赞扬，同观点相同的美国人更靠近了。战前在北京时，他已经听到斯诺讲述所亲见的中共和军队，现在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为：他们可能在抗日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而日本将来也会成为美国的敌国，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他们作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帮手是很重要的。在八路军中，他见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使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认识。他回到武汉后，帮助史沫特莱给八路军收集医药用品，协助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的“工合”运动。

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新观点再也没有改变过，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闻名遐迩，成为有名的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司令官。他的训练和思想教育理念部分地吸收了他在八路军中所看到的东西。他的部队的战斗口号“Gung Ho”（工合，意思是“共同奋斗”）渊源于中国“工合”运动提倡的协同工作的箴言。在他1947年逝世以前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直言不讳地反对华盛顿支持蒋介石对中共重新发动内战的倒霉决策。

在非官方的外国学生中，大家对共产党的战绩和政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当时旅行还比较自由，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率领一个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和青年），去晋东南朱德将军八路军总部参观访问，此行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美国国内的进步运动。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成员，名叫拉尔夫·休斯，他是波兰人，以前曾经在“国际联盟”工作过。他写了一本书，题为《鱼翅和小米》，在美国出版后，颇为畅销。书

名中的鱼翅是中国宴席上最昂贵的一道佳肴，小米则是老百姓的粗粮、八路军的主食。他以此来象征性地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那些岁月里，还有一个“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经过武汉去延安访问，同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晤谈。其中的美国代表是莫利·亚德，她出生于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几十年以后，她领导了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成为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之一。

1938年，在武汉的中国人中间，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使人感到特别强烈的是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的坚定支持，这是当时另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佛朗哥发动的军事叛乱得到了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军队和武器的支持。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爱国歌曲在被禁止多年以后，1938年重新回荡在南京的上空。这酷似《马赛曲》的命运。据历史学家记载，《马赛曲》被卷土重来的君主和拿破仑第三帝国长期禁唱以后，于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重新出现在巴黎。1938年在武汉，除了这首爱国歌曲外，还增添了一种国际气氛，到处可以听到一首新的中国歌曲《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曲的诞生基于这样一种感情：中国和西班牙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很多人都知道“热情之花”(3)是谁。在援助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大约有一百多名居住在西方的中国人自愿参加。在武汉，我碰见了来自西班牙前线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他准备去敌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一个战地医疗队，为伤病员服务。这位技术精湛、忠诚的国际主

义战士牺牲在他的岗位上，他的英名在中国永垂不朽。毛泽东所作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全国家喻户晓。从同一条道路上，还来了一位出色的荷兰纪录片先驱者佐里士·伊文思。陪同他一道从西班牙来华的，是著名的匈牙利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后来加入美国籍）。当西班牙共和国惨遭失败后，被关押在法国拘留营的二三十位国际纵队医生，又来到中国为反法西斯战线服务。

※　※　※

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台儿庄位于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作战，而远在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则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拦阻敌人的增援，这是在统一战线中互相配合的成效。

我们去台儿庄采访的一行人可谓是意气相投、配合默契的最佳搭档。伊文思的电影班子刚刚来自战火纷飞的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拍摄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国，他们正在创作另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它将产生同样的效果，解说者是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该片将包括：他们亲眼目睹的台儿庄战役情况，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区的情况。国民党不让他们去那里，他们设法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的一位摄影师，让他拍摄后把胶卷交给他们。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那位有头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森，他刚从敌后共产党游击区访问归来。再一位就是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手下的曹亮。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的《中国之声》社。他在教会学校教书，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这个人非常出众，我以后还要讲到他多年来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之中还有来自国民党宣传部的

人，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一个是官方的摄影师，他指手画脚，说哪些能拍摄，哪些不能拍摄。他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滑稽的是，我们的“总管”是大腹便便的西奥多·杜先生，他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的指挥，后来被授予战时准将。然而他一点也没有军人的味道，还有两站地就到达台儿庄的铁路交叉点了，他突然奔过来，惊恐地说：“我们不能再走了，我发现昨天这里落了一颗日本炮弹！”让我们转身回去也许正合他（和他的上司）的心意。但是，既然已经到了今天和明天都会落下炮弹和炸弹的地方，我们就毫不在乎地耸耸肩，不理会这位“勇士”。上述这些情况反映出战争过渡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局面还是乐观的，越接近前线，越是如此。战区司令部设在战略要地徐州（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躺着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赶快把他们撤到后方去，他们是很难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却依然生气勃勃。墙壁上贴满了新的爱国标语。部队和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行进着。平民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报童叫卖着报纸。身背广告牌的人照样宣传着正上演的戏剧和电影。学生宣传队自发地在户外表演着时事短剧。在公园里，妇女带领着儿童玩耍。尽管轰炸声不绝于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比遥远的武汉更有信心。在武汉，人们担心徐州被突破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在徐州，人们在期待着把日本鬼子赶走。

在战区司令部的门口，挤满了赶着猪来慰劳将士们的农民。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统帅30万大军的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他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属于桂系。他的部队是从靠近越南的多民族省份广西带来的。李宗仁将军是南方人，面目清瘦，但精神矍铄。他把

台儿庄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爱国主义精神，也由于战区禁止一切无偿的摊派。

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台儿庄更近了。我们吃力地步行到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孙将军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少睡眠，过度疲劳，声音有点嘶哑。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已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

次日，我们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一个浮桥到了台儿庄。到处是瓦砾，尸横遍野，许多是阵亡的士兵，有一个是农民，在他那只伸出去的手臂旁边是一只死鹅（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附近还有一些躺在铁制弹簧床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是日军溃逃以前准备把他们拖到空地上去焚烧的，他们只来得及烧掉一半。

中国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指挥部队进行惨烈的肉搏巷战，终于把侵略者赶走了。同他的军阶相比，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细长的个子，显得很精明能干。他的军服在战斗中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所以换上了皮夹克和便裤。他说，他的部队有70%的官兵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城墙已有一半被炮弹炸毁。在城外，有四辆被日军丢弃的坦克残骸。

台儿庄战役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仗主要是杂牌军打的。所谓杂牌军，就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以外的部队。他们的装备很差，均来自边远省份，被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所轻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勇敢、不怕死的。

从地理上说，这表现了无远弗届的民族精神，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这一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是保存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

支柱的，所以只是从远处打打炮，而且数量不多。

日本的高级发言人对他们在台儿庄的失利感到震惊，何况又是败在杂牌军的手里。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掩盖败绩的手法：在许多天里，他们不仅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还说什么徐州（台儿庄是它的前哨基地）从来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其实，徐州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它必争之地。

1938年4月29日，即“台儿庄大捷”三周以后，武汉的士气由于武汉上空的一次空战胜利而进一步提高。我亲眼目睹了这次空战。

“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原因。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在国内，台儿庄的胜利受到普遍的欢呼：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在延安和解放区、在敌占区，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也为之雀跃。外国的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打下去，曾经产生过怀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疑虑消除了。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在日军一个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

四小时占领天津，
六小时拿下济南，

为何区区台儿庄，
久攻不克如此难！

日军虽然在台儿庄受挫，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死。在我们去台儿庄的路上，经过一处看来空旷的田地，一个孤独的日本伤兵在一个用毯子盖着的弹坑里不断向我们开枪，直到护送我们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他本来可以躲过我们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光荣的自杀”。他显然深受日本军部的思想毒害，在他看来，落入中国人手里，必然被折磨致死；如果能够作为俘虏生存下来，那也是对天皇、对自己和全家人的一个耻辱。我们的一个中国同伴说，太遗憾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日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导开导他。

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

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　※　※

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但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淹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国民党右派和投降派这时又嚣张起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从欧洲等地流亡归来后，投降派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外表温文尔雅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着角色。在1926—1927年，他曾领导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府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左派，在反动营垒里同蒋介石争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到国外，同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分子勾勾搭搭。当1938年他重新出现在武汉的时候，又打扮成了一个渴望参加抗战的爱国者。他的左右手陈公博和周佛海更为善变。他们两人曾经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的两个。后来，他们在国民党内从左翼变成右翼。他们两人被安插在武汉的战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职务。两人同汪精卫一起在

1940年变节，投入日本营垒，成为被人唾骂的汉奸。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死于狱中，陈公博则被处决。

我个人对这三人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汪精卫在公共场合同别人握手时，总是毫无生气、软绵绵的。衣冠楚楚、有点女人腔的陈公博曾经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似乎老是在演戏。他和戴眼镜的周佛海在同记者打交道时，明显也喜欢那些讲德语或日语的人。

在这个复杂的时期，共产党也有重要的人物叛逃，他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中央委员，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只身一人溜入国民党阵营，甚至连他的贴身警卫都没有跟着他走。他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野心家，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忽左忽右。他的个人野心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动机。在长征路上，他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裂党，最终把他统帅的第四方面军引向绝路，在中国西部差一点儿被回族军阀消灭掉。他原想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寻找一个安全地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则走向未来的抗日战场。张国焘叛逃后，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许多职务，有些职务名义上很高，但无实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逃到香港，后来移居加拿大，最后死在那里。

※　※　※

1938年，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

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国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它同武汉一样，也是在10月份被日军占领的。

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贾宗谊　译）

---

(1) 有一张集体照片中的人物自称“最后的守望者”，其中大多数人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刻。他们是：史沫特莱；美国官员：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助理武官弗兰克·多恩和使馆秘书约翰·戴维斯；记者：F．M．费希尔、杰克·贝尔登和A．T．斯蒂尔；英国作家弗雷达·厄特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官员章汉夫。

(2) ［译者注］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统帅，后半生致力于教育工作。格兰特（Ulyleeo S．Grant，1822—1885），美国军事家，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为美国第18任总统。

(3) ［译者注］承《今日中国》老同事、西文部主任徐钟麟同志告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是西班牙的群众对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的赞誉之词。

第九章　战地记者（三）：广州

广州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既是一个士气高昂的城市，又是一个令人消沉的地方。说它士气高昂，是因为在日军持续狂轰滥炸、入侵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广州人民临危不惧。说它令人消沉，是因为政府高官尽管口头上高谈坚决抗日，但事实是他们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日军一登陆，向广州挺进，那些达官贵人们便弃城而逃。

从1938年6月至10月，我在广州待了五个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日军狂轰滥炸，民间抗日组织风起云涌，最后是大撤退和这个城市的陷落。日军登陆后，中国军队曾经进行了短暂的抵抗，我在前线采访，了解到迅速瓦解的军事方面的若干原因。我离开这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农村待了一些时候，看到日军势力向农村扩展以及村民的反应。

我是在仲夏时分抵达这座名城的。当时，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尚未被日本占领的大的海港城市。自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它多次面临外国的侵略和威胁，都勇敢地进行了抵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两次革命的摇篮。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的君主王朝；另一次是1924—1927年的革命，把中国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到东南亚和美洲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来自这个华南重镇附近，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故乡和整个中国取得进步。

我一到广州，那里的人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比北方的同胞矮小瘦弱一些，但是精力充沛，闪动着乌黑的眼睛，说话很

快，声音很大。这样说话在别的地方可能被认为是情绪激动，而在这里则是平常的事情。

1938年的广州，爱国情绪非常高涨。日本飞机天天进行轰炸，还通过广播电台和散发传单进行煽动，说什么“你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派飞机来保卫你们”，但是广州游行示威的群众却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派飞机来，留下那些飞机保卫大武汉。由此可见广州人民的民族精神。

在我来到广州以前的几个星期，日本人把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当作他们轰炸机飞行员新手的练兵场，因此他们要轰炸的目标常常没有炸中，无辜平民却被炸死不少。在我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有两千具平民的尸体躺在广州的河边。日军每次出动的飞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们不断地轮番进行轰炸。6月6日，又有一千五百多人死于非命，这些男女老少被日机炸得血肉横飞，成为难以辨认的一堆堆骨肉。有些受伤的人被压在水泥板下，哭泣呻吟着。断壁残垣上的水管子还在淌着水，如同死伤的人的血管还在流血一样。

好几个夜晚，日机连续来骚扰，虽然投掷的炸弹并不多，但却不停地在人们的头顶盘旋，发出撕裂神经的呼啸声，使人不能安睡。沙面岛上英法租界的周围有一条小河，岸边聚集了许多饥寒交迫的群众，日夜守候在那里，桥上荷枪实弹的租界警卫不让他们进去。日本对广州的空袭，显然是想用这种恐怖手段摧毁广州人民的意志，其残酷的程度只有希特勒对西班牙共和国的空袭可以相比。

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屈服。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消防队和童子军面对轰炸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工作着。必要的服务工作没有中断。报纸照常出版。男女老少纷纷在户外聚会，为抗日捐款，女同胞往往把家里的珠宝首饰捐献出来。广州人喜欢的茶楼早晚

仍然坐得满满的。由于香港供应商不肯冒着风险供应新片子，影剧院不得不继续放映着美国的一些老片子。6月6日，住在伦敦的陈依范（他是孙中山时代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来广州举办反法西斯画展，参观的人很多，广州市长也参加了。画展所在大楼门前当天还有许多人在空袭中被炸死。这种气氛预示着以后几个月广州的群众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

像在武汉等地一样，我在广州很快找到了一批同我意气相投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救亡日报》的年轻员工中，有担任主编的夏衍和尚忠义（译音）。

夏衍是评论家、剧作家、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者，尚忠义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在报社却已称“老大哥”了。还有一批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年轻木刻家、招贴画家和漫画家，他们充满战斗力的作品经常出现在街头和各种会场。苗毅范（译音）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身材修长，大约二十岁，他准备到遭受日本入侵威胁的沿海一带去一趟。我请他回来后给合众社写一篇稿子。然而，他永远完不成这个任务了，因为那里霍乱猖獗，他染病而死（多年以后，我写了一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其中谈到了这位热情爱国的学生）。

6月中旬，日本对广州的空袭暂时平息了下来。国内外的注意力转向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上。为了阻止日军从徐州西进，蒋介石于6月10日炸开了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堤坝。洪水的泛滥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转而南下长江流域，陆海空三军并举，并且使用毒气展开进攻。

国民党在多处战场上，有一些部队打得很顽强，但是腐化的将领们总是使他们灰心丧气。当日军进攻长江上的马当要塞时，司令官正在城里宴饮作乐。由于群龙无首，这个江防要塞在一天之内就陷落了。日本军舰轻易地通过了这一宣称“不可逾越”的防线。其实，这条防线不仅防务部署得很差，而且其工事构筑也很差，不堪一击。

在随后的几周内，敌人的进攻缓慢了下来。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国民党正规军进行了比较强烈的抵抗；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和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在敌后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游击战，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压力，使它无法向那里大规模增援。

另外，国际因素也起了作用。

日军企图试探一下苏联在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接壤的边界一带的虚实，结果在张鼓峰（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大败而归。东京的一个发言人无话可说，只能归咎于苏军炮火过于猛烈，日军难以承受。

由于通过陆路北进的企图受挫，东京总参谋部便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有希望的打法：对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阵地发动海陆两路进攻。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本着“用甜言蜜语来消释怒火”的原则，同日本调情，提出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在武汉，汪精卫敦促改善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因为它们可能在促成中国对日本的带有投降性质的“议和”方面担任调停人的角色。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采取“绥靖政策”的气氛日益浓厚，德国几个月前霸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被9月30日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所出卖。这些情况为日本壮了胆，使它敢于同时攻打武汉和广州。

※　※　※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一个孤立的海岸渔村哈冲（译音）的滩头登陆，开始了对广州的攻势。当地一个名叫莫希德的旧式军阀没有进行什么抵抗。他以作威作福和治军残暴出名。他同他的心腹军官们走私钨矿（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先运到香港，最终卖给日本。他由于防务松弛、抗日不力而被捕，交付军法审判。

敌人的先头部队登陆后建立了多个桥头堡，装甲部队接着拥入，在海军强大的航空力量的掩护下分割包抄，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中国守军。广州东面的惠州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据一位英国工程师说，“在中午两个血腥的小时中，平均每十秒钟就有一颗炸弹落下。”

一周之内，日军就迫近广州。我和另外两个记者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夜间到前线作了12小时不同寻常的采访。起初，我们跟着中国部队先向前走，后来突然向后转，以避开迅速反攻过来的敌人。

最初我们从城区向东前进，走了大约30英里，只看到大批中国军队，队伍整齐，像在检阅场上似的，没有战斗的迹象。最后，我们同几十辆维克斯牌轻型坦克走在一起，并有大批摩托车和一辆像灵车似的很长的客车，是参谋人员乘坐的。车上的军官让我们尾随其后，但是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

突然，我们发现摩托车队和步兵向着相反的方向奔走。他们喊道，前面发现敌人，正用机关枪朝着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共汽车扫射。那辆参谋人员的车和我们的车调转了方向。我们很快就走在后撤的中国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的中间，这表明不会在这里设防抵抗，也许是由于敌人的两翼包抄获得了成功。

回到旅馆后，我们决定次日清晨再去前线。不料，我们所在的地方一下子成了前线。珠江沿岸出现了许多日军坦克，隆隆之声不绝于耳。远处传来爆破声，这是最后撤退的中国军队正在炸掉重要的设施。平民百姓也在仓皇逃走。

我冒险到城里看看，发现20辆日本坦克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行进。作为这些坦克经过的象征，留下的是弹痕累累的墙壁和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四个平民、一个漂亮女孩和一个士兵。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美国国旗上有两个弹孔。头顶上，日本飞机正在低空盘旋。

傍晚时分，日本的装甲部队完全控制了进入广州的公路。而在头天晚上，我们还看到公路上挤满了装备精良的中国机械化部队。那些幸存下来的部队不是通过广州城撤退，而是沿着广州—惠州公路的两侧撤走的。

几个小时以前，我们这几个乘坐出租车乱跑的新闻记者实际上处于随时都会丧命的危险之中。我们在凌晨四点以前一直与之同行的中国部队，在日本飞机的俯冲轰炸和坦克的轰击下，到拂晓时分已经所剩无几了。凌晨五时，开始了人与机械的殊死战。

白天在城里，我们偶然碰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一位中国军队的营长，前天晚上，我们曾经让他搭乘过我们的便车。此刻，他显得很憔悴，军服也脱掉了。他说，起初他不相信日军坦克已经在公路上，因为下达给他的命令是：进入前面第二道防线的阵地。下面是他接下去的谈话记录。虽然我不可能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清楚地记得他谈话的内容和精神：

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第二道防线。我们接到的新的命令是：各部队单独活动。这意味着，日本人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一个小时以后，日本飞机发现了我们。我们尽量隐蔽起来，对日机的扫射没有还击。后来由于一些战士被打死，愤怒的战友们忍无可忍，开了火。

日本人决定歼灭我们。最初，六辆坦克向我们扑来，我们打掉了四辆。接着，大约有50架飞机轮番向我们轰炸。我们的战士把反坦克炮架在临时拼凑的竹子支架上，以便阻击。日机投掷了大约300枚小型炸弹，炸坏了我们的反坦克炮。战士们被炸得血肉横飞。到中午时分，我们这支500人的队伍只剩下275人。我们销毁了我们的重武器，越过田野来到这里。现在，我正设法寻找我们司令部的去向。

这位营长告诉我们，那个曾踩在我们汽车踏板上的彬彬有礼的传令兵，在遭遇战一开始时就被炸掉了双臂。

※　※　※

现在回想起来，在日军登陆前后，广州群众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甚至在敌人进入广州一两天前，还举行了盛大的动员大会，高级官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事实上，跟听众不一样，这些官员正准备赶快溜之大吉，在城内或在周围地区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人民群众一时陷入了混乱。后来，他们的爱国心主要表现在不愿意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纷纷离开了广州。他们行动之迅速彻底是我在别处没有见到过的。

后来，广州周围的武装抗日活动逐渐形成，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相关的游击队。

※　※　※

在广州郊区没有从上而下照着模子组织起来的武装抗日活动，是由于当地军阀官员狼狈逃窜的结果。

下面，我讲一讲当时我亲自观察到的某些情况，当然不可能很全面。

从10月27日至31日，我和美国自由投稿的摄影工作者雷伊·斯科特试图走出这个沦陷的城市前往香港，但是，未能成功，不得不返回。回到沙面英国租界内的旅馆后，我给合众社发了一条新闻稿。当时根据一项尚有效的协议，还能通过停泊在珠江口的美国军舰上的电台发送稿件。我在这篇稿件中写道：

> 我们在“无人区”过了四天，刚刚返回。我目睹了日军在一个荒芜的港口登陆的情况。接着来了三架日本飞机，追着我们轰炸了45分钟。我步行和乘船一共走了80英里。这使我有可能讲述一下广州沦陷后珠江三角洲的某些情况。
>
> 斯科特和我曾经试图经过一条小溪和小路出境，以便把首批关于日本占领情况的图片带出去。但是，日本人对三角洲的水路严密封锁，飞机不断进行侦察，武装舰艇巡逻，每个陆上据点都有上百人把守。
>
> 不过，他们对陆地的渗透并不很远。广州周围20英里的半径范围内实际上是无人地带，中国当局已经撤离，而日本人还没有

占领。

在我们经过的十几个村庄中，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两个问题：第一，日本人来了，怎么办；第二，如何对付蜂拥而来的难民。

距离广州不远的佛山郊区，布满一条一英里长街道的武装民兵把小股日军赶回了火车站。

解决难民问题的典型做法是：给他们一顿饭，把他们送走。

穿着蓝色制服的村自卫队员背着武装带，挎着步枪或手枪，检查来往行人和保卫家园。这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很有效率，但是，同外界完全隔绝，又缺乏协调。距离广州只有十英里的一些村庄的居民不相信日本人真的进了广州城。甚至那些在附近的佛山打退过日军的人也坚持认为，他们打退的只是打着日本旗帜的汉奸。

这个地区似乎没有中国军队。只是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分布很广的组织。那里有数十名沉默寡言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对我们的所见所闻很感兴趣，似乎在计划把农村地区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并加以领导。但他们似乎也怀疑广州城是否那么快就已被日军占领，路过的难民都是在日军进城前逃出来的，所以也不能对此加以证实。

途中，日本飞机在我们租用的舢板船附近扔了几颗炸弹，他们似乎对任何移动的东西都疑神疑鬼。有一次，日本的巡逻艇在

离我们只有十码远的地方开过，没有发现在草席船棚下蹲着的我们这两个外国人。

我们随身带着两支勃朗宁45式手枪，这是美国军舰在斯科特的请求下借给我们的防身用品。如果我们想用这些武器对付日本人，那我们就该倒霉了。

最后，由于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溜回广州，在沙面英国租界内的维多利亚饭店这个安全避难所栖身。从那里，我作为旅客登上了美孚石油公司的汽艇前往香港（西方国家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向日本宣战的。那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我随身带了两个大洋铁桶，里面装着在广州出版的全套《救亡日报》，这是报社编辑托付给我的，他们也到香港后，我就送还给了他们。这就是我对广州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效劳。

※　※　※

在重新叙述广州沦陷前十分高涨的群众爱国热情时，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宋庆龄的两次广州之行作为本章的重点，因为她不仅使全城受到鼓舞，而且我同她的会见成为我自己以后整个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

我在广州停留期间，具有高度原则性、受人尊敬而又气质高贵、风度优雅的宋庆龄两次来到广州。她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她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亲临广州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她在中国近两个重要时期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一次是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以后，继续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另一次是准备进行1924—1927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

她于1938年8月访问广州时，我没有见到她。但是，我通过合众社发表了她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一些主要观点。她说：

> 12年来我第一次重返广州，为的是亲自看看广州人民抵抗日本野蛮轰炸的英勇精神。中国的力量蕴藏于人民之中。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是全面的侵略战争——不分军民，所以我们唯一有效的对策是进行全民抗战。没有全民总动员，中国是无法取胜的。但是，甚至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年以后，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充分了解。许多官员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外国的力量……当国际局势似乎变得不利于我们时（如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还谣传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他们便绝望地说，一切都完了。当有迹象表明，日本将入侵华南从而同英国发生矛盾，或者日本在中苏边界向苏联挑衅时，他们便说：“外国现在一定要进行干预了，我们得救了。”这是一种半殖民地弱国的心态，他们只能仰仗别国才能生存下来。这表明，他们对自己人民的力量缺乏信心。其实，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而且必将——挽救中国。……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人力物力，将决定我们的胜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外援。我们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都深表感谢。
>
> 对于美国人民，我要说几句话：你们是同情中国的。但是，在前线杀死我们战士的子弹和落在广州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的炸

弹是用美国的废铁制造的。日本的经济依赖着美国。这些事实应当向美国人民说清楚。

她接着像有先见之明似的说道：

今天，日本的飞机是用你们的石油飞来轰炸我们的。明天，日本的飞机将飞临菲律宾和夏威夷的上空。你们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正是不计后果的美国商界帮助造成的。

她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对此，美国人民打算怎么办呢?

（在宋庆龄发表这次谈话两年半之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　※　※

我第一次同宋庆龄见面，是在她最后一次访问广州的时候。那是9月18日，即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国耻纪念日。但是，七年以后的广州，这一天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人民群众的勇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日本飞机从海岸到广州，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然而，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打着火把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行示威。他们大公无私地要求中国自己的空军集中力量保卫武汉，而不要分散力量来捍卫广州的天空。

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她的名声早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亲眼目睹她的风采，这还是第一次。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后来的24小时内，我们就见面交谈了。宋庆龄认识一批中外人士，她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谴责日本野蛮轰炸的行径。她邀请我们组成了她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游击战士们从敌人手中收复了许多领土。由于我报道了广州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我也被吸收到“保盟”广州分部中。在此之前，她已知道我经常给《中国呼声》写稿，《中国呼声》是她在上海主办的英文版爱国杂志。

大约一天以后，宋庆龄欢送印度国大党医疗队上前线，她邀请我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个医疗队是尼赫鲁组织的，宋庆龄同尼赫鲁保持着友好的通信联系。在这个医疗队中，有年轻勇敢的柯棣华大夫。柯棣华接替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工作，后来也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保盟”广州分部还来不及正式开始工作，广州就沦陷了。但是，我同宋庆龄、同保卫中国同盟和她的其他事业的工作关系却持续了四十多年，并且成为我以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我应她的要求，在她身后撰写了她的传记。1981年，在临终前夕，她被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这里，我们还是回到1938年底，在广州陷落以后，我便前往香港了。

（贾宗谊　译）

第十章　在香港同宋庆龄共事

日本占领广州后，我第一阶段的战地报道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一到香港，合众社就把我解雇了。在香港，我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一年多，帮助她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

这个变动成为我一生中的分水岭。香港是英国100年前在鸦片战争中从中国夺得的一块“直辖殖民地”，它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不同于战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它的建筑物大多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冒出来的钢筋混凝土和大玻璃窗所形成的“丛林”。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代表着不列颠帝国的威严和财力。但即使是这些建筑物也只有四五层楼高。

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座供殖民地官员和中国富豪居住的孟加拉式平房(1)，周围种着繁茂的亚热带植物，有高大的榕树，也有开红花的攀缘灌木丛。沿着港湾是主要的商业大街，使人恍如置身于伦敦。有许多狭窄的街道从这些商业大街辐射开来，那里挤满了小店铺，还有货郎和民间艺人沿街叫卖或做生意，像华南许多城市世世代代的景象一样。在这些繁华表象的后面是贫民窟和棚户区，那里是辛勤劳作的贫苦大众的栖息之地。

香港辖区内的居民95％是中国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法律上的地位。确实，外国人，甚至普通的英国人——如果不属于文官或军队系统，也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这里没有民选的机构，一切权威来自英国任命的总督。不过，这里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和许多战时难民）的政治倾向倒是反映了大陆的民意。总之，香港的殖民地体制同中国

内地的生死搏斗相互依存着。当时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唯一剩下来的同外界联系的通道。

※　※　※

为什么合众社把我解雇，而不是派往别的地方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合众社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来，所以它减少了派驻在中国战线的记者，而派驻在日本的记者则没有减少，它估计重要的新闻将出在那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报纸是合众社在亚洲的主要订户。而且合众社在远东的最高主管——东京分社经理迈尔斯·沃恩据说购买了大量日本债券。要裁员的话，还有谁比我更适合成为被裁对象呢？我“太亲华”了，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同时，解雇我代价比较小，因为我是在当地雇用的，没有订立雇用合同，所以我无权提出关于解雇费、遣返旅费以及美国本国雇员所享受的其他许多优惠的要求。

对我来说，同合众社分手实际上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工作的开始。因为宋庆龄很快就请我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我的任务是编辑它的英文出版物。虽然这是无报酬的义务工作，却成为我留在香港的主要因素。此后不久，我在当地的一家日报谋得一份差事，借以糊口。

为什么宋庆龄不在别处，而是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因为遭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内地受到了双重封锁。一重封锁是由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了海岸线。另一个正在发展的封锁是蒋介石政府禁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医疗用品也不让供应，同时压制报道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种种胜利和成就。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打破这两种封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至于被不公

正地剥夺通向外界并使外界听到它的声音的权利。而香港——当时仍能同世界大部分地区联系——则是发挥这一作用的最好“窗口”。宋庆龄跟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赴港并协助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宋庆龄由于她的经历、她的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她作为孙中山夫人、作为中国共和革命创始领袖的遗孀，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同样的，她以对中国团结进步的爱国事业的一贯忠诚、纯洁的思想、不受腐蚀的廉洁正直的品德而闻名于世。她的热诚使她能广交中外朋友并团结不同观点的人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她堪称世界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她又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时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我们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人数不多，但却充满朝气。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我们大家把她当做慈母一般看待。30岁的廖承志作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驻香港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成员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我的年龄最小，刚过23岁。在宋庆龄和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她的威信的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

保卫中国同盟和它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外的广泛赞助，特别是在它成立的头两年，更是如此。宋庆龄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保盟”的第一任会长。宋子文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是蒋介石的内弟。在美国，“援助中国委员会”是通过“保盟”送交捐款的，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2)

宋庆龄处理同“保盟”同事们的关系时非常民主。虽然她是全国和全世界的名人，但她平等待人。不论什么工作，包括在办公室用打字机打信和救济物资的打包托运，她都跟大伙儿一起干。在她主持的会议上，大家不论在她发言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由于大家的立场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果。中国籍的成员把自己为祖国的生存而战看成是世界人民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外国籍的成员则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反映宋庆龄风度的一个插曲，我在这里援引一件小事，事情虽小但它使我觉得颇有意义，永志不忘。

在香港，我同唐纳德·艾伦同住一个小公寓。艾伦是一名教师，也是二十来岁，他志愿帮助“保盟”“工合”和其他反法西斯事业做些事情。有一次，我们请宋庆龄来我们住处共进由我们亲自动手做的午餐，她欣然答应，我们高兴极了。但接着，我们慌张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没有桌布，于是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代替。席间，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论“保盟”和别的事情。饭后，她表示感谢，接着又逗趣地问道：“你们中间哪一位睡在这条床罩下面？告诉我，我才走。”我们在欢乐的笑声中送走了她。她这位世界名人、大无畏战士就是这样同年轻人有说有笑，和谐相处的。

在1939年至1940年，“保盟”的工作发展很快，它同国外的许多进步的援华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援华组织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和华侨组成的——对这些外国人和华侨来说，宋庆龄代表着原则和正义。捐款和救济物资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海员们也在他们的同伴中募集

捐款，送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并把我们的宣传品成捆地带去散发。每一笔捐赠的现款和物资，不管数额大小，宋庆龄都在收据上签名。

那时向中国大陆运输物资还是有可能的。货车队和救护车是通过当时法国控制的越南进入中国的。敌后游击区的战地医院是按照白求恩大夫所定下的模式建立的。经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运动”批准，这些医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为了照顾孤儿和父母上前线的儿童，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建立了。“保盟”有关这些儿童的宣传，不是用伤感和怜悯的语调，而是充满健康向上的气势——必须帮助这些孩子成长为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设者。

在国民党地区的援助计划，包括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国民党地区和共产党地区，都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工合”运动把工人（特别是来自敌占区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主、自管、自养的生产单位，为许多地区生产日用必需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有的也生产军需品，如军毯。在游击区还生产一些武器。这些合作社是由一个国际团体组织的，其成员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和外国的友人。在外国友人中，包括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为“工合”运动做了大量国际宣传工作。路易·艾黎则在基层进行了不疲倦的工作。宋庆龄赞扬合作社这种经济形式，认为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而同意担任在香港设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主持了它的许多活动。

※　※　※

“保盟”在香港多次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捐助的人既有生意兴隆的企业，也有普通的劳动人民；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都是慕宋庆龄之名而来（人们更多的称她“孙夫人”）。她是既不可或缺，

也无可替代的人物。她虽然从不隐讳自己的左翼观点，但由于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香港总督罗富国（杰弗里·诺思科特勋爵）也不得不来参加她所主持的活动。

在汪精卫叛国时，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姊妹孔祥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多年来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从1940年3月31日开始联袂访问重庆，以显示团结抗战，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这件事在中国政坛引起了广泛注意。

在同一时期，由于“保盟”在钱款方面绝对廉洁自律，声誉远扬，所以蒋介石夫人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委托“保盟”对它在香港开展的捐款活动进行审计。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以上所述可见一斑。

然而，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武汉时期似乎大有希望的统一战线，却正在危险地崩塌。1939年6月，在湖南省平江，共产党新四军通讯处的两个干部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四人被活埋。延安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大会，要求杜绝这类事件的重演。但是，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却变本加厉，包括武装进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这类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国民党对其军政官员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反共的挑衅活动还有：国民党特务和流氓团伙乔装打扮成八路军、造谣说八路军从事贩卖鸦片等等勾当，用这种手段煽动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国民党官员还说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占区“游而不击”。

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些谬论，他们强调，必须巩固两党的团结，而不能破坏这种团结。然而国民党仍继续明里暗里指责共产党，后来发展为无端的、无休止的谩骂。又过了

些年，重庆当局终于被迫允许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但在我们出行以前，他们仍然絮絮叨叨地给我们灌输对共产党的这些指责。我们对共产党地区采访了几个月，发现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　※

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不是大使本人的意思，他是执行英国政府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以前和以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允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

※　※　※

我在“保盟”的工作重心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战局，我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工作虽然也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但却处于香港长期保存下来的那种殖民地氛围之中。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庆龄知道我需要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便请她丈夫以前的贴身保镖莫里斯·科恩想想办法，替我找一份差事，最好是在新闻界。莫里斯·科恩的中文名字叫马坤，外号“双枪将军”，他对香港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果然为我找到一个工作，给《每日新闻》(3)当编辑。这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始创于19世纪50年代，几十年来颇有影响，后来由于财政拮据，把部分所有权卖给国民党，转而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效劳。在内部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它在业务上急需一个新的编辑。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我去应聘了。

接着，报社的国民党负责人俞鸿钧找我面谈。俞鸿钧曾经当过上海市市长。在香港，他是为报社提供经费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负责人。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谦和。他自己也当过记者，后来在宋庆龄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和妹妹（蒋介石夫人）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他似乎对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感到满意，也不在乎我比较年轻。尽管他并不喜欢抗日统一战线，但还不至于拒绝宋庆龄这样一个左派的推荐。最重要的是，我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愿意接受比其他与之竞争的英语报纸编辑要低得多的薪水。

我发现，《每日新闻》混乱不堪，并且令人摸不着头脑。它的印刷字模长期不变，印刷质量比竞争对手要差。谁也搞不清楚，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的部分股权为默罗上校所掌握。他是创办这份报纸的默罗家族的后裔，一位脸色红润、头发雪白的贵族子弟。他对新闻是门外汉，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了一辈子，退役后回来领导这份家族报纸。另一部分股权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购买。第三方面的股权所有者可能是控制这份产业的关键，它可以同英国股东结盟，也可以同中国股东结盟，但这所有者在哪儿呢？他也许是默罗的一个已故的或者年迈的亲戚，再不然就是被国民党的一个竞争派别所秘密掌握，直到把对手击败才出面？

不顾这种风险，俞鸿钧支持的那个派别正在一步步地排挤着对方。不久，我就成了编辑部的负责人。我手下的人不多。有一个年轻的助理编辑，苏格兰人，名叫迈克奈德。还有两个资深记者，一个是亚历克·格里夫斯，他是欧亚混血儿，身材高高的、机敏的僧伽罗人，从他的姓（Jansz）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荷兰人对斯里兰卡的占领；另一个是埋头苦干的白俄青年，很遗憾他的名字被忘记了。此外，还

有一个瘦削的美国女性，负责航运新闻和名人来往专栏。她的签名是Hyer（海尔），但我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全称。我的年龄比她小，职务却比她高，她时常不客气地称呼我，我不在乎，因为她工作干得不错，又不耍心眼。在我的印象中，编辑部好像没有中国人，只有在印刷车间和经理部门才有中国人，这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最头痛的是发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大大不如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香港电讯报》和《中国邮报》。有一天，我到街上去看我们的报纸究竟卖得怎么样。卖报的都是中年妇女。我看见只有我们竞争对手的报纸挎在她们的前臂上。于是，我问一个卖报妇女：

“你有《每日新闻》吗？”

“当然有啦！”她从挎着的一摞报纸的底部抽出一份。

“为什么放在那里？”

“为了不让我手臂上的汗水弄湿《南华早报》。”她的回答几乎把我气晕了。

尽管有种种不利条件，我们毕竟对《每日新闻》下了功夫，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

我们的社论（有许多是我写的）往往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有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谴责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批评西方（尤其是英国）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以前，特别是在欧战爆发以后，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

当反德战线好几个月没有动静变成了所谓“有名无实的战争”时，我们批评了西方转向“另一条战线”的倾向。所谓“另一条战线”，是指对苏联进行干涉，当时苏联正在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同芬兰打仗。

当汪精卫叛徒集团在南京建立亲日的傀儡政府时，我们不仅严厉抨击了他公然卖国的行为，而且揭露了企图把中国的民族战争变成看上去像是内战以掩盖外国侵略的本质的阴谋，使得其他国家可以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给予汪精卫政权以交战一方的地位，就像当年对待西班牙的佛朗哥那样。同样，我们也痛斥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诱降的阴谋。日本的这一举措同汪精卫在日本授意下要同蒋介石和解的表示相配合。针对这些阴谋活动，我们呼吁支持蒋介石反对投降主义的立场。

尽管《每日新闻》是国民党拥有的，我还是设法在社论里偶尔提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还列举了已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在香港英文报纸的评论中是罕见的，虽然它们的新闻报道中偶尔也会提及。

关于从日军占领区传出的一些歪曲中国局势的报道，我们同路透社上海分社展开了笔战，指斥他们把一些谣言当作事实来报道。

我们始终呼吁外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认为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欧洲变成战场以后，也仍然没有变成“次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几乎经常在晚上跟香港《星岛日报》的编辑、进步人士金仲华通电话，所以我们两家报纸的社论调门往往是一致的。

※　※　※

我在香港的处境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没有国籍，我在香港的合法居留，全靠每两个月申请续签一次特许居留证。这件事得到了“保盟”的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的大力支持，她的丈夫是香港的高级官员——医务总监，因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的负责人，也是应受到尊重的。所以香港总督罗富国为英文报刊的高级人士举行的吹风会，我也应邀参加。吹风会上，我们可以听到官方的观点，还可以享受到雪利酒和大麦茶。（世界上是否还有人用大麦茶待客，或者它已同不列颠帝国一同消失了？）

我在《每日新闻》工作的一年内发生了两次小小的内部危机——或者说是两则轶事。

默罗上校很少来报社。但是，每天深夜，当迈克奈德和我在印刷车车间忙于出报的工作时，他便醉醺醺地从俱乐部打来电话，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开头的一句话总是：“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顶了他一句：“请让我们干活吧！”这位老上校显然认为他夜里打电话查问是他的职责，我顶撞了他，他不禁大怒，便告到俞鸿钧那里。俞鸿钧把我们叫到他那宫殿般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里，想把事情摆平。默罗咆哮道：“从来还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我说，我说话粗鲁，很抱歉，不过当时我们确实很忙。他感到挽回了面子，表示满意。默罗不再生气，每晚照常打电话，不过，不再那么啰唆了。他关心报纸的主要表示是每月必问：“给大家发饷了没有？”

另一次出现的危机更有意义一些，那是作为我们竞争对手的香港报纸员工罢工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个扩大我们报纸销售的天赐良机，但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别人罢工就该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员工也停工声援。在香港，一个主编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在国民党中

国，那会被认为是犯罪）。我应当承认，我们的员工是驯服的，我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大响应。虽然这场风波很快烟消云散，罢工停止了，我在香港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

我在“保盟”的朋友柳无垢不厌其烦地把《每日新闻》的社论都剪下来贴在剪报簿里。这些剪报簿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仍然奇迹般地保存在我的手上。现在翻阅起来，不胜怀旧之感，它们反映出我年轻时的精力是何等充沛。当年在报社的工作很紧张，每天从黄昏一直忙到深夜，但丝毫不觉疲倦，还有时间做许多其他工作。除了为“保盟”做宣传工作外，我还为“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编辑了一两本宣传小册子。我的第一本书《人民之战》也终于完成，它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中国头两年抗日战争的情况，由伦敦的维克多·高兰茨出版社出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由该社出版的。《人民之战》问世后，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总的来说，评价是好的。

宋庆龄称赞它“不同于其他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是第一手的分析性报道，并把目前的斗争同过去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

斯诺说它“是一本极好的战争新闻，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赞美之词是不敢当的。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这也算是一次鼓励，写作的速度也非常快，最后40页是开了一个夜车，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我没有对出版社谈稿酬问题，只想到能出版就行了。一本近400页的书，英国高兰茨出版社只付给我35英镑（税后）。随后，它经历了

一次战火的考验。在伦敦存放此书的仓库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轰炸，幸而有一小部分书已经卖出去了。多年以后，我还看到一些书和参考资料援引《人民之战》的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可以说，幸运的是），此书的盗版很快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出现了。上海的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未为日军占领，但由于同外界隔绝，这里的居民特别想了解周围的战况。因此，许多人渴望得到《人民之战》这本书，连远在香港的我也是如此，因为不少朋友向我要书而出版社只给了我十来本赠书，我必须自己掏腰包买书，正版书买不起，廉价的盗版书正适合我干瘪的钱包。

我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喜欢自己的著作被盗版的作者。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盗版”这个字眼恐怕不合适。首先，中国那时还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中国的书在外国销售的很少，中国需要进口的外国书很多，但价钱高得惊人，读者、学生甚至学者都不敢问津。其次，日军占领区的人民急需关于中国坚持抗战的书籍，作为激励士气的主要来源。我的《人民之战》除了廉价的英文版外，还有中文版，是由几位翻译各译一部分，同时动手，很快就译成出版的。中文版合法地在租界内销售，同时也通过地下渠道运往敌占区。在那种条件下，“盗版”既是有益的，也是爱国的。

此外，我还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廖承志的父亲是在美国旧金山出生的、国民党早期的革命烈士廖仲恺，母亲是很有才能而又勇敢坚定的何香凝。廖承志在他的父亲1926年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参加了共产党。1938年至1941年，他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并且是“保盟”的一个主要成员。廖承志非常活跃，讨人喜欢。他多才多艺，懂多种外语。他的中文和日文都很好（他生于日本，在那里上过学），英文也不错（他早年居住

在香港），还略懂其他一些外语。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者。1925年，当他还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的时候，他同他的姐姐廖梦醒一起参加了广州的反帝大游行。这次游行遭到英法租界内两国军队的机枪扫射，这就是历史上的“沙面大惨案”。在父亲遭到反动派暗杀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先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德国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的中国海员中间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回到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生命危在旦夕，幸而由他的母亲（她是国民党元老）出面营救了出来。他偷偷溜出上海，参加了红军的长征，在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又差一点儿丢了性命。张国焘把他扣留作为人质，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党的领导权（张后来叛变，投向国民党）。

那时，朋友们给廖承志起了个外号，叫他“肥仔”。他擅长绘画，他的漫画富有想象力。他性情随和，又很健谈，总是那么悠然自得。在这种随和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钢铁般的心，这是经过前前后后许多烈火的锤炼铸造成的。有一次，我同他一起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我关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挤破了他的拇指，皮开肉绽，流血不止。他一声不吭，用手帕包扎起来。我连声道歉，他挥挥手，依然笑容满面。其实他伤得不轻，因为几星期后，他的指甲周围仍然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却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一直在想，他的确是一个长征干部，什么打击和苦难都经历过了，这点小事真算不了什么。

廖承志交给我们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要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原来是一次演讲）。这篇论文概述了抗日战争可能经历的几个阶段和应当采取的战略，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这是一部条理清晰、有说服力的杰作，既说明了同时也促进了事态的发展。另一些文件论述了国共两党

摩擦的发展和危险。还有一些文件谈到党内政策，同王明展开论战。王明是莫斯科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心只想讨好他的主子（由于没有指名道姓，我对某些实际问题不大了解，文件中所谈及的路线斗争是从革命的原则和策略立论，而没有涉及个人或国家）。

来自延安的这些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当地参加翻译的人中，有年轻的作家叶君健，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我一起参加英文改稿的，还有跟我同住的唐纳德·艾伦。艾伦参与创建“保盟”广州分会，广州陷落后，他也来到了香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那时美共正处于鼎盛时期，约有十万党员，影响极大。

艾伦、叶君健和我在香港罗便臣道租了一套房子，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复印。后来，增添了一名生力军，他的名字叫莫利·贝克曼·塔伦泰尔，他同艾伦曾在纽约的国际工人共济会共事。

尽管工作繁忙，我们仍然挤出时间编辑了延安推荐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译稿，并对几期《中国作家》的英文版作了文字加工。《中国作家》刊载当代中国作家的各种作品，由富有才华的叶君健翻译成英文。他的译稿在英文文字上有时会有一些问题需要改正，但对原作精神和含义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可说是“心领神会”。我们三人都对文学很感兴趣，不时同在香港的中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见面叙谈，如左派的茅盾，还有戴望舒、叶灵凤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人物，他们都支持统一战线。那时来往的还有爱国画家叶浅予和丁

聪。我们同《中国作家》的中文编辑和同仁经常会晤，如冯亦代和他的夫人郑安娜以及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诗人杨刚。杨刚当时担任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全国性日报《大公报》的文学主编。

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又过了一些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在该报是第一次。

廖承志组织我们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从1939年起，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曲折斗争时期，周恩来领导着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中共军政代表团，同时兼任中共华南局书记。

当时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外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最高代表，实际上起着党的外交部长的作用。十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了总理兼外交部长。

同样的，我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被认为有助于促使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诞生。

※　※　※

1940年春末，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居留结束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艾伦等人仍然在那里帮助做翻译工作。

至于《每日新闻》的那份差事，原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根本不想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上长期担任主编工作。

所以我决定去重庆同我的妻子伊迪丝团圆，她为我在那里的国际电台找好了一份工作。我们两人长期分离，感情越来越淡薄，不过，我们是同学，后来成为恋人，现在还不想就此分手。

最重要的是，我同中国内地隔绝的时间太长了，我渴望回去。

（贾宗谊　译）

---

(1) ［译者注］原文为bungalow-type house，bungalow为当时印度孟加拉式平房，屋前或周围有平台。

(2) ［译者注］关于“保盟”的情况，请参阅《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以及《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书。

(3) ［译者注］香港人把这家报纸叫做《孖剌报》，因为创办人为默罗，广东话发音与“孖剌”相近。

第十一章　内陆之旅

1940年，日军封锁了香港同中国内地的边界，所以从香港通过陆路前往重庆是不可能的了。坐飞机吧，又太贵，而且无法看到沿途的情况，而这又正是我所希望的。后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旅伴——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只记得他姓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们决定先从海路登上大陆，再走陆路进入内地。距离最近又没有日军的登陆地点是沙峪冲，一个用木料建成的小码头立在一段沙滩之上。它位于大亚湾内，一度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有时利用这个地点偷运救济物资。大亚湾名义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是，使国民党头疼的是，共产党开始在那里组织游击队，名叫东江抗日纵队，海外华侨中有许多爱国学生前来参加。

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家庭，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他们的老家就在附近。还有一个外国人，名叫皮伦加神父，是一位中年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长得高大魁梧，他在这一带传教。我们登岸后不久，就到了他的教堂所在地。他邀请我们品尝他的家酿葡萄酒和奶酪。招待我们的是一些女教徒。许多少年儿童蜂拥而至，来看热闹，其中有几个长得非常像他。

我们走向内地的道路是很狭窄的土路。我们的行李由雇用的脚夫用扁担挑着。我们一行有三四十人，由一些称为“保安队”的警察担任警卫，他们懒洋洋的，扛着老式的步枪或毛瑟手枪。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主要是防备东江纵队，而不是对付日本特务的。

第一天晚上，我们住进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小旅店，里面有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就差不多没有什么空间了。旅途

的劳累使我们每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午夜时分，近处突然传来了枪声。转眼之间，就拥进来二十来个强盗，都穿着广东流行的香云纱短衫，其中一个不速之客走进我和小陈的房间，向我们要钱，特别是要我交出金戒指，我说没有，他硬说我有，还用手枪柄敲打我的膝盖。最后，他终于拿着我们的钱离开了，但很快又返回来，这次他把枪放进枪套，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这使我更加不安。如果他的各种威胁都不奏效的话，他就可能用这家伙来砍我切我，想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果然，他又索要我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金戒指。幸而这时隔壁房间忽然有人高声大喊，似乎因为发现了一笔更大的财富而欢呼起来，他赶忙跑过去分享自己的一份。

当他快要出门的时候，那位一直逆来顺受的小陈勇敢地抓住强盗的袖子，大声说："把这个外国人的身份证件还给他，没有这些证件，他怎么走？"这个匪徒显然觉得此话有理，便把皮夹子还给我。我从皮夹子里不仅取出了证件，还取出了中国银行的旅行信用证，这个强盗显然是文盲，对此并不反对。小陈得寸进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把钱全都给了你，明天早上吃什么？"这个匪徒于是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十元面值的中国纸币，他拿走了几百块。当他离开后，小陈突然满怀民族自豪感地说道："瞧，在中国，甚至连强盗也是有良心和理智的！"

次日清晨，强盗走了，遭受抢劫的人纷纷向"治安队"诉苦。意大利神父听到我们的不幸遭遇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到惠州县城后，去见当地的香翰屏将军，他会补偿我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因为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辖区内被劫，是丢他"面子"的。我见到香将军后，他哼哼哈哈了一阵，果然赔了我的钱。当我把宋庆龄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了之后，他更客气了。小陈本来还有一个新发现，他说那些土匪

中有几个人虽然换了服装，但是很像护送我们的“保安队”士兵，怪不得香将军这样谦恭。但我没有说。如果说出来，这位将军岂不更丢面子了！既然人家已经慷慨赔偿，何必弄得他下不了台？

我们旅程的下一段没有出什么事，平平安安到达广东的临时省会韶关。途中有一段是水路，在船上我们又碰见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人，留着很长的胡子。他不幸感染了细菌性痢疾。他向我们诉苦说，尽管他在中国极其注意饮食卫生，决不吃不干净的或者没有煮熟的食品，但还是害上了这种病。

我不无骄傲地对他说，我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在街头不卫生的小饮食摊上吃东西不下千百次，也没有得什么病。报复之神大概听到了我的豪言壮语，第二天早晨，我就拉肚子了，小陈也拉。到了韶关后，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位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美国人埃德·洛克伍德建议我们到那里的伦敦教会医院去就诊。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们度过了两周痛苦的日子。当时人们还不大知道抗生素，大夫不管我们已有脱水现象，勇敢地用大剂量泻盐给我们清洗肠胃，果然奏效。但是，我们的体重却很快减了一半。更糟糕的是，我还得了疟疾。大夫给我注射奎宁时，笨手笨脚地伤了腿部神经，使我的腿麻木了好几年。

当我患病时，我给重庆的妻子发去了一份电报。她大为惊慌，马上请求正在华南采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休·迪恩到韶关来看我。迪恩长得又高又瘦，刚从哈佛大学毕业。6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又瘦又弱的我同迪恩一起，重新徒步踏上前往重庆的征途。我虽然起初瘦得皮包骨头，无精打采，但很快就恢复了食欲，体重增加了。看来，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比走路更有助于恢复我的体力了。当

时我们黎明即起，天黑才休息，一天徒步走90华里，中午时分在路边的小摊上花一小时吃饭，另外还停下来一次，歇歇腿。这次徒步旅行，充满了有趣的见闻。从韶关北上进入江西省，我们经过了红军1934年长征前所建立的几处根据地。尽管国民党竭力清除红军的痕迹，但是墙上的许多军事、政治标语口号仍然依稀可见。我们常常听到老百姓小声地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路边一家小饭馆的厨师告诉我们，红军总司令朱德曾经在他这里吃过饭：“他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总司令的架子。”

在江西南部的赣州专区，迪恩和我采访了时任专员的蒋经国。他是蒋介石的儿子，曾在苏联留学多年。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公开谴责他的父亲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分子。现在，他同父亲和解了，但仍然谈论并实施某些城市改革，包括在他这个地区支持“工合”运动。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像大多数其他国民党官僚一样，大肆逮捕“工合”运动人士并迫害共产党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曾经是同学。由于他们是班上两个身材最小的人，所以点名的时候，他们俩总是并排站在最后。几十年以后，蒋经国在去世前当了台湾政权的“总统”，继承他曾宣布不承认的父亲蒋介石。

穿越湖南省的时候，迪恩和我体验了中国农村没有见过世面的那种场面。农民们看到迪恩和我一高一矮，迪恩身高六英尺以上，我站在他身旁，只到他的肩膀。一个农民问另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人？”那人回答道：“大概是洋人吧。”“为什么一个人那么高，另一个人那么矮？”那人满有把握地回答说，“他是个幼仔。”

在剩下的路程中，我们有时乘公共汽车，有时坐一段仍然控制在中国人手里的铁路。铁路在金城江这个小镇终止，那里成了交通运输的瓶颈，许多急不可耐等汽车的旅客挤在一些破烂不堪的小旅店里。我们把这些小旅店称作“世界臭虫之都”，晚上臭虫成群结队地向酣睡的旅客进军，或者从天花板上大批“空降”到他们身上。

离开金城江后，如果能在卡车所装的货物上找到一个座位，那就算幸运了。装的货物如果是打包的棉花，那就相当舒服，如果是金属或者机器，那就难免碰撞得鼻青脸肿了。后来就进入了山岭重重、雾气弥漫的贵州，那是一个多民族的穷省，正如当地俗话所说：“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

到了重庆，还有“七十二弯”的山路，山路两旁净是在悬崖陡壁翻下去的卡车残骸。一路上还可以看到蒋介石征兵制度的可怕景象：成群抓来的面黄肌瘦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索拴在一起，以免逃跑；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遗尸荒野。路上有一具尸体已被以前的车辆压进路面里去，我们的卡车同样从这个尸体上又压过去。这些不幸的人死去很长时间以后，所属部队的军官仍然冒领他们的军饷和口粮，中饱私囊。

到了重庆，我跟伊迪丝团聚，她早已为我从一个传教士手中租了一间平房，它位于多雾的长江南岸。我在那里休息一周后，就去她早已为我安排好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XGOY）工作。

（贾宗谊　译）

第十二章　重庆序幕

从武汉迁移到重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次退却。重庆是长江上游一个群山环抱的河川港口、一个半封建的商业中心。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军阀所统治。它不像沿海城市那样受到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变革的影响。它成为中国的战时陪都，也没有使之发生根本性的进步。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国民党政权在武汉时代曾有短暂的进步，后来又退步了。重庆本来就在地方军阀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动统治束缚之下，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官僚统治和军事独裁的重压。

在开始的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这种变化还不那么明显。1939年是重庆作为陪都发挥新作用的第一年。它经受了两个考验，表现得相当不错。一个是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叛国投敌，并没有造成政府的分裂，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抗战。当时我在香港，统一战线的气氛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而使得宋庆龄有可能同她的两个姐妹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和宋霭龄（孔祥熙夫人）一起访问重庆，这是她们三姐妹多年来的第一次共同活动。在同一时期，重庆经受了日本最厉害的轰炸，轰炸引起的火灾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这并没有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动摇政府和民众抗日的决心。重庆很好地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40年初离开香港赴重庆，开始为官方的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像我这样在香港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过的人还是能够立足的。

简单说一说我是怎么搞到这个工作的，我的感觉又如何呢？本来有三个年轻的美国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是：梅尔维尔·雅各比、西奥多·怀特和贝蒂·格雷厄姆。后来，他们跳槽到美国大媒体工作。当电台物色接替他们的人选时，我当时的妻子伊迪丝正在重庆，她替我应聘英文改稿工作（需要时也兼做英语播音），结果被选中了。

通常我们在国际宣传处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内进行广播，外国记者招待所也在这个院子里。当日军的空袭频繁或严重时，我们便坐卡车去市郊沙坪坝，在地下钢筋水泥的防空洞里的发射台工作。

1940年初我到那里工作的时候，绝大多数职工都是爱国的。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抗日的战斗岗位，中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但是，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在国民党的战场上，同敌人的交火越来越少，尽管官方的公报还装作好像在不断打仗。后方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我到那里工作初期，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同几个年轻的同事在防空洞外的斜坡上看日本空袭（我们并不总是钻防空洞），惊讶地听到了这样的话："他妈的，又没有炸中目标！"怎么会有人公然惋惜敌人没有炸中呢？在南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更不用说武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一个人向我冷静地解释道："他是说没有炸中孔祥熙的住所。"这些年轻人仇恨侵略者，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毫无疑问，他们也越来越憎恨国民党的某些大官（尽管他们中也有国民党员）。通货日益膨胀，他们越来越穷，生活水平大大低于战前，他们特别痛恨那些发国

难财的奸商。主管国家财政、大腹便便的孔祥熙显然成为大家憎恶的一个象征。

稍后我碰到了一件使我吃惊的事。我住在外国记者招待所。孔祥熙向外国记者招待所捐赠了一套现代化的洗手间、浴缸、淋浴设备，他亲自来视察一番并接受对他表示的谢意。在招待所门口站岗的武装警察拍拍他身上的手枪对我说，如果不是孔祥熙带着一帮警卫，他真想给他一枪。他说这话时，孔本人就在近处。老百姓对蒋介石即使说一句不满的话，也会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枪毙。骂孔胖子，危险显然会少一些。这甚至可能被认为能起到一种“避雷针”的作用，借以让人们发泄一下积愤。而且孔祥熙越是不得人心，他对其主子蒋介石就会更加唯命是从，何况蒋介石还是他的内弟呢。

从1940年初到1941年春，我在重庆的这一年中，重庆和整个国民党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对日本的抵抗有气无力。压迫和贪污之风加剧。内战的危险日增，从反动派的偶尔挑衅发展为全国性的威胁。甚至国民党政权的宣传官员也满腹牢骚。广播电台英语部的头头彭乐山，曾经当过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以前毫无怨言地为国民党做宣传，现在却沮丧地对我说：“我厌倦了。1938年我们在电台广播新闻、进行宣传时，我们自己是相信的，并且受到鼓舞。那时我们工作起来轻松愉快。现在，我们老觉得我们是在胡说八道。”

更高一点，他的上司董显光也在发同样的牢骚。在关于武汉的那一章中我已经谈到，他非常怀念武汉时期那种全国团结、积极抗日的气氛。再者，他并不喜欢他在重庆担当的许多新任务。当他负责的部门奉命把散发给外国驻华记者的中国报刊英文摘要加以修改“加工”，以便更能为外国所接受时，他私下里告诫外国记者不要被愚弄，要用

自己的翻译，并提醒他们凌晨就发出去，也就是说，要赶在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长睡醒起来、确定当日新闻检查重点之前。

在国际上，由于欧战正在进行，关于中国的消息很难见报，而且中国的消息也不多。这个时期的特点体现在合众社给它的驻华记者下达的一个指示中：只发震惊世界的消息，而且要压缩在50字以下。这样一来，西方又重新捏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中国事物。美国的媒体有许多日子集中报道一件奇闻，说什么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这个国家里的鸡蛋会神秘地可以在小的一头上竖立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只有请著名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去解决了。

在重庆，外国人对国民党的信任不断下降。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左派思想，他们觉得共产党关于全国形势的说法一再被证明为比国民党政府的说法更真实。当国民党1941年1月突然对新四军暗下毒手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内战挑衅，它只有利于日本。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怀疑国民党的说法，而比较相信共产党的报道。英国大使克拉克—寇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引人注意。他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团结，并请代表共产党《新华日报》的龚澎坐在他身旁。他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坦诚的。这是一个明确的表示，表明西方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关键时刻，担心中国爆发内战，所以要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共产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以确保外界了解真相。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进行短暂访问后即将离开重庆以前，曾经对我说，周恩来预料到这样的进攻可能发生，给了她一份秘密的背景材料，以便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即可在美国发表。那时国民党不准斯诺进入中国，但共产党也向他传递了事先准备

好的材料，以便必要时发表。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得到了同样的材料。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便被打破了。

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不久前采访过新四军，对它的抗日斗争深为敬佩。他听到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消息后，便在外国记者招待所的院子里，单独一人示威抗议。他含着愤怒的眼泪高呼口号，痛斥国民党将领是杀人犯、国民党新闻机构掩盖谋杀真相。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新四军的情况告诉其他记者，大家知道他是忠于事实的，所以也都信任他。

贝尔登确实充满着维护真理的激情。早在武汉时，我就记得他曾经劝告我，要多动脑筋，别轻信别人的说教。他对我说：“少说多听，才能学到点东西。”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尽量这样做。

在重庆，周恩来对新四军遭到袭击一事，作出了最强烈、最引人注目的反应。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察官把共产党《新华日报》上报道这件事的新闻全都删掉，当时周恩来在现场，他指示把在头版留下的“天窗”保存下来，填上他用毛笔书写的、激烈谴责这一事件的几句话(1)。他说，如果要逮捕什么人的话，第一个被捕的应当就是他。由于他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国民党不敢轻易动他，否则，国民党就得承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部责任。

延安的共产党高层领导，拒绝了政府要求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它把新四军置于经过改组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并任命了新的领导干部，因为在国民党的袭击中，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

在国际上，1941年3月，在纳粹德国政府的档案中记录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外相松冈的谈话。松冈说，他同蒋介石“亲自进行了接触”，“了解他，并信任他”。(2)

发生新四军事件以后，重庆的氛围变得比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动，令人感到窒息。许多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前往香港，以便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我自己也想重新回到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以前我在香港还能够同时为国民党所有的和左派的媒体工作，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发生新四军事件以后，由于国民党已在积极准备重新发动内战，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可能了。

（贾宗谊　译）

---

(1) ［译者注］指周恩来亲笔书写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分别刊登在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

(2) 德国外交部1941年3月21日文件Aufz．RAM，这份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政府所查获，并予以公布。这份文件的日期表明，在1941年1月，当蒋介石蓄意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歼灭性进攻时，这种接触已在进行。可以这样推断，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影响了以后的事态发展。1941年晚些时候，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初期似乎所向无敌，那时普遍传说，一旦德国人拿下莫斯科，蒋介石有意参加轴心国家集团，配合他们的“反共国际公约”，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内战。但是，德国人未能拿下莫斯科，被击退了。后来，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从而结束了蒋介石估计轴心国家集团可能获得胜利的猜测。

第十三章　逃出香港日本拘留营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同时进攻香港之前，我在香港的英国报纸《南华早报》工作，同时义务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宣传工作。

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当地人的说法是“挂气球了”——是在当地时间1941年12月8日早晨（在珍珠港，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关系还是12月7日）。当时我住在九龙一所破旧的然而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贵族之家”的公寓里，在塌陷下去的弹簧床上，我被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惊醒。自从1937年以来，我在许多战地已经听惯了这样的声音，没有想到这是又一次战争的开始。我模模糊糊地以为“一定是在演习”。四年前在北京也是这样的，日军在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宣布了它对中国全面战争的开始，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受欢迎的真理往往不大容易为人一下子就接受。我虽然知道日本终究会打香港，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在前些日子里碰到过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这样想。确实，这里正在建造不少防空掩蔽体，承包商、分包商、再分包商从中渔利，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其中一部分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在香港报界，像这样的诈骗和随之而来的性丑闻及自杀案件是比战火即将来临更为重要的头条新闻。

加拿大部队虽然已经开到，以增援原有的英、印驻军，但进度和规模都不足以显示危险已迫在眉睫。日军进攻开始时，加军的许多装备尚未运到，日本人赶在他们前头了。

刚开到的加军士兵对香港的殖民地气氛颇感气愤，特别是不许士兵进入军官吃喝玩乐的场所。在渡轮上，我听到有些加军士兵大喊：

“让女王去保卫这个操他妈的帝国吧！”尽管如此，他们抗击日军是英勇的。他们投入战斗时，装备不齐、地形不熟，所以有许多人死于战场。

从历史上，我知道日军是善于进行战略突袭的，他们往往不宣而战。1894年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甲午之战）、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战争都是如此。但前车之鉴并没有使人们对新的现实有所警惕。

日本进攻之前，我每天都是乘轮渡从居住的九龙去香港本岛，到报社工作。日本开始进攻之后，九龙很快为日军占领，我就搬到香港报社去，晚上睡在桌子上。我同保卫中国同盟仍然保持着联系。宋庆龄在日军进攻的第二天离开了香港，“保盟”的办公室成了我的同事柳无垢一家（她的父亲柳亚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的避难所。他们及时地从九龙撤到了香港。我在报社工作完毕后就冒着隔海射来的日军炮火到“保盟”办公室去，帮助柳无垢销毁文件。

同时，我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保持着不定时的联系，他们为了防止被日方发现，经常迁移住处。同我保持联系的还有同情这些中国进步人士的外国友人，包括我未来的妻子邱茉莉。

随着战局的失利，我决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免被日本人抓走。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所以不属于“敌国国民”之列。但实际上我的处境更糟糕，因为就个人而言，我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之敌”，我无国籍，得不到任何政府或国际公约的保护。我多年来写了很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东西，并且同中国爱国人士一起从事抗日工作。所以日本人特别恨我，要同我算账，而且他们对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干。

杨刚是一位女共产党人、新闻工作者，在奉行中间道路的《大公报》工作。我同她商量，她作了安排，先使我“消失”，然后救我出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驻港代表廖承志为我打了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说有人看见我在香港湾仔地区被一颗日本炮弹炸死了。日军当时对湾仔轰炸很猛烈，所以这个消息听起来是可信的，足以成为我开溜的极好烟幕。

不幸的是，在我个人方面，这个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则“传闻”传到了我父母那里，他们为失去独子极度伤心。由于杨刚这个计划的救援部分后来未能实现，所以几个月之后我才又“复活”。

自公开宣布“死亡”之后，我随同杨刚去一所中国式住宅，她的一位朋友吴大夫住在那里。我们一起商量好，我先用一个假名住进一家医院，再从那里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去。为了住院，我必须先成为伤员。因此吴大夫撕破我的裤子在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好像是给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这倒并不危险，也不怎么痛，因为不伤及筋骨并且吴大夫动刀时给我做了局部麻醉。带着这个锯齿形的还在流血的伤口，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附近的玛丽医院。护士长玛格丽特·沃森是我在参加中国战时救济工作时就认识的，她接收了我。我告诉她不能用我的真名，所以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身份”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在战事发生前刚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原籍衣阿华州锡戈内镇。这个地方我从未到过，只是听一个朋友说起过，他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用一个小地名的好处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我说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是否属实，日本人当然更不会知道）。

香港被日军占领时，我的病房里有受伤的军人，也有平民。在他们中间，我听到了对时局的许多不同的、很有启发的反应。

在香港陷落后的那个早上，我同一个英国正规军军官一起站在医院的一扇窗户前，他无疑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英勇作战而使一条胳膊受了伤。我们看到在一片表示投降的白旗中，一个汽油库突然爆炸，火光冲天。这表示有人决心不使战争物资落入敌手，我为此十分高兴。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英军军官却不赞成。“如果是日本人向我们投降，我们是不会愿意看到他们放火烧掉仓库的。这不合规则。”对他来说，战争不过是在上等专业人员之间的一种游戏——尽管是种血腥的游戏。平民的抵抗在他看来是不合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日本人在中国、德国纳粹在欧洲所进行的大屠杀并没有使他的成见有所改变。

和这种“按规则打仗”的理念截然不同的是一位爱尔兰血统的美国商船海员雷·奥尼尔的看法。他是我们这个病室的病友，背上中了一块炸弹碎片。敌对行动开始后，他自愿登岸参加战时勤务。“你会开卡车吗？”他说会。于是他就签名担任卡车司机，但没有车。他从一个汽车展示厅的大玻璃窗里，看到里面有一辆崭新的卡车，就进去发动卡车，冲破大玻璃窗，开到街上，再开到他所在的营地，向英军军官报告：“我们有卡车了。”但他不仅没有因此受到表扬，反挨了一顿训。“这卡车不是我们的——如果不是政府出钱买来的，我们就不能接受。”雷不明白，在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中，为什么缺了这点手续就不能用这部卡车？他开着这辆卡车为前线部队运送军火，因而负伤住院。后来，我和医院里的伤病员一起很快被送进日本人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赤柱拘留营，雷以后也加入了我们从赤柱出逃的行列，这事下面就要谈到。

在住院期间，有一次日本人对伤员进行检查，我差一点出了大纰漏。在这次检查中，日本人要把那些他们认为伤口已痊愈的病人送走，军人进俘虏营，平民进拘留营。我的伤口好得实在太快了，尽管

我老是用手指戳它，不让它愈合，使我可以在医院里多待些日子，以便设法逃走。

一个前来检查的日本军医走到我的病床旁边，问我包扎起来的大腿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炸弹碎片炸伤的。”“能走吗？”他问。我说：“走不了。”（实际上我当然能走。）幸运的是，他没有像对别的伤员那样，要我解开绷带把伤口给他看。

半小时之后，我下了床，在走廊里走动。我听到声响，一看原来是这个日本军医正在我背后十步远的地方走来，挂在腰间的指挥刀铿锵作响。我马上尽量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走。又是运气——这个日本军医急急忙忙走了过去，看也没看我一眼。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一个手臂受伤的人站在病室门口对我大笑。我问他有什么可乐的。他“咯咯”地笑着说：“你这笨蛋，装瘸腿都装错了！”原来我把那条包着纱布绷带的腿当作好腿，把好腿当作伤腿了。悲剧和喜剧有时真成了一回事。

我终于恢复了一直在盼望的同中国友人的接触，以便出逃。吴大夫想方设法调到了这所医院，杨刚也来了，当上了护士助手（尽管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告诉我关于帮助外国朋友出逃的安排。在这些外国朋友中有我，也有邱茉莉。他们在邱茉莉的原住处没有找到她，正在打听她的下落。

他们问我，能不能搞到一个有日本方面盖章的红十字袖章。住院的被俘伤病员戴了这个袖章可以短时间外出，购买一些经允许的物品。我如果能搞到这样一个袖章，就戴上它，通过日军岗哨，走到街角上，那里有一位中国同志，也带着同样的袖章。他会引我到一条船

上，这条船将开到香港的一个外岛上，然后我再从那里去东江游击队地区。

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义务秘书长、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在这所医院里当“助理护士”。通过她，我居然搞到了一个红十字袖章。但我还必须取回我入院时换下来的衣服。我同约好的中国联系人在一个星期日早上碰头。到了那天，我告诉病房的护士要求换上自己的衣服。她起初不同意，说：“你还不出院呢。”我争辩说：“我好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医院的教堂去做礼拜了，但我觉得穿着病号服去教堂不体面呀！”她接受了我的这个解释，把我的衣服给了我。我准备走了。

在走廊里，我把袖章放进口袋，以免别人见了好奇发问。快到出口处，一位名叫肖特的美国传教士（当时医院由他管理）把我拦住，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许溜出去买包烟抽。他不让我去，可能日本人曾吩咐过，如有病人溜走，唯他是问。这样，我的中国联系人在外边等候而我却在里边出不去。

我设法通知杨刚这一情况。她传话给我，要我第二天同一时间再试一试。但到第二天这个时间，医院的进出通道上塞满了日本卡车，日本兵蜂拥而至，押送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到俘虏营去。同我约好的接头地点只要走几分钟就可到达，但我去不了。这样，整个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又过了些日子，已到了1942年1月底，所有病人都从医院转移到了收容平民的赤柱拘留营。营里共约3000人，我仍旧用“传教士亚历克·史蒂文森”这个假名，暂时还可以混下去，但我仍在想办法逃走，万一日本人查出我的骗局，那就不得了。早晚总有一天在例行检查时，他

们说不定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件（我说是遗失了），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时间非常宝贵，出逃的事情不能耽误太久。

我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营里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因为在香港，我来往的主要是中国人，但仍然存在着被营内某些人认出的危险——即使我留了胡子（我只有一片刮胡子用的刀片，从进医院时起就秘密收藏起来，如果有一天我暴露了，必会受到严刑拷打，那么，我就用这刀片割腕自杀）。

如何战胜时间？外面的援助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了。中国友人可能无法同关在拘留营里的我取得联系，他们甚至于可能不知道我在何处。

我幸运地在营里找到了几位难友，同我一样决心出逃，原因也同我相仿——参加过中国的抗日事业。

在拘留单身美国人的禁闭区内，十分偶然而又十分巧合的是，曾为“中国工合”工作过因而同我认识的帕克·范内斯（“荷兰佬”）和我同住一室。他本来是个海员，曾是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这个工会在美国全国的领导人当时是哈里·布里奇斯，在夏威夷的领导人是同他有私交的杰克·川野（日裔）。战争爆发时，他在香港启德机场做技工。

我很快就告诉他，我想出逃。他也偷偷地告诉我，他也想出逃，并且越快越好，因为他曾对进攻香港的日本兵开过枪，如果被发现，那他就很可能作为一个参战的“平民非战斗员”而被马上枪决。

我们室内共关四人，除了我和帕克，还有雷·奥尼尔，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感情冲动的人。我们要不要瞒着他？很难。我想，最好还是要他参加，范内斯很快也表示同意。雷所显示出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他当过水手的经验，对我们实现从海上出逃的计划大有好处。我们对他一提，他马上就同意了。我们惟一的担心是怕他的火爆脾气会破坏必需的谨慎。

关于邱茉莉的下落，以至于她是死是活，我一直不清楚。到了赤柱拘留营，我发现她也被拘留在营里的英国人禁闭区内。我告诉她，中国友人一直在找她。她说，她也曾参加过一个出逃的计划，但那个计划落空了。如果有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即使有很大危险，她也愿意参加。从此，她积极参加我们的谋划并且在我和难友们的心里有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邱茉莉在她的禁闭区内遇到了一位原先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英国人F．W．赖特，他向她透露了想出逃的意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会说广东话——我们几个人都不会说——这在同本地人打交道时是个有利条件。作为海关工作人员，他又熟悉香港周围的所有水道。我们同意由邱茉莉去探询他的意见，因为我们几个人都不认识他。赖特表示愿意。我们觉得向他和盘托出我们的所有情况（如我们过去同中国左翼朋友们的交往以及我的真实姓名等等）不大妥当，但关于出逃的具体计划，所有讨论他都是参加的。

幸运的是，当时的赤柱拘留营没有日本重兵把守。关在营里的都是平民，大部分是妇孺和老人，他们的年轻男性亲属大部分参加了“香港志愿军团”，所以都被关在俘虏营中。因此就安全而言，我们倒不怎么担心。也许这是由于日本人的仗打得太好了。他们在亚洲的神速进

军，使香港成了后方，而他们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在靠近新战区的地方更为需要，因此对香港就无暇顾及了。

日本人对赤柱拘留营的警备只靠一支巡逻队，每天绕着营地四周，像接受检阅似的行进，肩扛步枪，靴声橐橐。人们可以摸出规律，巡逻队在几点几分会经过某个地点，然后过了20至25分钟才会回来。

在禁闭区内没有日本人，只有汉奸，日本人用他们来进行监督。他们对营区的控制办法，大多不过是立一些警告牌，有一张上写着："禁止向海上瞭望，违者格杀勿论！"另一张上写着："不许靠近铁丝网，违者枪毙！"

但到底怎么逃出去呢？最初我们想游出去，从一个小岛游到另一个小岛，一步步前进。这种想法勇气可嘉，但不现实。我们同其他难友一样，身体日渐衰弱。伙食极差，每人除主食大米定量供应外，副食只有一点点猪肉或鱼肉。难友中有医生，他们估计营里的伙食每天大约只能产生700卡热量，而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干体力劳动就需要1500卡，干体力劳动则需3000卡。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较好的办法。范内斯不顾禁令，偷偷向海岸边细看，有一天瞥见了一条船，靠在一间供游泳者冲澡用的小屋旁，一半掩蔽在灌木丛中。这里的海滩曾有圣斯蒂芬学校的学生来玩过，这个学校的校园现在成了拘留营的一部分。所有船只都被运走了，只有这条船可能因为无主而被抛弃。

当天晚上，范内斯勇敢地溜出去看个究竟。这条船确实是被扔在那里的，船体破旧，因为长久搁在岸上，船板之间已有很大裂缝。船

的龙骨还在，但没有舵，没有桨，没有桅杆，也没有帆。范内斯认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自造这些船具，这条船还是可以用的。船的大小正合适，能载我们五个人，挤一挤可载六个。船板之间虽有裂缝，只要在水里浸泡一定时间，就会缩紧。

此后，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自造船具和装淡水用的容器上。我们预想的目的地是大亚湾（英国人称它“米尔斯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核电站就设在这里）。我们听说，在那边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人数虽少，能量却不小。

拘留营伙房里有一块长长的木板，是用来在大锅里搅拌稀粥的，我们拿来做成桨。另外一支桨是用一所被炸坏的屋子的木门做成的。我们把这两件宝物藏在范内斯、奥尼尔和我所住的房间里。同室还有一位正派的美国海员克拉伦斯·休伯，他眼见我们每天晚上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得告诉他我们的出逃计划并邀他参加，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人，无权去冒这种险，但他决不会告发我们。他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决定出逃时间后先让他知道，到时候他就离开房间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借口来指控他知情不报。为了使他的“不在场”看不出破绽，我们晚上“干活”时，他常常出去同别人打牌。

因为船上还有空位，我们就考虑还有什么人我们能帮忙出逃。我们同邱茉莉商量，决定邀请马坤老人。他曾是孙中山的加拿大籍（事实上他在伦敦出生）保镖兼副官，在孙中山那支精干的军队里有少将军衔，绰号“双枪将军”（因为他用手枪的枪法高超）。他年事已高，又是大个子，所以只能做乘客，干不了什么活。我们邀请他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尽管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他个人对宋庆龄在

香港的工作（包括“保盟”和“工合”）多有帮助。第二，日本宪兵曾经拷打过他并威胁要处死他，如再受这样的酷刑他可能挺不过去了。第三，不论他是否参加，他决不会暴露我们的计划，他不是那种人。但他婉拒了我们的邀请。他说，他年纪太大了，在行动中会拖我们的后腿，而且船要是翻了，他恐怕就会送命，因为他患脉管炎，腿部又常抽筋。从后来的情况看，他的决定是明智的。过了几个月，经国际红十字会斡旋，交战各方交换被拘留的侨民，他获准返回了加拿大。

我们尽力筹集途中所需的物品。我们做成了第二支桨和一个舵。在拘留营的图书馆里有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地图，虽然不够好，但对我们也够用了。我们把它撕下来保存。又找到了一个容量为五加仑的空汽油桶，装满淡水后封严。还搞到了一个小小的指南针。

范内斯经常在夜里勇敢地偷跑到海滩上去，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藏在英军防守时所挖的壕沟里。这些壕沟都在沙滩上，所以把东西放进去，再推些沙子盖住就行，不会像挖地那样露出痕迹。

在全部谋划中，范内斯是真正的英雄。每次他去海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不但去埋藏好我们的用品，还带回急需的数据——他用手指粗略地量了一下船上舵孔的周长，使我们自制的舵能够放得进去。他还查出来这条船原来的主人给它起的名字“范达”（Vanda）。我们打趣说，从船名可以知道，“范”发现这条船是命中注定的。

出逃的主要办法和准备行动都出自范内斯。他思想进步，有胆有识，镇静自若。他意识到并且正视所有的困难和危险。一旦确定了奋斗目标，他就不知疲倦、毫不退缩地去完成。他是一位最优秀的美国工人。

※　※　※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知道范的踪迹。直到1978年，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北京工作的寒春（琼·欣顿）在美国碰到了他。当时他在原籍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代表“美中友协”发表演讲。他是友协积极分子，在演讲中提到了我和邱茉莉。

寒春回北京后给了我范的地址，我们开始通信。几年后，我和邱茉莉到纽约去看望我的父亲，我打电话给他，他飞到纽约来看我们。那时他已有两个高高大大的儿子，一个叫卡尔，一个叫马克。

1992年，我又一次见到了范和他的妻子雷尼，他已年过八旬，但还像过去那样瘦、那样敏锐，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由于新的生活经历而更加坚定。

※　※　※

这里再插叙一段在香港和赤柱拘留营的轶事。日本进攻香港之前，我是在一种勉强通融的情况下居留的，每隔一两个月就得去警署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通常都由特别事务部（主管政治安全）一个名叫“尤”的警长来处理我的申请，他总是板着脸，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在香港本地，支持我多次申请的是“保盟”（通过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以及我先后为之工作的香港《孖剌报》和《南华早报》，理由是他们需要我为他们服务。在个人方面，我提出的理由是我正在向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我当时的妻子伊迪丝和我的父亲都是美国公民，住在纽约，他们为我提供了必需的文件。为了保证我逗留香港只是等待而不是瞎混，我得把横渡太平洋所需的旅费存放在警署。

即使如此，我每次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都是一件千钧一发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尤警长时，香港已在日机轰炸之下。他把代存的旅费还给我，对我说：“现在，你在香港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战争的狂潮使我们都变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关进了赤柱拘留营。在营里，知道我真名的人不多，尤警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想他不至于主动向日本人告密，但我确实怀疑，如果日本人盘问起来，他能否守口如瓶。特别是因为英国人有关外国人登记的档案都已完整地落入日本宪兵手中，如果他们追问我的下落，尤警长恐怕难以推托。

我有一次问尤警长，这些档案材料有没有烧毁。他摇摇头，似乎我向他提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我怀疑，即使警署会毁掉一些材料不让敌人得到，那也不一定包括那些有“赤色分子”嫌疑的外国人的档案，因为不论是英国官方还是日本官方，对这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同尤警长的那次谈话之后约一个星期，我们就出逃了，不得不留在香港直到战争结束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尤警长，这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出于敌人的意愿。

※　※　※

关于尤警长，还有另一件事，我怀疑也可能是由于他的某种暗示才会发生。

1942年3月的一天，有一个也关在营里名叫汤普森的香港警官（督察）同我搭讪，我同这个人并无一面之缘。“你是新闻记者？”他虽然没有叫我的名字，但那口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的。我否认是记者，当然只是装装样子的否认。他不管我是承认还是否认，向我提出了一个

建议。他同另一个朋友将在第二天夜间出逃，他知道有一条通过新界的路径，一路上有英军在战前密藏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都是出逃中用得着的。如果我保证尊他为头领并听从他的吩咐，可以同他和他的同伴一起走。

我很犹豫。他这条路径也许是最理想的。我极有必要早早逃出这个地方，以免被日本人在清查身份时发现我改用了假名，如果日本人再进一步查问我为什么要隐姓埋名，那么其后果——说得温和一点——也将是不愉快的。

但我们这个五人出逃小组怎么办？营里的警戒措施现在是很松的，但如果汤普森先生走了，日本人发现后必然要加强警戒，那么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泡汤了。

我把全组的人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另外有人约我明晚一起走（具体细节我没有说），如果大家同意也在明晚走，而不是像过去所想的那样等潮汛和风向改变，那么我就拒绝另外那个人的邀约。大家同意立即行动。

于是，我以健康原因和情况不明为借口拒绝了汤普森的邀约。他对我们的计划毫不知情，可能认为我是个傻瓜或者胆小鬼，不敢和他同行。

这样，那个晚上有两拨人逃出了拘留营，出发的时间是不同的，路线也不一样，但两拨人都获得了成功。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逃出赤柱拘留营了。

汤普森怎么会找到我，这是一直存在我心里的疑问。是不是尤警官提示他，我面临险境，急于离开？是不是他需要一个记者把他的冒险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和他一起出逃的伙伴格温·普里斯特伍德夫人后来写过这样的东西。）

20年之后英国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讲到汤普森出逃后的一些事，这才使我想到他当时约我一起走的另一个可能存在的动机。他知道我同左派有一些关系，因此他要带我同行也许是为了便于接触在香港周边活动（在香港本岛也有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

书中写到汤普森出逃之后的事：

> 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从惠州回到在大亚湾周边、由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试图私下实施一个计划，从赤柱拘留营营救出更多的平民。国民党政府对他的行动强烈反对，甚至于要求英国驻华大使馆命令汤普森离华并不再入境。这个插曲使稍后在华建立的英国陆军支援团（英文简称BAAG）在同中共联系的问题上，与国民党方面的紧张关系更趋严重。(1)

这样的揣测可能还有一点道理，但后来我读到的另一本书却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何等丰富的想象力。

温策尔·布朗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教师，当时也被关在赤柱拘留营，以后交换战俘时回国，他在1943年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他看到我们八（？！）个人出逃，其实可能是他在想象中把汤普森和普里斯特伍德夫人包括在我们这群人之内，实际上这两人是另外一批。

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我们如何从不同方向聚集到一处——实际上我们五人是一起行动的。但五个加两个仍然只有七个，他说有八个，还差一个，于是他想象出另外一个人物，一个名叫“迈克·谢克蒂”的俄国人，并且进一步扩充想象力，说：“出逃计划是他定的，我觉得计划的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机智。”

他还描写了另一个场景，一支渔船队在海上等待接应我们这些逃难者：

> 从一条船上忽然灯光一闪……从他们八人藏身的海滩上传出一束灯光回应……迈克和他的队伍消失了……(2)

莎士比亚曾经写道：“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呀，你登上了无比辉煌的幻想的天堂……”(3)布朗先生对此作了一次小小的尝试。

（沈苏儒　译）

---

(1) Edwin．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2) Wenzell Brown．Hong Kong Aftermath．New York：Brown & Durrel，1943．

(3) ［译者注］见《亨利五世》，《莎士比亚全集》（五），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41页。

第十四章　“范达”号的航程

我们五个人是1942年3月18日偷偷离开拘留营的。天黑之后，我们跑到了一个长满灌木和大树的高坡上。这个高坡位于环绕拘留营的一条道路的路边，下面就是用铁丝网隔离的海滩，再往外就是大海。在这条路上，大约有二十来个日本兵按规定路线定时巡逻。我们躲在灌木丛中，等到他们走过我们藏身之地约200步远，就悄悄地下到海滩上。我们趴在铁丝网边，用搞来的老虎钳剪断铁丝网，把范内斯冒险埋藏的物品从沙子下面挖出来，放在船上，然后把船推下水。

接着就发生了一些令人惊骇的事情。

首先，我们用桨一划就发现海面有很强的磷光，随着桨的划动会发出冷冷的、十分耀眼的闪亮。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逃亡者——是从香港，不是从我们的拘留营——也遇到了同样令人惊怕的情境。有人写道：

> 我们只能痛苦地站着、看着。水里充满了发光的磷。我们的船头一碰到水，桨一划动水，在许多英里之外都能看到。(1)

一点光、一点声音都可能使我们暴露。在下坡时，我们掉了一个金属容器，它滚下去时发出了很大的声音，幸亏没有人听到。

在快到海边时，我们看到远处岬角旁停泊着一艘日本巡逻艇，不时用探照灯转动搜索。

这些情况都让我们担心。但我们并没有愁死，因为突破长期禁闭我们的铁丝网所带来的那种狂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觉得这世

界又属于你了——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几十年之后再来回顾这段往事，我觉得另一位香港逃亡者所说的下面这段话真是再确切不过了。他说：“人类所能经历的冒险行动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不想逃走就如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2)

但随着重获自由而来的那种一切都不在乎的高兴劲儿增加了危险。如果在海滩上被抓住，我们会被野蛮地毒打、受刑，甚至被枪杀。或者，如果在海上被发现，他们就会立即用机枪扫射，我们就会流血、溺死。但当时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是：能逃出来有多美妙！我们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我们都还年轻，“希望”很容易地战胜了“恐惧”。

我们经过了那艘日军海岸巡逻艇。幸运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划船时产生的那种磷光，可能因为那艘日本巡逻艇离我们较远，所以这种磷光不像近处那么耀眼。

我们也遇到了“内部”的困难——技术性的困难。我们的舵因为舵孔尺寸不准，装不进去。我们的帆是用两条毯子拼成的，挂不起来。我们的一支桨很快又折断了。舵不能用，我们就不能按预定的航线前进。于是我们决定到最近的一个名叫“南丫岛”的无人居住的小岛上暂作休整，对我们的船和船具作紧急修理，天亮之后就躲起来，第二天夜间再继续前进。但事情并不是那样如意。我们接近这个小岛时，发现岸边岩石嶙峋，船一撞上就会被粉碎，所以只好驶离。这时，船开始不断地进水。除了范内斯划船外，其他的人都发疯似的往外舀水。我们疲劳极了。我迷糊起来，不是把船里的水舀出去而是把海里的水舀进来，大家都骂我傻瓜。形势固然严峻，我们还是说着笑话，有人说，“我们是在把自己‘舀’出监狱。”引得大家哄笑起来。

使我们险些送命的倒不是敌人而是一艘舢板船。在漆黑的夜色中，在海面上，一个巨大的黑影在距我们仅几米远处“嗖”地驶了过去。这艘舢板船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走私货物，自然不敢点灯。我们的小船，加上我们五个人，不到一吨重，而这艘舢板船载重至少有50吨，如果撞上我们的小船，肯定会把我们撞得稀里哗啦。但等我们感到害怕时，危险已经过去了。

另一个威胁是我们的小船可能被洋流冲出沿海水域，进入浩渺无际的太平洋，那就无从知道最后会漂流到什么地方——如果能有这么个地方的话。

但我们继续向前、向前——仍然由范内斯划船。天亮时，我们想靠近哑铃状的长洲岛，我们以为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未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块陆地。但我们很快就看到，在海岸也有日本人新修的水泥碉堡，于是我们赶快划走。要是敌人抓住我们，我们怎么说？过去几小时的艰苦行程已经把我们弄得头晕目眩了，所以我们就想，不妨冒充德国人外出钓鱼，因为德国人是日本人的朋友，他们也许就不管了。但这纯粹是想入非非。我们几个人没有人会讲德语，看起来也不像是钓鱼的样子。男人们都已经几天没有刮胡子了，我的胡子是在集中营里留起来的，以便伪装，几个星期没修剪了。因为船仍漏水，我们下半身都已湿透——即使作为难民，我们的模样也是惨不忍睹的。

我们改道驶向大屿山岛，这是香港外岛中最大的一个，但在那时是最不发达的一个。我们必须在这里登陆，因为我们看到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在破浪前进，显然是在追逐一艘满帆的、他们认为可疑的舢板船。如果这艘巡逻艇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事情就糟了。因此我

们径直驶向岸边，把船拖上沙滩，再尽我们力之所及，把它藏进灌木丛中。

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倒在沙滩上，睡着了。

我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岛上的渔民老乡，围成一圈，站在我们这几个人四周。他们看着我们几个躺在那里，用广东话（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听得懂）说，我们一定是从拘留营里逃出来的。我们都哼哼哈哈，不知道是该否认还是该承认，但听他们的口气是友善的。他们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就带着我们往上走进灌木丛中，然后用他们的手和一双赤足把沙弄平，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我们曾在这里躺过、我们的船曾在这里拖上岸。他们的身后有一个溪谷，他们叫我们在谷中躲好。“这儿附近有日本人吗？”我们不由自主地问。他们回答说，偶尔有少数几个驻扎在岛上主要市镇里的日本兵。我们不想到他们的村子里去，因为有时日本兵会突然进村，村里也可能有坏人会通风报信。“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们回来。”他们嘱咐完就走了。

他们还提到：“如果让坏人知道了，对你们和我们都不好。”这一点我们明白，但究竟“不好”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听说，有几个从赤柱拘留营逃出来的人被抓住后受到酷刑，腿被打断，还有人被杀害。

我们也明白，如果这些渔民老乡帮助了我们，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将同样严重，甚至更坏。但我们越来越相信，他们不想把我们交出去，尽管这样做会得到奖赏而不是招致危险。我们很高兴地知道，他们都是穷人，战争更使他们受苦。他们究竟苦到什么地步，从他们给我们送来的食物就可以知道——清水煮红薯，这就是他们的食物。他们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大米了，好几个星期前就吃光了。

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有一位年龄较大的渔民曾在英国和其他外国船上当过海员，包括航行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属于“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船队”。凑巧的是，雷·奥尼尔也在这家公司工作过。他们相对微笑并拍拍肩膀，这些动作是显示劳工团结的纽带，有了它，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负责带领我们的是村里的一位裁缝，他说要带我们去日本人还没有占领的地方，我们说“好”——其实我们也别无选择。

我们谈到下一步去哪里，怎么走。他们没有问我们要钱，我们带的钱也很少，总共不过200港币，大家分用。当时带一个人逃出香港，通常要收500到1000港币，如果这个人在日本人的黑名单上，那就需要格外的小心，风险也更大，因此收费更高。现在我们这五个人都是日本人要抓的，但我们平均每人只能付给他们二三十元，为这点钱是没有人甘冒掉脑袋的危险的。这些朴实的、贫困的中国渔民老乡出手相救不是为钱，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古老民族的爱国子孙，这是令人难忘的。

这一整天我们都躲在这个峡谷里，他们给我们送了几次饭。第二天我们仍睡在那里，准备起程。到了傍晚，他们把我们安顿在一艘渔船上，船上有个棚子，我们躲在下面。因为洋流方向不对，他们不能送我们去大亚湾——我们希望到那里去是因为可以找到东江抗日游击队——只能送我们到澳门。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从理论上讲是保持中立的。

我们登船的码头上有一座小庙，供奉着华南渔民的保护女神妈祖，渔民们出海之前都要向她焚香礼拜，祈祷平安。我们这条小舢板的船长和他的12岁的儿子（船上唯一的水手）虔诚地祈了福，然后我

们全体（包括那位负责带领我们的裁缝）挤进了船舱，船就出发了。为了尽量不引人注意，我们没有挂帆，只靠船尾一支大橹作为动力。

这时天已黑了。我们实际上是紧贴着岸边航行的，这样比在开阔的海面上航行更不易引起巡逻船艇的注意。“要是真让日本人看见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问那个年幼的孩子。“我们有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扒开船底的稻草，露出了一支步枪。他的这一答复是令我们永远难忘的。一方面是日本帝国，它在征伐的过程中一举粉碎了香港，继而拿下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但是，在它进军的途中却站着这个手持钢枪、毫不畏惧的少年。这个岛上的居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搭救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英国人对香港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痛恨现在正在侵略他们祖国的日本人，而我们都已成为盟友。

我们在船上吃了一顿饭。刚从海里捕来的乌贼，很硬，难嚼，但有一股香味，使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人大快朵颐。他们是在船上的一只炭炉上用平底锅把它烤熟的，炉子四周遮挡严实，不让透光。

大约在清晨四时，第一缕曙光尚未出现，我们偷偷地驶进了澳门的渔港——是位于后面的港口，不是正常航运用的前面的港口。港内挤满了小船，有几百条，都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不愿出海的。有的已在这里停泊了很久，成了临时住家。当我们的船挤进这群小船时，因为船的大小模样差不多，所以很难分辨哪一条是新来的，哪一条是已在这里停泊了很久的。

当我们的船沿着通向埠头的步阶慢慢前进时，我们看到岸上有一个孤零零的警察的影子，还听到了教堂的钟声。澳门居民中有很多是天主教徒，他们正用齐鸣的钟声迎接星期日早晨的来临。

我们又都趴下，直到那个警察的影子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接着我们上了岸，腋下夹着装在麻袋里的替换衣服，开始沿着岸边往前走去。突然，一个矮小、黝黑、胖胖的男人向我们快步走来。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喂，你们这些老乡是从香港来的吗？"他一口美国口音，自我介绍说他是保罗斯神父，属天主教玛丽诺尔教会，这个教会的总部在美国纽约州的奥斯宁。

凭我们这副脏兮兮、湿漉漉的样子，除了是逃亡者还能是什么别的人呢？因此，我们也不同他多啰唆，只问他到英国领事馆怎么走。我们估计，现在从苏联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直到澳大利亚的整个亚洲太平洋沿岸，大概只有这样一个盟国的官方代表机构了，其他的都已被日本人占领。

"跟我来，"这位胖胖的神父说，"但我先得去嘉梅修道院做弥撒。"

我们对他说："我们不想叫人看见。"

"别担心，"他向我们保证，"那些修女是起过誓，要严守秘密的。"确实如此，我们发现她们站在栅栏后面，一声不响。保罗斯神父主持弥撒。我们五人中的雷·奥尼尔是爱尔兰人，从小在教堂中长大，他也跪了下去，虽然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信神的迹象。

我们到英国领事馆按响门铃时，太阳刚刚升起。办事的公务员名叫里夫斯，穿着睡袍，睡眼惺忪，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请进，请进，"他刚说完，马上接下去问，"有人看到你们吗？"我们告诉他，没有人，除了修女，但她们是发过保密誓的，还碰到过

很少几个人，天刚蒙蒙亮，没人会注意我们的。但他说：“如果在澳门有人见了你们，那么全城就都知道了。别存幻想。”说完，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打电话：“喂，喂！你知道我们这里来了什么人——五个人，直接从香港来的！他们可能有关于你家属的消息。”

当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谁进了拘留营，谁没有进。日军攻占香港以前，在澳门有许多同盟国籍的侨民，其中有些人只是到澳门来赌博，玩几天，有些人是香港英国人的妻子，当局下令疏散家属时她们打定主意不回国而是到这个近在咫尺的中立小埠来暂避。现在，这些人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期间在这里滞留下去了，而他们的亲人则已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我们告诉里夫斯，“我们还要从澳门到别处去，所以最好隐蔽起来。”他对此一口回绝：“没有人能从这里再往别处去，你们就待在这儿，直到战争结束，别想离开。”照他的说法，我们正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该再想走动了。要把我们长期圈在澳门，这实在令我们丧气。

里夫斯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政局，情况是不妙的。葡萄牙当局分成两派，总督是亲盟国的，警察局局长则是亲日本的。战争爆发以来，澳门的人口因难民涌入而增加了四倍，食物供应必须通过日本的封锁线，所以日本人只要发出切断供应的威胁，澳门对日本的任何要求都只有答应。我们在城里亲眼看到的情景是可怕的。配给的食物少得可怜，排成长队的人们跪在地上等候。任何人带着食物，即使是生鱼，也有被饿得发疯的人们——多数是孩子——抢去的危险，他们不管抓住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里夫斯说，甚至有吃人肉的。

为了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葡萄牙人把仓库里的棉花几乎全部送给了日本人。葡萄牙空军有一架飞机驻在澳门，连这架飞机需用的航空汽油也奉送掉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日本人指名要我们几个人，葡萄牙人一定会乖乖地把我们交出去的。

为了安抚我们，里夫斯说，“我想去同总督商量商量，把你们的户口登记改一改，改成不是从香港来的。”为此，他同我们中的一员——赖特——去办这件事。

我记得当时把邱茉莉说成是奥地利人，取名“埃尔莎·莫勒”，让她住在一家名叫“美景”的高级旅馆里。令她尴尬的是，在这家旅馆不多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位是德国纳粹在澳门的头子。她作为一位有名望的奥地利人出现但却不会说德语，因而不得不竭力回避那个德国人。其他的人当时如何造假，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因为赖特是英国人而范内斯又有病，因此里夫斯把他们安排在他住宅的一间空房里。奥尼尔和我住在一间按床位收费的小客栈里，这间小客栈取了一个口气不小的名字：“葡国曙光”。

至于钱的问题，里夫斯说，他当尽力帮忙。但他解释说，所有在这里的盟国难民都想向他借钱，而他所能做的只是签一些借条，这些借条别人认不认账很难说。他想了许多办法同伦敦联系、要钱，但通讯或汇款却很困难。有一次，来了一封无线电报，他赶快拿进译电室去译。关于这个电报，他激动地说：“我在这里真是困难重重，而我收到的却是这样一个通报，说是鉴于当前世界的混乱局势，建议英王陛下外交部人员在旅行时宜尽量少带行李，不要用船运送家具。”这就是他等了很久以后收到的第一个信息。

邱茉莉和我们住旅馆的钱，是由里夫斯签了借条付的。他希望将来英、美或其他有关的盟国政府会偿还他（我名下这一份可能他得不到补偿了，因为我装成美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其实，里夫斯应该是认识我的，虽然他一点不露声色。1938年我在武汉当记者时，他在武汉英国领事馆任职。武汉当时的外国人寥寥可数，我见过他，他也一定见过我，只是没有说过话。在澳门，我觉得他有一两次看着我，表情怪怪的。但他对我名叫“史蒂文森”而不是“爱泼斯坦”从未表示过怀疑。

他对我们的劝告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他说：“别一起到外面去，你们太扎眼了。”有时却又说：“别一个人出去，因为一个人走，日本人很容易绑架你，把你一下子拉过边境线。还是在一起安全些。”

里夫斯也有让我们开心的时候。他曾带我们去喝啤酒，这是逃出拘留营后第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啤酒泡沫在我舌头上破碎时那种快感。人只有经历过长期困苦之后才会有这种快乐。自从几个月前香港陷落时起，几乎就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进过我们的嘴巴。

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萨空了，是一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香港战事的末期，他给了邱茉莉一个澳门的地址。他说：“万一要经这个葡萄牙殖民地逃出去，这个地址会有用处。”在拘留营时，我们一直在打算的是从另外的路线出逃，所以几乎把这茬儿忘了，现在这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这是一位姓陈的医生的地址。这个地址只有我和邱茉莉知道，我们就一起去找。但叫这个名字的这条街道实在难找，也可能她记得不是很准确。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医生的诊所，看起来有点像，就去敲门。接诊处的一位女护士问我们看什么病。邱茉莉说她的胃部不

舒服，护士让她进了诊室，我在外面无聊地等候。她照萨空了的嘱咐，对医生说，请他帮助我们从澳门出去。医生说：“那你得跟我弟弟谈。”那位弟弟看起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位教师。他说：“好的，我们能想办法。我们认识一些人，是搞走私的，但也带人出去。他们不要钱，他们是爱国者。”

接着他提到，马上要把一位威灵克先生和他的夫人送出去，他原任荷兰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由本国政府指定担负领事任务的商人）。由于英国领事里夫斯的要求，他们将把这对滞留澳门的夫妇送到中国大后方去。

我们听了不禁生了一肚子的气。同一个里夫斯，对我们斩钉截铁地说想从澳门出去没门儿，却偷偷地给别人安排出去的路子。但我们回来见到里夫斯时什么也没有说，就如他对我们守口如瓶一样。我们怕他知道了会拆我们的台，因为他可能以为我们在拆他的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走之前要他帮什么忙，如借一点钱备用等等。保罗斯神父和他的教会同事们我们是经常去拜访的，因此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有机会到内地去，想问他们借一点钱，到了内地我们会把钱如数还给他们指定的任何人。我们没有透露其他细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可以，在内地也有他们这个教会的人，他们一直在想给他们送点钱去。这样搞到了2000港币，这个数目不大，所以他们觉得不妨冒一下风险。

另一个困难是现在在澳门没有人外出旅行，所以没有人在街上扛着行李走路，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定会引人注目。我们向所谓的“走私团伙”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这好办，他们会装作收旧货的商人，到我们住的小客栈来，收购我们的衣服等等物品。在澳门，许多难民没钱

花了，就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和他们要装作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声嚷嚷，招引人来围观。然后我们的“买主”就会大件小件地把东西拿走，送到船上去，不用担心。于是在“葡国曙光”这个小客栈的院子里就上演了一出砍价争吵的闹剧。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人说，“太便宜了，别卖！”又有人说，“这破烂还要那么多钱！”最后，我们把带来的所有东西——包括那两块曾打算作船帆用的毯子——都“卖”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还向别人诉苦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么低的价钱就把东西处理掉了。这种场景在当时的澳门是常见的。

又出现了另一个障碍。大个子雷·奥尼尔在我们整个出逃过程中都是勇敢和沉着的典范。他的肾脏上方还有一块弹片，香港的医院没有取出，他咬紧牙关支撑着。但到了澳门，他开始酗酒。他会到酒吧去讨酒喝，口无遮拦地大声胡说。有一次他甚至跑到日本领事馆——靠近英国领事馆——前面，使劲敲打铁栏杆，口中大喊：“你们这些杂种！我们要到中国去参加游击队，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他的病和大呼小叫的行为在我们以后的行程中会给大伙带来危险，因为我们还要经过一段日本占领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护送我们的人现在不想带他一起走，因此把他留在澳门养伤，另外找机会把他送走——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一天傍晚，一串模糊的人影在朦胧暮色中行进。我们被带到岸边，上了一艘小船，划到一艘停泊着的舢板船上。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底层船舱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们是在等这位荷兰商务领事威灵克和他的夫人，他们没有按时到达，因为他们坚持要带许多行李，包括那种专供放在船舱铺位下的扁而宽的衣箱。不像我们都是轻装，他们搬运这些东西而不被人注意必然是想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办法的。

护送我们的中国人对他们造成的麻烦直犯嘀咕。他们所造成的延误可能会使大伙送命，因为护送我们的人同澳门境外一处地岬上的伪军哨所秘密约定了通过的时间。我们的舢板船同其他的舢板船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在夜间，很难辨别，惟一的识别办法就是在约定的时间通过。如果我们不是按约定的时间通过，伪军哨所就会开枪。所以我们越等越感到紧张，直到这对拖拖拉拉的夫妇到达。他们带的东西真不少，其中有一个纸筒，里边装着他的“商务领事”证件，是一刻也不离手的。

威灵克白净、魁梧、壮实，外表上不动声色，只有他那双微微闪烁的眼睛露出一点不安的神情。他的妻子是一位黑黑的、活泼的奥地利犹太人。她显然在希特勒统治下受过刺激，可以看得出神经有点不大正常。我们很快就明白，她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边缘。

连同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东西，我们还得再转一次手。我们从底层舱出来，在漆黑一团中从绳梯下到另一条船上去。这种称为“蛇舟”的船船身很长，像一只挖空树干制造的独木舟，船上有几个划桨的人，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船尾有一个人站着，操纵着一支长桨，起舵的作用，还喊着号子，使划桨的人动作一致——他既是舵手，又如赛艇的艇长。我们已经迟了，过了约定的时间，因此穿过地岬时，哨兵就向我们开枪，子弹“嗖嗖”地飞过水面。可怜的威灵克夫人这时才决定，她必须戴上帽子，于是从手袋里取出一顶白色的帽子戴上，在月光下分外耀眼。我们要她拿下来，她不干。态度坚决而又身体结实的她，腰板笔挺地坐在那里，头仰得很高，以至于划船的人每次把桨向前划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一下她的脑袋，但她依旧岿然不动。

当岸上向我们开枪时，子弹射向四周水里，我们望着船尾的舵手，以为他会蹲下去躲避，但他却站得更直，不住地喊：“快划！快划！”到了距离岸上哨兵不远处，可以彼此听到声音时，他喊了一句通行的口令，还带上几句骂人的脏话。射击停止了。我们过了关。

再往前行，我们消失在浓浓夜色中，进入西江三角洲。这一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我们左弯右转，最后到了一个村庄。在这支水上远征队中，除了我们两条“蛇船”外，还有一条像“舰载艇”那样的小船，有一面小帆，还有一位船老大——保护我们的走私团伙头头赵其休的兄弟。村子里有武装警卫队，据护送我们的人解释，他们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伪军——日本人很少到这里来——实际上只是伪装的，他们并不亲日。当时，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的解释。

我们在村里住了一宿，觉得村民们非常友好。我们走近一个所谓“伪军”的士兵，看他的枪，是一件锈迹斑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古董。那个士兵承认这是个破玩意儿，接着就带我们到一座古庙里去，让我们看藏起来的一些很像样的步枪。他微微一笑说，那些老家伙是给来巡察的日本人看的，这些新的是为秘密的爱国行动准备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这批人分乘三条吃水很浅的用于内河航行的船，组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小舰队”的船队。最前面一条小巧灵活，是带队的人乘坐的，用于侦察情况，如果有人阻拦，带队的人就出面去交涉放行。第二条稍大一些，装着一些货物和我们几个人。船上有篷，白天我们就躲在篷下，我们的安全和隐蔽是必须保证的。最后一条船的大小同我们这一条差不多，船上是村里的警卫队，穿着伪军的制服，有步枪和一挺机关枪，这是装样子的，如果必要，当然也可以真打。

我们在船上开玩笑说，这就像当今的世界。最前方是外交和情报工作，靠这两者达到目的是最理想的。支持这两者的是武力——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这支“小舰队”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或压倒对方，因为在我们选定的路线上可能遇到的敌方巡逻兵都是小股部队，并且是分散的。但我们的护卫队显然要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有时最前面的指挥船发出有情况的讯号时，我们后面两条船就会改道，开进较为僻静的水面去躲避。

※　※　※

我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确切地说，是到1991年——才真正弄清楚当时护送我们出险的“走私团伙”的真实背景的。在遗忘已久之后，我忽然收到了一位名叫钟华的人的来信，我是在出险途中的最后阶段碰到他的，当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学校教师和地方报纸《前锋报》的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全国驰名的《羊城晚报》的领导之一、资深编辑，到了规定的年纪就离休了。

在后来我们的通信中，他叙述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一些情况。

当年带我们出险的领头人原来是个商人，确实干过不少走私买卖。但他又是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抵抗日本占领军。中国共产党决定把他吸收进抗日统一战线，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了解和工作。赵其休确实一贯抗日，倾向进步并愿意合作。

钟华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职业是教师兼当地一张小报的编辑。他对赵做工作，争取他，最后成了赵的秘书，帮助他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部队。赵过去干过走私，所以有一个水上交通网，可以通过日伪占领的地区。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新的贸易公司，澳门的那位

陈医生——我们是通过他接上这个关系的——是他的老乡和朋友。陈医生在澳门是颇受人尊敬的，现在仍旧住在那里，已经退休。但赵在几年前已病故了。战后，他因在对日作战时在香港及境外援助盟国，英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奖章。这可能是由于他同英国驻澳门领事里夫斯的关系。

我在1991年所了解到的情况也使我对1942年所遇到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企图逃出香港的计划失败后，曾经以为我们后来的出逃是全靠自己。但通过萨空了向邱茉莉提示在澳门的联系线索以及后来通过陈医生同赵的“走私团伙”接上关系，我们是再一次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罢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及其周围地区，外国人的脱险和盟国的一些作为，大多是依靠了中共领导下的抵抗力量。

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有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故事。人们“跳不出”历史的掌心，这里说的历史，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就是当时的抗日战争和抗战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沈苏儒　译）

---

(1) Benjamin Proulx．Underground from Hong Kong．New York：E．P．Dutton ＆ Co．，1943：P210-211．

(2) R．K．M．Simpson．These Defenceless Doors：P193，转引自Endacott ＆ Birch．Hong Kong Eclip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84。

第十五章　再到重庆

我再返重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时，中国已不再是单枪匹马地打日本，而是有了西方国家作为它的盟国。这本来应当可以提高中国战时首都的战斗士气，但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借此却产生了依靠美国来打败日本的打算，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囤积来自外国的武器，以便日后在内战中打共产党。

至少有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很早就参与了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工作。

同美国战略服务局（OSS）和美国海军情报部（ONI）有联系的“中美合作所”，培训蒋介石的特务使用拷问逼供的办法（包括刑讯）来对付共产党嫌疑犯和他们的同情者。竭诚拥护蒋介石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赞成这些活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的史迪威将军，则激烈反对这样做。史迪威非常能干、精力充沛，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潜在的战斗力量，不喜欢、不信任蒋介石的腐败官僚和害怕打仗的将军们。他主张美中两国军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

史迪威在政治上斗不过蒋介石及其由中美两国人物组成的小集团，终于被召回美国。罗斯福总统作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它所产生的致命后果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因为这个决定使美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1945年罗斯福逝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卷入了中国的内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是承认它，而是企图颠覆它；美国对朝鲜和越南进行了倒霉的军事干涉；同中国断绝关系长达二十多年，使

两国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此外，还造成了一些迄今困扰着两国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

国民党在1939—1945年的政策不仅仅是尽量避免同日本作战，而且还听任57名将领带着他们的部队投靠日本一手制造的汪精卫傀儡政府。他们被日本人用来对付“赤色分子”，最后又回到国民党的怀抱，干同样的勾当。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蒋介石当年的角色，作了这样入木三分的讽刺——“坐山观虎斗”。这些“虎”就是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1942—1943年，面对国民党的战线平静无事，侵华日军便集中力量，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企图加以消灭。他们采取了残酷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但是，他们的这种恐怖做法并没有使根据地屈服，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农民群众投身于武装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者也是为挫败敌人的阴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战士、民兵和辅助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和一些简单的工具，耕田种地；他们还坐在纺车织机前，纺纱织布，以生产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根据地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为日后的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的发言人和媒体，越来越把共产党当作他们在中国的最难对付的主要敌人。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意识到他们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点也日益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在1937—1938年抗日抗战争初期，人们就曾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共产党成功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后，人们更加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两个战场之间形成了日益鲜明的对比，中国的西方盟国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它们出于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作为战胜日本的一个因素，它们却不能无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所作出的越来越大的贡献。

下面谈谈我的工作。我逃出香港的日本拘留营，到了桂林以后，董显光从重庆打电报给我，请我重新回到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这使我感到进退两难。断然拒绝吧，将使我无路可走；接受吧，又可能使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观点写作。所以我给已去纽约的伊迪丝打电报，请她尽快设法给我弄一个在中国当外国记者的差事。很幸运，她果然做到了。联合劳动新闻社聘请我担任驻华记者。这是一家新成立的通讯社，专门向工会和左派报纸提供世界新闻。有了该社的聘请电报，我便可以对董显光婉言谢绝，说我很感谢他，但我已接受了一个外国新闻单位的聘请。

联合劳动新闻社给我的报酬寥寥无几，但我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找些兼差来维持生活。很快，我就在美国战时新闻局（USOWI）的重庆办事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它后来演变为美国新闻处。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费希尔，我同他曾在合众社共过事。我每天把华盛顿用无线电发来的消息编成新闻稿，供中国报纸采用，这项工作只需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付给我的生活费足够维持我一向十分俭朴的生活。

※　※　※

就我个人生活来说，重返重庆时期的巨大变化是我1943年同邱茉莉结了婚。她同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直到她逝世为止。我们是在

我同伊迪丝离婚以后结的婚。伊迪丝是我中学时代的情人，我19岁那年，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虽然伊迪丝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们互相帮助，但我们已经分居多年，我们的生活目的也不同，她要建立一个家庭，过平静的生活，而我是要作为一个记者，报道中国战场的情况。我们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我是通过从香港一起出逃这段患难经历同邱茉莉相知相爱的，我们也有共同的人生追求，终至结成终身伴侣；伊迪丝在美国也重新结了婚。她是在从事对中国的战时救济工作时认识她的新丈夫的，她婚后忙于教学工作和支持进步事业。她同她的新丈夫生儿育女，还有了第三代。虽然我们两家经过这许多变迁，但始终是好朋友。

我们离婚的特殊情况反映了美中两国法律制度的不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案例，涉及以前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要按照中国法律办理离婚。伊迪丝是美国公民，她现在成为了被告。经过咨询后，我控告她遗弃我，因为自1940年以来，她就离开了我，一直在美国。在1943年以前，根据列强从中国取得的治外法权，这样的案件本应由在中国的美国领事法庭来审理。不过，在那一年，由于中国已同美国和英国结盟，英美公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规定被正式取消。

有趣的是，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现代民法法典中的离婚法也比美国的开明。中国把双方同意作为离婚的主要动机，但纽约（伊迪丝所在地）的法院则认为这有双方串通之嫌，是不能接受的，还不如找到或伪造一些通奸行为的惊人证据作为离婚的借口。所以我们选择遗弃作为离婚的理由，因为这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诉讼反映了过去的情况，但同将来也有关系。我的律师是沈钧儒和沙千里，他们是著名的法学专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就积极主张武装抗日，而国民党对此持消极态度，因而他们和其他五位著名人士锒铛入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救国会七君子”案件。在战时的重庆，他们两人仍然受到当局的冷遇，没有任何官职也没有受到任何优待。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律师费勉强度日，因为有钱的客户不找他们，找上门来的客户都是贫苦的人，即使付得起钱，也是很有限的。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些爱国人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都受到了很大的尊敬。沈钧儒担任了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沙千里则入阁成为部长。

我同邱茉莉结婚比同伊迪丝离婚要方便得多，根据中国的法律办理结婚手续也更加容易一些。我们在文具商店买了一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上印着一对鸳鸯，象征白头偕老。我们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两个朋友作为证婚人。由于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所以我们按照规定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

办结婚手续是很简单的，但我们作出结婚的决定却要复杂得多。同她结婚，我是非常坚决的。而她则长期犹豫不决，她比我大九岁，觉得自己太老了。我们结婚以后，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　※　※

我和邱茉莉结婚以后，头几年住在重庆外国新闻记者招待所。这个地方值得一记。它原先是一所贵族中学的所在地，原有的砖瓦楼房成为董显光的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在它的操场上，临时搭建了一批类似棚屋那样的房子，有的一层，有的两层，这就是新闻记者招待

所。墙壁是用竹板横七竖八搭成的，再抹上些白灰，很不结实。日本飞机在附近扔炸弹时，白灰往往脱落，于是我们的房间变成了竹条“笼子”，从外面一眼可以看透。我们便用国际宣传处充分供应的、印在绿色纸上的每日新闻稿临时修补一下。但不论是新闻稿纸还是白灰，都不能隔音，隔壁的一举一动都听得一清二楚：打字机的嗒嗒声、对政治的高谈阔论、“荤”笑话、男士的或男女混杂的闹哄哄的晚会、谈情说爱，以及其他种种声音。

我在平房区有一间房子。每间这样的房子都有一扇窗户和一扇门，通向庭院。庭院内栽种了许多香蕉树，枝叶繁茂，但从来不结香蕉。外国记者如果喝醉了，往往去把香蕉树连根拔起，以显示他的力气。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外号叫“辣椒”，身体强壮结实，有一次，他一口气拔起了一排香蕉树，创下了最高纪录。

当邱茉莉从桂林来到重庆时，由于她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宣传员，我在隔壁给她找了一间房子。我们在闲暇或工作的时候，在我的或她的房间里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结婚以后，把两间房子打通，安装了一个木炭火盆，为两个房间供暖。

这些房子的天花板是用竹条搭成方格子，再糊上白纸。重庆的老鼠硕大无比，听说它们能吃掉小猫。它们在天花板上嬉戏，撒出又黄又臭的尿洇湿了天花板上糊的纸，还不时用它们的爪子踩破。夜间，它们偶尔会从天而降。有一次，当邱茉莉熟睡的时候，一只老鼠咬掉了她一边的头发。她的头发呈麦秆的黄色，质地柔软，所以一定是被老鼠认为可作为垫窝的理想材料。老鼠的动作很轻，也很仔细，所以直到第二天醒来时，邱茉莉才发现她的头发被啃掉了。

为了照明，我们装了个小灯泡，有时是25瓦的，弄不到25瓦时，就只用15瓦的。然后配了一个自制的灯伞。

新闻记者招待所的房间有好几十个，但只有一个带有冲水设备的便所和一个浴室。它们都是用灰色水泥抹成的，里面铺着抛光的鹅卵石，有点像水磨石。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些设备是财政部长孔祥熙所赠。我们大家轮流使用这些设备。

※　※　※

我和邱茉莉除了有报酬的工作外，又开始自愿地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做些工作。1941年12月日本进攻珍珠港和香港后，宋庆龄直到最后才乘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她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那两位当上高官夫人的姐妹的“款待”中解脱出来，并找到了一处远离她们官邸的私宅（她们的官邸都是警卫森严，隔断了她和友人们的联系）。1942年8月，她重新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在重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我们没有办公的场所，所以只好在她住所的起居室里工作。我们无法搞到印刷设备，所以只好托友人在旅行时把宣传品带到国外，由国外支持我们的团体印刷出版。香港同外界原有海上交通，现在也没有这个条件了。但是，重庆也存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必然都想会见宋庆龄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从而了解她的一些坚定不移的主张：全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对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至少在医疗用品供应方面必须做到。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所以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孙的遗孀或者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

做不到。再者，在重庆有中共的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所有的抗日力量一视同仁地争取救济援助，这在国内外大大提高了它的威信。在那些自愿地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中，不仅有外国外交机构的年轻官员，而且还有一位盟国大使的夫人。有些年轻的外交官参加了各种义演活动，包括国际性的音乐会和足球赛、为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省灾民募捐等等。国民党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几乎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但是，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则帮助灾民迁移到那里去安家。

在外国军事使团中，宋庆龄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史迪威将军。他不仅会讲中文，而且对中国的平民百姓的赞赏甚于上层社会。史迪威曾经主张派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常驻八路军总部以了解它在抗日中的作用，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他还主张向八路军提供武器援助，但未成功。他还命令飞往延安同军事观察组联络的飞机携带送给八路军的医疗用品。有一次，他下令把运输机的舱门用喷枪拓宽，以便安放一台送给八路军的X光医疗设备。

宋庆龄在盟国军事使团中广交朋友。她不仅邀请军官，还邀请低级士官和普通士兵到她家去或参加慈善性的社交舞会。因此，她在这些使团的下层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她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广度是无人可及的。

“保盟”在香港期间就得到了外国的大力支持。现在，通过她的努力，许多国际救济组织、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团体也都为“保盟”的项目捐款。

此外，她始终力求使国际舆论注意到国民党对运送到共产党地区的医疗等救济物资实行封锁。她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致美国工人们》。我感到自豪的是，我通过联合劳动新闻社把这封信发到了国外。她在这封信中敦促美国的劳工运动坚持这一原则："要求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这样做的军队就不予分配。"她还揭示中国发生内战的威胁。她说："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1)

除了这一声明之外，她还愤怒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伤病员受到歧视，有人故意不让他们得到医治。她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国民党。从下面提到的记者招待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友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他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这样的情况：宋庆龄告诉她的一个友人说，国民党陆军部长何应钦和秘书长吴铁城等人对她进行了"训斥"。"他们拒绝承认事实，只是一股脑儿指责我不该呼吁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她对谢伟思说，她的姐夫孔祥熙不安地问道："如果你继续发表这样的言论，他们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办？"

她对孔祥熙说，她欢迎他们这么做。她平静而又温和，毫无惧容。

※　※　※

1943年底，国民党的战场略有好转。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中国的地面部队从日军手中收复了湖南省西部的常德市。我目睹了这场战斗，随后详细报道了日军对这个城市的破坏：

当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时，人们需要好好研究这样的问题：法西斯轴心国家的军队为什么会干出那样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常德市遭到破坏的情况将可以提供一些引起他们注意的案例。日本农民看重大米，把它看作是辛勤劳动的果实，维持生命的粮食。为什么日本兵却把从中国农民手中窃取的大米，不仅用来喂马，而且把运不走的大米堆作为厕坑？（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日军普遍采取的行动。其他战线的记者都提到同样的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历史学家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进入天主教孤儿院的日本士兵会干出这样的事：他们不仅偷了孩子们的床上用品，而且还费劲地从院子里搬来大石头，砸烂了职业培训用的纺织机器？他们还闯入教室，把墨水瓶往墙上扔，这又有什么乐趣？为什么他们把难民用来炒菜的油瓶统统打得粉碎，而没有拿走它们？为什么他们把老百姓抓去当苦力时故意让年老体弱的人干重活，而让年轻人干轻活，然后把那些不堪重负而倒下去的人用刺刀刺死？

所有这些事情不是我亲眼目睹的，就是从数以百计的亲身经历过这种磨难的人的口中听到的。

※　※　※

我第二次在重庆居留的那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举行过两种类型的记者招待会，一类是军事性的，另一类是非军事性的。

军方发言人徐培根将军，他腰板儿挺得笔直。然而，他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前线没有什么好消息可谈，但又不能报道坏消息或僵持局面。记者们开玩笑说，这位发言人什么真相都不知道，所以才会板着面孔去念那些编造出来的新闻稿，有时还在地图上指指点点。

对于那些令人鼓舞的战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敌后根据地打击日寇的进展情况，徐将军只字不提。他的任务是对这些战绩不闻不问或者隐瞒、否认。

外国记者往往不参加军方的记者招待会，但他们要求参加政府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地去，问一些有关战争的政治问题。

邱茉莉用速记记录了1944年2月22日由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主持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情况（美国财政部代表爱德乐在给该机构的报告中曾经加以引用），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现场气氛。

西奥多·怀特（《时代》杂志）：部长先生，能否告诉我们，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进行？

部长：你所说的“封锁”是什么意思？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怀特：自1939年以来，我去过西安四五次。人们对我说，从西安去延安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把医疗用品送到那里，无法运送军事物品。这就是我所说的封锁。

部长：……周恩来和他的人去延安没有任何限制。第十八集团军的运输畅行无阻。所以“封锁”一词不符合事实。

斯图尔特·格尔德（《伦敦新闻纪事报》）：自1940年以来，有多少批医疗用品被允许运输过去？

部长：我无法提供这样的材料，因为这个问题必须去问军事委员会。

冈瑟·斯坦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些来自国外的医疗用品是指定运给共产党地区的，却被扣留没收。部长先生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部长：你要了解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建议你去采访陆军部长何应钦。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纽约时报》）：如果部长先生反对使用“封锁”一词，是否有别的什么词汇可以使用？人们不能自由地去延安，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部长：中国对待国共两党的分歧，可以比作家庭内部之争，没有必要公之于众。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心理上的不同之处。中国人认为，当权的人最好少说多做。西方人则认为，政府作出什么规定，必须大事宣传。这是心理上的差异。

怀特：这是家庭内部之争吗？但是，我听到一位部长说，共产党是一群匪徒、军阀等。这不像是家庭内部之争。一年多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被允许充分报道一下局势。

阿特金森：（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地位如何？它像其他军队一样，也是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部长：它原先是的。但是，后来由于它不服从政令，发生了新情况，对他们的供应中断了。

怀特：日本电台不断广播说，他们在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可是在重庆，人们对我们说，新四军已经不存在了。哪一种说法对？

吴国桢（重庆市市长）：如果你对日本的新闻感兴趣，你就听它的好了。

部长：在中国，有些人在利用局势，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最近，英国《雷诺新闻》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中山夫人对英美劳工界发出呼吁，指责重庆的反动分子加强了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中国处于内部冲突的边缘。这显然是一条歪曲事实的报道。我给孙夫人打电话，问了此事。她予以否认，并出示了她原来的电报，那上面是这样说的：

> 值此“中华民国”建立32周年之际，我们应当记住，走向民主的进程类似学习游泳，光说不行，必须跳进水中。……全力以赴，抵抗侵略的人，对此最有作用。美国朋友通过积极支持实际打击日寇的一切人，就可以对民主有所帮助。
>
> ——孙中山夫人

在她的电报中根本没有“反动分子”的字眼，也没有什么取消封锁这样的要求。我再说一遍，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你了解事实真

相。如果你能对发言人谅解，那么就谈到这里吧。

爱泼斯坦：你谈到，第十八集团军曾经被认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后来因形势变化而停止供应，那么，停止供应有多长时间了？关于孙中山夫人的电报，她说，“美国朋友通过积极支持实际打击日寇的一切人，就可以对民主有所帮助”。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含蓄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两个军队没有得到平等的支持？

部长：关于什么时候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供应，容我以后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自行决定征税，政府一获悉这个情况，就停止对它的拨款。在最近两周内，没有特别的理由强调共产党问题，一个集团军已从那个地区撤走。

怀特：但是，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遭到封锁，不允许我们谈论时局。

部长：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感兴趣。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

怀特：是你在大题小做。

格尔德：……如果中国政府用大批军队对别的中国军队进行封锁，它怎么能够全力以赴地抗日？

部长：在任何战争中，都必须既在前线打仗，又在后方维持治安。

格尔德：请问，是否能允许我们去共产党地区？

斯坦因：能否允许我给延安发个电报，要求它发表一项声明。如果我得到答复，能否允许我发表?

吴国桢：我们的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表单独的声明。

部长：我不想说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如果那样说的话，如何解决问题呢?

斯坦因：是否值得花钱给延安发这样的电报?

部长：你必须到军队的电台发。

斯坦因：这就是说还是有封锁了。

吴国桢：不。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我只是随便说说。

一位外国记者：记者是否被允许去延安和陕北?

部长：就我的意见而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但是，这必须得到军方的批准。

阿特金森：这里有一封由一些记者签名的给蒋委员长的信，要求允许他们去延安。

有许多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直到最后国民党批准去延安的访问。

在此期间，梁寒操部长还发表了一番令人难忘的高论。记者们多次表示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为此，他给大家上了一堂哲学课。他说，哲学是他的专业，但显然非记者们所长。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没有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能够为真理下个定义。

这成为在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笑柄。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一席话也是如此。他说，他之所以反对记者们去延安，是出于好意。不去，他们会失望。但是，如果他们去了，而写的报道被政府的新闻检察官砍掉了，那他们岂不是就会更不愉快了么？！（董显光其实就是新闻检察官的头头之一。）

※　※　※

我们这些新闻界人士之所以终于去了延安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很不够的），而且还由于盟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它们之所以施加压力，是因为国民党本来已经消极被动的军事态势进一步迅速恶化。

如果是在亚太战事陷于僵局的条件下，这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到了1944年，由于美国海军的节节胜利，连接日本新帝国各个部分的海路被切断了，这些海上运输线对日本占领军的调动和补给品的供应，以及把日本掠夺来的原料运回国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海上的失利，日本在中国发动进攻，企图从陆路（主要是铁路）把亚洲大陆上被日本占领领土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即从中国的东北到东南亚沿海）连接起来。它还企图迫使蒋介石政权投降或者加以摧毁。那年春天，日军向重庆方向挺进。重庆以南的贵阳市是日军必经之地，但从未被攻占。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在战斗尚未打响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心涣散、惊慌失措的情景。这使我相信，只要有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出现，国民党军队就会弃城而逃。在出现这种局面以前，国民党曾经迷恋于美国空军将军（国民党前顾问）陈纳德所描绘的前景。

他十分相信空军的决定性作用，声称他只要有500架飞机，就可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个梦想对蒋介石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不想在同日本人的地面战中牺牲自己的兵力，而是要保存这些兵力打内战。日本人的新攻势进展迅速，使美国空军慌忙放弃了它在桂林的最前沿的基地，销毁了地面的一切设备，也使陈纳德和蒋介石的梦想破灭。事实证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另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有良好的训练、供给和领导，中国军队不仅能够进行地面反攻，而且能够保卫空军基地。这一点在中缅边境已经得到证明，按照上述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战斗。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能够同日军战斗、决不退缩的中国军队呢？盟国现在清楚地看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如果重庆当局垮台，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就成为中国境内抗日的唯一希望。共产党声称他们有能力收复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核实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如何同他们进行接触，以便在战胜日本的最后斗争中联合行动呢？对此，美国越来越感到关切，因为它的海军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似乎使它在华北海岸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在史迪威将军的心目中，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正是盟国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史迪威以及与他看法相同的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史迪威将军不但支持外国记者的要求，并且争取到允许美国陆军医疗队的梅尔文·卡斯伯格上校陪同我们一起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他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即所谓的“迪克西代表团”）去延安和游击区考察。陪同这个观察组的还有国务院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中国，会讲中国话，赞成同共产党的力量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抗日。

下面就要叙述我们的延安之行。

前面一章已经谈到，在重庆举行的争论激烈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们多次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要求准许他们去那里采访。起初，官方对他们的多次要求都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后来，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表示同意，但提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外国记者只能作为官方组织和监督的采访团的成员（团员中重庆当局主办的或者许可的中国媒体的记者人数比外国记者多几倍），所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言论的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除非连同国民党的评论或驳斥一起发表。

（贾宗谊　译）

---

(1) ［译者注］以上引文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2。

第十六章　从重庆赴延安

在多方的压力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但它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限制记者团的组成。他们借口缺乏女性用的卫生设备而把代表《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拿大一些出版单位的邱茉莉排除在外。实际上，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国民党委派的采访团团长谢保樵起初向我们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把邱茉莉包括进来。但在我们背后，他却在对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的小理查德·瓦茨吹牛时吐露了真情。瓦茨把他的话转告了邱茉莉。他说：爱泼斯坦真是个傻瓜，他还想有人会帮助他妻子去延安。我们一百年也不会让她去的，因为我们怀疑爱泼斯坦想留在边区，这就是他要让他妻子跟他一同去的原因。

这纯粹是瞎胡扯。因为我们所要做的——也是国民党所害怕的——是我们把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在外国媒体上披露，而不是想把自己同外界隔绝。

在重庆新成立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对不把邱茉莉这位正式任命的记者包括在记者团中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拿大驻华大使维克托·奥德伦将军向邱茉莉讲述了他是如何向董显光大发脾气的。他对董说：“这真是一个荒谬的规定，竟然不让一个代表整个加拿大报界的记者参加这次采访活动。”他还说，“现在的女性很坚强，是不怕任何艰苦的。”

邱茉莉还为此事找了国民党元老孙科，但也未能使她的名字列入记者团的名单中。她听见孙科亲自打电话给宣传部长梁寒操（据说，

梁寒操是他的人），生气地要他取消这个禁令。看来，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比这些官员地位更高的人。

我们采访团启程以后，才知道邱茉莉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被突然排除出采访团的。因为沿途在国民党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有人问：那个女记者在哪儿？他们已为她安排好住处了。由此可见，不让她去的最后决定必然是突然下达的，所以来不及通知他们。而且这样的决定一定来自非常高的领导。

国民党认为，如果邱茉莉参加，外国记者团的力量对比就左倾得太厉害了。此外，不让女性参加的政治禁令还把两个有影响的中国女记者也排除在外。她们是《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她们两人都主张国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日。是谁不顾大家的抗议，断然否定原先的安排呢？种种迹象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是蒋介石本人。他习惯于过问最具体的细节。

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男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沃陶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情况所感动。

参加采访团的中国记者是国民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但就是在他们中间，国民党也无法“一统天下”。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延安的报道。代表最反共的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的谢爽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开了身份。

尽管国民党竭力想控制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二战”最后一年中的中国局势已事先决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国民党挑选的报人中间，它也找不到一个起作用的支持者。

继重庆之后，我们行程的第二个起点是西安。从西安，我给《纽约时报》发了第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西安——封锁的堡垒

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前往中共地区的途中，在西安已经停留三天。这是我们五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共地区。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对盟国将要在亚洲大陆对日本进行的反攻来说，西安都是很重要的。由于从印度到中国的公路即将开通，西安便显得更加重要。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内部团结。在重庆，有共产党的一位全权代表正等待着是否有可能进行谈判。虽然重大决定都是来自重庆，但这并没有减少西安的重要性。西安是政府自1937年以来为“解决共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堡垒。不管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和解，还是强硬，执行的关键在西安。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堡垒，西安给人的印象和感觉都是如此。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一切都要检查、跟踪、再检查。相比之下，重庆可以说是极端放任自由的了。访问者离开长江沿岸潮湿闷热的天气，来到阳光强烈的陕西高原。开始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很快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仿佛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行动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对外国记者团的欢迎是盛大的。我们像来访的大人物一样，每天都参加宴会。不过，既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参加社交活动，我们还是利用宴会之间的间隙去采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方。

在西安掌握军政大权的胡宗南将军不在这里。在日军完成对平汉线的占领之后，他带领一部分军队开赴前线，以阻止日军向陕西方向前进。这是他们第一次实际参战。他的参谋长罗子凯（译音）少将断然宣称，共产党“并没有打仗”。他向我们保证，他是代表胡宗南讲这番话的。

西安是一个警察城市，这个特点随处可见。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去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据说是公开的和合法的）在西安的办事处时，我们发现，它所在的那条街道空无一人。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处不在，每一个敢于在那条街道上行走的人都可能被怀疑同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我们是乘坐人力车去那里的，后面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尾随着我们。他们伪装得很可笑，原先没有戴帽子，由于我们经常往后瞧，他们戴上了宽檐帽。

尽管控制得很严，实际上仍然有空子可钻。国民党作出了种种努力来孤立和隔绝八路军办事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在这个城市活动的情况竟然了如指掌。例如，“你们昨天去英国传教士大厦，谈了些什么？”，“听说你们向省长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等等。

西安这个反共堡垒看来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我们参加了专为我们安排的反共青年集会以后，那个措辞最激烈的主要发言人来到我们住处的房间，悄悄对我们说：“今天你们听到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是胡说八道。”他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如果被人告密，会遭到严刑拷

打，甚至还会掉脑袋。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名叫陈忠经，他是地下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公开了身份，成为著名人物。在西安，他是胡宗南（他统率的军队封锁着共产党地区）办公室的人。当时二十来岁的熊向晖也是地下党员。他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许多要职，如新中国的驻英代办，后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同基辛格的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导致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美中关系解冻。

在西安，国民党特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反共见证人，他是延安地区八路军的一个逃兵。这显然是真的，但他太老实了，以至对他的展示者没有什么用处。他说，他曾经三次试图逃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次被抓回去，只有第三次成功了。为什么他如此急于逃走呢？作为一个士兵，他希望打仗，但是，却让他劳动。他指的是，延安地区的军队垦荒种地，以满足部队、干部和学生的需要。他被抓回去后，关禁闭没有？挨打没有？他说没有。他抱怨说：“但我受批评了！”他并没有证实国民党关于中国红军如何残酷野蛮的说法。

国民党在宣传上的另一个失败，就是安排我们参观“劳动营”。据说，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这里接受温和的教育，以便改过自新。关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十来岁或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在去延安的途中被抓的。他们的住处刚被粉刷一新。他们的回答显然是经过授意的。如果谁敢于发表不同的说法，那就要遭殃了。但是，有一个年轻人仍然设法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幕后的情况。我们问他，在劳动营通常待几年？他提供了标准的回答：“两年。”但是，当我问他，他自己在这里待了几年时，他小声说：“四年。”

甚至在外国记者中间，包括保守的沃陶，对此也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在这里所产生的怀疑后来在延安得到了证实。下一章将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　※　※

沿着重庆当局安排的路线，我们还要在国民党的地区盘桓几天，才能最后进入延安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继续向我们灌输一些他们的看法。

在陕南的大荔，欢迎我们的代表团据说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照例一致赞扬当地的形势，并谴责共产党。一个穿着贵重的丝绸马褂的“农民”代表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他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用他的手杖演示，他在田地里是如何使用锄头的。

随后，为了说明国民党是怎样挡住日军的，我们被带到黄河边的潼关，对岸就是日本侵略军，双方有时近距离互相打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将领胡宗南。他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对延安实施封锁。他个子不高，显得有点瘦削，神经质，似乎在模仿拿破仑的形象。他只谈到潼关是抗日前线。

在当地他的总部吃饭的时候，他的副官蒋纬国（蒋介石的小儿子）为我们敬酒。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为了维护形象的趣事。老蒋提倡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下令他的军官不准喝酒。因此，当我们的报道送交重庆的新闻检察官审查时，不允许提到老蒋的儿子喝酒一事。重庆的检察官同邱茉莉争来争去，最后建议改动一下措辞，才算通过。改动以后的文字是：“在司令官的指示下，蒋副官敬酒。”这样，国民党就算保全了面子。

我们的下一站是在黄河向北大转弯以后的东岸继续前进到克难坡，接受更多的反共教育，然后进入延安地区。克难坡是阎锡山在山西老家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阎锡山这个狡猾的老军阀，居然想方设法在推翻清朝君主的辛亥革命以后，一直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块地方是一个1000米高的山头，叫作克难坡。在我的一本通讯集中，我把它叫做“阎锡山将军的奇妙山头”。

这位年迈的将军（他喜欢人们尊称他为“老帅”）在牢牢掌握地方政权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本事。几十年来，他确保不让竞争对手的军队进入他的地区。山西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当铺为基础的钱庄业很发达，这里铺设了比全国通用铁轨狭窄的专用铁路，还有一个巨大的兵工厂。在日本侵华以前，他长期巧妙地周旋于觊觎全国政权的军阀之间。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山西的一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一部分地方被八路军收复，他设法对付这两种力量，以便在战后能够生存下来。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同八路军的交火中赢得了一些胜利。他梦想建立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社会行政王朝，不过，要乔装打扮得具有革新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他这方面的观点。

在待了四天以后，我给邱茉莉写了一封信：

> 阎锡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这个山头上居住着一万人——军政官员、纺织工人等以及军队，全都住在山洞里。他们通过以下办法维持生计：下乡从农民那里征集粮食和棉花，越过黄河大桥，去河南省贩运日货谋利，每人每天从事四小时园艺或纺织等生产工作。除了正规的工资外，他们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劳动，赚取“合作券”货币，用以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如布匹、鞋袜等，以及用很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虽然这里有电

灯、卡车（由马帮驮运来的零部件组装而成）和其他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现代化用品，周围的农村却是一片荒凉。克难坡本身实际上像个中世纪贵族的城堡，由老帅统治着他的世袭领地。他和他的扈从依靠到附近农村地区征收税捐维持生活。他希望，等到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去以后，重返他的省会太原。

在这里，没有上帝，只有阎锡山，学校和办公室都挂着他的画像。他提倡的是“新经济制度”和“农兵合作制”（两个耕田的人养活一个士兵）。除了他的指导思想外，任何别的思想都不准进入这里。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博士、工程师、军政官员等都奉他的哲学为圭臬。此外，这里还不准吸烟、喝酒或犯其他一些罪行，如有违反，轻则劝诫，重则命令自杀。

阎锡山说，他找到了“对付共产主义的对策”。条件成熟时，他将广为宣传。这个对策就是：把土地分配给每个人，把他们束缚在一块田地上，如果他们离开，就将把土地收回。这样一来，支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将被消灭”，就不会有到处漂泊的流浪汉去参加“非法军队”了。这个制度可以提供充足的兵源，因为每两个农民必须养活一个士兵，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

“阎老西儿”是有名的著作家，撰写了许多书。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厚厚的一摞。我在写稿时，他的副官又拿来了一本新书，书内有四个小标题：《阎帅的宇宙观》《阎帅的生活哲学》《博爱和正义的政治原理》和《按照兵农联盟的原则组织起来》。

黄河对岸西北大约15英里处有八路军，而东南20英里的地方则有日本人。阎锡山同他们都有贸易来往。阎老帅有时同八路军

发生摩擦而打起来，现在有一处正在发生冲突，不过离这里比较远。他说，如果共产党抓住他的人，他们让他学习一个月，就把他放回来了。但是，如果他抓住一个共产党员，他让他学习一个星期，就把他放了，因为他相信他的理论比共产党的更加强有力。

明天我们就要渡过黄河进入共产党地区了。今天，这里有人警告我们说：不要把文件放在行李袋里，而是要随身带着，因为共产党要进行彻底搜查以后，才会放行。我们问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有一回，他在重庆外交部招待所住，他们就检查了我的东西。在那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共产党。"

山下的黄河只有40码宽。上游的宽度四倍于此，然后慢慢变窄，形成一个漏斗状的河床，当地的居民说有三英里深。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反正水多得不得了。不过，无法利用，不能发电，因为淤泥太多，会弄坏涡轮机的。

（贾宗谊　译）

第十七章　访问延安（一）：新中国的胚胎

我们乘一艘平底木船渡过黄河的奔腾激流。船上可容约50人，有16名船夫都伸腿坐着，几个人划一支桨，运用全身力气，齐声高唱号子，那种雄浑高亢的声音令人终身难忘。（这个号子是中国杰出的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的基调，后来我们在延安听到一二百人高唱这首歌曲，内心感到无比巨大的震撼。）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过了河——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我们前些天在陕南国民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旗帜和横幅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欢呼，好像我们这些来访者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混合体。来迎接我们的只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一个年轻，另一个有了胡子。他们同我们握手，说是乡政府派他们来的，然后引导我们爬上山头，进入一个村子。村里是在黄土高原上常见的一口口窑洞，我们住进了其中一个窑洞，窑洞里有一个很长的炕和一个炉灶。窑洞前是一个院子，养着一头奶牛、一头驴子和一群鸡。

第二天一早，一位军人骑马到来，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和一双草鞋，大脚趾上缠着绷带。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陕甘宁边区南部警卫部队司令员王震，已为我们备好马匹。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

一小时之后，为我们准备的马匹来到，以便我们西行。同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的战士——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笑嘻嘻的一群小伙子，有的着装比王震将军还好。他们中不少人背着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或佩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这些武器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军队高级司令部里是作为战利品陈列的。

王震带着这支队伍是从很远的地方急行军赶来迎接我们的，因为原定我们进入边区的地点并不在这里（记者团中的国民党分子后来吹牛说，他们是故意改变渡河地点的，以使共产党毫无准备，不得不带我们经过一些会泄露“红色秘密”的地方。他们后来造谣说，他们一路上看到种植的罂粟，用以制造鸦片）。王震这支队伍曾转战河北、山西等地，后来才调回边区担任警卫。他们说，他们的三八式步枪和指挥刀当然是在作战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然后用来对付敌人。你可以想象：这些小伙子虽然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过使脸黑了一点、汗多了一点，却始终带着微笑、始终珍爱自己的武器、始终让子弹带上缠着红布条（这是老红军的传统）、始终保持着那种带有警惕性的高度好奇心——在最初的一小时之内，他们向我们记者团问了许许多多关于外部世界的问题。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震的经历。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后来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他所率领的“三五九旅”不但早在十年内战的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并且在边区以开垦南泥湾而著名。南泥湾位于延安之南，原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原，他们把它开垦出来，种植谷物、蔬菜和棉花，以供部队衣食之需。后来我们曾去那里参观，听说部队开拔后这片新垦区就交给了当地农民。因为部队可以自给自足，所以这里的农民本来并不需要交纳公粮来供应军需。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记者团的行程。我们一行骑上马，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每一座原来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或棉花。这一带在国民党实施封锁以前，原来是不种棉花的，所以有两年边区人民几乎弄得衣不蔽体，去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边区的棉花半数可以自给。农民现在都愿意种棉，因为边区政府规定头两年所收获的棉花可以免税，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告诉人民种棉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和坚持抗战的需要。农村供销合作社（边区总人口150万，其中25万为社员）负责以合理价格收购全部棉花，如果供销合作社有余棉则由边区政府收购。

（我们后来看到，“大生产运动”除在陕甘宁边区外，还推广到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样减轻了当地物资缺乏的困难，并成为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田间耕作是以“变工组”的形式来进行的。耕地属于个人，但农民们组成了许多“变工组”，在各户的土地上共同耕作，还共同开垦荒地，垦荒所得收获平均分配。这样，土地虽仍私有，但劳动已集体化了，并且随着荒地的开垦，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也逐渐成为集体的财产。“变工组”不但加快了播种和收获的工作，并且节省了往田间送饭的劳力，过去单干时每家每户都要有妇女往田间送饭，而今只要有一个人给全组的人送饭就行了。妇女也都按合作社的办法组成纺纱组。这一切节约劳力的举措可以在必要时腾出一部分人力和畜力来从事运输及其他工作。

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

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我们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每天都学到不少东西。

进入边区不久，发生了两件事情，很实在地显示出国民党仍旧在我们身边，其代表人物是谢保樵（我们这个中外记者团名义上的头头）和他的几个亲信。但在边区，他们虽然想按他们的意志行事，却未能如愿。谢一见到王震就对他说，记者团所有成员都由他管理，不允许单独行动。谢还说，这次来访的外国记者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想写一些有害中国统一的轰动性报道，以增长他们在银行中的美元存款。谢还向王震透露这样一个“秘密”——记者团的外国记者中有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贪财是臭名昭著的，而且他们无祖国，所以别指望他们会理解民族斗争。谢的劝告是：共产党在所有事情上都应该依靠他，让他来引导他们走出迷津。

但是，同谢所预期的相反，当天晚上王震就把谢的这个拙劣的阴谋告诉了我们。他气愤地说，如果由着他的性子来，他会当场就把这个姓谢的一枪撂倒。他直截了当地对谢说，他打国内的法西斯、打日本法西斯，已经打了15年，他决不会听信像谢这样的人所宣扬的法西斯思想。

第二件事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忽然大声嚷嚷，说他在经过的路上看到了种在地里的罂粟。王震听到后立刻提

出：这个记者可以由陈家康（周恩来的秘书，他精通英文，这时正陪同记者团）陪同，立刻骑马回到他看见罂粟的地方去，采集一些标本回来。他需要花多长时间都可以，记者团仍继续前行，他可随后赶来。这个记者知道后果不妙，表示拒绝，但从此也就不再提种鸦片的话了。

两次挑衅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谢还制造了一些麻烦，但到底也没搞出什么名堂。

※　※　※

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县城名叫“古林”（译音），一位农民出身的县长来迎接我们。他几年前还是文盲，现在也只能写简单的报告，但他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详细，谈到农民们开垦了多少荒地、生活改善了多少，脸上就露出笑容。

他还很得意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劳动英雄”，他不但带头开荒，还帮助安置从邻近的河南省逃荒来的难民（边区需要劳动力，所以凡从外地来的移民都分给土地，以长期贷款的方式供应他们种子和农具，头三年免交公粮；当地农民帮助移民安置有功者受到政府的表扬）。这位年已六十而身体健壮的“劳动英雄”对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得到了改善，还有他去年到延安参加“英模大会”的情形。在这个会上，他学到了关于安排活茬和组织劳力的一些新方法，看了一场电影，同毛泽东握了手，领到了奖品——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他过去没有地，但后来分到了地（边区的某些地方在1935年前红军曾实行分田，但以后就停止实行这一政策）。他虽然到现在仍几乎一个大字不识，但并非不明世事。他问了我们许多问题，关于法西斯

主义和欧洲、关于苏联境内的战争、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等等，他还询问国民党为何不通情理不让棉花、药品等进入边区。

那位农民出身的县长向这位农民劳动英雄逗趣说，你现在的地位高升了（劳动英雄有权出席县政府的会议，代表自己或村民提出建议，所以事实上成了县政府的成员）。老英雄也半开玩笑地回敬说，你这位县长干得也不赖，在上次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带头给地里送了不少肥。他在这里已经住了那么长时间，对过去祖祖辈辈的事也都了解，谁听说过县长会干这样的活?

我们一路上看到农民们用的新农具感到惊讶——锄头和深耕用的犁铧都是用优质的铁做的，有的用钢。边区有几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些农具，兵工厂也把生产农具作为副业。为了破坏日军的交通，八路军在华北拆毁铁道，把钢轨千里迢迢地运到边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惜把这样来之不易的钢材用于制造农具。在边区，农民的生产工具和部队的武器一样都来自对敌人的武装斗争。

※　※　※

下一站我们到了延长，看到了油井和炼油厂。有三口井还在出油，另外正在挖掘一口新井，因为挖掘的深度不够，产量不高——工人们运气不好，把一套钻井设备丢失在一口废井里了。

我同工人们在井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聊天，这座俱乐部是这一带最好的建筑物，屋顶装饰着一颗红星。工会主席是从新加坡回国的老海员，管理着矿上所有的柴油机。他在这里已工作多年。油矿原来归美国人所有的美孚石油公司，后来到了国民党手中，最后则为红军（八路军）所有。他说：“红军游击队到来之前，矿上有从南京来的工

程师、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知道我想学会使用柴油机，生怕我学会了把他们挤掉，所以他们拆卸时把我轰了出去。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工人之间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本事被别人学了去，自己就会失业，你要是有本事，又肯干，你当全矿的经理都可以。”

他还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用现金发放，但工资的数额是按小米多少斤来计算的。例如，工资如果是1担（100斤）小米，那么这个月就发给你‘边币’（边区的货币）2万元。如果下个月小米的市价涨了，你的工资就会多一些。这里说的市价是指自由市场的价格（这里的市场不受政府控制），所以工人的实际收入不会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受影响。”

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了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很巧妙的临时应急的措施。例如：他们需要有一根两英寸的管子，用于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十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12英寸的管子里，两者的空隙正好是两英寸。炼油厂的经理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工程师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我们记者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在这里遇到他的学生，感到十分惊喜。

这个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供应这一地区约二十多辆卡车使用）和优质的蜡烛（同战前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产品不相上下）。汽油和蜡烛，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冒很大的风险（包括行贿的费用等等）。

※　※　※

早些时候，我在重庆曾听说过关于这个小油田的一些事情，讲中共怎样按照统一战线的方针用它的设备帮助国民党，但这些事情因为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未能传播到国外。在延安，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源）时，西北唯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当然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就移交了。

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做宣传吗？"

"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产的数字吗？"

“是的，”董说，“当然有一些数字。”

“那么，”翁说，“你最好把这消息扣了。我们不能公开这些数字。”这样，他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　※　※

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像这种连怎么做肥皂都帮不了我们忙的人，算什么知识渊博的国际记者呢！在参观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深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说是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边区目前虽然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

> 这个边区不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

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使我们产生了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沈苏儒　译）

第十八章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

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他所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英译文）：

>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
>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这件大事预示着德国希特勒的灭亡，以及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很欢迎。希特勒和日本垮台之后，世界将成乐土。在中国，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

效。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应该团结得更紧，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新闻界应该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并说明我们的态度。

首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创建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针，现在也仍然坚持。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的缺点，并且是很大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缺少民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实现了团结和民主，未来就有保障。中国需要保持全民族的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我以上所述概括了我们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观点。

接着，毛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关于正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他说：“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开创了世界新局面？对这一新局面，共产党是否将发表一项声明？”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真正的转折是随着1942年11月苏联斯大林格勒反攻胜利而出现的。第二战场

的开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机遇，但不是真正的转折点。我们的报纸已经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解放日报》在此之前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确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如同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一样。这两件大事都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大合作的体现。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反攻前，反法西斯的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法西斯势力呈上升趋势。之后，形势迅速转变，盟军在北非、接着在太平洋上停止了后退，转为反攻。）

毛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红军开始反攻标志着全世界形势的转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向法西斯反攻的一大新步骤，没有这一步骤，我们不能摧毁轴心国。因此我们可以讲，此举打开了一个大反攻的局面，对欧洲、太平洋以及中国的形势，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对于欧洲第二战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看法，也没有采取苏联的看法，认为第二战场本身决定全世界的命运。他当时就把重点放在未来，放在各个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动性上。

用同样的思路，上引那篇社论（可能就是毛本人写的，至少是他审定的）推断，第二战场将加速欧洲战场的胜利，以后盟国的武器和人力将可能转到远东来。这样，第二战场将为中国创造一种较好的形势，但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利用这一形势。如果中国只靠外在的因素，那么它本身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

有一位中国记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毛回答说：

“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中国的军队也需要民主，如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级指挥部门之间、各个部队之间。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部队就可团结得如同英国、美国及其他民主的军队一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思想方面、出版和艺术创作方面。只有当文化和人民结合起来，它才能被广大群众所热情接受。

“在各个党派内部，在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上也必须要有民主。国际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内部的团结和国际间的团结，打赢这场战争并建立牢固的国际关系。

“只有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团结才可称之为民主团结，或日民主集中制。这一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我们的同胞和全世界朋友们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的。

“战后的国际联盟(1)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

“总之，在一切方面我们都赞成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后来我同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作报道，我也没有作记录。我向他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那时宋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我是“保盟”的干部，所以我就“保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他的意见。他给了我一张所需物资的清单让我带回去。

毛主席在交谈中询问了国外的一些情况。他听说我为多家传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讯社是专向美国工会报纸发稿的，就问我美国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哪一家的会员人数更多一些？那时这两个组织还是对立的，后来才合并。我比较倾向于发展很快的“产联”，因此就说“产联”多一些。他说不，还是“劳联”人数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说明，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他还问到为什么美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白劳德要解散美共，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团体”，以便在美国两党制的架构中活动。我引用了报纸上发表过的白劳德自己的解释。毛问道：“那么，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呢？！”虽然他没有说下去，但显然是不赞成。这是在法共等外国共产党批评白劳德的行动丧失原则的几个月之前。

※　※　※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展示和分析问题的。

有一个方面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就是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形象地去说服别人。他一生的经历从当教员开始不是没有好处的。

举一个例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开进了许多中等城市。在以前的20年里，这些部队从来没有进过城，所以当1946年内战开始时要他们撤出这些城市，他们很难接受。但当

时的形势又非撤出不可。毛泽东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使他们很快信服了。他是这样说的：

> 你设想一下，你在等车到别处去。一个强盗来抢你的行李包裹。你是不是该拖住每件行李不放呢？最好别这样做。让他把能拿的都拿去，甚至于你还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背上，两只手也都拿着东西。等他摇摇晃晃想走，一拳打在他脑袋上，他和所有的东西就都让你拿下了。

这段话在实质上就是用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取胜的战术。国民党军队要分兵把守新占领的城镇，兵力分散便难以运动。解放军灵活机动，没有包袱，可以到处破坏交通并在必要时集中兵力作战。最后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收复了失去的城镇，国民党守军则被俘或被歼。

毛用“抓跳蚤”打比方，说明在作战中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重要。他说，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

至于军需供应，一支有效率的、机动的军队可以一点一点地从敌人那里得到。中国人民的军火库在美国和英国，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替我们把军火运来。这是毛在过去红军时期说过的俏皮话。

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公式概括地说明了在农村人口占90%的旧中国所必须采取的方略。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就预见到将有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有着优势装备的敌军前进，中国军队撤退或转向两翼。第二个阶段，

双方主力相持不下，中国的游击队渗入敌后。第三个阶段，中国军队能转而进行反攻。

在政治上，同军事相配合，使敌人和投降派在国内和国际上越来越陷于孤立，不断地动员群众抗击侵略者，最后，在盟国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使中国的兵力增强到能反攻取胜的水平。

这些理念使战士们心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其力量抵得过许多师团——在撤退时防止产生悲观情绪，在相持时不会使思想停滞——并且指明了胜利的道路。

※　※　※

7月中旬我在延安访问了中共领导的部队的总司令朱德。下面是我当时的记录：

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宽宽的脸庞，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长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下面是我问朱德将军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一、你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及其发展有何看法?

中国和日本的战事已持续了七年，我们仍然致力于挫败正在进攻的敌人。虽然目前是反攻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谈到敌人和我方的形势，我们发现日方在政治上正陷于孤立并处于一种日益增加的、不利于他们的全局形势之中，而它还在极力巩固其占领的大片领土，期盼着某种新的国际形势的转变。这种巩固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日本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切断中国同盟国的军事联系，并把威胁日本的盟国空军基地往后推。经济方面，它打算利用我方的资源支持它在中国的战争。在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好的地区，它取得了成功。相反，在我们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的地方，它遭到了失败，我们经常破坏它的交通和生产，对其贸易实行封锁，切断它的人力、物力供应。总体来看，日本人取得了一些胜利，譬如在长江流域，他们可以为其部队取得给养。他们也可以从山西阳泉的大兵工厂得到一部分武器供应，这个兵工厂原来在太原，后来他们把厂址搬到了距离钢铁和煤炭资源较近的阳泉。

敌人在打通北平至广州的铁路线，企图进一步渗透，因而他们就会离开大平原而转向山区进攻，那样，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不得不分散，交通也会困难起来。假如我们能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这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粉碎这种渗透。

说到中国，它的国际环境比之日本强百倍，但由于当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在试图打击日本的同时，也打击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中国人民不能适当地动员起来，国家的潜在力量也就无从发挥。经济方面，我们人民的生产和金融资源也不能充

分用于建立一种战时经济，而只能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在交通方面，中国还没有抓住时机，利用我们伟大的人力资源对落后的技术予以补救。结果，我们不仅不能前进，在正规战场上，部队还继续遭到失败，这主要归咎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但是我们在敌后有另一条战线。在这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十分充分地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人民动员起来了，部队组织起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敌后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一支抗日的新军。正是因为敌人经常被迫分散兵力以对付我们，正规前线多年来才得以稳固。譬如洛阳，如果没有八路军在黄河北岸，就不会这么长时间仍留在中国人手里。因为在正规的前线没有采取相同的政策，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在敌后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就他们的战绩和国家整体利益而言，他们是应该得到这样的支持的），因此，中国直到现在都没能阻止日本向前推进。

关于改善形势的可能性，可以讲，目前唯一可行的战略仍是利用机动和游击战术继续对敌人进行全面的消耗战。

今天敌人的薄弱环节就是在占领了大片领土之后，力量过于分散，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机动地、逐个地打击其较小而孤立的据点，因此大大地将其削弱。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是中国唯一合适的战略。

我们希望中国的形势在未来能有所改善。只有当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有所改变时，正规前线的形势才有可能改观。只有取消了半封建、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建立起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把人民武装起来，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战。在军队内部，应停止灌

输反共思想，使所有部队都树立起一个目标，即共同打败敌人。部队里的特务制度也须取消。具备了以上条件，加上把盟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分发给正规战线上的部队以及敌后战线上的我们的部队，我们就能巩固我们的地位，并且使两条战线上的部队能够同时发动反攻。

二、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同盟国战略？同盟国对中国帮助的最佳形式是什么？

同盟国的战略有两个方面：从海上到陆地和大陆进军打击日军。这符合尼米兹计划[(2)]，其理由是，大陆战争必须依靠由同盟国提供援助的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发展了的人民的力量。取得这一成果所需步骤之一是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给以快速和相当数量的援助，使其在盟军最后反攻中得以配合作战。没有这些基础，在中国打败日本几无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负责正规战线的当局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也是绝对需要的。

三、你是否承认在缅甸的中央政府军得到同美军一样的给养装备时，打仗也极为出色？

当然。但是这些部队之所以能吃得好、穿得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不能给他们吃好穿好的那个军事和经济架构。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使他们保存力量同时打击日本、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愿望的那种政治架构，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敌人日本。假如他们再次回到旧架构下，我以为他们的战斗力就会降低。不可忽视一些表面事实的内在含义。

四、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同盟军合作？

就目前来讲，合作只能是非直接的。当日军在东南亚和盟军作战时，我们可在华中和华北加强对他们袭扰。再就是在我们根据地建飞机场，更好地营救盟军飞行员，提供有关敌人的情报，在我军控制下的河北、山东、江苏、广东沿海地区供应盟军潜艇的军需给养。然后可以从非直接合作发展为直接配合。假如盟军在中国沿海我们控制的地区登陆或从大陆南部向北进攻成为事实时，我们就可以直接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

五、八路军和新四军需要盟军给予何种支援?

武器弹药、无线电设备、医药及技术人员。我们欢迎盟军的技术顾问。空军合作，目前可限于运送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从另外的交谈中，我得悉，最急切需要的武器中有轻型的、可携带的小炮，用来摧毁铁路沿线敌人的碉堡，为此，火箭筒很可能用得上）。战术上的合作可以在将来进行。(3)

周恩来的作风始终是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他对我们记者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作了一次关于国共关系的回顾，从抗日战争前夕直到目前，他都亲身参与过。我们采访他的日期是1944年10月13日——我们刚从敌后游击区（请参阅下一章《在敌后》）回到延安不久，即将返回重庆。在这次采访后不到一星期，突然发生了史迪威将军（时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被免职的不明智之举，这是蒋对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罗斯福不幸同意了。他的这一同意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国共两党战后合作的可能性就为重新爆发内战所取代。他的这一同意对美国未来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支持中国实现战后和平的趋势发生了逆转，转而支持和供应蒋介石打内战；在总的国策方面，这

是美国同未来的新中国断绝关系长达22年的前奏，美国为了围堵和扼杀新中国，在外部不惜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内部，从“谁丢掉了中国”的歇斯底里狂叫发展到麦卡锡主义的瘟疫。他的这一同意甚至对全世界的命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的源头之一。(4)

周恩来从中日战争发生前夕1936年的“西安事变”谈起。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继续进行已历十年的反共内战感到不满，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他转向国内和平、团结抗日。当时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代表，从中调停斡旋。蒋勉强同意后获得释放，恢复了作为国家和军队首脑的地位。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奋起抗战，由于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保证合作。

1940年，国民党违反合作抗日的行动变本加厉，共产党政治家林祖涵（伯渠）携带了关于加强相互团结的二十点建议，从延安到达重庆。但国民党谈判代表不愿意把这一建议呈送给蒋介石，因此改为十二点书面建议，其余部分用口头表述。

1944年8月，周恩来发表了回顾“谈判过程”的谈话。

国共谈判的恢复是在新形势下促成的。1944年4月以后，中国中部的国民党战线沉寂已久，此时因日军重新发动进攻而迅速瓦解。但在北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却收复了越来越多曾被敌人占领的农村地区，从而显示出它的能力。只有在缅甸边境，在史迪威将军主持下在印度重新训练和补给的国民党部队表现得比较出色。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加上国内和国际的压力，重庆的政局就有些松动的样子。表现之一是国民党勉强准许我们这个记者团去访问延安，稍后又有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因史迪威的力主和华盛顿急于战胜日本的

要求而被派往延安。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国民参政会”中关于国内局势的讨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新展开。“国民参政会”是在国民党政府战时首都成立的机构，参政员中有少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若干中间派政治团体的人物。

但是，由于国民党设置了无数陷阱，讨论受到很多阻碍，最后事实上趋于停顿。

周恩来在会见我们记者时对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7月26日的声明逐条加以驳斥。梁的声明故意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国共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两党关系已有改善。

周恩来说，现在正在谈判以往没有讨论的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对的，但是他的意见和梁所说的“种种问题大体上都解决了”的那种意见截然相反：“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没有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关于重建我们在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无线电联系、自由使用邮递、释放被捕人员、停止对共产党造谣污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关于取消封锁和停止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些重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连说这件事简直都是多余的了。”

梁说“政府与共产党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这种讲法被周指责为“蓄意迷惑此地和国外的人民。事实上，两党在原则上表现出巨大的分歧”。周说，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一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加强抗战，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公正、正确解决国共和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看法，也是99%的中国人民的看法。“然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当局的看法则不同。从开始到最后，他们一直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再加上限制、削弱和消灭别人的政策（狂妄自大地而且蛊惑人心地坚持别人必须服从和支持

团结，而不允许问一问所说的那种团结是否有利于抗战），这就是两党至今仍然谈不拢的真正原因。”梁说共产党保证要合作而行动却相反，周反驳了梁的这种说法，宣布共产党一直遵守1937年的诺言，而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民主动员的政策和真正实现三民主义，而这正是共产党作出保证的必要条件。

他接着详细地叙述了两党谈判的真实情况，这一谈判无论在军事、政治或财政方面，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达成协议。

最后，周恩来评论说，尽管梁说两党分歧正在解决过程之中，并且一再重申，中国确实应当避免内战，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不同，事实表明，上月对边区发生过多次袭击，即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军和国民党军达成一致协议，进攻陕西的八路军，李品仙领导的军队攻击湖北的新四军部队，而这支部队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当时还在进攻日军以牵制日军在正规前线的作战。罗茂宣（译音）率领的国民党军攻击了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的游击队。“这些事件表明，军事冲突仍在继续，内战危险尚未过去。”

他指出：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两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为此，需要统治当局和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策和那种削弱和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必须立即将民主付诸实施，两党关系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而这是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5)

我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开始发送第一批新华社新闻电讯。他不但关心报道的内容，当我问他所需的无线

电器材如何取得时，他告诉我是他装在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医药都不准供应，所以他总是利用经常来往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我长期为它工作）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去。

※　※　※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1938年在临时首都武汉。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当时是为美国合众社工作），经常到他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去访问，有时直接去拜访他。尽管我当时年轻、不成熟——我还没有满23岁——但他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力、清晰、非常严肃而态度却又非常活泼——没有书生气、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派助手来告诉我各种事件和动向，使我对形势不断有新的了解。有一次，他介绍我去采访叶挺将军（即将出任正在组建的新四军军长）。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后来在国外被广泛采用，成为研究新四军军史的一个重要资料。

后来在重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所获得的最可靠的消息都来自周恩来的办公室，有的是直接取得的，有的是通过龚澎或他的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同外国记者保持着经常接触。

关于周恩来在重庆时的情况，我有一些个人的记忆，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国记者交谈时，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他的回应是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二是他作为领导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来到了会场，就会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马上就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的交谈的主角。

三是他的统一战线意识，即使是在最边缘的场合也不忽视。有一次，我们外国记者同董显光（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又为新闻检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在一个公开的招待会上，他趁同我握手的机会，低声对我说，不要对董过分为难。他这样说是为了对董和他的更反动的上级区别对待，还是只想提醒我不要表现得过左，我不知道——不论是为什么，他的话含义是很深刻的。

此外，看到周恩来同中共代表团中其他同志相处时那“亲如一家”的气氛，也是很有教育意义和令人难忘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厨师、警卫、通讯员等），他都平等相待。像他这样从不吝惜自己的人，不管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婴幼保育到文娱晚会。我和另外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文娱晚会，他担任指挥，还同大家合唱一些延安的歌曲——他有很好的乐感，还是个不错的男高音。

但是，在工作中，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严格要求的，直到每一个具体细节。

他的整个人格就是一首诗。一个有修养、有原则、有责任心、有内在力量的人。后来，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敬爱的总理”。其实，早在他成为总理之前，他就为人们所敬爱了。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指未来的联合国组织。

(2) ［译者注］尼米兹指彻斯特·威廉姆·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计划”指“珍珠港事件”后，他担任太平洋舰队指挥兼太平洋地区司令官期间，在太平洋诸岛对日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系列计划。

(3) ［译者注］本节译文曾参考作者所著《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的中文版，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4) 请参阅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所著《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1971）。

(5) ［译者注］本段译文曾参考前引《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

第十九章　访问延安（三）：在敌后

在访问延安和其他中共领导地区期间，最对我有启发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敌后的一次旅程。下面是我在1944年10月9日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的关于这次旅程的一篇通讯：

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访问，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的成功袭击，有一次距攻击目标——日军据点为三英里，另一次只有500码。还有两次在摧毁敌人碉堡的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近处。我们自己有两次被敌军追踪，一次相距一英里；另一次十英里。有两个晚上，我们宿营的村子都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但这些村子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敌人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的掩体，所以除非有外面来的强大增援部队把道路扫清，否则碉堡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我们看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竖立在距敌人仅一小时步行行程的地方，还有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这样的大幅标语，敌人从碉堡的瞭望孔里往外张望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

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一位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和美国陆军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全程陪同我们，他们也目睹了这一切。

要在报纸上有限的篇幅里把我们在敌后那些日日夜夜的丰富经历都报道出来，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述。

我们在9月8日穿越日军控制的离石至岚县汽车道。这条路沿线每隔三英里就有一座日军碉堡。奉命护送我们过路的八路军四个连决定，派敢死队去割断马坊镇碉堡外封锁沟上吊桥的拉索，使吊桥落下，然后向碉堡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碉堡里穿着日军制服的50名残存伪军缴械投降。俘虏中有一个上尉，他也指挥附近另一个碉堡开府（译音）的守备队。八路军就把他带上，让他告诉那边的伪军，马坊已经丢了，他们是守不住的，还是悄悄地出来为好——那些伪军照他的话办了。

我们前进路上的两座碉堡在24小时内先后被拔除，所以我们可以在大白天越过封锁线，并且到一个碉堡里去观察和照相。这座碉堡的建筑十分坚固，外面围绕着带刺铁丝网和一条30英尺宽、40英尺深的封锁沟，沟上设有吊桥，沟外又有一道带刺铁丝网、三道壕沟以及地下掩蔽部。

马坊镇上有很多共产党干部在秘密活动，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带着手枪，迅速地把这里的居民——他们已有三年多不属抗日政权管辖——组织起来。因这里的居民害怕日军报复，不敢把碉堡拆毁，甚至不敢拆几根椽子去当柴烧，所以农会动员其他村

子的农民来做这件工作。当我们又骑马上路时，看见至少有1000名老老少少的农民迎面走来，他们扛着铁镐锄头，兴奋地又说又笑，仿佛去赶庙会。

当我们在17天之后（其间日军曾来过一次）重新经过马坊时，碉堡、围墙、带刺铁丝网、封锁沟、壕沟和地下掩蔽部都已完全消失，在镇子后面的小山上（碉堡原来在这里）只剩下一片黄土。这便利了八路军一个旅的活动。这个旅负责这一带的警卫，它是由在冀中平原战斗过多年的一部分老战士、山西“新军”的一些部队以及几支游击队编成的，总数有几千人，在日军占领的太原、汾阳等大城市郊区作战。

第二天我们到达晋绥边区一个军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距四周日军据点不超过30英里。民兵同游击队不同，他们不脱离生产，农闲时练兵，有敌情时就在本地作战，他们的土地由变工队代耕代收。这个军分区的民兵有一万两千人（我们看到从四个村子就集合起600名民兵），正规军和游击队约8000人，共计有武装人员两万人，全分区人口是400万，这个比例同我们以前曾经过的两个军分区差不多。所有武装人员中2/3的武器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产党曾宣称在他们领导下的正规军有47万人、民兵250万人，从我们所得到的军分区的材料来看，这些数字是确实的。敌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有：日军5500人、伪军3820人，此外在太原还有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分布在110个据点里（这些据点类似于我们视察过的马坊）。我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月内，单是在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的据点二十余处。

在军分区司令部，我们看到了六个日本战俘。他们是在8月28日八路军的一次出色的突然袭击中被俘的。当时他们正在碉堡墙外无所顾忌地享受田园风光的户外早餐，枪也不带，一下子就被突然出现的八路军猛扑上去抓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兵除一个外都是当年6月才入伍的，有的是应征的小青年，有的年龄稍大是过去因身体条件不合格而没有被接受的。这些日俘以及自动投奔八路军的十个朝鲜人都告诉我们，日军士兵都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尽管日本军官对他们灌输相反的宣传。他们还看到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宣传品，不但在前线，在北平这样警卫森严的大地方也有。

在司令部，我们又看到了一百多名伪军俘虏，是在过去两周内被俘获的；还有一支四十多人的伪军小分队，是自动投奔过来的。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武器，经过训练后将编入他们原来在日军指挥下驻扎地区的游击队。同时，随着日本驻军人数的减少，敌人正把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据点交给伪军防守，而伪军又在迅速瓦解——八路军对伪军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亲眼看到，当马坊被俘伪军说他们不敢投降是怕日军对他们住在镇上的家属实行报复时，八路军马上动员村民赶上驴车，装载他们的妻子儿女连同家用什物，随着这批俘虏，运送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

离开军分区司令部，我们快速地走过几个村子，这里有医疗单位，还有供医生和伤病员居住的山洞，另一个村子里有军工厂，每月能生产一万枚手榴弹和地雷。最后我们到达一处山脚下。这条山脉俯视三英里外的汾阳市——日军在山西所占领的战略要地之一。我们目睹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三个晚上攻击

这个城市的郊区，烧毁了火车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一英里半处的一座碉堡，击毙十名日伪军，俘获两名日军和几名伪军以及在这里藏身的伪镇公所全体人员，缴获两挺机枪、70支步枪以及许多日本樱花牌香烟、饼干、糕点、罐头等。在这次进攻中，我方以急行军从几个方向调集了一支优势兵力，包围了这座城市。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守备的敌军出城应战，但虽经三天三夜的不断攻击，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记者团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先后到几个村子里去进行观察，几乎每过几小时就换一个村子，但都能清楚地看到汾阳城。在每个村子里，我们都发现八路军建立的政府在开展工作，人民在欢庆胜利，当地干部向我们保证说，所有敌谍老早就被村民清除掉了，现在敌人特务只敢跟着日军的突击队行动。这样，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这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已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我们有一次在距日本炮楼仅一英里的地方宿营）。即使在有日军炮楼的村子里也往往存在着双重政权——一个是公开的伪政权，另一个是爱国政权，老百姓都知道，只是瞒着日本人。（伪政权的村长常常是村民要求他担任的，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八路军办事。）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利用缴获的日本军的信封信纸，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昭和天皇，写明由汾阳日军司令官转呈，用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日军在这一地区所处的困境。当地游击队答应把这封信投入镇上敌军邮箱。

经过这三天的远征后，我们和集中起来的八路军部队都迅速分散。当骑兵侦察兵和秘密的电话联络站（有的使用缴获的电线，有的甚至使用带刺铁丝网上的铁丝做电话线，隐藏在灌木丛中或埋入地下）发出消息说，敌人大部队出动时，我们就避开他

们，不是在敌人面前逃走，而是转向其他已被我军包围的敌人据点。

三天以后，我们在汾阳以北几英里、位于汾河上的娄烦镇活动。这里有两个日军据点被我方包围，经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在夜间用扬声器喊话，据点里的300名日军和约百名伪军开始动摇，但不愿投诚。八路军决定挖地道通到这些据点的炮楼下面，进行爆炸。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6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都趴在地上。敌人的夜间射击盲目性很大，我方几无伤亡，但因此使我方挖地道的工作未能在天明之前完成。我们在离去时没能看到作战的最后结果，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其后不久传来消息，敌人的娄烦据点已被摧毁，守敌除个别被俘外全部被歼。

在所有这些攻击中（歼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很多），我方牺牲12人，伤约30人，其中有群众团体成员，他们是往火线上送担架、云梯和弹药的。双方伤员都被人冒着炮火抢救下来，并在作战结束后同部队一起迅速撤退，逐村轮流由担架队护送到后方去。日俘受到人道待遇，并有一位美国医生给他们打止痛针，这使他们感到很惊异。看到他们这样的表情实在很有趣。

八路军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

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

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一再向我们显示，他们对每个据点里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这些都是为敌人服役的仆人、挑水夫和小贩们所提供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进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

在另一方面，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我们外国记者团是多年来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的外国人，但我们能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战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八路军目前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体会到。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

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必须要等待北京、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高级司令部从他处调集兵力，这样一来不但会削弱其他也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的防守兵力或减少总后备队，并且需要调用大量铁路车辆、卡车和汽油，因此报复就必须是一个由更高层次作出的战略决策。

由于目前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煎锅旁边、在旧橱柜里所设的手榴弹和地雷引线），小股日军根本不敢离开据点。这是目前阶段华北和华中人民战争的战术。八路军告诉我们，他们也在为下一阶段——大反攻——作准备，那时有更多的日军将被盟军所牵制，八路军有了更多的供应（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就可以从北面和西面出动，迎接来自东面和南面的盟军。(1)

---

(1) ［译者注］本章译文据前引之《突破封锁访延安》。

第二十章　途经印度

从中国去欧美的旅行当时是个难题。由于战时没有国际商业航班，唯一的办法是搭乘飞越喜马拉雅山、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美国空军飞机。它们把物资运到中国后空机返回印度，因此不存在机位短缺或优先照顾之类的问题。但要得到机位，你必须取得军方的许可证书。这对于穿军装的正规的现役战地记者来说相当容易，但对我们这样仅限于在重庆活动的地方记者来说，是很困难的。

最后，在我曾兼职过的美国战时新闻局的帮助下，我们登上了去昆明的飞机。美国第14空军大队的司令部就设在昆明，我们得跟他们商谈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下一步行动。在昆明机场，我们遇见了约瑟夫·艾尔索普，他当时是陈纳德将军的副官，空军上尉。在政治上他对我们并不感兴趣，特别是在最近的指挥权争执中，我们站在了史迪威将军一边，而他却站在非常亲国民党的陈纳德一边。但不管怎么说，在香港时我们都曾是赤柱拘留营里的难友，艾尔索普乐意在我们面前露一露他的能耐；另外，他毕竟是受过良好教养的，懂得对邱茉莉这样的女士应该讲究礼貌。因此，凭着他的一纸字迹潦草的条子和几句话，把我们送上了返回加尔各答的飞机。

这架飞机是双引擎C-46，机体庞大，是专门为尽量多载货物而设计制造的，因为它臃肿、笨重，人们给它起了个不吉利的绰号，叫“飞棺材”。机身中央部位专门用来装载货物，乘客只能坐在机舱两旁的凹背单人坐椅上。邱茉莉和我是机上仅有的两名旅客。由于我们坐在光秃秃的金属椅子上，飞机进入高空后，寒气自下而上逼来，冻得我们浑身发抖。我们透过机窗看见一个引擎正在漏油，这更使我们捏了一把汗。尽管如此，那天夜间我们终于熬到了密支那——不久前刚从日

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的缅甸北部城市。飞机在黎明前再次起飞，第二天早晨飞越广袤荒凉的恒河和布拉马普德拉河三角洲。

关于这些C-46货机的传闻很多：如何难以躲避日本战斗机的袭击，即使没有遇到敌机拦截也可能触山而机毁人亡，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如何将走私物品偷偷运进和运出中国，所得的利润由走私商和机组人员双方分成。为此，机上的普通球形门把手，甚至连马桶的座板都被换成黄金做的，然后将它们漆成草黄色伪装起来，如此等等。

我们到了加尔各答，想先在专门为战地记者提供的一家旅馆落脚。幸运得很，我们找到了伦敦《新闻纪事报》的斯图尔特·格尔德，他为我们安排了当晚的住宿。不久我们又跟我的《联合劳动新闻》同事尼赫尔·贾拉瓦蒂和他漂亮的夫人雷努接上了关系。尼赫尔毕业于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印度独立后，他成为印共在印度国会里的代表之一。尼赫尔那时常给印共机关报《人民战争》撰稿，后来自己创办了《主流》周刊，该杂志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纽约的《民族》杂志。雷努一直留在党内，直到1994年去世。《主流》是一份消息灵通、富有创见、风格尖锐泼辣的报纸，现在由他们的儿子苏米特担任主编。

印度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国大党以战后印度独立为条件，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被英国宣布为非法，甘地、尼赫鲁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均被投入监狱。而共产党在遭禁几十年之后，却获准公开存在，因为它号召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把打败德、日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立场体现在其机关报《人民战争》这个名字上）。它利用其新的合法地位，跟印度和英国的社会各界、美国以及英国战时派遣军进行了广泛接触。美、英派遣军的官兵与殖民地常规

驻军不同，他们之中有些人具有反法西斯和左派背景。这些多方面的接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除了工人和农民外，印共党员中有一批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曾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的家庭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

尼赫尔和雷努夫妇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印度独立后他担任高级法院的法官。我们在印度逗留的两个月中，他们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左翼积极分子和劳动人民的情况（例如加尔各答贫民窟的悲惨境况），还全面介绍了整个战时统一战线的情况。

在加尔各答，我们被安置在一位印度科学家的家里。几乎每天他都要安排我们会见一些人，其范围之广，可以从下面所列名单中窥见一斑。我们访问了查托帕喜亚家族（他的一个姐妹是杰出的国大党妇女领袖萨罗吉尼·奈杜，我们没能见到她，但我们见到了他的另一位姐妹、共产党员苏哈西尼）。我们采访了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苏拉瓦底，后来他出任巴基斯坦总理。我们会见了英国刊物《政治家》和亲国大党的《印度斯坦旗帜报》的编辑，我给这两家刊物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特别是我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德里是我们在印度逗留期间唯一在旅馆（瑞典旅馆）下榻的地方。我们《联合劳动新闻》的另一位记者夏拉夫·阿萨尔·阿里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

在德里，设在红堡(1)的英国印军司令部的官员们读了我在一些主要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后，邀请我们去谈谈我们对中国战争形势的看法。我在介绍中强调了战争的群众性和共产党领导地区的抗日战争，包括游击战术和民兵的地雷战。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愿在印度看到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里的占领军。但他们似乎对日本人在中

国遭遇意外的困境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就牵制住了本来可以转移至次大陆对付英国人的日本军事力量。

也是在德里，在英国新闻部，我们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博学多才的陈翰笙博士（邱茉莉在纽约就认识他，我在香港同他相识）。在桂林时，邱茉莉曾帮助他躲避蒋介石特务的搜捕并移居印度，还帮他找到了一个工作。使我惊讶的是，在德里，我们与威尔弗雷德·彭内尔不期而遇。彭一度曾在我任职的《京津泰晤士报》当过总编辑。他曾被日本人逮捕和拘留过，后来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一次交换战俘中获释，加入了英国新闻部，成为一名主要播音员。关于他的情况我在前面第六章中已讲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也是在德里，经过交涉，我终于获准在前往英国——这是我们继印度之后的下一个目的地——时，可以随身携带的不仅有我的笔记本，还有一件战利品——一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左轮手枪，这是我访问延安时朱德送给我的，他同时还给我开了个字条，证明它的来路是正当的。

※　※　※

孟买是我们在印度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从这里坐船前往英国。在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又高又瘦的莫汉·库马拉曼加兰带着我们到印共总部，拜访当时的印共领袖P．C．乔喜。这个总部有点儿像一个公社，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同吃同住。乔喜个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但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似乎人人都很喜欢他。他说起话来快得像开机关枪，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国内的、国际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化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对我们谈论的中国的每一件事都感兴

趣，详细向我询问延安怎样使民间文化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目的——如有名的秧歌舞和说唱剧那样。

经过在孟买的接触后，印共的人民出版社把我从中国解放区发给《纽约时报》的报道汇总起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附上我从延安带回的、有特别说明文字的一些木刻；全书约100页左右，书名是《我访问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很大。30年过去了，我自己的那本早已不知去向。但幸运得很，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位退役的美国老兵，名叫切瓦特，他战时在印度购得这本小书后一直保存了下来，他复印了一份送给我。在1994年前，他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分会的会长，2001年初病逝。后来，印共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印地文版，原来的英文版是1947年在美国印刷的。许多年后，1956年，北京出版了我的另一部著作《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它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印地文版。

在印度，我还再次邂逅两位缅甸革命者貌登佩和貌丁瑞。我们是1942年左右在重庆经埃德加·斯诺介绍相识的，斯诺请我安排他们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接触，这件事我做到了。

莫汉属于印度上层社会人士，他安排我们住在菲罗扎（“皮普茜”）·瓦蒂亚夫人家里，作为她家的客人。她是帕西人(2)，她家的房子坐落在与外界隔绝的马拉巴尔山上，生活极其富裕，社会地位也极其显赫，但却是左派的朋友（她丈夫的最大爱好是赛马，对她的活动不加干涉）。尼赫鲁在被捕前是瓦蒂亚家的常客。在这里，我们结识了身材瘦削但衣着非常讲究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穆斯林联盟的

领袖及未来巴基斯坦的缔造者。他非常世俗化，根本不受宗教礼仪的约束，娶了个帕西太太而成为帕西社会的一员。

在瓦蒂亚介绍我们认识的帕西名流中，有一位是印度最大的实业家，名叫J．R．D．塔塔，他的体格强壮，留着两撇八字须。另一位是年轻漂亮的原子能科学先驱霍米·巴巴，他在90年代末期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第三位是瓦蒂亚的一位表兄弟，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帕西人是多才多艺的。

我采访了真纳，可惜笔记已经丢失。塔塔邀请我们去他的海滨别墅，向他的部分董事会成员非正式地谈谈中国的情况。根据现在回忆，我们着重谈了三点看法：不管蒋介石能否坚持抵抗到底，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前景将是进步的，共产党人将起主导作用；中国战后的发展将为印度伙伴们创造贸易和合作的前景——包括塔塔他们在内，如果他们能够抓住机遇的话。

瓦蒂亚结识的人范围之广，还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同样的场合，我们认识了一位前土耳其公主，她嫁给了海德拉巴的亿万富翁尼扎姆王子的一个儿子。她对左派很友好。她长得异常漂亮。邱茉莉事后打趣我说，在她面前，平时夸夸其谈的我惊讶得瞠目结舌；她还发誓说（当然是开玩笑），后来曾听到我在睡梦中气喘吁吁地低声呼叫：“公主，公主。”

总之，我们尽量向这些富豪们介绍中国及其在未来的新世界中可能占有的地位。

虽然我们在印度逗留的时间很短，仅两个月，但留下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

一个美丽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可悲的国家，比正在流血、遍体鳞伤的中国还惨。

尽管独立运动正在热气腾腾地进行着，但从气氛上看，在人民的眼里，这是一出消极的、近乎听天由命的精神悲剧，与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人们面对水深火热的灾难依然能面带笑容，到处可以看到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朝气蓬勃和觉醒了的解放区。在那里，战争造成创伤，人民在流血，但人们藐视貌似强大的敌人，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坚信他们正在为一个崭新的未来世界中的崭新的中国奠定基础。

尽管我们逗留的时间很短，但印度（特别是它那色彩斑斓的壁毯）使我们终生难忘。

在告别印度时，我们相信，一旦时机成熟，印度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时代必将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　※　※

我们在孟买登上“达尼丁城堡”号海轮，在军舰的护航下向英国进发，穿越敌舰出没无常的海洋。旅途需时几个星期，趁这段空闲，我开始写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

一路上，旅客们经常要跟船员一起，轮番到甲板、船头、船尾、舷窗及右舷的各个岗位去监视敌方的潜水艇。为我们护航的是两艘驱逐舰，它们在我们的船上配备了几名水兵，负责投放深水炸弹并操作一尊高射炮和一尊平射炮。邱茉莉和我都在监视潜艇的值班名单上（我抱着打字机专心致志地写作，好多次因没准时到位而受到严厉的

警告和呵斥）。邱茉莉比较清闲，总是时间未到就提前到位，还延时下岗。她花言巧语地说服炮手让她爬上顶层，并打了几发实习炮弹——万一炮手中弹，她可以上去顶替。

所有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演习。我们的确投放过深水炸弹。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我们看到被击沉的船体部分地露出在水面上——提醒人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避免灾难重现。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空间，平民旅客实行男女分居。但通过友好安排，已婚夫妇可以在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同室旅客们会自觉地回避。

在几星期的旅途中，我们只有在亚丁获准上岸一次。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石头水池，据说是所罗门国王建造的，提醒人们牢记淡水在阿拉伯国家的无比重要性。在一条街道上，我们溜进一家小书店，发现店里有莫斯科出版的列昂提也夫的《政治经济学》英译本，店主介绍说，这书卖得很好，于是我们也买了一本。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也在传播着。

我的同室旅伴中有个年轻的英国大学生，表面看来温文尔雅，操一口纯正的英语，但他在许多地方当过突击队员，是一个地道的亡命徒。他最心爱的宝贝是一把廓尔喀人(3)用的阔头弯刀，他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用手指在锋利的刀刃内口试试，絮絮叨叨地夸耀这把宝刀如何了不起，如果使用得法，可以把一颗脑袋干脆利落、悄没声儿地削下来。他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狂，以杀人为最大乐趣——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痛恨德国人或日本人。事实上，他的仇恨似乎主要是针对所有有色人种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摧残了古老的辉煌的东方、阻碍新时代的诞生——它们无疑是下一场斗争的对象。

到英国去可真不容易。对我来说，除了有形的障碍以外，还有无形的障碍。若干年后，随着旧档案的解密，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份复印件，是当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外交部关于我申请去英国的往来公文。有的官员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入境。”有的官员则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说我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着迷”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后终于途经英国抵达了美国。

（钱雨润　译）

---

(1) ［译者注］红堡是印度莫卧儿帝国在旧德里城内建立的城堡，17世纪中期营造，墙用红色石头砌成，故名。堡内有皇宫、苑园、军营等。迄今仍为旅游胜地。

(2) ［译者注］公元8世纪为逃避波斯人迫害而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

(3) ［译者注］廓尔喀人，Gurkha原为尼泊尔的地名，并非民族名称。后指尼泊尔士兵，尤指服役于英一印陆军中的尼泊尔士兵。

第二十一章　英国：一九四四年

我们于1945年春天到达英国，那时欧洲战场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但纳粹仍在继续向伦敦发射V-2导弹（当时通称火箭）。

这是我第一次跟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交道，过去我所见到和来往的西方人，都是以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里一个特权统治阶层的面貌出现的。

在我以前的想象中，不列颠王国的首都一定是壮丽辉煌，但到了伦敦，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全副精力关注着战争和忙于介绍中国，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观光客”，没有时间和兴致去参观游览伦敦塔、伦敦桥、温莎宫、汉普顿广场、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圣保罗大教堂、画廊、博物馆……

火车从海港向伦敦行进，我们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两旁几乎都是像后院一样乱七八糟的灰色建筑。进城一看，我们发现这座大城市呈现出一片肮脏的土灰色，长期没有洗刷的建筑物上，布满着一道道烟痕，既不见大理石的洁白，也看不出它们本来的颜色，跟我想象中的大都会迥然不同。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人民的坚毅勇敢，是伦敦的真正伟大之处，但这一点还有待我去慢慢感受。

邱茉莉的母亲专程到伦敦来接我们，她把我们带到帝国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帝国饭店位于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附近的勒塞尔广场。由于战争，它跟别的建筑物一样，显得陈旧不堪。许多被炸弹炸掉玻璃的窗子上用木板挡着。在登记处，值班人员要我们出示邱茉莉和我的结婚证件，她那位戴着帽子和手套的母亲把脑袋高高一扬，大声说道：“这是我的女儿！”这一声吼把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房间在高层。我们一直睡到远处一声很强烈的爆炸把我们从梦中震醒。一枚V-2火箭击中了史密斯菲尔德商场，就造成的伤亡而论，这是战争后期最严重的空袭之一。

我们在伦敦用第一顿早餐。一名邋里邋遢的年轻女招待胡乱做了两个硬得像皮革似的煎蛋卷，往桌上一扔，拉长声调说："鸡蛋粉做的，真要不得！"我喜欢她的粗鲁率直。东西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将就着，不美化它们，该做什么照常做什么。这就是熬过并赢得一场长期战争的坚实基础。

不久以后，我听到了一个关于"脱水货"的战时笑话：在诺曼底，英国士兵正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地涉水登陆。附近停泊着一艘登陆舰，一群群干瘪得像用硬纸板剪出来的小个子正从船上下来。"我的天！那是什么？"一个士兵问。"脱了水的美国佬，"他的战友回答，"连尿都挤干了的美国佬！"不是英国人不需要美国盟友的帮助，是美国人的高工资、高供给、未经战争销蚀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们向英国姑娘和女人献殷勤的真真假假的传说，使英国人产生了反感。英国人抱怨说："（美国人）工资太高，性欲太旺，离我们又太近！"的确，英国人工资较低，又有被外国占领的感觉，他们在自己土地上流露出来的这种心态，跟他们殖民地的"土著人"对他们的情绪是类似的。

我对本土英国人的评价，很快就高于对他们在东方的同胞，因为在东方的英国人常常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英国国内战时的平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经营的"英国餐馆"，以最低廉的价格向所有人供应普通的但是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午餐每份仅需一先令六便士（相当于现在的7.5便士或10美分），当然那时的货币比现在值

钱。“经济实用”的衣服和鞋子也很便宜，外观很一般，但非常结实耐穿，几乎穿不破，几十年后，我还能穿它。

战时的某些朴素和平等的做法，自然会在将来消失。英国毕竟是一个阶级社会，尽管战时有同舟共济的感情，但战前那种古板僵化的传统作风，已经被大大动摇了。

※　※　※

我们从伦敦前往邱茉莉的家乡约克郡北部。她的弟弟理查德经营着全家最后的一片耕地（是从他的银行家哥哥弗朗西斯那里租来的）。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因汽油管制，私人汽车几近绝迹，因此我没能观赏沿途英国乡村的美丽景色。不管怎么说，乡村不如战前和战后那样苍翠繁荣（为确保战时粮食供给，大片草原开发成了农田）。

弟弟理查德是大学农科毕业的，既从事体力劳动，又进行科学化种田。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他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肩负起为国家增产粮食的任务。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穿上靴子下地，中午踏着因疲劳而显得沉重的脚步回来吃午饭，先喝一杯“雪利”酒为自己鼓鼓气，随后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吃完饭拿起报纸坐进一张扶手椅里，不一会儿便打起盹来。常常是我对大事小事高谈阔论，却没有引起他的任何反应，原来他睡着了。个把小时后，他醒来，站起身，又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地里或牛栏里继续干活，直到夕阳西下。

在东方，我从没见过英国人干体力活儿。在英国，我发现他们都干活，而且比我干过的活更重。有一次，理查德太太雷切尔和邱茉莉正在准备开饭，我往椅子里一坐，理查德四岁的女儿达夫妮突然尖声叫道：“艾培姑父就会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这使我恍然大悟。

在中国，我们在外国人堆里是穷人，但至少也雇一名佣人（富有一点的外国人都有好几个佣人），为我们操持大量的家务，所以我才能老是“坐着”。银行家兄长弗朗西斯当时是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他一身戎装，只到农场来过一天。他跟他们的母亲和理查德不同，不把我看在眼里。他最喜欢的妹妹嫁了个我这样的男人，一个犹太蹩脚文人，不配跟他平起平坐。他的另一个妹妹罗莎蒙德找了个爱尔兰天主教徒、飞机制造厂工人克里斯托弗做丈夫，这不是已经够呛了吗？因此，他对我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是保持距离的。

邱茉莉跟他年龄相差不大，他尊重她，她又知道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对邱茉莉，他不能太多地流露出一肚子的不高兴。可是对待比邱茉莉小12岁的小妹妹罗莎蒙德就大不一样了。他从没请她到他家去过，几乎不承认妹夫克里斯托弗，甚至于到了从不带他到外面去吃午饭的程度。对我，他倒的确作了一个正式的姿态，请我到他伦敦俱乐部的怀特餐厅吃过饭。但也出现了一些尴尬场面。记得侍者问我喜欢牛排怎么做，我说“Rare”（嫩一点）。“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弗朗西斯不屑地问。我作了解释，他说：“哼，美国佬的说法。我们说‘underdone’。”虽然偶尔也有比较客气的时候，但他始终对我若即若离——而对博览群书的克里斯托弗这个大好人，则简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弗朗西斯后来在巴克利银行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当上了巴黎分行的负责人和首席执行董事。他熟悉法国、法语和法国文学。他有幽默感。但遇到跟他看法不一致的事或人，他的态度则极其固执生硬。后来他的儿子在一次滑雪事故中身亡，在经受了这次悲剧的打击后，他的这种毛病才有所收敛。他的苏格兰太太米塔倒是一个没有架子的热心肠。就在1945年，在约克郡，我第一次见到了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

德·卡弗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她成了我们亲爱的亲戚和朋友。她是个大大咧咧、性格坚强的女子。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两手抱着她的女儿吉尔——她当时唯一的孩子。后来她又陆续生了七个子女。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已经当了祖母了。

战争结束时，罗莎蒙德刚满28岁，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的医院膳食营养师。这是她父亲的意志。他认为，即使是“乡绅人家”的姑娘，也得有个专业挣钱自立，这在他那个年代和他那个阶级是不多见的。在跟克里斯托弗结婚这件事情上，她也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不仅因为遭到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全家的反对，而且还因为克里斯托弗身体不好，患有骨髓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生长在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郊区，那里的居民大多是爱尔兰工人阶级，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拥有高超的技术、成为工党党员和信奉天主教三大特点。因为飞机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他有时在这里工作，有时到那里工作，因此他和罗莎蒙德居无定所，以活动汽车住房为家，到处流动，直到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世。随着家庭的不断扩大，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始终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成为并始终是邱茉莉和我的亲密朋友。

在约克郡，我还结识了邱茉莉的一些朋友、她父亲以前的佃户。虽然他们管她叫“邱茉莉小姐”，但都是一起长大的，相互之间不拘礼节。我们曾跟着他们去参加牲口交易会和别的乡村集会。邱茉莉曾在雷丁受过饲养奶牛的训练，在鉴别公牛和母牛的优劣方面是一个公认的行家里手。

总而言之，在有着各种等级差别的邱茉莉家族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获得了许多有关英国社会当时和未来变化的感性知识。

※　※　※

我首次访问英国期间，比家庭生活更加重要的是社会活动。在1945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大量谈论并撰文介绍中国情况，特别是记忆犹新的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运动。

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中国运动委员会”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旨在声援和宣传中国抗日而最早成立的英国组织。我与它的联系始于1938—1939年我为宋庆龄和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期间。委员会的名誉秘书和实际领导人是“英国民主监督联盟”的多萝西·伍德曼（左翼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及民族》主编金斯里·马丁的夫人）。它的全国性组织者是共产党员教师和诗人、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亚瑟·克莱格(1)。

为了让英国左派舆论了解我所掌握的消息，我在1945年的一期《劳动月刊》上写道：

> 这是日本人在1939年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他们迅速和成功地占领了所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前沿基地。这充分证明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国民党军队并非总是那么无能。我们记得上海的英勇抗战、台儿庄大捷、缓慢有序的向汉口（武汉）退却以及1937—1938年最伟大的民族团结期间所取得的其他成绩。这期间，像汤恩伯将军等将领手下的军队曾多次打得很出色。然而就是这些部队，六年以后，即1944年，当敌人在河南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却全线崩溃，望风披靡，放弃了保卫国土的职责，仓皇逃离河南，残兵败将们一路跟无法无天的土匪一样，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缴了散兵们的武器，用打麦的连枷打死伤兵。为什么？……

应亚瑟·克莱格的邀请，我还向几位英共高级领导人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们之中有帕姆·杜德（《劳动月刊》编辑）、特德·布拉姆利等人。虽然他们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怀着强烈的同情感，但他们对解放区的具体生活和奋斗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对我的介绍听得津津有味。我还曾多次在英国合作党报纸《雷诺兹新闻》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总的形势以及合作社对解放区的重要作用。

我们应邀出席了在斯卡伯勒举行的合作党1945年全国代表大会。邱茉莉曾为中国第一批战时工业合作社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也曾积极参与其事，因此我们跟合作党有共同的语言。我听说斯卡伯勒是一个著名的海滨胜地，但它跟我自小喜爱的华北的北戴河相比，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北戴河有着广阔的金色沙滩、温暖的海水、阳光灿烂的天空，而在斯卡伯勒，我发现的是冰冷的海水、铁灰色的天空、索然无味的旅馆墙壁。邱茉莉的家族跟约克郡这个海滨胜地有着一段历史渊源。她的一位先祖在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期间曾是斯卡伯勒城堡的司令，起初站在议会方面反对国王，后来临阵倒戈，将城堡交给了保王党人，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也就是在英国逗留期间，我开始在中国以外发表公开演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在各地演说达数百次之多）。第一次演说是由中国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地点在伦敦的卡克斯顿会议厅，同时还展出了我从延安带来的实物。我介绍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和切身经历。

在其他几次公开演说时，国民党代表当场出来讲话，试图诋毁我和我的报道。后来成为台湾“外交部长”的乔治·叶（叶公超）当时负责蒋介石政权在英国的宣传活动。他站起来否认国统区有政治集中营。

他质问我，能不能举出哪怕其中的一个呢？我一口气说出了四个集中营的名字，并把它们描述了一番，气得他横眉立目，但却哑口无言。

另有一次，我在伦敦的妇女合作会演讲。我注意到听众中有一位比其他人更年轻、衣着更讲究的女士低着脑袋，忙不迭地在她膝盖上的速记本上作记录，仿佛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中间休息时，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会长，她问那位女士替谁做记录。她愣了一会儿，随后说是替中国大使馆。能不能请她把笔记交出来呢？不行，她恳求道，她得先把记录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向她的上司交差，但她答应将提供一份复印件。使馆如何歪曲我的讲话内容我无从知道，但不管怎样，她的逐字记录（我把它长期保存在我的文件堆里）有助于我驳斥对我的歪曲毁谤。

我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通过优待政策和阶级兄弟般的态度，成功地使许多日本战俘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些战俘加入了在延安成立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同中国游击队一起到前线喊话，表现出与他们替天皇打仗同样的勇气，努力说服他们以前的战友得出跟他们相同的结论。别的抗日武装很少抓获日本战俘，把他们转化为自己战友的事例（如果有的话）则更是凤毛麟角。我的叙述，引起了当时在英国新闻部从事战时工作的日本问题作家维尔·雷德曼的极大兴趣。这种做法，虽然美国和英国军方感兴趣，但他们做不到。

通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做的一次广播，我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发表了讲话。下面是我那次讲话的片断：

我们把日本人还没有侵占的一些地方叫做“自由中国”。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日本战线的后方还有一个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解

放了的中国”？它包括被割裂的15块抗日根据地，拥有9000万人口，即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比未被日本占领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总人口只差一点点，是不列颠群岛人口的两倍。在抗日根据地待了五个半月后，我相信这些根据地在今后对日本发动反攻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以前不知道有这些武装力量？因为在过去五年中，从“自由中国”向解放区运送物资和人员遭到了国民党的禁止和严格封杀。

直到最近，国民党在巨大的压力下，允许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外国记者到那里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在马背上花了两个月，跋涉了1000英里，进入了敌人后方。我们跟爱国武装和百姓一起行军和生活，看他们打仗并取得胜利。日军多年来千方百计想消灭这些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亲眼目睹他们消灭日本占领军，炸毁他们的机场，焚烧他们的工厂，拔除他们的据点。日本人到处抢掠百姓。我们看到中国士兵使用缴获的日本武器和装备；他们的工厂使用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机器，又用从敌占区扒来的铁轨做原料制造迫击炮和步枪，用大量废弃的日本电话线铜芯制造子弹。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电台和电话机，用来作为各游击队之间互相联络的通讯工具。在旅途中，我们和护送我们的部队吃的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食品，味道鲜美可口；他们抽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卷烟——那味道实在可怕。

日本人到处散布恶毒的法西斯谬论和所谓归顺“优等民族”的胡言乱语。但是我们到处看到断垣残壁上画着反法西斯同盟国领导人的肖像和这样一些标语口号：“欢迎盟军在欧洲登陆！（指诺曼底登陆开辟反德第二战场）它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灭亡及亚洲反法西斯反攻的加速到来！”“狠狠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

根据地，为参加盟军反攻做好准备！”“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军队，为解放区人民生产粮食和棉布！不许敌人抢割庄稼！”这些口号不仅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也能看到，因为它们离日军哨所只有三四百码之遥。有时人们甚至趁着黑夜，把口号写到了日本兵营的墙壁上去。口号可以动员人民起来战斗，但光靠口号不能使他们坚持战斗达七年之久。日本人报复行动之残酷，不亚于发生在欧洲的法西斯暴行，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们坚持战斗呢？……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发现，在这些备遭战祸的地区，人们穿的、吃的都比富庶、平静得多的地方好。这可能是因为农民交的地租大大减少的缘故。军粮的摊派比例是按照下面的方式计算的：最贫困的农民缴纳其收入的5%或更少，而地主则缴纳其地租收入的30%左右。政权掌握在普通农民手里——他们世世代代有着同样的命运，那就是贫穷和悲惨。

因此农民努力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执行法律的不是由上面指派的、容易腐败的官员，而是当场选举产生的、便于撤换和监督的代表。

我还在英国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室里向一批工党议员发表过讲话，会议由伊曼纽尔·欣韦尔主持，他的选民都是煤矿工人。在英国上层社会，经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分子利斯托韦尔勋爵介绍，我去看望了空军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这位退休老战士留着两撇浓密的八字须，当时担任着英国红十字会会长。他的组织只向国民党统治区提供医药援助；我此去的目的，是想探索一下他们同时向两个中国政党控制下的地区、而不是只向国统区提供医药援助的可能性。他开始时表示赞同。但当我提到这种援助除了其人道主义性质外，还将显示英国公众对中国国内团结的关注时，这位年高德劭的菲利普爵士又马上

把门关上了。他告诫道：“哎呀，中国有五亿人口，如果他们都团结起来，在我看来，那太太可怕了。”他所说的向对立双方提供援助的目的，根本不是促使他们团结，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对这一点早就领教过了。

在希腊，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英国的斯科比将军已经在支持希腊的极右分子掉转枪口，屠杀该国最积极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了。这一点中国知道，毛泽东于4月发表讲话警告说，在中国，同样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国民党“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还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任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2)。

与此同时，我对在这种环境下一些西方大报的所谓自由的本质和局限有所领教。历史悠久、声望颇高的伦敦《泰晤士报》鉴于我刚从中国来，约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当前形势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把战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与国民党在1927年所干的事情联系起来，我写道：当年国民党“大规模地屠杀它的左派盟友”并“支持地主镇压反封建运动”。这是叙述过去的中国政治史实，说法其实还不够全面，因为没有充分提到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因素。但即便如此也不行。《泰晤士报》把它改写为：

> 抵达长江流域后，“国民党重申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是反对俄国的煽动并与中国社会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爆发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上面引号里的内容是编辑加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恰恰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深受与外国统治势力妥协之害。不过文章只署名“一记者”，我觉得这样改动无损于整篇文章对中国现状的叙述，所以没有抗争。

实际上，这篇文章从来没有发表，因为文章是以抗日战争为主要背景的，而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泰晤士报》还是给我寄来了最后的校样，让我看看若不是局势变化，他们准备发表的内容。校样里除了原来的“更正”外，还有另一处编辑部的曲解，他们事先没有给我看过，尽管我们之间有明确的协议。关于1927年国共分裂的原因那一段，他们改写道：

> 很不幸，混乱局面达到登峰造极，要成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已经没有可能。于是国民党与中国社会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共同反对由鲍罗廷组织的、俄国人煽动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过激行动在爱好和平的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于是中国的许多黑社会组织参加了对左派人士的大屠杀，那些死里逃生的共产党人进入了……一个临时性的飞地，在那里，共产党的信念实质上已经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采取了中国的形式……

我的文章胎死腹中，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这并不能阻止这类歪曲事件真相的说法到处流传。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那些欺骗性的用语。“俄国人煽动”是那场革命的一个因素——那是一个因素，但并不像《泰晤士报》所解释的那样，是“鲍罗廷组织的、俄国人煽动的运动”，好像这场革命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历史性的根源。国民党跟“较稳健的力量达成妥协”，并不是出于国内外统治者的需要，而是出于“不再能容忍混乱”的“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压力。其意思是说：

人民起来反对左派（并屠杀人民）！屠杀上海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的地痞流氓是从哪里找来的呢？他们的银行家后台老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当时美国人担任主席）和法租界的外国当局又在哪里呢？两者都允许武装镇压者们通过它们的领地从背后袭击工人。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些历史事实都不存在。按照他们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数以亿计在城市和乡村劳作和承受剥削的工人农民，也统统并不存在。最后，为了解释文章后面部分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当前的抗战努力，修改后的文稿谨慎地写道：如同在古老的中医疗法中有时要出点血一样，他们的红色渐渐消退，也变成“民族主义”了。在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妥协后，中国的工农大众在干什么？他们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谁在“煽动”他们？按照最后审定文稿的《泰晤士报》编辑老爷的说法：俄国人。我记述这段历史，并不是对英国新闻界或伦敦《泰晤士报》怀有任何特别的恶意。《泰晤士报》与某些别的大报相比，特别是在战争后期，显得更公正、更实事求是一些（死硬的保守党人甚至辱骂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为分文不值的报纸）。

但所有这些都显示，在阶级问题上，有权势的报纸，自由派的也罢，保守派的也罢，最后都采取同样的立场，不过有的行动温和些，还有点儿羞羞答答，另一些则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

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随着第二次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结束，新闻阵线站到了支持第三次反共世界大战一边，或者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站到了支持“冷战”一边。英国斯科比将军把枪口转向“二战”盟友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游击队的例子，后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反复重演。宣传机器则为这些行动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臭名昭著的“冷战”已经结束，中国成了新的“遏制”对象，一场新的战

争的战鼓已经擂响，谩骂和嘲讽不绝于耳。这些不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故技重演吗？

（钱雨润　译）

---

(1) 许多年后，克莱格写了一本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内容极为翔实的书：《援华：回忆一次被遗忘的运动》。该书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用英文出版。

(2) ［译者注］参阅《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6年，人民出版社，1051—1052页。

第二十二章　美国五年：在逆境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从1945年至1951年，我们在美国度过了五年。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47年为分界线。

在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在两国国内形势都非常复杂的背景下已经初见端倪，并且正在继续明朗化。

在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但双方都在为避免一场全面内战而进行谈判，美国通过乔治·马歇尔将军（后来出任国务卿）居间调停。他是受亨利·杜鲁门总统的派遣以特使身份来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于1945年4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去世。比起罗斯福来，杜鲁门的目光要短浅得多。在国际层面上，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就一系列世界性问题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其中包括对华政策问题。在美国国内，公开反对政府支持蒋介石的言论还没有遭到压制。在这样的情况下，邱茉莉和我可以发表我们的观点，虽然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大有人在，但他们没有无端地不让我们说话。

在第二阶段，马歇尔的“调停”失败。调停的唯一结果是，蒋介石赢得了时间为发动内战部署好兵力。美国通过海空运输，把国民党军队（其中一部分为美式装备）大量运至内战前线。内战终于在1946年年中爆发。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以1949年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全面失败而告终。又是在美国的支援下，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率领一帮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岛。

在长达1046页的官方文件《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1949年8月）里，收录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公文信，在这封信里，他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

>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是中国内部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1)

这个结局其实是可以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年来，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察家们，曾一再报告国民党政府如何无能、虚弱、腐败、不得人心（《白皮书》本身也罗列了无数事实）。后来，连杜鲁门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出马，发表谈话说，他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家族“都是贼”，他们“窃取了我们给蒋的35亿美元中的7.5亿……他们用这笔钱在（巴西）圣保罗和我们眼皮底下的纽约进行投资”(2)。杜鲁门不仅公然利用美国的力量，而且还利用“已经投降的”日本人，来支撑被他自己称之为“贼”的那些人免于垮台的徒劳努力。

用杜鲁门自己的话来说：

> ……在共产党占据铁路线以外的地区的情况下，（蒋）不可能占领东北和华南。我们完全清楚，如果我们叫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开往沿海地区，整个国家将会被共产党占领。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步骤，利用敌人来充当卫戍部队，直到我们把中国的国家（即国民党）武装部队空运到华北以及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接防各个海港。因此，日本人奉命就地留驻，并维持治安。待蒋介石统率的中国军队赶到后，日本人再向他们投降，然后我们

把他们送回日本去。利用日本人去抵挡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共。[(3)]

来自权威方面的自白大概没有比这更直率的了。没有什么比“马嘴里吐出来的”东西更加真实。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赤裸裸的自白还没有公开，有关的行动仍为官方所掩盖。还要经过好几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语言才被“冷战”语言所完全取代。

随着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的内战跌跌撞撞地走向注定的结局，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行这一破产政策最卖力的美国权势集团恼羞成怒，转过脸来拿国内所有反对他们路线的力量开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臭名昭著的政治迫害运动——麦卡锡主义——开始横行。在中国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备受骚扰和追踪。对我和邱茉莉来说，传播我们的观点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变得很危险。因此，我们的前景和计划都须随之而改变。我们曾一度打算留在美国，把我的书写完并出版；我还打算归化美国，结束我的无国籍状态，然后返回中国，继续我们的记者生涯。但历史决定了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

※　※　※

现在来回顾一下我们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的经过，以及我们在那里度过的忙忙碌碌的五年。我们乘坐的英国客货轮“埃克塞特城市”号离开英国后，我们所属的这支护航船队便分道扬镳，各自按自己的速度、沿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上的灯光许多年来第一次在漆黑的夜海里

闪亮。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大大松一口气的时刻——大西洋海域的战事已经结束，大批兵力正集结起来以结束太平洋战争。我们在新泽西的霍博肯上岸，我父亲已经在那里迎候我们了。他老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但高兴得眉开眼笑——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由于战时住房紧缺，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一家老旧的克拉里奇旅馆度过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一夜。窗外正在举行集会，推销战时公债，以支持尚在进行中的对日作战，喧闹声弄得我好几个小时没能入睡。

可是，第二天早晨的报纸带来的却是一股新的“冷战”寒风。在粗体大标题下报道了《美亚》杂志（我在中国时，有时为这份杂志写稿子）的编辑和同事被捕的消息。一伙联邦调查局的人突然搜查了这家杂志的办公室，随后指控该杂志有意泄露“偷来的政府机密”，为间谍活动提供信息（虽然它刊登的内容和论述在今天都属于正当的“调查性新闻”）。被捕的人员中有我们的朋友约翰·谢伟思。他是一位在中国出生、会讲中国话、对中国事务有真知灼见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曾任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政治参谋，并随同美军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工作过几个月。跟史迪威一样，他曾敦促美国在打败日本的最后战斗中，与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武装力量合作，并希望美国与未来的民主、统一的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谢伟思把他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观点，在长期以来跟他持相同观点的杂志上发表了。对他的指控也就是这样一些材料。然而，随着史迪威将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召回国，一个大规模围剿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官员的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挑头的是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此人端着一副趾高气扬、自命不凡的架子，其实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谢伟思对中国形势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

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事业。（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得到平反，再后来被公认为全美国目光最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对邱茉莉和我来说，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早晨，并不仅仅是阴暗的，它后来也被证明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严肃地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国会和主要媒体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嚷，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麦卡锡主义的其他前兆。

这也注定了我那本原来打算到美国来写的书，只会使我们同华盛顿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处于全面、公开和严重对抗的地位。当时的背景是：虽然美国和蒋介石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联盟，并公然利用已经投降但尚未交出武器的日本军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们，拒绝向美蒋屈服。他们也没有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被它拥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所吓倒。他们谴责内战，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新国家。同时，如果内战证明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们也决不会为了避免最终摊牌而向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种种威胁屈膝投降。

在刚到美国及随后的一些年头里，我们决定帮助“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开展工作。这是一个新的组织，其成员是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因此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敌意监视。

甚至在此以前，就在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闻到了联邦调查局鹰犬的气息，虽然当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左派记者和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这位老朋友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所以迫不及待地前来听我们介绍别后的情况。当时我们刚搬进滨河大道的一处单元房，这是一位外出度假的熟人转租给我们

的。艾格尼斯进门不到半小时，门铃响了。一名彪形大汉说，他要检查一下屋内的冰箱。他一面往里走，一面眼珠子不住乱转，把每样东西都观察了一遍，根据他的举止，我们怀疑他显然是别有用心。

我们同史沫特莱谈得很晚，她就在我们家过夜。她是劳动妇女出身，第二天早晨离开前，把我们的厨房和垃圾桶彻底地擦洗了一遍——她显然认为，这活儿是我和邱茉莉这两个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干不来的。

那位不速之客的真实目的，邱茉莉和我直到35年后才得以证实。一位史沫特莱研究者，在业已解密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发现了那个特务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史沫特莱在爱泼斯坦家里过夜，却只字不提邱茉莉也在家里。他和他的同类如何惯用捕风捉影的手法编造他们的“发现”，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太平洋战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胜利结束，因此，尽管出现了这类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发现总的社会气氛仍跟以前罗斯福的新政时代差不多。在那个年代，虽然存在着逆流，但美国的平民百姓经过斗争，取得了许多思想和物质生活方面的改善，开始把左派当作朋友和同盟者看待。

举一个例子。纽约市C大道是工人聚居的地区，我们曾在这里的一栋没有热水、没有电梯的楼房里住过很短一段时间。我们在搬走时，把从中国带来的旧行李袋堆在人行道边上，等待出租汽车。一位行人以为我们是穷得交不起房租被房主撵出来的，他向街上的其他行人喊道：“被撵出来的房客！咱们把东西给他搬回去！”在房客与房主之间，他们自动站在房客一边。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是战前美国人民在反对经济大萧条的灾难中培植起来的心理。

当联邦调查局把眼睛盯住我们的时候，这种精神再次表现出来。邻居们在没有受到我们请求的情况下，自愿为我们通风报信。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冷战”的乌云正越聚越紧。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活动，对我们的监视也加强了。这种监视行动，有时似乎故意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也许是意在吓唬我们不要参加活动；有时则鬼鬼祟祟地暗中进行。我们在美国逗留的整个时期，这种监视从没间断过。

委员会取得了胜利，也遭受过挫折。它于1945年公开亮相，在一本小册子中，呼吁美国军队在打败日本人以后应立即撤回本国，并警告不要把美国的武器、人员错误地用作帮助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政治、军事和后勤支持。在中国的美国军人也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二战”结束后，许多士兵向他们的上级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复员回国。有的还在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回家！”有时跟高呼“美国佬回家去！”的中国学生游行队伍擦肩而过，这成为双方共同的呼声。委员会请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验，以口头和文字形式对这一类消息发表评论，我们自然乐意为之。

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赞助人和其他公众支持者激增，反映了美国公众反对干涉主义的情绪普遍高涨。当选主席的是我在武汉和台儿庄时期认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准将埃文斯·F．卡尔森。30年代初，卡尔森第一次在中国服役。后来，他在佐治亚州温泉度假营担任警卫部队司令，深得罗斯福的喜爱。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返回中国任职。他访问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总统本人的命令，他直接向总统报告访问情况……“珍珠港事件”以后，他指挥一个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近战营，参与太平洋岛屿的作战，并因领导有方而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在指挥中，

他采用了从八路军那里观察到的用政治鼓动促进军事训练的方法。他为近战营选择的作战口号是“Gung Ho”（“工合”的音译），这是从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借来的，含义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就在他手下服役，这表明总统对卡尔森是多么器重。

不少推崇美国早期民主和革命价值的美国人，为中国的革命所吸引，卡尔森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官方公开全面支持蒋介石使他大为反感，他直言不讳，于1946年11月发表声明：

>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当政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看作美国外交史上所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

卡尔森将军的声明以及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战前就发表过的尖锐的反帝声明，加上战时史迪威将军的态度，这些都显示，在美国高级将领中，可能（而且确实）有一些与夜郎自大、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巴顿将军之流大相径庭的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把原则置于个人雄心和事业之上。

※　※　※

委员会信笺的抬头，除印有卡尔森的名字外，还有当时一些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小理查德·瓦茨、利兰·斯托以及当时美国主要自由派周刊《民族》和《新共和》的主编弗雷达－柯奇韦和迈克尔·斯特拉特。在资深的中国问题权威学者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林顿·古德里奇教授，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莱纳斯·波林；著名政界人士有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

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以及六位参、众议员。还有世界闻名的非洲裔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和保尔·罗伯逊。还有几个大工会组织的全国一级领导人，电影编剧和影星代表，其中有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他是电影演员公会的领导人。（我的姓名与后来的美国总统同时出现在一张信笺的抬头，这是唯一的一次。必须指出，里根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事业的支持者，正如后来公开的那样，他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

我的身份是委员会的顾问。担任顾问的还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其他新闻界人士，如埃德加·斯诺、休·迪恩、小理查德·瓦茨，以及1944年跟我一起突破封锁访问延安的哈里逊·福尔曼和根塞·史坦因。

不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年轻的“二战”退役战士，他们纷纷越过太平洋，从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朝鲜等地返回美国。其中有些人在他们所熟悉的部门或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出发，他们主张继续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目标，并很有见识地提出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反对战后出现的反动倾向而进行的斗争。

邱茉莉是委员会的雇员和坚定的积极分子，在委员会的新闻刊物《远东聚焦》当了好几年编辑。

除了出版许多刊物和新闻简报外，委员会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分会还派人到一些地方乃至全国发表讲演，就一些关键性问题组织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大会。我经常发表讲演，并为委员会的各种刊物、美国和加拿大的报纸以及《联合劳动新闻》（供应数十家工会周刊）写稿，就中国、亚洲和其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此期间，我完成了那

本已酝酿了多年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由波士顿的小布朗出版社出版。

委员会的执行董事是精力充沛、勇气过人的莫德·拉塞尔。她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过很长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她来到中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离开。她亲眼目睹了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及蒋介石的背叛、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一度攻占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她为上海的贫困劳动妇女工作了好几年。在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革命运动中，莫德渐渐坚定地站到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一边。应该说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后者的部分工作对象是外国侨民社区，其成员中有不少是以寻求有利的机会和结交权势人物为目的的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青年会不同，派遣来华的女青年会志愿者则置身于中国的组织机构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其上，也不是与之平起平坐。分配给她们的社会和教育工作主要在女工之中进行，而且多半是在拥有一些真诚无私的中国领导人的工业部门里。她们的工作，使她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回到美国后，那一代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中，有许多成了委员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支持者。她们之中有：罗斯·特林、耿丽淑、莉莉·哈斯等。“美国促进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艾达·普律德虽然不是女青年会工作人员出身，但也是一位性质非常相似的社会工作者。

莫德是一位真正的杰出领导人，有能力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她身体健壮，行动敏捷，有一头浅棕带灰色的浓发和一对真诚坦荡的眼睛。她驾着自己的车——或者更确切地说，开旧了一辆又一辆车——

车上塞满文件和书籍，在全国东奔西跑，长途跋涉，到处发表演讲，散发材料。为了腾出时间来讲演和跟当地的支持者们联络，她常常一口气连开好几个小时车，中途不停。她的先辈是19世纪40年代驾着大篷车横跨北美大陆的首批西部拓荒者，跟她的先辈相比，她的胆量和毅力毫不逊色。

在联邦调查局面前，莫德能够横眉冷对，以正压邪。有一次，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想从莫德嘴里套出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他点了一些支持者的名字后，开始追问。莫德厉声答道：“你不能自己读吗？所有的名字都印在信笺抬头上！”来人赶紧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我也姓拉塞尔，我们可能还有些亲族关系呢。”莫德回敬道：“是吗？可能你是那些在去加州的艰难旅程中开小差的拉塞尔们的后代。”在她看来，在困难面前退却的懦夫是最没有出息的。

同样令人难忘的是，在委员会最后的动荡岁月里，面对华盛顿国会里的反共委员会的传讯，她设计了一套应对策略。受到这种“邀请”的外地人在首都期间，每天可以领取25美元的食宿补助。莫德住在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们家里，不用花钱，但补助照拿。为了领得更多的补助，她还常常寻找借口，比如身体感到不适等等，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等到口袋里装满了最大限额的补助后，她返回纽约，得意洋洋地在办公室里炫耀道：“瞧！这些钱足够出版下一期《聚焦》哩！”

莫德本人不拿报酬，因为她在自己家乡的州里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即便这样，与国民党为了扩大在美国的影响而收买的“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相比，委员会的经费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我们用勤奋和热情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委员会历经坦途和坎坷，一直坚持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竭力主张美国应该立即承认新中国，并跟她建立贸易和友好关系。

朝鲜战争期间（1951—1953年），委员会承受麦卡锡主义的压力达到了顶峰，最后，在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扰下被迫解散。但莫德继续昂首前进。她创办了一张自己的报纸《远东报道》，一直坚持到1989年。每年，她总要开车横跨美国大陆，进行讲学和散发书刊。我们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令我们终生难忘。我们在沿途的许多地方发表演说，其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和约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哥伦布，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和坐落在梅萨比-艾恩山区的希宾，犹他州的盐湖城和一个露天铜矿，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在加州期间，我们还向正在蒙特雷半岛阿西罗马尔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发表了演说。

※　※　※

我们热烈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委员会在当月出版的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我相信这是在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的五星红旗图片。

邱茉莉和我还私下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在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我引吭高唱激昂慷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前我在天津听到过，它曾鼓舞中国的战士们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英勇杀敌，现在已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委员会发起了一次新的签名运动，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贸易”。

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是由保尔·罗伯逊夫人埃斯兰达率领的妇女代表团。一位代表团成员给我带回一件礼品——珐琅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告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30年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这是我当时从没有想到过的。

※　※　※

我们在纽约逗留期间，适逢身材魁梧、精力旺盛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来到美国。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讲演者之一。在历史上，他曾站在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一边，接受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里工作。蒋介石血腥叛变后，他开始向右转，但没有参与蒋的大屠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冯玉祥则主张抵抗，并一度率领他的武装力量在北方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5年），蒋介石不给他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一个没有实权的顾问闲职，以示安抚。但冯仍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有效合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公开发表讲话，反对蒋介石重启内战及美国支持国民党。他不仅在中国发表演说，而且在访美期间也这样。华盛顿起初试图诱使他采取“温和”（即亲蒋）立场，遭到冯坚决抵制，于是随后又对他实行缩短居留期限等报复性威胁。

冯玉祥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联袂在纽约制衣区发表街头演说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正是午休时分，他们站在一辆卡车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前进。史沫特莱以她一贯的雄辩口才和尖锐泼辣的语言发表演说，工人们聆听着。令人惊讶的是，冯玉祥以他在阅兵场上那种深沉洪亮的声音，用华语发表演说，竟然也吸引了许多听众。

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尽管没有翻译，这位魁梧的老兵严正抗议外国支持中国打内战的强烈呼声，似乎当即赢得了理解和同情。

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恭维拉拢，把他变成中国的“第三种势力”，以阻碍中共即将取得的胜利。但面对冯玉祥的直率，美国政府转而通过移民局对他进行骚扰。他来找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们给他找了一位很好的辩护律师——“美国保护外国出生者委员会”的艾拉·戈洛宾。

最后，冯接受了中国解放区的邀请，离美返华。在辗转回国途经黑海时，他乘坐的苏联轮船放映电影时着火，他和他的一个女儿不幸遇难。他的夫人李德全——一位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和进步人士——则幸免于难，回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出任卫生部部长，前后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她去世。她以拼命工作和反对吸烟著称，甚至在政府会议上，她也会敦促抽了一辈子烟的毛泽东戒烟。她还兼任我们《中国建设》杂志的编委，那时我烟斗不离口，她在编委会开会见到我时，也总要力劝我戒烟。

如果冯玉祥活着，他将在新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作为一位杰出的统战人物，他无疑会担任地位很高的职务。冯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将军，体格魁梧，嗓门很大；他的夫人则身材小巧玲珑，说话低声细气，但二人却同样的坚强。冯是旧军阀出身，但热爱祖国，也不像别的军阀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背景；李受过部分西方教育，但忠诚于祖国。从这对夫妇身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历史趋势，即各种政治潮流最终殊途同归，汇合到一处，共同支持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在望的中国革命。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常常在开会时见到这对夫妇的女儿——政协委员冯理达，她体格结实，穿

着军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少将衔医官。

※　※　※

1945年邱茉莉和我到达美国，1951年我们返回中国，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可以从一连串的往事中得到印证。

开始，在美国的上层，仍有一种主张中国统一、避免内战的倾向，尽管力量不大。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为襁褓之中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音乐交流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援华委员会”成功地安排了激动人心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在美国演出。著名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这一作品，有力地表达了中国普通百姓深受日寇侵略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1944年，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延安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时，它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在延安到处感受到的活力。我们强烈感到这一作品应该拿到国外去演出。我得到了一份手写的歌谱。在途经英国时，我和我在香港时期的老同事叶君健一起将歌词译成了适于歌唱的英语。到了纽约后，“援华委员会”取得了查尔斯·爱迪生州长以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思·卢斯的赞助，成功地说服了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黄河大合唱》演唱会。虽然爱迪生，特别是卢斯夫妇，在政治上均属于美国右翼(4)，但当时对日作战还在进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溃退，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正在加紧出击，规模越来越大，两党合作是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唯一办法，有利于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因此，这次演出活动，标志着对上述事实的广泛认同。我们随同被摩托车簇拥着的州长车队前往特伦顿，这样的场面，对邱茉莉和我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此之前，有一次，我们跟邱茉莉以前的雇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爱德华和爱丽丝·卡特夫妇一起，在马萨诸塞州乡村度周末，我们把那份从延安带出来的乐谱拿给他们的一位俄裔美国朋友、著名的“唐格坞音乐节”的作曲兼指挥谢尔盖·科斯维茨基看，希望能在他那里演出。也许是出于对共产党地区的东西的反感吧，这位流亡者不屑地瞥了一眼，说配器法太简单。后来“援华委员会”请来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福德·莱格尔帮忙，他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在特伦顿演出时取得了成功。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但不是最后一次。半个世纪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美国的一个合唱团在北京演出了这组大合唱。

50年代初回到中国后，我把在延安时拿到的乐谱，连同美国印刷的莱格尔版乐谱、在英国时翻译的歌词，以及特伦顿演出的节目单，一并捐赠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我们在美国过得还算“体面”。我们的其他活动包括跟右翼反对派人士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其中有：由“外交政策协会”主办的与约瑟夫·艾尔索普在费城的辩论，以及与弗雷达·厄特利等人在纽约市及全国性广播网进行的辩论（邱茉莉也在电台发表过类似的讲话）。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亨利·卡西里亚的邀请，平生第一次接受电视访谈。40年代中期，美国的电视业还处于幼年时期，无法控制的炽烈灯光散发的热量，使得我唇焦舌敝，差点儿没被烤糊。

在“群众性”活动方面，我们曾同其他成员一起，前往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夏季露营地，教在那里野营的工会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跳中国解放区的秧歌舞。秧歌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寓娱乐

与政治、社会教育于一体。它节奏欢快，身体摇摆，很容易学。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到处在扭秧歌，欢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教美国人扭秧歌，能帮助他们感受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农民的欢乐心情，培育他们对人民共和国的亲近感。

※　※　※

然而，从1949年起，邱茉莉和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警方的跟踪和骚扰。被人监视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我的记忆里，偶尔也有过令我意外地感到开心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纽约西23街参加完一个会议后，走出大门，发现背后有人盯梢。我住在西123街，还要向北走100个街口。我打算坐地铁，但使我大为懊丧的是，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当时我正年富力强，于是决定步行回家。

这可给我背后那个年纪比我大、身体又笨重的“尾巴”出了个大难题。我加快脚步，他在后面紧跟，连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也顾不得掩盖了。他大概以为我去乘地铁，哪知我路过地铁站径直往前走；如果他知道我兜里没有钱，他很可能会给我买张票，然后跟着我跳上车。就这样，我一路往前走，他在后面一路跟。除了体重以外，他还穿着正式服装，脖子上打着领结，就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他的下属们要求的那副打扮，这使他的行动更加累赘。我想他回去后，至少要请假一周才能恢复元气。

说起这位胡佛局长，就我所知，至少有一次我引起了他本人的注意。在斯坦福大学的档案材料中，我发现有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装着一封已经解密的信件，是国民党“中国院外游说集团”的积极支持者、美国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写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信上要求把我递解出境。科尔伯格是个商人，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因进口

中国童工的手工刺绣品而大发其财，这些孩子的视力却因此很快遭受了损害。他对中国革命进行报复真可以说不惜工本。

虽然他腰缠万贯，却必定亲自光临我们的每次会议，并做着速记。科尔伯格在给胡佛的信上说，我对于美国是一个危险，不应让我待在这里。但这可能只是对我不断进行监视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名字还不断出现在联邦调查局“退休”密探们办的反共小册子《反攻》上。著名电影明星和编剧的名字只要一上这个印刷品，饱受恐吓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马上就会把他们解雇。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冗长的会议文件中，记录着受害者们被反复问及是否认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如果认得，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以及如何认识的，等等。约翰·弗林之流还在他们的反共书籍中诬陷中伤我们。

在这样的气氛下，移民局开始向我们开刀了。一个名叫莫尔斯的人打扮成我们的朋友，来到《联合劳动新闻》办公室对我们进行“友好访问”。当我被移民局叫去接受讯问时，他现出了本来面目，成了对我们的审问官，我们面临着被递解出境的威胁。委员会自身难保，我们的嘴巴遭到封杀，我们的朋友在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留在美国似乎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决定返回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在那里，我们也许能有所作为。

1950年11月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后不久，北京向纽约联合国总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20年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团的成员里，有些是我在香港和重庆期间对我很了解的人，包括后来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找到了他，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结果我收到了孙中山夫

人宋庆龄的邀请信，请我到她正在筹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后来改名为《今日中国》）去工作。

在朝鲜战争的初期，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在拥挤的纽约电车上听来的一段对话。在我身边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手拉吊环，海阔天空地神聊，从各自的女朋友长得如何漂亮到比较严肃的题目——朝鲜。其中的一个说，他很快就要奉命到那里去打仗了。另一个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俩将永远不能再见。“中国人已经进去了——有五亿人（当时的中国总人口）呢。”这个年轻人对现实的看法，比起杜鲁门总统、迪恩·艾奇逊国务卿及美军战地总指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要清醒得多。

邱茉莉持有英国护照，她先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后来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国际儿童基金会一个下属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萨克斯博士手下工作了两个月。迈克尔战时曾在中国待过，并同情我们的观点。我因要办理过境国的签证手续，到1951年3月才启程，在波兰跟她会合，再从那里继续我们的旅程。

我是自愿离开美国而不是被递解出境的。我是个没有国籍的人，把我递解到哪里去呢？美国移民局为此犯了难。再说，递解出境对我本人也是很不利的，因为从此我就不能再来美国了。但我终于在紧要关头离开了。因为，虽然移民局看到我离开很高兴，但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却要把我留下来，接受它的审讯，得知我获准离境，他们不禁大为光火。

（钱雨润　译）

(1) ［译者注］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490页，1966年3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

(2) 引自默尔·米勒的《实话实说：亨利·杜鲁门自述》（Plain Speaking，a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3) 引自《亨利·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岁月》第62页，纽约州加登市1956年出版（Memoirs by Harry Truman Vol．Ⅱ．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 City New York，1956：P62）。

(4) 库尔贝克编《美亚文汇》（Amerasia Papers by Kubek）。书中还有许多涉及指控谢伟思及其他美国官员帮助所谓“丢失中国”的材料。

第二十三章　波兰见闻

我们决定返回中国，但怎样返回？邱茉莉有英国国籍，这没问题——她可以先去英国，再从那里转道中国。可是我，事情就复杂多了。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函，这可以跟波兰驻北京大使馆进行核实，我以出生在华沙为理由，向新波兰驻纽约总领馆申请护照。我想，既然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左翼国家以及左翼运动和政党，这不应该会有困难。然而困难出现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政府。”总领事加列维奇提醒我说，因此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耗费一些时日办理国籍手续。就他个人而言，他对我表示同情。他本人也是犹太人，是纳粹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让我看他前臂上的刺青，并说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身上烫着烙印的总领事。虽然他不能给我办理护照，但他可以在对我的中国邀请函进行核实后，在我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旅行证件上加盖过境签证的公章。

幸运得很，在美国，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可以在马路旁边随便找到一个公证人，就自己的身份向他宣誓，从而取得一份宣誓书。这东西本身并不是旅行证件，但如果有人在上面加盖了签证公章——加列维奇总领事可以做到这一点——不需其他手续，它就可以作为旅行证件把我送到波兰，到那里后再办理去北京的签证。我拿着这张东西，订了一张由纽约去波兰的船票，客轮名叫“巴托利”号，它是新生的波兰商船事业的骄傲。

几位亲密朋友到码头来为我热情送行，其中包括我的律师艾拉·戈洛宾。在旅途中，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旅伴。他们大多是回国定居的波兰人，还有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去波兰探望几十年未曾见面的姐妹。在我一时找不到手提箱的钥匙时，他教我怎样

用回形针开锁——我没有打听他这门技术是为了应付本人的万一之需呢，还是以前曾经当过小偷。另一位中年匈牙利人——他的立场偏左，但仍是天主教徒——非常气愤地告诉我，他的加拿大牧师要求他定期地进行绝食，并不要跟他的妻子做爱，以抗议新生的匈牙利逮捕曾经为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者效劳的红衣主教明曾蒂。一位农民出身的前苏联士兵，在战争中被纳粹军队俘虏，后来移居加拿大，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当苦力，最后他选择了返回苏联，虽然他明知从战俘营里出来的人回国后要受到是否有投降或背叛行为的严厉审查，通常会被遣送到劳动营去服苦役。我们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港后，他被一名身材魁梧、一身戎装的苏联军官接走，上了他的汽车后离去，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去向。

邱茉莉先我几个月离开纽约。我们在英国的南安普敦短暂地会了一面。“巴托利”号停泊在港外，而不是港内。对邱茉莉来说，从码头到外港，再登上我们的航船，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她凭着不寻常的顽强毅力克服了障碍。当我瞥见她走在波浪滔滔的水面上方的跳板上时，我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她像一尊屹立船头的雕像，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短暂地亲热了一番以后，她把我们别后的情况说了一遍。一小时以后她即告辞。匆忙之中，她把她的一副手套落下，我吻了吻，把它收了起来。在华沙，我下榻在布里斯托尔饭店。战前，这是一家第一流的时髦旅馆；后来在纳粹占领期间，它成为侵略者的大本营，这大概就是德国人在炸毁全市大部分建筑物的时候，它却能幸免于难的原因吧。现在它已经显得相当破旧，但依旧保存着昔日辉煌的某些痕迹，其一便是那部古老的电梯和那两扇雕花的铁门，开动起来发出呼噜呼噜、当啷当啷的声音，但它别具一格，犹如一个过了时的老年花花公子。

在旅客接待处，我上了第一课。在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重要的不是你本人，而是谁接待你。“谁接待你？”登记人员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问题。“我自己接待自己。”我的回答招来了怀疑和睥睨的一瞥。要不是我提到当天要去中国使馆，很可能根本就不让我入住，而且还可能受到更多的盘问。在中国大使馆，我的旅行宣誓书当即获得签证，这使得一切都变得更为合法。

住宿费按波兰货币兹罗提计算，当我拿出美元支付房费时，那位白发职员，也许是可怜我年轻无知吧，告诉我说，如果拿到大街上去，汇率能高得多。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不愿违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纪律和法规。那老头也值得称道，他没有表示想插手外汇买卖并从中渔利的意思，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也许他决心让一个年轻傻瓜去做一件傻事；也许他对我存有戒心，怀疑我头脑一热之下，会把我拒绝一个非法建议的事告诉某个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并且把他揭发出来；也许这压根儿就是一个事先设下的圈套，旨在捉拿黑市交易的后台？这一点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不久，老头儿发现我囊中日渐羞涩，便建议我到跟我的钱包相称的地方去用餐。你可以在华沙的任何一家“奶吧”里享用到价廉物美的早餐（包括面包、黄油和一杯质量很好的牛奶，加上在另一个玻璃杯里浮动的两个煮得很嫩的去皮鸡蛋）。开设这种“奶吧”的目的之一，是要把波兰人从伏特加酒吧引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一种廉价的咖啡代用品——如果你愿意暂时忘却真咖啡的味道的话——名叫“Enrilo”，是用炒过的粮食制作成的，类似于也是用粮食制作的美国的咖啡代用品“Postum”，但更粗糙一些。这样一来，我才免于在旅途中破产。但即使如此也还不行，于是我不得不立即去找波兰的出版商以及匈牙利和东德的大使馆，向他们索要稿费，因为他们翻译出版了

我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本书在这些国家很受欢迎。波兰文版和匈牙利文版的稿费稍后倒确实寄来了，但东德的稿费一直拖欠到我到达北京以后，而且不是用货币，而是以实物代替——经过谈判，我获得了一架“康泰克斯”照相机、一台手提打字机和一架手风琴作为补偿。

在华沙，我首先访问的一个单位是对外文化协会。在纽约时，我的波兰朋友、新闻记者维奥切克和高尔，以及波兰文化处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都建议我到那里去。在协会，一位头发开始谢顶的男子接待了我，他叫鲁巴赫。我告诉他我认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以及波兰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尤柳斯·卡茨·舒赫和波兰驻美大使、著名经济学家奥斯查尔·兰盖等人，他听着，脸上露出一副深信不疑和肃然起敬的表情。可是他最后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你没有请他们写个条子，哪怕三言两语也行。”协会不能协助我在波兰参观，除非我能出示文件，哪怕一个便条也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然而，协会在其权限范围内确实帮了我一些忙。他们向我介绍什么地方能看到有意义的展览——华沙到处都在举办展览。他们还送我几本好书——波兰优秀美术作品集以及波兰中世纪木刻家、也许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木刻大师维特·斯特沃什奇的作品集。鲁巴赫还亲自出马，找到了我那本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的波兰文译者贾莱克，随后他们两位带我在城里转了一下——显然是得到协会同意的，因为这样的活动，协会本身不便出面。

这两位先生是那个复杂时代的有趣产物。身材矮胖、性格开朗的鲁巴赫是个文学型人物，他告诉我他怎样撰写和发表作品而不愁挨批

评。他有一个万应灵药式的私人资料索引库，当他发表任何见解时，他都能从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斯大林的适当语录作为护身符。至于马、恩、列、斯对他的其他影响，他在平时的讲话中从未谈起过。贾莱克身材矮小，为人热情，他的英语很好，主要是通过大量阅读和“二战”期间在西欧跟美、英军队（由巴顿将军指挥）并肩战斗中学来的，当时他在一支波兰武装部队里服役。他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听不进任何波兰不如人家的话。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天，他密切关注着正在举行的环法国自行车大赛。波兰本来有希望摘取冠军的桂冠，但却只得了个第三。他掩盖住对波兰没有取得第一的失望，扬着脑袋说道：“我们毕竟获得了第三名。”

我在华沙结交的一位好朋友，是当时波兰的主要报纸《人民论坛》的出色记者斯塔尼斯瓦夫·布罗兹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纽约，他是专程前来报道联合国的重要会议的，而我也是《联合劳动新闻》驻联合国的正式记者。后来我有幸再次与布罗兹基结伴，作为同一个记者团的成员，从北京前往板门店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另一位朋友是我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早就认识的斯塔尼斯拉夫·弗拉托。他是医生，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服务，国际纵队失败后，他于1939年随同一批医生来到中国。弗拉托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战前波兰反动政权的统治下，他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服过苦役。到1952年时，他在新波兰武装部队里的地位很高。会见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必须经过波军最高统帅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本人的批准（罗虽然是波兰人，但他在“二战”中是一位著名的苏军元帅）。弗拉托不能跟我见面，派了另一位曾经到过中国的前国际纵队医生、时任格丁尼亚港首席卫生官员来看我。他们两人都在1951年以后的政治大清洗中遭到整肃。后来弗拉托出狱并得到彻底平反后，转

到外交部门供职，回到中国当了很长时间的波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在此期间，我们经常见面，重续我们的友谊。但在那个时代，东欧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他在华沙波兰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解除了职务，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在60年代的那场反犹浪潮中，大多数（如果不说全部）犹太人都被逐出了波兰各级政府的领导岗位。

那时，在华沙的美国进步人士为数甚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威胁正在抬头。美共高级党员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在波兰电台工作，她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主要任务是撰写一些与新中国有关的稿件，并做些广播谈话，这样既有助于提高我的社会地位，也可借以解决我的经济困境。五大三粗的博勒斯拉夫（比尔）·格伯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美国钢铁工人的杰出组织者，现在成为波兰工会机关报《劳动之声》日报的编辑。在我返回中国之前，他任命我为该报驻中国记者，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为它写过稿子。比尔后来被任命为波兰驻土耳其大使，一位罢工运动领袖出任外交官，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同在华沙的还有马克西姆·利伯，一位曾协助安排在东欧翻译出版我的作品的左翼文学出版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更杰出的人物：波兰出生的著名数学家莱昂波尔德·因菲尔德教授及其夫人和孩子，以及他的姐夫、欧洲中世纪文化权威马格雷特·施劳格。

因菲尔德是犹太人。在波兰后来出现的反犹高潮期间，正值周恩来总理到华沙进行正式访问。我听说在一次欢迎招待会上，周总理问起因菲尔德教授，因为他知道因菲尔德在科学界和进步人士中的声望。当时他正站在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他以后，穿过大厅，上前跟他握手，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姿态，表示他不赞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反犹主义。

波兰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全世界，人们只有在华沙能看到两条主要的林阴大道并存的局面：一条以教皇皮乌斯六世的名字命名，另一条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

1951年5月1日，我平生第一次在华沙观赏了社会主义阵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盛典。我站在人行道上，目睹50万人流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地走过，历经好几个小时。不久以后，我又目睹了天主教举行的基督圣体节大游行，大约也有50万人之众，人们打着宗教旗帜，牧师们在街上维持秩序，看不到警察。这些游行者之中，有多少也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呢？这是一个只有在1951年的波兰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只有在波兰，人们才能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的年轻军人经过教堂时，虔诚地脱帽致敬，不仅步行时这样做，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如此！

我问自己：与同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为什么对天主教的信仰在波兰——还有爱尔兰——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在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如此广泛的世俗的和反天主教的传统，而在波兰和爱尔兰非但不存在这样的情绪，而且刚好相反，很少有诸如嘲讽教士、僧侣和尼姑的大不敬行为？

我想，答案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在几个世纪时间里跟政府和统治阶级紧密勾结在一起，因此成为被统治者和自由思想家们批评的对象，而在波兰（爱尔兰也一样），骑在他们头上的是外来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来说，他们的大块领土处于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沙皇俄国以及以路德新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德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信奉天主教跟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波兰，对教会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举一个例子：在处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对待上层教士和下层教士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教会的地产跟世俗地主一样，分配给它们以前的佃户。对于大多数农家出身的乡村牧师来说，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同样能分得一份土地。这一政策，赢得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新社会和新政府的好感。

深受各阶层波兰人一致欢迎的一个行动是重建华沙。波兰在18世纪时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标志着波兰在几个世纪中曾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古老建筑，在“二战”中几乎被德国人摧毁殆尽。到1951年，华沙老城区已按照其原来的美丽风格全部重建完毕——玫瑰色的墙壁，许多建筑物还带有翠绿色的铜顶，只有城堡王宫仍在修建之中。

在惨遭破坏的首都其他地区，大批居民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早期修建的小区之一坐落在穆拉诺夫区，这里原是犹太人居住区，后来在英勇的华沙贫民起义中，被杀人不眨眼的纳粹镇压者夷为平地。现在这里矗立着一座纪念贫民起义战士的青铜雕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美共友人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和她的年轻女儿就住在附近。我的波兰同行布罗兹基则住在另一个住宅小区莫科托夫，也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　※　※

邱茉莉4月抵达华沙，这给我带来了欢乐。在等待开往中国的轮船期间，我们在华沙和波兰其他地方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

我们在军事博物馆里，看到17世纪波兰在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入侵和保卫欧洲的斗争中留下的文物和记载，我们还看到被瓜分后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大量遗物和记载，以及两个多世纪以来波兰爱国者参加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难忘事迹——科斯丘晓和普拉斯基是美国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革命战争中的将军；杜姆布罗夫斯基是1870年巴黎公社的指挥官。

在华沙郊区的莱津基行宫，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波兰影响的古迹——一座附有仿中国式楼阁的建筑。

在去喀尔巴阡山扎科帕内旅游胜地的途中，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波洛尼诺村，仔细参观了列宁从沙俄流亡国外期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小屋——波兰被瓜分后，当时那个地区处于奥地利的占领之下。

在波兰逗留期间，我一再发现它是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当时执政的左翼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办妥了前往中国的签证，确定了启程日期，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没有去目的地的轮船。在此期间，我不得不数度延长在波兰的居留时间，这就必须到华沙警察局去办理临时延长手续，每次我都遭到一位官员的大声呵斥，他认为这是对待有求于他的人的合适态度。

在离开波兰时，我再次谢绝了中国使馆要到码头送行的盛意，虽然这能为我解决许多具体麻烦。作为一名独立记者，拒绝官员（即使是最友好的官员）的帮助，几乎已经成为我的天性。虽然我早就相信，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忠于某种事业，但我认为，这应该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且应该根据他的作品来对他进行判断，而不应以谁是他的赞助者为依据。

在我看来，波兰集悲哀、可爱和矛盾三者于一体。虽然屡遭蹂躏，这个国家产生过像科学家哥白尼和音乐家肖邦那样的巨人。更为光荣的是，她的儿女们不仅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且也为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热情、忠诚地战斗和牺牲。可是，这个国家在独立期间，也压迫过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此外，早在拿破仑时代，波兰的军队曾被法国用来镇压在遥远的海地被解放了的黑奴争取独立的斗争。但从历史上总体衡量，波兰及其人民为自由和进步所作的贡献占据着——我相信今后仍将占据着——一个光辉的地位。

（钱雨润　译）

第二十四章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通过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时，我们看到牛群在距离我们的船舷仅几英尺外的绿草地上吃草。客轮南下英吉利海峡，随后沿着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前进，穿过地中海（一进一出，两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绕道罗马尼亚加油，因为沿途没有一个西方控制的港口愿意为我们提供燃料。然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我们拐弯北上，沿着中国海岸进入渤海湾，抵达天津，一路上尽可能地离台湾远一点。

由于“冷战”，这个历尽艰难的漫长旅程——说得温和一点——绝不是一次豪华的旅游。船上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乘坐的这艘上了年纪的客轮，原是丹麦莫莱运输公司的，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不久前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公司把它买了下来。它原以船主莫莱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现在更名为“人民友谊”号。但一路经过的地区大多在西方的控制之下，我们没有从沿途所经国家的政府得到任何友谊。它们不仅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料，连淡水和生活必需品都不给。

然而，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包围和孤立。拿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说，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我们乘坐的客轮，都是当时刚刚诞生、后来变得非常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起如此巨大和复杂的新生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来，未来的希望要大得多。

波兰船员们年轻而热情，但几乎全是新手，有的还是第一次参加远洋航运。有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好奇地打开引擎的油箱盖子，结果被滚烫的机油灼伤了前身的下半部，不得不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疗。

比较起来，船长是个有经验的老水手，战前曾在波兰商船队工作过，后来为了逃避希特勒入侵，这支船队逃亡英国。在他的波兰同行中，拥有他这般技术的人本来就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他几乎成了国宝。沿途港口的管理当局只准他一个人上岸办理必要的航运手续。由于他在西方长期待过，他每次上岸，总有人怀疑他是否还能回来。但他每次都回来了，带着一些精心挑选的铁钉、螺丝、合叶、门把手以及其他家用五金什物。他说他正在他的老家格丁尼亚港盖一所住宅，这些东西是装修新居用的。他还解释说，住宅的大小要同时考虑到当前和以后的需要。苏联船长曾告诉他，根据他们国家的规定，船长私人住宅的面积比波兰所规定的大。他眨了眨眼睛说道，现在波兰的口号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所以他正在琢磨新居地基该多大，以便今后可以往上加盖楼层。

客轮政治委员莱万多斯基的年纪只有船长的一半。他并不去批评船长的自私自利思想，只是很友好地跟他下棋，也没有千方百计想赢他的意思。毕竟，他的任务是使船长留在船上，所以要让他心情舒畅，而不是惹他生气。

就他本人而言，年轻的莱万多斯基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当我们的客轮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腥风血雨的加利波利战场时，我面对一大片阵亡将士墓地，对当年的

那场战役发了几句感慨，但他很不以为然。他大声说道：“所有双方的年轻人，都是为各自的剥削阶级白白地送死。”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如此。

自然气候跟政治气候一齐向我们发起挑战。没有水喝，我们支起帆布槽接储稀少的雨水。在红海里，热浪滚滚，弄得我们委靡不堪。这且不说，我们在波兰随船储存的土豆仿佛也感到春天已经来临，一个个长出了嫩芽，不能再供食用了。

为了消暑，我们灵机一动，用柏油帆布在甲板上造了个临时游泳池，用水泵往里面灌满海水。但我们对如何拯救这些土豆，则束手无策。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我们跟船员一起，把船上外露的金属部分和救生用具油漆一新，以迎接波兰国庆。幸而我们随身带着书籍和打字机，我把许多时间用来写作。

旅途的最后几天把我们带近正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战场。当我们几乎可以望到天津的时候，美国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几架重型轰炸机飞得几乎跟桅杆一样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它们显然是在吓唬我们，同时也侦察和拍摄我们甲板上蒙在帆布下面的货物（大多是汽车）。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准它们按动相机的快门。

我们停泊在天津外围的大沽口沙洲。14年前，日本增援部队在这里登陆时，我离开了天津。我当时就深信，日本人不可能征服一个为民族存亡而奋起战斗的中国。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重返故地，而且此时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击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一位人民共和国的干部

从天津乘汽艇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将乘火车去北京。

上船来卸货的码头工人，跟我记忆中从前那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弯腰屈背的苦力大不相同。“去北京？”一位码头工人问道，“你可以看到毛主席啦！”我回答说希望能在明年国庆的庆祝活动上见到他，其他工人听说，都向我围了过来。我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年代里，从没听到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想知道——或者关心——我是否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蒋介石。显然，这些工人认为毛泽东是他们自己人。

在过去的火车上，列车后部挂有专供外国人和有钱人享受的宽敞、豪华的头等车厢，而接近浓烟滚滚的火车头的，是穷人乘坐的拥挤肮脏的三等车厢。这次在我们去北京的火车上，这种强烈的对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有两个等级的车厢，即“硬席”和“软席”，都收拾得很干净。同车有一位从朝鲜前线回国养伤的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他吃饭用的是一双白色的金属筷子。据他说，这双筷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材料做的。这是大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大大小小外国入侵者对其主权恣意践踏之后，中国终于在反对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中，成功地捍卫了它刚刚取得的独立。

我们沿途经过的农村，那些地方我是熟悉的，但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从前不长庄稼、连野草都长不好的白色盐碱地，现在成了绿油油的水稻田，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我听说土地已经用淡水冲洗干净。土地已不再属于地主，而是归耕者所有，所以庄稼管理得井井有条。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睬，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

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作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随地吐痰，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害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了跟这种恶习作斗争，北京市民发起了一个巧妙而有效的运动。目光锐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年龄不过十岁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一旦发现有人吐痰，就用手里的粉笔在痰迹周围画个白圈，叫吐痰的人在旁边站住，

对他进行教育。在盛行家长制的中国，大人被孩子们当众责备，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与被警察罚款或大声呵斥相比，是一个更大的心理打击。如果当时正好有警察在场，他们也会告诫这个人应该记取孩子们的话。

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过去商店里常见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欺诈和讨价还价，如今已不复存在。在革命后的中国，我们发现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和统一价格，不允许讨价还价——诚实得令人咋舌。例如，在过去，对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来说，英国的“飞利浦”是最受欢迎的名牌自行车之一，结果假货充斥市场，令粗心的顾客大上其当。现在我发现所有品牌都如实标明：如果是真品，就标明“真飞利浦”；如果是质量较好的仿制品，则标明“仿飞利浦”；如果是劣等冒牌货，则标明“假飞利浦”。同样档次的商品，各商店的售价基本都一样——跟人们的收入水平保持着稳定的关系。

当时，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旧的战争创伤，还要应付朝鲜战争，然而它成功地制止了1949年前天文数字式的通货膨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确是事实。政府的经济措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包括国家掌握足以保证市场供应的粮食和棉布储备来保持币值。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需要，因而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经济措施如何精密周到，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货币的面值仍有许多“零”。我的工资如果从数字上看，我是个“百万富翁”。但实际的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下一步是把那些“零”砍掉——以前发行的面值10000元的旧币可到银行调换1元新币——除了失去那些“零”以外什么都没有损失，货币的购买力是固定不变的。

在对待大小事务上，新中国似乎决心与令人厌恶的旧思想决裂。消极、压抑让位于积极、向上。普通老百姓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乐观、认真地重新打造命运。“没有办法”一度是中国人的口头禅，现在正被“有办法”所取代。

在树立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新思想的同时，人们也冷静地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显著变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家还很穷。城乡生产虽已达到以前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规模，但还需要为全体人民创造繁荣和文明的新生活。这个艰巨任务要求每一个人工作——更好地工作，并尊重所有别人的工作，不管他干哪一行。

“同志”这个称呼就体现了这种觉醒，它取代了反映不同地位和不同阶层的称谓。你称旅馆服务员或人力车夫（当时还存在）“同志”，他们反过来也称你“同志”。这跟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亲切温暖。“我们”的意识取代了“我”的意识。

需要克服的困难依然十分严重。毛泽东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仍不甘心或不可能承认这一现实。蒋介石的残余武装在大陆的一些地区仍然很猖獗，更不用说还有国民党残余偏安台湾，时刻梦想复辟。朝鲜战争正打得十分激烈。美国当时是拥有原子武器的唯一国家，自杜鲁门总统以下的美国政府领导人以及自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的战地指挥官，均公开威胁要动用他们的核武库（苏联直到1950年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接着是英国，于1952年；而中国则又过了许多年）。早在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报界扬言，使用原子弹轰炸朝鲜的方案“正在考虑之中”。麦克阿瑟则更是竭力主张，把朝鲜和中国军队控制在半岛上一条致命的原子战争的钴辐射带之外，并将战火扩大到中国，同时支持蒋介石从台湾反

攻大陆。接替麦克阿瑟指挥朝鲜战争的克拉克将军，在此后的两年中继续鼓吹发动一场二次性核打击。持这种主张的，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也不乏其人。他们反复叫嚣说，目的是“遏止”中国革命。

1952年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出任总统后，准备核打击的急促脚步才放慢下来——部分原因是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的强烈反对。但核威胁的陈词滥调仍在喋喋不休地继续着。

我们一回到中国，立即发现美国拥有和挥舞核武器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同事以及所有北京人表现出恐惧心理。他们忙于埋头建设中国的新生活。实际上，早从1945年毛泽东把原子弹称作“纸老虎”起，新中国的武装力量从来没有在原子弹面前发抖过。

跟外界的歪曲相反，毛并不否认原子弹的破坏力。他强调的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归根结底，原子弹不可能消灭人民，而人民将消灭原子弹（禁止使用直至最终销毁），他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就是这样说的。

※　※　※

现在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从美国返回中国的。30年代末我就跟她在一起工作过。当我们在北京站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她那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笔迹——“欢迎回家！”她安排得如此周到、及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现在她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之一，她请我们协助创办一份计划中的英文杂志，她给它命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1)]。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刊名含有一个“行为动词”的杂志。宋庆龄委托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负责筹办工作。陈不久就带我们去见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周的夫人邓颖超（我和她早在天津时就见过面）。我们同他们不仅讨论了有关这本杂志的计划，还谈论了在国外的老朋友的情况，包括他们非常熟悉的埃德加·斯诺。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横行的时代，他们对斯诺的处境深表关切……

※　※　※

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我们跟新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同事们一道工作、学习和娱乐，不管级别和年龄，彼此亲密无间。为了赶急稿，我们常常在一起度过许多个紧张的不眠之夜，只在午夜吃夜宵（面条）时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在这些解放初期的日子里，中国的革命气氛就像19世纪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作品《约翰·鲍尔之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平民世界”。

我们还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中国当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我们轮流参加北京的重要水利工程——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作，每次两星期。我们用扁担把装满泥土的沉重篮子往山上挑，用双手把装满石块的小车往山坡上推，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彩色幻灯片，是邱茉莉跨出我家大门前去参加半个月修水库劳动时摄的，她腰带上别着一块毛巾，背上挎着背包（装着被子和替换衣服），完全是一副修建大坝的重体力劳动者的装束。虽然她那年已经

53岁，但在比她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她成了标兵。同时成为标兵的还有我们杂志社的另一位中年的英国同事南·格林。她是一位共产党员、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她的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也是共产党员，在西班牙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中国和西班牙是30年代世界上两条反法西斯阵线，在当代人的脑海里至今仍被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邱茉莉由于干活出色，被中国伙伴们评为水库的模范建设者。接着轮到我参加半个月的水库劳动——我只得了个“及格”，没有获得荣誉。跟我们的同事和所有解放了的人民一样，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水库建设，我们流的汗水，把我们跟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后来，我们还参加过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所有这些（也只有这些）使我们永远成为这块土地——人们用几千年辛勤劳动所创造、耕耘和浇灌的、现在获得新生的土地——上的一分子。每当我们看到新的水渠、道路、林带，我们总觉得自己也在它们的建设中出过力。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50年代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大人，也影响了孩子。我还记得美国孩子南希·霍迪斯的话。当时她还不到十岁，刚进小学，在问到中国跟美国比怎么样时，她用自己的语言回答说：“在那里，我们可以吃到冰激凌和巧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不为自己出名。”

这就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是从战时的解放区继承下来的。它能激发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巨大努力。可惜后来这种精神遭到歪曲和滥用，造成了过高估计当时在物质方面可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发展到“大跃进”时期的吹牛比赛，牛吹得越大越好，把不可能的事情说成既成事实。例如在全民炼钢运动中，说小平炉炼出的钢产量打破

了纪录；在农业生产方面竞相报道神话般的“高产卫星”等等。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另一码事。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跟大家一样。冬天，我们跟同事们挤上一辆卡车（大家都站着），到故宫外的护城河去滑冰；夏天，我们一起到湖泊或游泳池去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不需要很大空间的简单运动，工间休息时在办公楼区就能进行。我们集体观看免费的电影和演出（由工会包座，作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我们在本单位举办歌舞晚会（我学会了拉手风琴，但很不高明）。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捐献现金和实物（我们的所有中国同事几乎都志愿报名到前线去服务，少数合适的人被选中，引起了大家的羡慕）。

在面对外部敌人挑战的同时，另一种不良倾向开始露头，令人大吃一惊。这就是革命队伍内部暴露出来的腐败。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精神，与旧中国大大小小的贪污腐化、巧取豪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受人民的欢迎，但现在这种精神开始受到腐蚀。冷嘲热讽的外国评论家早就对此作过预言。说实在的，他们调侃道，中国的穷乡僻壤好办，等共产党占领了拥有社会背景复杂的几百万人口、繁华而富有诱惑力的花花世界上海以后，咱们再瞧吧。

他们还预言，城市技术人员以及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将会逃跑。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绝大多数留了下来，愿意为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效力。

这些怀疑论者还预言，共产党“土包子”将在管理大城市和经济这两大棘手的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因为在外国控制和中国反动统治下，乌烟瘴气的大城市成了投机家和邪恶势力的乐园。只有腐败才能

把“自由世界的价值”从“红色威胁”中拯救出来！但这种局面在解放初期没有出现。在上海，变化了的是社会风气，而不是新政府本身。

共产党并不否认演变的危险。它早就对此发出警告。早在1944年，即取得全国胜利前五年，我就在延安听说对进步作家郭沫若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篇文章描写了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地方取得胜利后，其领导人如何开始腐化堕落。到了40年代后期，在即将解放大城市的前夕，毛泽东警告说，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们，有可能在精神上倒在大城市有钱阶级的“糖衣炮弹”之下。

我们到达新中国后不久，在我年轻时的老家天津出现了一个不祥之兆。那里的两个高级领导人刘青山和张子善堕落成为一个腐败集团的核心，利用职权之便侵吞了大量公款。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都经历过长征，过去都有良好的军事和政治记录。有人认为根据他们过去的功绩，应该对他们从轻处理。但毛泽东坚持对他们应处以极刑（即死刑），因为他们的和平演变是触目惊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决不宽容——更不用说纵容——其干部背叛公众信任的行为。

这一事件加速了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到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都参加了这些运动。

“三反”的对象是公职人员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2年元旦，毛泽东亲自发动了这场“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清洗干净”的运动。

一个月以后发动的“五反”运动，打击目标是私人工商业者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在这两场运动中，极少动用死刑。在“三反”运动中，实际上只枪毙了刘、张两人；在“五反”运动中，只枪毙了很少几个上海商人，因为他们向赴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伤员出售假药和污染药品，从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公愤。处理时实行宽严结合，对为首的和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从严处理；而对从犯和有悔罪表现的，则给予不同程度的从宽处理，直至完全免予处理。主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群众性的教育运动预防犯罪。

这两个运动的目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管其职位高低，不应损害公共财物。私人企业不应进行欺骗，特别是诈骗或损害国家利益。（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不仅合法，而且还受到保护和鼓励，以帮助国家发展经济。对待他们的政策，与此前对待国民党的国有财产及其官僚的私有财产是大不相同的，对待后者采取国家没收的政策；与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财产也不同，对后者，如果其主人或政府采取颠覆中国的行动，它们就可能被冻结或没收。）但是，利用私人财产收买公职人员或违背社会主义原则，那是不能容忍的。就如周恩来当时所解释的那样，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为新社会服务获取合法利润的机会，也面临着损害和掠夺新社会的诱惑。

在这两个运动中，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和与政府做生意的私人企业，人人都必须对照“三反”“五反”的内容作自我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听取与会者的意见。老实交代的人将得到从

轻处理，或者完全免予处分。但不老实交代的人，不能指望得到从轻处理。

运动的精神是积极的和得人心的——用新的社会道德来代替令人憎恶的旧的社会道德。人们甚至检讨自己用公家的办公用品写私信这类事情。那时广泛流传着在中国访问不会丢失东西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即使是扔在旅馆垃圾桶里的破袜子，服务人员也会追上来说："你落下东西了。"这种良好的声誉远播海外。有一次在伦敦购物时，我妻子邱茉莉粗心大意，没有把挎包的拉锁拉上，结果钱包被人偷走了。她向英国警察报案，警察对她说："你应该多加小心，别以为你还是在中国。"

不幸的是，在几十年以后，盗窃在中国变得司空见惯——提包必须紧锁，门户必须紧闭。人们开始怀念解放初期清除和自我清除不良恶习的做法，以及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觉得这非但可能，而且是做到过的。

※　※　※

前面谈了我们和中国同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北京的早期岁月里，我仍穿着在美国穿的衣服，系着领带，而我的中国同事则清一色地穿着蓝色棉中山装（它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几十年前设计的，当时在国外却被误称为"毛服"）。这是一种外表上没有地位或财富标志的制服，人们穿着它常常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和为他们服务的象征。此外，它很方便——剪裁得宽松，不管你怎样活动都很舒适；四个上衣口袋足以装下你要随身携带的东西；穿着它什么场合都合适

——出席晚会或观看演出也不必换装，而且耐磨耐洗。就拿我来说，我巴不得尽快换穿中山装。

但也不是人人都如此。在我还穿着美式服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位新来的同事在解开他的中山装上衣领子时，露出了里面衬衣上打着的漂亮的真丝领带。虽然根据他的工作表现，没有理由怀疑他对革命是否拥护，但他肯定是在怀念他逝去的上海岁月——当年他曾是一名西装革履的风流公子。另一方面，也有人用这种清一色服装作为保护性的伪装。我听说那些穿着最邋遢、补丁最多的蓝色或灰色棉衣的人，常常是过去穿得最讲究的人，他们是想让人们忘掉这一点。多数普通人即使衣服旧一些，但收拾得很整洁。

最重要的是，艰苦朴素已经真正变成人们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邱茉莉和我后来领养的几个中国孩子，都不喜欢穿新买的衣服。他们的同学也一样，更乐意穿他们的哥哥姐姐们穿不下的，或者用大人衣服改制的衣服。有一次，我们给我们的小男孩买了一条新裤子，他却说："你们不能给它缝上一两块补丁吗？这裤子看上去不够艰苦朴素。"

在这里顺便说一件小事。我常常觉得系上领带对我来说又紧又不舒服，到新中国后，我尝到了从领带中解放出来的甜头。可是，70年代以后，我看到领带作为一种时髦的正式服饰重新出现，心里感到非常遗憾——过去的"绞索"又回到我这又短又粗的脖子上来了。

50年代初期，中国多数公职人员实行"供给制"，而不是工资制。在衣服方面，每人每年可以领一套冬衣、两套夏装。口粮以未经加工的谷物价格计算。住房及主要家具由工作单位提供。即便如此，熟知内情的人也能看出等级差别来。有位朋友刚往我们不久前领来的新床

上一坐，便立即宣布她的判断：根据她屁股的感觉，床垫的厚度说明我们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我们开玩笑说：“基本准确。”

伙食费相当充裕，饭菜也做得不错。主要负责干部的伙食花样多一些，对此谁都没有意见。但当他们从公共食堂转移到用屏风分隔的小饭厅后，批评就出现了——他们是否太脱离群众了？只管自己说话而不跟大家谈谈心？谈公事在办公室里照样可以谈嘛，为什么要单独吃饭，不跟群众随便交流意见呢？

※　※　※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它跟西方“大国”政府没有正常的外交接触，因为后者不承认这个新生的国家。但人民之间的友谊，生动地体现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上。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我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邱茉莉作为一名英语技术人员参加大会工作。稍后，我们俩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担任同样的角色。这次活动对我们同样是名正言顺的，因为我是工会报刊的长期撰稿人；我们俩又都是工会会员，我是“美国报业公会”会员，邱茉莉是“美国文职及专业工作者联合会”的成员。

与西方新闻媒体大肆宣扬的神话相反，新中国在国际关系和贸易方面，从未有意识地把自己孤立于“竹幕”之后。相反，就如亚太和平大会前后中国反复表示的那样，原则上她主张在和平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包括那些在朝鲜同中国打过仗和参与西方对中国禁运的国家。

1952年7月，就在美国对华封锁甚嚣尘上的时候，中英签署了一项价值10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在赞扬中英扩大贸易的同时指出，英国政府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对华禁运，是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的主要障碍。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派部队参加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朝鲜停战后不久，工党领导人、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率团访问北京，这也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往。在旧中国，从未有这么高层的外国人物来过中国，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把他们吸引来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中国就跟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1950年，中苏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同盟条约。之后不久，又跟新独立的印度及北欧一些中立国家很快建立了正常关系。

十几年后，中国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交换了大使。只有美国，在中国革命胜利23年后，即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才承认了这一现实，并于1979年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时间已整整过去了30年。在等待中，输家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

此外，在亚太和平大会上，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边境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受到指控并被记录在案。会上，一个由国际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提供了大量证据和证词，但西方的官方和舆论界却斥责这种指控是虚假的、不可能的、恶意的，等等。今天，历史学家阅读了当时的绝密文件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这个问题——美国军方确实生产并大规模储存过细菌武器，这些细菌武器同在朝鲜使用过的是一样的，而且其中许多是仿造残忍的日本人在战俘身上试验过的最早的细

菌武器（作为交换，美国对交出试验被记录和结果的日本罪犯免予战犯起诉）。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战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新关系也开始了。我们在早期访问北京郊区的卢沟桥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卢沟桥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地方，现在，不少日本朋友来到这里，保证他们将竭尽全力反对类似的事件重演。日本代表还在亚太和平大会上表示，他们决心让两国人民像他们的古代先辈那样和睦相处。这使我们再次回想起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延安和解放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成员——其中有许多原来是战俘——为了说服仍在为皇军卖命的同胞停止反对中国人民（归根到底也是在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得的一项独一无二的成果，因为他们相信，各国劳动人民归根结底都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必须共同反对的敌人。其他对日作战国家的军队也抓获过日本士兵，但没有一个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呢？这是我们在“二战”期间经常被西方盟国的官员、平民和军方问到的一个问题——起先他们不信，后来终于为事实所说服。

总之，新中国的活力正在日益显现，尽管在重建和复兴过程中面临着困难，尽管西方——特别是美国——喋喋不休地叫嚷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苏联的领地和工具（这期间，中国人民搞建设则被污蔑为“蓝蚂蚁”，作战则又被污蔑为“赤色团伙”）。然而，即使在解放初期的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掩盖世人的耳目，人们都能看到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光明前景——这是一种激发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的激情。中国的这次革命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应——加速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独立。在短短几年里，它们大多砸碎了身

上的锁链，升起了它们自己的国旗。虽然这些新生国家的领导人一般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有的甚至是反共的，但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斗争中，他们绝大多数从中国革命中得到了鼓舞。稍后，1955年，这些国家在印尼万隆举行的历史性会议，就显示了这一点。再后来，1972年，许多新兴国家的代表团在联大的表决中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几乎一致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应有席位，同时驱逐依靠美国长期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这在事实上标志着美国全面操纵联合国的历史最终结束。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历次战争中都被战败，加上本国官僚政客的背叛出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她，使她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孙中山悲痛地称之为“次殖民地”，意思是人人都能宰割的战利品）。在本章叙述的这些年月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国家，并显示出她充满着活力。她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挺起了腰板，在国内，受尽各种各样阶级压迫之苦的广大劳动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也挺起了腰板。

下一个任务是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分阶段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摸索和渐进的过程，需要经历反复的磨难和挫折，要持续到20世纪末，甚至更长的时间。

（钱雨润　译）

---

(1) 后来，经宋庆龄生前同意，《中国建设》杂志改名为《今日中国》（China Today），现在仍以这一刊名出版。

第二十五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年轻时曾热情讴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写道：“这是天堂，沐浴着朝气和曙光；青春，美丽的乐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他们在许多国家的朋友来说，1949—1956年这段时期，大体上就是如此。总之，这一阶段无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时期。在物质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0—1952年医治长期战争创伤的阶段；1953—1956年中国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阶段。

实际上，在第一阶段期间就已经出现了空前的突破。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是，1952年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建成了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把该省的主要经济中心重庆跟省会成都连接了起来。修建这条铁路的蓝图，可以追溯到中国清王朝末年，那时当地的投资者就提出了这一计划。可是清政府将筑路权交给外国公司的举动，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抗议，从而加速了使中国变成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这条铁路始终没有修建。即使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也没有修建过一寸铁路。我曾在这个城市工作过多年，我看到的仅有的可怜标志，是一度乐观地动工兴建但始终没有建成的车站，它孤零零地被遗弃在那里，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有关联。

可是现在，新中国刚刚诞生，面临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条铁路却轰轰烈烈地建成了。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生日这一天，成渝铁路开始通车。

同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长江上从来不曾有过一座桥梁，虽然美国工程公司曾为旧中国政府绘制过蓝图。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才成功地建成了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在建设过程中，我曾爬上还未全部合拢的钢架，对它进行现场采访。1957年，邱茉莉参加了盛大的铁路桥和公路桥通车典礼。

在这段早期岁月里，中国只能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东欧集团得到外援。这些援助包括兴建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它们几乎都是旧中国时期完全空白的部门。这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宣布“15年内超过英国”的目标，主要指钢的总产量而言(1)。

这一口号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这可以从我们的养女颂雅身上得到印证。当时她只有六岁，还在上幼儿园。我们带着她取道苏联前往英国访问。我们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下榻，她在朦胧的早晨醒来，趴在窗口瞧着下面的街道，问道：“怎么看不见人？”接着又习惯性地自我解释道：“我知道了，他们一大早出去干活儿赶英国去了。”

在社会改革方面，第一阶段的关键进程是完成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几亿中国农民耕种；不仅分给了男子，也分给了过去从来无权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妇女。与此同时，在家庭关系方面，颁布了《婚姻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基本平等。在总的经济领域，土改为逐步向农业合作化过渡奠定了基础，也确保在以后逐步实现城市工业国有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占当时全国人口90%的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赖以赢得内战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最新发展。走完了这一步，城市及其工厂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

就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在文化领域里也开展了多次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通常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因为他对这个领域特别关注。1951年，发动了对一部广泛放映并深受好评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影片把为穷人筹资兴办义学而对富人和权贵们奴颜婢膝的武训（1838—1896），描绘成一位情操高尚、热衷于发展平民教育事业的先锋。毛愤怒地责问：对于当时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这是群众贫困和愚昧的根源）而视死如归、英勇奋斗的进步运动，武训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件事？武训的义学教育难道不是为了传布旧教育、为旧统治者培养忠实奴仆吗？那么，武训怎能在新社会受到歌颂，甚至连一些共产党员都热衷其事呢？

批判的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过去只有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有钱看电影，而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观众范围迅速扩大到城镇贫民和农民——影片所宣传的思想，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年以后，开展了一场对伟大的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讨论。长期以来，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生动刻画各色各样众多人物性格和家庭关系的杰作。当时，持这一传统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现在他的观点受到两个年轻人的大胆挑战，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是对整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揭露。但他们的文章在发表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公认的学派被视作“权威”，而那两个年轻人是“小人物”。毛使用愤怒的语言支持这些“大人物常常不注意的……小人物”的观点。他给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写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小人物”有广泛发表作品的权利，从而发动了一场对旧的学术垄断的批判。

就在同一年，主要也是在毛的发动下，对一向被视作著名左翼文人的胡风及其周围的一批文化人发起了攻击。胡风抱怨1949年以来的作品“千篇一律”，从而被扣上了为反革命分子寻求言论自由的帽子，这批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有的还被投入监狱。(2)

这些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事情，跟邱茉莉和我都能理解、支持和参加的反腐败运动不同，我们没有予以密切关注和参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能流利地讲、读中文，不能理解所有有关的文章和论点。但是我们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创建了新中国，所以党怎么说我们都接受。

在国际和国内，中国在1956年受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冲击。报告谴责了1953年去世的斯大林，并含蓄地谴责了整个斯大林领导时期在苏联国内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事情。这在许多共产党员中引起了震惊和混乱，因为他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转弯毫无思想准备。

甚至连那些作为客人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事先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或者被允许听这个报告，或者事后能看到讲话稿。他们在莫斯科所得到的，只是苏联低级官员官腔十足的口头简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直到秘密报告经过情报渠道向西方报纸泄露后，才拿到报告文本。对此，应邀参加代表大会的英共领导人亨利·布立特后来访问北京时，对在中国工作的英共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表示痛心和愤懑。他还向同样受到冷遇的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中国领导人认为，揭开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盖子是件好事，可以防止它们重演。错就错在赫鲁晓夫采用的粗暴方式，导致了对斯大林及

其领导下的苏联的全面谴责。毕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是一个榜样，它在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可歌可泣的、决定性的作用。

更加错误的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实践努力中出现了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这无异于错误地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毫无疑问，中国对苏共代表大会的意见，以及对由此而引发的波兰—苏联争端和匈牙利事件的意见，对混乱的世界共产党队伍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些意见无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威望正与日俱增。

这里举一件对我来说虽然很小，但却难以忘怀的趣闻为例。我年长的姑姑索妮娅、埃玛和安娜——莫斯科的退休教师——读了在苏联刚刚发表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性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她们持赞同态度。这几位姑姑我在1958年首度访问苏联时才第一次见面，她们亲身经历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年轻的时候，她们向往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波兰—立陶宛边境的家乡迁徙到俄国定居。此后，她们亲眼目睹了内战及其来之不易的胜利，以及笼罩着斯大林大清洗阴影的全国性大规模建设的努力。在大清洗中，她们的一个兄弟亚历山大（森德）失踪；索妮娅的丈夫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7年，出狱不久便患癌症去世。安娜姑姑的丈夫在抗击希特勒侵略者的莫斯科保卫战中献出了生命。幸亏苏联政府将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从被围困的首都撤离，她们莫斯科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才得以逃过纳粹的种族主义屠杀。“二战”后，他们的家庭又面临着新的危险，其中就有苏联官方再次在国内

掀起的排犹运动。但他们始终热爱苏联，不像许多人那样想方设法离开那里。因此，她们对北京观点的认同是很有分量的。“你在中国，那里有聪明的领导人。”身材小巧的埃玛归纳了她们的意见后，作出这样的评论。

同样使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深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了一次讲话并于几个月以后公开发表，其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内的一个新概念。讲话同时提出了在文艺界实行“百花齐放”、在科技界实行“百家争鸣”的观点，这些也是新的概念。大体说来，在1956年至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总结前些年做了些什么——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了框架——以及下一步怎么做，应该避免些什么，特别是要借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引用中共坦率的说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即坚持苏联有权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发号施令，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不是平等相待，而是实行专断的家长作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虽然它仍然是一个因素），而是利用新社会提供的可能性迅速发展物质和文化。

我是参与对代表大会的报告、讲话和决议的英译稿进行“润色”的人员之一。这些文件的基调跟当时全国的气氛一样，是一种冷静的喜悦和信心。

毛泽东提出了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接受的、放宽文艺创作自由度的“百花齐放”方针，以及在科研领域提倡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垄断

学派（像苏联在从遗传学直到语言学各个领域所做的那样）的“百家争鸣”方针，显然与中共八大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并且吸取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出现的事态的教训。他在1957年初发表的有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说，其核心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一概看作是对抗性的（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并采用镇压的手段来解决。因为还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另一类矛盾，例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内部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等等。毛泽东称，这些就是非对抗性质的矛盾。虽然它们也可能有是非问题，但它们应该通过辩论和教育来求得解决，而不能像苏联那样采用镇压的方法。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这一讲话，经过若干修改后于6月在报纸上发表。

出于这种考虑，共产党广泛邀请社会各阶层对其政策和工作提出广泛的批评和建议。这种邀请大量见之于公开张贴的标语口号之中，或大众传播媒介的栏目里。在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估计到的、超越建设性批评的恶意言论。这些言论先给予公开发表，然后作为反革命论调的证据拿出来示众，声称它们跟煽动匈牙利武装叛乱的言论如出一辙，在中国也是一个威胁。

基于这种看法，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在实际上背弃了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和心平气和地辩论的原则。像民主同盟等友好政党实际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它们的报纸要么关闭，要么被接管。总的说来，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靶子，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主张控制人口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杰出人物，遭到猛烈的批判和降级处分，他们的学术职务被撤

销。几十万人被打成（当时称为“戴帽子”）“右派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有的锒铛入狱。

对抗分子无疑是有的，但反右派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直到几十年以后“文革”寿终正寝，扣在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头上的沉重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他们本人得到了平反。

那些被“戴上帽子”的人，自己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他们之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对有些人来说，最初的不祥之兆是有人贴出了一张对他们具有攻击性的大字报，如果同样的大字报接踵而至，那么这肯定是厄运即将临头的征兆了。

有一次，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我看到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冯亦代正在看针对他的第一个这样的不祥之兆。平时性格开朗健谈的他，现在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昨天还跟他很亲热的朋友，如今从他身边经过时形同陌路。

我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和重庆认识冯的。在那里，作为一名散文家和翻译家，他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在经济上，他还是一位经常慷慨解囊的赞助者，因为他在银行里有一份报酬不菲的工作；他还毫不犹豫地甘于承担风险。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这些优越条件，来到北京从事新中国的外文出版事业。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热情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个政治上被人遗弃的人——许多年以后才获得平反。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最难忍受的并不是失去职务和工资，而是被他过去和现在一贯为之忠心奋斗的革命所遗弃的失落感。

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一旦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可能被开除出党并受到降职处分。50年代初期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之间的亲密友谊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在我工作的单位如此，在整个社会上也基本如此。

动不动就随心所欲地滥用“右派分子”的标签，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更加残酷、规模更大的行动——包括导致死亡和自杀的肉体摧残——的先兆。幸运的是，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大清洗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很少发生处决反对派和批评者的事情。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旦出了差错，一个脑袋砍掉后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的确，中国运动中的许多受害者最终都恢复了适当的、有时荣誉很高的职务。马寅初活到100岁，他一度遭到谴责的人口控制理论，被确立为国家政策。费孝通成为深受尊敬的农村工业化导师。

※　※　※

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样，我们返回中国的时候，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持续打了两年。

在朝鲜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中国军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把美国军队推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无疑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又一个恢复中国人民自尊的最伟大的胜利。尽管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但共产党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结束了这个民族长达一个世纪的战败和屈辱。他们在朝鲜与美国的战争机器直接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是美国图谋“遏制”中国革命的政策的失败。

1953年7月27日，我以记者身份来到板门店，采访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在没有战胜的情况下在停火协定上签字，这在美

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我以美国进步刊物《国民卫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记者团。我们沿着一条仍然不断遭到空袭的道路前进。路过朝鲜首都平壤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地面建筑都已被夷为平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公共大厅里会见我们）。在我们路过的另一个城镇沙里院，只有一个被炸毁的基督教堂尖顶的残骸，孤零零地露出在地平线之上。“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是美国军方三年来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朝鲜军队和前来支援的中国志愿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在遭受战争严重摧残的废墟上，仍能看到“正常状态”存在的迹象。丰富的电力从朝中边界鸭绿江上的一座水电站源源输出，除了夜间供掩体内照明之用外，白天为了耗掉多余的电力，露天电灯在光天化日之下照样亮着。沿途的军事哨所向我们提供简单的免费午餐鲟鱼鱼子酱，由于战争，这些东西不能加工成罐头食品或出口，只能用旧报纸包成大包，每包重达好几磅——若在别的地方，这些东西经过包装后在高档饭店里供应，只怕连王公贵族也说不清它们是多么名贵！

停战协定签字后，我们看到双方军队连同他们的装备从新的非军事区后撤（这是对双方的要求）。在返回朝中边境的途中，我们看到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中国志愿军战士正在修复桥梁。在我们离开停战城镇开城前，志愿军司令部招待我们吃了一次晚饭。我们走到主桌旁，举杯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祝贺胜利停战。“别感谢我，感谢卡尔·马克思。”他回答说。

许多年后，我听说人们批判他当时不提毛主席。他按照正当程序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批评毛主席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结果被撤销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从此他的处境越来越险恶，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他死后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以前的崇高威望。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之一，他在一次美国的空袭中牺牲。他是毛泽东家族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巩固而牺牲的七位成员中的最后一位——包括毛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毛岸英的生母）、两位弟弟，以及其他几位近亲。毛岸英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参加志愿军的。毛泽东在惊悉其长子的噩耗后，决定将岸英的遗体留在朝鲜的土地上。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名义）方面在宣传战线上也遭到了惨败，因为新闻官员们向记者发布假消息或实行新闻封锁，而中朝方面却及时提供被证明是准确的事实。这主要应归功于两位特派战地记者：伦敦《工人日报》的英国人艾伦·温宁顿和英国《每日快报》的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常常冒着战火，到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才确立的停战区内的“中立地带”，与敌方阵营的记者接触，逐步赢得了后者的尊敬。开始对方不大愿意跟他们交往，后来相互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中国记者从未提供过假消息，连垂头丧气的美国发言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记者的报道）都是真实的，是未加掩饰的事实。

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新闻史上的一种罕见的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明了它能捍卫自己的疆界，并挫败了“遏制”中国革命的企图，她的威望不仅在自己的国民中，而且在新独立的其他亚洲国家，以及那些仍在为挣脱殖民主义桎梏或其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民族中如日东升。

在处理同印度和缅甸的关系中，经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这两国领导人的谈判，产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模式(3)。开始它们被视为主

要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后来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衡量准则。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上，这些原则的实质再次得到了确切的阐述。这次会议只有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政府参加，而没有当时或以前曾操纵它们命运的殖民主义国家政府参加。在万隆，周恩来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巩固并在某些情况下打开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后来，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投票，恢复了长期被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荒谬窃踞的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席位。

我原计划是跟别的记者一起从北京前往万隆采访的。如果不是因为另有任务，我肯定会登上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飞往印度尼西亚。这架飞机遭到潜伏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的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因为他们估计周总理可能在机上。他没有在机上，但他的记者团在机上。在这架倒霉的飞机坠入海洋时，机上的全体人员无一幸存。在遇难者之中，有我的朋友、新华社的沈建图和奥地利外科医生、记者和作家弗里茨·詹森。我跟前者在延安相识，有段时间他在我负责编辑的《联合劳动新闻》担任记者；后者是结束了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服务后来到中国的。北京革命烈士公墓里耸立着一座集体纪念碑，就是纪念他们和同机遇难的其他中外新闻工作者的。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我在这里写下这段历史。但我至今仍为未能亲历万隆会议——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而感到遗憾。

（钱雨润　译）

(1) 由于两国人口不同，在人均产量方面的差距当然是很大的。

(2) 25年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作为一件错案得到了改正。官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90》虽然没有全面否定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各种运动，但把当时发表的批判文章说成是“简单化和粗暴的”。

(3) 它们是：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第二十六章　四访西藏

我在这一章里要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我在1955年、1965年、1976年和1985年四次访问西藏，每次相隔十年，每次访问的时间持续三四个月。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和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1)。

按照我参观访问的顺序，下面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变化：首先是西藏同全中国的交通联系。

1955年，我第一次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前往拉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颠簸了12天才到达目的地。这看来还是最快的速度了。这条刚刚通车一年、长2271公里的公路，路面已经很不平整，颠得我骨头都快要散架了。一路上时而爬上海拔5000米高的陡峭山口，时而进入深深的峡谷——这是中国和整个亚洲几条大河的发源地：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澜沧江到了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变成了湄公河，雅鲁藏布江流到印度则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一路上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透明的天空充满了紫外线，色彩明丽耀眼，令人难以置信。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形状变化无穷，忽而堆积如山，忽而如薄纱轻飘。路上除了不时碰到大块堆积物之外，还时常被山崩所阻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下车帮助护路工人清理。然而，现在前进的速度已经是划时代的了。以前的交通运输全靠牦牛或骡子，走一趟起码用六个月。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以善走著称，只用了104天走完全程，创下了空前的纪录。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今天人们舒适地飞行，很容易忘记当年行路的艰苦。现在，客运和货运航班经常定期飞行。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有2000名代表和其他访问者前来参加庆典。他们大部分是在几天之内乘坐飞机分批抵达拉萨的。

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航线的航班。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山脉和沙漠。飞机是大型的，几乎每天都有定期航班。乘客中有汉族人和藏族人，他们都显得很自如，就像是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在我们的旅伴中，有地质学家、气象人员、建筑员工、中年熟练工人、二十来岁的学员、来自中国内地省份大学的西藏学生，以及出差和度假的官员。

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　※　※

在西藏境内旅游，仍然是靠陆路。这方面的情况需要谈谈。在旧时的西藏，连大车道都没有，更不用说汽车路了。唯一有轮子的东西是祈祷用的、制作精美的铜轮车，它是用手转动的，或者是用流速较快的河水冲动的。车上有许多经文，每转动一次，便等于是为朝拜者提供背诵许多经文的记录。在以后的年代里，建设了几条大型公路，

三条通向中国各地，一条通向加德满都。路面、路堤和通过能力都不断改善。在西藏境内，几乎所有的县都已有公路相连。在修建公路的工地上，我高兴地看到了天津生产的大批“铁牛”牌拖拉机。天津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长大，当年那里根本没有拖拉机，更不会制造拖拉机了。至于西藏，这样的事从前连想都不敢想。

运货汽车结伴而行，每个车队有几十辆卡车，它们在“世界屋脊”上吃力地爬行着。汽车的发动机还不如人的心脏和肺，连四五千米的高度都不能适应。但是，西藏的研究机构不仅在为人类研究一种适应高原条件的药物，而且也在设法使发动机在缺氧的世界屋脊上能够“比较畅快地呼吸”。

长长的满载工业品的载重卡车车队从中国各地开到西藏，而返回去的时候，则是空空如也。运货的飞机也是这样。那些硬说“北京剥削西藏”的人，对此又如何解释呢？

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援助一直是多方面的。西藏的行政开支大部分是由国库拨款的。西藏的税收只占全国内地省份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中央政府对远距离援藏物资进行补贴，使其在西藏的价格同原产地的价格持平。内地到西藏进行科研的人员和西藏到中国内地各大专院校学习的学生，他们的费用都是由中央政府负担的。给西藏的大部分工业设备是无偿调拨的，农业机械则是低价供应的。但是，西藏农牧民生产的产品收购价格则比其他地区的同样产品提高好几倍。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本着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采取的。其目的是创造事实上的平等，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广泛发展生产、教育等等，才能做到。

铁路是发展西藏的经济所必需的。但是，修建铁路碰到了许多困难：山高、河多，又有山崩和永久冻土层。冻土层在冬天坚硬无比，承重力很大。但是，冻土在夏天就会融化，表面只有薄薄的一层，会使很重的车辆陷进泥淖。从经济上来说，漫长的铁路线沿途既没有燃料资源，也没有生意可做，甚至连个人影都没有。不过，到1979年，有一个铁路终点站向西藏靠近了一步，那就是北部青海省的格尔木车站。在南部也有几条线路进行过考察。2001年传来好消息：北部路线已经选定，即穿越冻土带的那条路线，2006年火车就可以从格尔木到拉萨了。我现在86岁，到那时超过90岁了，尽管年事已高，我仍然希望坐火车去西藏一趟，这是我长期的梦想。

在此期间，由于建造了一条输油管线，公路运输得到了加强。而在以前，卡车的双向行程都得靠自带燃料。但是，只有修建了铁路，才能把大型机器运进西藏，以便开发这里的几条世界上最大、流速最快的河流的发电潜能，以及开采、加工和运出西藏的丰富的矿产资源。

※　※　※

现在，我来谈谈在我的几次行程之间所显示的西藏社会发生的变化。1955年，我第一次访问西藏的时候，西藏的首府仍然是封建制的，类似于11世纪的欧洲。这同中国其他省份的社会主义民主变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呈现着中世纪风格的辉煌。宫殿的顶部包着金箔，在太阳照射下金光灿灿；拱顶储藏着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底层是关押犯人和敌人的地牢，阴暗潮湿，蝎子遍地，污秽不堪。拉萨市1/3的人口是乞丐和流浪汉。在喇嘛寺和绿树环绕的达官贵人官邸周围，我看到许多穷人蜷缩在发臭的茅屋里或破烂的窝棚

里，饥寒交迫，有的还疾病缠身，有的则年迈体弱。他们在臭气熏天的粪便池旁，同野狗争夺一小块肮脏的食品。贵族官吏们却穿着闪闪发光的毛料锦缎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按爵位大小，跟着人数不等的扈从，耀武扬威地穿行于街头。衣衫褴褛、满身油渍炭灰的农奴和奴隶们，则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中为贵族和官吏们劳作。他们低着头，不敢抬头仰视，因为如果他们的目光超越贵族的膝盖，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西藏人不管高低贵贱都世世代代相信，一个人的地位是命运决定的：上辈子干了好事，这辈子就享福；上辈子干了坏事，这辈子就受罪。因此，富人骑在穷人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不必感到内疚，尽管他们也抽象地宣传同情心。穷人则应当心甘情愿地忍受压迫，否则，就是犯罪，就是违背神意。

老西藏肯定不是“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想象中的人间乐园是根本不存在的。詹姆斯·希尔顿《失去的地平线》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理想乐园，只不过是为了让20世纪饱受经济萧条和战争灾祸的西方人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求得心灵上暂时的解脱而已。

※　※　※

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在拉萨上空飘扬。新修建的几条公路在拉萨汇合。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和第一座世俗小学已经建立。但是，这个地区的核心政权仍然掌握在西藏当地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权力集团的手里。保留这个核心政权，本来是要换取他们在1951年的17条北京协议中承诺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和不阻挠将来的社会改革，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恪守这两项诺言。

1955年10月1日，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庆典上，我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广场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画像。他们两人都曾保证遵守1951年协议。一年以前，他们在北京参加新成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招待会时，我曾经见过他们。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瘦削的个子。我请求他们在我的请帖上签字，首先递给了班禅喇嘛。“我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把请帖从我手中抢过去，第一个签字。就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上，他都要占上风。可见，他是毫不客气的。虽然他还年轻，但是并不简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情报机关就伸出很长的手，秘密同他接触，企图骚扰和肢解新中国。虽然屡次受挫，却仍然不死心。从那时起到现在，始终如此。它表面上声称关心西藏的文化和福利，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1955年，在拉萨庆典的检阅台上，有穿着蓝色制服的中国中央政府干部，还有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当地封建政府的官员，他们穿着金丝锦缎长袍。虽然鲜红的旗帜迎风飘扬，但是尚未改组的拉萨警察，仍然在群众中间大摇大摆地穿行。这一天，他们虽没有背枪，但是，挥动着生牛皮鞭。我没有看到他们打人，因为这不是打人的场合。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整个中国在搞社会主义，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西藏，则仍实行农奴主的封建统治。在人民和革命的红旗之间是封建的皮鞭，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隐隐燃烧着的矛盾。看来，必然会爆发什么事情。1959年果然出事了。

那一年，农奴主的地方政权发动了武装叛乱，从而撕毁了中央政府一直在贯彻执行的1951年协议。中央政府按照协议帮助当地人民的措施必须取得当地封建政府的同意，或者由他们来执行，而他们则是要阻挠改革。

这里，举一些例子：

人民政府对西藏从事公共工程（最初是公路）的人的报酬进行了革新，实行了工资制。但是，做工的许多农奴和奴隶的工资被头人夺去了。这些农奴和奴隶都是主人的财产。按照这个逻辑，他们的收入所得当然也应当属于主人。

现代化的学校已经开始建立。但是，讲授自然科学受到当地政权的抵制，被认为是“违反宗教信仰的”，而宗教的课程则是必修课。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方面，不准在学校讲授劳动人民被剥削的道理。在西藏，劳动人民受到最残酷的赤裸裸的剥削，甚至没有任何货币收入。农奴一年要为喇嘛寺或贵族劳动300天之多，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的“徭役”。

在20世纪的整个50年代，在达赖喇嘛的地方政权的主宰下，西藏仍然实行着过去那种压迫性统治。西藏的老百姓不仅受到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遭到中世纪法律和习惯所实行的那种最残忍的暴力对待。1965年我们的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采访了以前的一些农奴和奴隶，并给他们拍了照片。他们之中，有的人被砍掉了手或脚，有的人被抽掉了腿上的筋，有的人被剜掉了眼睛，其实他们只犯了轻微的罪行或过错，如牧羊人丢掉了主人羊群中的一只羊，或者仆人不承认主人硬说他们偷东西的罪过。

这样可怕的做法，甚至那些鼓吹西藏分离主义的流亡者也没有否认，其中有一个人在用英文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此作了冷静的描写，甚至还向农奴们表示道歉。他这样写道：

“刑讯”是在无法用其他办法弄清真相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常冷酷无情地观看两个法官审问一个被鞭打以后的犯人。

同一个作者回忆了这样一些刑罚，如“把眼珠剜出来，把舌头割去，把手剁掉，把罪犯活活推进水里或者从悬崖上推下去”。作者说，“西藏的传统法典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制定的。不过，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实行这种法律制度”。(2)

另一个女流亡者是西藏两大贵族家庭的成员之一，她对旧制度充满了留恋之情。她谈到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可以对“受到这种惩罚的少数罪犯剜出眼睛，砍掉四肢，为特殊的仪式而向僧侣提供人的颅骨和股骨”(3)。

在过去的西藏，还实行一种制度：在贵族庭院或寺院的角落里活埋儿童或青年人。英国在西藏的一个特务查尔斯·贝尔勋爵在谈到冲比谷的一座塔时写道：

在这个塔内，有一个神龛，在神龛内有一个铜制骨灰瓮。若干年以前建造这个塔时，为了祭奠这个塔，特地杀了两个八岁的孩子，一男一女，把他们的血倒进这个瓮里，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也放进去，头朝下，脚朝上。……

这样的习俗一直持续到1959年西藏农奴主叛乱前夕。与此同时，也保存着旧的生活方式。1965年，我见到了两个险些被作为祭奠仪式殉葬牺牲品的孩子，由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的生命被挽救了。

关于1959年以前西藏的实际情况，不妨引用美国的一位学者根据居住在印度庇护所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所提供的材料作出的结论：

> 西藏的特点是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可以被叫做无所不在的农奴制。除了25万至30万贵族家庭外，其余的居民都是农奴。那里没有“自由的”农民。(4)

这就是所谓富有同情心的、行善的封建神权政治的神话。西方人和其他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可能想象他们是生活在封建的鼎盛时代。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遗风不宣传行善。他们也宣传行善，但实际上却干着相反的事情。

共产党的政策，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设想的和实行的那样，是给封建的上层人士一定的时间，从而使大多数平民百姓日益觉悟。死硬分子必然会发动公开的叛乱，暴露他们自己。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可以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摧毁旧的社会制度。1959年，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来，西藏的基本情况同全中国的变革类似，但有一些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是根植于旧的统治集团中。如在西藏的改革中，农奴主和阿沛·阿旺晋美等高级官员的房地产不是没收，而是收购。阿沛·阿旺晋美以前也是一个奴隶主，他没有参加叛乱。他曾经在中央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还曾经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主席。

西藏许多僧俗要人担任了全国性职务或者地方新政权的职务，其中不仅包括较早就接受改革的人，而且还包括参加过叛乱，但服刑以后改变了观点的人。拉鲁·次旺多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是反叛力量的总司令。这些达官贵人最终同曾经给他们当过奴隶的普通西藏人一道工作。

1951年，我会见过许多这样的西藏人，并同他们交谈过。他们现在大多成了西藏的领导干部。他们原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可以这么说，西藏的干部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西藏人中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红军长征经过有大批西藏人居住的省份时，他们参加了红军。不过，红军并没有进入西藏。当时他们只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赤贫如洗，又不识字。他们自愿参加了这支为穷人谋福利的队伍。

这支队伍虽然主要是汉族，但并不鄙视或歧视少数民族。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留在这支队伍里。在这些人中包括桑杰盖西（也叫天宝，他是一个新的僧侣）、杨东生（他是一个农奴牧羊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自西藏地区的也有数千人。他们在部队里受到了教育，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战斗，后来又参加抗日，1945年以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包括解放天津和上海的战役。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参加了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政府的工作。

最后，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西藏老家。20世纪60年代，天宝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杨东生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扎西旺徐担任青海省省长，青海省也有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全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成员。在老一代红军中，他们是少数幸存者，大部分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二代藏族（包括附近省份）干部是在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驻西藏时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参加革命的动机同第一代藏族干部很相似，不过，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在他们中间，我会见和采访了洛桑次诚。他原先是一个木匠。他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

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农民出身的郑英当了日喀则专区党委副书记。多热本以前是一个无主的人，那意味着，任何上级都可以虐待他，甚至得不到主人的保护。他后来成为山南专区的副专员和工业主管。喜饶是西藏自治区很重要的汽车修理厂的副厂长。他年轻的时候被农奴主砸坏了膝盖。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他的膝盖动了手术，现在已能行走，但仍然不得劲儿。

第三代藏族干部是在1959年农奴主的叛乱被镇压以后成长起来的。我会见了其中的一些人，如：

巴桑，她以前是个女奴隶，后来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热地，他原先是一个从事畜牧的农奴，后来也成为中共西藏党委委员，2001年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次仁拉姆是一位充满活力的能干女性。她最初把跟她一起干活儿的奴隶发动组织起来，接管了奴隶主的庄园。若干年以后，她成为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这些人并不是一下子飞黄腾达的，而是在西藏建立新制度以后，一步一步上升起来的。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提高自己的本领。他们的例子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说明以前受压迫的人蕴藏的能力和人的尊严。

在基层，我也采访过许多人，其中包括：

阿旺加措是一个农奴的孩子。由于他在少年时竟敢上新的学校，并戴上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反动派曾扬言要勒死他。他现在是拉萨

一个区的区长。

强巴加措以前是个农奴裁缝，现在领导一个县。

次仁平措原先是个奴隶，现在是拉萨的一个警官。

我采访的对象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藏族战士和将军、藏族登山队员、藏族歌唱家，以及数十个在生活中发生同样巨变的藏族人，如：藏族女登山运动员平措，她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在西方叫做埃佛勒斯峰）；由于演唱藏族歌曲而蜚声中外的藏族天才歌唱家才旦卓玛。

乡镇级（以前的公社级）以上的藏族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36000人，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在西藏地区的合格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人。在西藏地区6000所小学（30年以前，那里的小学还不到十所）的教师中，大约90%是藏族人；在1370名中学教师中，1/3以上是藏族人；在各类技术人员中，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类型的人才中，藏族人所占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西藏的改革取消了寺院拥有的庄园。西藏所做的事情，英国16世纪在国王亨利八世时代已经完成了。有一点不同的是，西藏把寺院的土地和牲畜分给了以前的农奴，而不是像英国的改革那样分给贵族。西藏还有一点同英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西藏没有英国的那种圈地。那种圈地使农民失去土地，以至于沦为流浪汉和乞丐。

在近代历史上，一直有一股势力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股势力是外国安插和扶持的，主要是英国在18世纪征服印度以后所从

事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在派遣海军沿着中国东海岸入侵的同时，通过西藏从陆地觊觎中国的领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操纵分离势力的主要外国主子和后台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的实力衰落以后，美国在亚洲谋求霸权，把手伸到了遥远的“世界屋脊”。1947年，当时担任美国驻新德里代办的乔治·梅里尔提请华盛顿注意，在新的核时代，西藏在整个亚洲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他出谋划策说，“保守的和信仰宗教的”藏族人被当地政府（他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神权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如果美国政府支持他们从中国分离出来，他们就可以“抵制苏联或共产党对西藏高原的渗入；而在火箭战争时代，西藏高原可能是亚洲最重要的地方”。(5)美国媒体也兜售同样的观点，至少有几本书持有这种看法。(6)

1948年，作为探险家和政论家的洛厄尔·托马斯父子不远万里来到拉萨。他们来拉萨以前，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情报机关首脑威洛比将军曾经向他们介绍了情况。据他们说，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直截了当地询问道：“如果共产党进攻西藏，美国会提供援助吗？援助到什么程度？”他们说，他们需要美国的武器和指导，特别是进行游击战的指导。(7)

显然，美国政府同分离主义者的联系已经有许多年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晚期，它用飞机运输藏族人到美国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接受训练，然后把他们连同武器和通讯工具一起空投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时，曾经带了黑尔营地训练出来的两个伞兵和美国提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8)

实际上，冷战时期美国企图推翻新中国的想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藏族同胞（包括分离主义者）。事实上，藏族人自己也开始公开抱怨，华盛顿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棋盘上的卒子，用来达到更为广泛的目的而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约翰·肯尼思·瑙斯在1999年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冷战的孤儿》，这个书名无可奈何地反映了这种情绪。瑙斯在书中讲述了他训练藏族特务的岁月，他负责把他们空投到藏族人居住的地区。受过他们训练的那些藏族人的确是孤儿。他们一被空投下来，就立即被抓起来了。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藏族同胞，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是极其仇视的。否则，怎么解释1959年的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了去呢？要知道，那里是山区高原，如果是人民起义，是可以无休止地进行游击战的。

※　※　※

1965年我第二次访问时，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拉萨。那是1959年叛乱以后经济得到恢复的成果。布达拉宫仍然雄伟地屹立在那里，灿烂辉煌。它不再是神秘而令人敬畏的建筑物了。在附近兴建起来的西藏革命博物馆里，展示了90％的藏族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难。达赖喇嘛的珍贵裘皮服装、珍珠宝石和纯金器皿，被从布达拉宫的拱顶和密室里拿出来展览，它们堪与昔日俄国沙皇的珍宝媲美。沙皇有1.6亿臣民为他流汗劳作，供他享乐；而达赖喇嘛直接统治的臣民还不到100万。在这个展览上，人们懂得了，“命运”并不是不可抗拒的，而是可以扭转的。人民摆脱了剥削他们劳动果实的压迫者。西藏的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半，牲畜头数增加了1/3以上。在拉萨，建成了许多新的、有着藏族风格的建筑物，如自治区政府大楼、拥有1200个座位的人民文化宫。对拉萨这样规模的城市来说，这个文化宫是相当不错的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戏院和剧院。在这些文化设施里，

坐满了不久以前还住在牲畜棚里的男男女女。附近，有一个国营百货公司，货架上摆着各色商品，从针头线脑到晶体管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应有尽有。

拉萨现在已有几公里长的新的柏油马路，两旁有电灯照明，地下铺设了排水管道。1955年我第一次访问时，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我看见一个由妇女组成的管道小组正在安装自来水的主要管道。从前臭气熏人的壕沟和充满污秽杂物的水池再也看不见了。

航空站也是崭新的。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以后人们可以坐上在济南和上海专门为高原生产的、带有暖气和氧气设备的公共汽车去旅游了。

根据向我们提供的数字，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从民主改革以来，拉萨修建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和戏院的总面积为这个城市建城1300年以来建筑总面积的十倍之多。在民主改革以前的拉萨，只有达赖喇嘛和少数贵族的住所有电，而且还很不稳定。到1965年，即民主改革六年以后，这个城市90%的家庭有了电灯，有些家庭还用电做饭。1976年，当我第三次访问的时候，西藏有了几个中型水电站，供城市使用。乡村地区拥有许多小水电站，它们利用山泉的能源，但是，冬季结冰的时候就不能使用。由于西藏地区矿物燃料贫乏，因此十分注意利用替代能源。西藏开发了地热能源，一方面用于发电，另一方面用于温室栽培，以便栽种某些季节不能生长的作物。西藏每年有3000个小时的日照，接近于世界纪录。潜在的太阳能正被越来越多地加以利用。

1955年，拉萨没有任何机器。纺织、印刷、铁工活儿倒是有的，但全是靠手工操作。

1965年拉萨有了汽车修理厂和水泥厂。到了1976年，已能生产简单的农用机器、拖拉机零件，以及农村发电用的小型涡轮发电机和电动机。西藏现在有178家工厂，为十年以前的三倍。1955年实际上没有产业工人，到了1965年大约有2.5万人，1976年达到6.5万人。1985年，我最后一次访问西藏那一年，即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工业、城市建设、教育、医药、文化、教育、旅游和体育等方面共有41个新的项目正在进行。国家除了提供资金和物资外，还提供了来自内地的5万名建筑人员，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都将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又在西藏进行了63个项目，投资23.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9亿美元）。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建筑、医学、美术、工艺、歌舞、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最出色的文化成就得到了维护和发扬光大。

西藏丰富的古代语言也是如此。在旧西藏，95%的人是文盲。今天，学龄儿童用自己的语言学习读和写。藏语的词汇量不断扩大，以满足新的需要，但是抛弃了那些媚上骄下的词汇。当然，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以促成藏语新文化的建立；这样的批评也并非不公平。不过，已经取得的成就确实是不小的。

法律规定，公告之类的东西必须是双语的，藏语在前，汉语在后。西藏地区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西藏的第一所大学也问世了。西藏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有许多文化宝藏有待开发。西藏本土本来应是世界藏学研究的中心，但过去多少年来，藏学研究却主要是在外国的学术界中进行的。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把那些过去运往国外的（通常是非法运走的）珍本典籍的原件或影印件，物归原主，还给西藏。

这并不是说，不鼓励藏族人学习中国多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汉语，因为他们若不懂汉语，就无法同中国的其他民族自由地沟通、交流，无法到内地各省份接受更好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除汉语外，现在西藏的中学和大学还增加了英语课程，使他们有了一个进行国际交流的渠道。

1985年，我已经看到人们开始使用藏语电脑。现在，藏语电脑使用得更加广泛了。

同美国对待土生土长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任何藏族人被官方赶出家园，遭受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或者被剥夺其中国公民权；也没有任何西藏人受到阿拉斯加土著居民多年来遭受的那种野蛮对待。西藏的发展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充分驳斥了所谓西藏人没有人权的谰言。旧西藏的既得利益者出于卑劣的动机，支持他们的那些外国势力出于自身利益，在这方面散布了许多偏见，而那些自以为是、不明真相或轻信谣言的人竟然相信了他们的宣传。

西藏的基本事实是：

今天，像过去世世代代一样，西藏是多民族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其他地区及其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在这个更大的实体内，西藏在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化等方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从这些特点中，并不能得出分离的结论。近代西藏的分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同帝国主义企图分裂和征服全中国（包括西藏在

内）这一由来已久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而同西藏进步的需要毫无关系。

中国的任何政府从来没有同意分裂西藏或西藏的任何一部分。任何外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合法地位正式提出过异议，即使当它们通过军事入侵、间谍活动或外交威胁对它进行颠覆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1912年，英国竟然对中国推翻清朝以后建立的新的共和政府进行威胁，声称如果西藏在它的议会中占有席位，就不承认“中华民国”。前面已经谈到，西藏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屋脊”。有人考虑要把它作为发射核武器的场地，用以瞄准中国和苏联。

中国的革命旨在解放中国所有的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使他们摆脱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压迫。但是，中国的革命进程中也有过错误，有的影响到全中国，有的影响到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在内。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主张，在进行社会变革的同时，要逐年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在一些时期，“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偏离了这条路线，提出了不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政治方面，他们无视了敌对矛盾和非敌对矛盾之间的区别、同敌视人民进步的死不悔改的敌人的矛盾和同不同阶层人民的矛盾之间的区别。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这种情况变本加厉。

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论，“左”派有时甚至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基本的阶级对立混淆起来。当阶级对立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还认为它起着关键性作用。有些方法和策略仅仅适合于汉族（多数民族）地区，

有些甚至在汉族地区也不合时宜，显得鲁莽。但这些方法和策略有时也不适当地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

在农业方面，从1952年到1980年，西藏的粮食生产据说增加了两倍有余，牲畜的头数增加了两倍半。从1959年镇压叛乱到1965年建立西藏自治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生产继续增长，但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并不是殖民剥削或阶级剥削的结果。政府给这个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没有获得什么效益。根本的原因在于：所作出的实际努力和实际可能性，同这个地区的实际需要（各种食品和其他产品）之间不平衡，投入（包括劳动力）同经济效果（包括创造购买力）之间不成比例。

根据中国的宪法，西藏享有区域自治，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西藏的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确增加了很多，但多年来在政策上却没有适应当地的条件。在评价西藏的新官员时，往往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仿效了内地其他地区的模式。这反过来束缚了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由于他们接近当地的人民群众，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他们本来应当在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发挥这种创造性和主动性。

所有这些缺点，从20世纪80年代起，已经被注意到了，并且予以了纠正。如果说这是后退的话，那么这不是后退到西藏的旧社会，而是后退到平息叛乱和实行改革初期的那种政策。我发现，西藏人把那个时期称作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混乱和曲折中，的确出现了一些比较陈旧的思想。但是，同时也克服了过去由于走得太

快而出现的不平衡、短缺和紧张等现象。这带来了进步，加强了团结，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分离的势头又冒出来了。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它是国外煽动起来的，并得到国外的支持。这方面的渠道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国特务继续秘密渗透，有增无减。也有一些旅游者故意煽风点火，他们受到西方媒体喋喋不休的误导。此外，达赖喇嘛利用他的宗教地位换取政治资本，周游列国，发表了无数演说。在西方，他被捧为世界级的宗教名人，但只字不提过去他那个农奴国家的真相。他还被一些人吹捧为西藏人民的“政治领袖”，受到外国国家元首的“非正式”接见。更有甚者，他甚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众所周知，从来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的要求。但不少国家确实卷入了对西藏的干预，从他们隐蔽的干涉，到鼓励和支持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攻击。

在一些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崇拜旧西藏，把它说成是“香格里拉”、人间乐园。其中既有外国的官员，他们仍然梦想把西藏当作外交—军事的前哨基地，还有达赖喇嘛，他妄想把西藏建成一个“好莱坞的神话”。对这样的神话，美国的一些作者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9)]。（对这些作者，任何人也不会指责他们偏袒中国吧。）他们问道，这些电影明星怎么会喜欢作为农奴生活在达赖喇嘛统治的旧西藏呢？这些作者在评论电影《西藏七年》时，也是充满了讽刺与挖苦。有人本来是要把这部电影作为国际上宣传西藏分离活动的原子弹，但却隐瞒了这一事实：电影中的主角是奥地利人，他就是剧作者，自己曾长期为纳粹服务。

西藏分离主义者和他们的外国主子，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国决心维护自己领土的完整，它的领土是历史上确定的，并得到国际法的承认。藏族人在这个国家完整的领土内正在取得更大的进展。

根据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别人的许多报道，在西藏人中间，也有怀旧情绪，留恋解放以前的岁月，但他们都是逃往国外的贵族和大官，他们是农奴制旧西藏的主要受益者。（那些留下来的人接受了新的现实，在新社会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还有一些人也怀念过去，他们是现代化了的、年青一代的流亡者，他们是在父辈流亡国外以后才出生的，或者当年离开西藏时，他们还是婴儿。如果能用某种魔法使他们生活在过去的西藏，尝尝旧社会的滋味，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离开那个肮脏、可悲的环境。

实际上，在西藏的平民百姓中，有另外一种怀旧思想，那就是怀念毛泽东。对于那些多年以后重返西藏的外国记者来说，他们是有深刻印象的。以前，我在普通的西藏人中间，耳闻目睹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他们真诚地深刻哀悼毛泽东的逝世。因为在毛泽东领导下，废除了农奴制和奴隶制。他还不断告诫派到西藏工作的汉族军政干部，决不要有大汉族沙文主义。他多次强调说，用大汉族沙文主义对待少数民族的作风，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它在新社会是有害的、不合法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派到西藏的汉族干部都接受了这种思想的教育。他们知道，他们是去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帮助他们的。但是，在后来去的干部中，有些人认为这个高原是艰苦的地方，因而不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刻苦学习藏语，没有在西藏长期工作的打算。他们

去西藏主要是看到那里的工资比较高，又有带薪的探亲假，还可以享受一些在内地省份工作所没有的特殊待遇。

大多数藏族人认为，汉族干部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中国的中央政府决定把大多数汉族干部撤出时，西藏自治区要求许多人继续留下来工作。

※　※　※

有人把旧西藏说成是尊重“人权”的地方，这纯粹是谎言。旧西藏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权。昔日的喇嘛寺也不是什么乐善好施、崇尚文化的净土。少数达官贵人，像各地封建社会的同类一样，是富有的。他们联系广泛，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进口的奢侈品，如罗莱克斯金表、派克金笔和最昂贵的德国照相机。但是，绝大多数农奴出身的西藏普通僧侣却过着艰苦的生活，伐木拉水，居住在牲口棚一样的破烂茅屋里。他们能够凭记忆唱一些祈祷词，但是不识一个字。

有人说，中国的汉族人在西藏“压倒”了藏族人。这也是不真实的。大多数以个人身份到西藏的汉族人凭自己的一技之长赚钱，他们都认为这里太艰苦，干一段时间，就回自己的老家了。在西藏自治区，汉族人从来没有占到当地居民总数的10%，将来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数字。藏族人口在过去的30年间翻了一番，从大约10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以上。这得益于营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生育率的提高。西藏人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多。中国政府对汉族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则不受这个限制。

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上翻了一番。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就没有必要反驳这样的谬论了：如外国有人胡说什

么有“100万”藏族人死于汉族的镇压。因为西藏初期根本就没有100万藏族人。

西藏从过去向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要比整个中国更加复杂一些，会有更多的曲折。如果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曲折也许会减少一些。如果把“西化”作为指导方针，那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隐患，酗酒、吸毒等等现象现在已经出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外国的许多应声虫大肆叫嚷的所谓“对藏族文化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内地，而是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缩小了封建势力，从而使西方的影响失去了土壤。

这些年轻的流亡者大多能讲一口流利的侨居国语言，而不会讲藏语。而在西藏，藏语是主要语言，汉语居次要地位。

在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实行的是鄙视和剥削少数民族的政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政策。汉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自治区，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革命领袖和政府领导人，多次批判旧思想，尤以毛泽东批判得最厉害。不过，旧思想的残余有时仍然会重新出现。

为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参加和支持下，西藏的阶级压迫制度已经被铲除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左派”的汉族至上的变种。他们坚持认为，对藏族人来说，最进步的事情就是照搬汉族地区的模式。某些藏族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这导致专断的行动，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这么做的。

在这个狂热的时期结束以后，商业上的考虑又占了上风。许多藏族人的感情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侮辱。一些猎奇的游客，像幽灵似的追逐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例如“天葬”：死人的尸体被肢解以后，让兀鹫啄食干净，不留痕迹。在西藏人看来，这是尸体光荣的归天之举。若干年来，西藏禁止病态的好奇者窥视兀鹫啄食尸体。

总的来说，藏族人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日子过得是比较好的。如果他们“独立”，是不会有这样的好日子的。那样的“独立”绝不会是真正的独立，不过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西藏将成为国际上刺探中国的工具，随着气候的变化，或被操纵，或被抛弃。西方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家们，甚至可能使西藏扮演北约前哨基地的角色，以便北约从欧洲通过中亚对中国内地施加压力。但是，如果这些阴谋诡计得逞的话，那么，丧失的只会是西藏和藏族人的平静幸福的生活。

在人权问题上叫嚷得最凶的是美国。其实，美国的人权状况并非尽善尽美。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被剥夺了土地和他们的特性。他们变得一无所有，甚至被作为“野蛮人”而从肉体上消灭。这种状况作为“征服西部”的一部分而被罗曼蒂克化。甚至在美国语言中也有所反映，如：“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多少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的处境也是如此。虽然最坏的情况表面上已经没有了，但是，种族歧视的残余仍然处处可见。美国在国内有那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然而，它却号召为“西藏的困境”而挥洒同情之泪，岂不贻笑大方。[(10)]

（贾宗谊　译）

(1) 这个过程在我的《西藏的变迁》（Tibet Transformed）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报道，此书是根据在当地进行的数百次采访所作的数千页笔记写成的。本章是一篇简短的概述。

(2) Dawa Norbu．Red Star Over Tibet．London，1974：P6-80．

(3) Rinchen Dolma Taring．Daughter of Tibet．London，1970：P9．

(4) Mervyn C，Goldsfein．Serfdom and Mobility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May 1972．作者的妻子是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女儿。

(5) 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

(6) Amaury de Riencourt．Roof of the Word-Key to Asia，1950．

(7) Lowell Jr．Thomas．Out of this Word．New York，1950．

(8) 瑙斯在书中第168页上写道："在华府，包括总统在内的一小批官员，通过去年夏天空降下去的、由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的电讯，一直在关注着达赖喇嘛的行程。早在拉萨叛乱几个月之前的准备阶段，这些报务员就空投到凯卡姆地区去了。"

(9) 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谢尔教授（Prof．Orville Schell），他常把整个新中国作为讽刺对象；还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他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

(10) ［译者注］本章藏族人名的翻译承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江嘎等同志惠予协助，谨致谢意。

第二十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对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

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我所没有预见的是“派性”很快发作起来，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使我这个“预言家”宣告破产。早些时候，中国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平稳地前进，毛泽东却警告说，不要骄傲自满，要警惕三种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是发生造成全国性饥荒的自然灾害，三是中共中央出现分裂。我的反应粗略说来大致是这样：又一次世界大战是可能发生的，但资本主

义已经造成了两次大战，结果是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会主动地再来发动一次；只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世界形势的发展使各国无法防止一次新的大战的发生。中国出现大饥荒——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疆域广大，一些地方歉收，一般地可以由其他地方的丰收来补偿。中央出现分裂？绝不可能。自从1935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之后，党是团结一致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屡次发生内部裂变形成了鲜明对照。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爆发出分裂的局面，我却看不到事先在许多政治行动中已露端倪的征兆。我把这些政治行动不是看成裂变的征兆，反而当作防止裂变的措施。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理念实际上也从未在理论上有所体会。这个根本理念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共产党内当权派”的官僚化和腐败，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蜕变的过程正在苏联出现，他为此忧心。

但我认为，历史已经显示，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法国自从1789—1793年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之后，虽然在政治层面上有过君主复辟和两次拿破仑帝国，但封建制度并未卷土重来。尽管在统治形式上有这样一些曲折变化，在法国发展壮大起来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已被永远地击败了。英国也是如此，革命之后出现了政治上的逆流，但旧的社会秩序没有恢复。克伦威尔领导的共和政体推翻并处死了国王查尔斯一世，其后恢复了君主政体，保留了有封号的贵族（其中有的仍占有很大的地

产），但这一切都处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更不能真正相信苏联会使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用“和平方式”来完成这种“复辟”）。苏联是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并且在世界性的战胜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英雄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应该承认，那里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一些毛病，但我看不到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

不过，正如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发展所显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已无可否认地回到了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卫星国。但也许不应该说是“回归”，因为在这里提到的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从来就处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些国家的革命清除了封建残余，为未来发展打开了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向资本主义，也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毛所看到并想要防止的正是这样一种危险。为此，他试图把社会上所有他认为同过去没有牵连的群体先后发动起来。这些群体首先是生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其次是了解并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其中大多数因为年轻还没有亲身体会），最后是人民解放军。

在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似乎隐伏着一种遗憾——我出生得太晚，来不及目睹和可能参与“十月革命”（在我看来，这是上一代最伟大、最壮观的世界大事）。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出火爆的戏剧，有盛大的群众集会和上街游行，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使我的这一遗憾在新时期里得到一些弥补。虽然我目睹了中国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震撼世界的变革，但我主要只是作为一个满怀同情的观察家，而不是真正去斗争和行动的队伍中的一员。我自己戏称这一心理上的阴影为“我的米尼

弗·奇微情结”。米尼弗·奇微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先驱作家舍伍德·安德森[(1)]以生花妙笔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平凡的青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寻常的小镇里，他因为没有赶上过去那个充满伟大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时代而自怨自艾。

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它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

作单位（中国外文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有一段时期我是实际上的“头头”，领导小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智利、比利时和斯里兰卡籍的外国专家。这是在美国人李敦白被抓起来之后。他一度是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首领之一，并且看来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的信任（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江青起初似乎认为他很可利用，但后来又把他甩掉了。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下一章《狱中岁月》将记述这五年的生活。）

直到我们获释平反之后，我才获悉我的一些朋友因为同我“有关系”而受牵累，使我深感痛心。《中国建设》同事张彦特别受到折磨，“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逼他揭发我是间谍，他拒绝后被毒打，打断了几根肋骨。“文革”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编辑，那些当初折磨过他的人成了他的下属，他对他们毫不歧视，保持了一个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另一位同事、女记者谭爱清也因为我而受到了折磨。

※　※　※

“文化大革命”中所用的语言，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凶猛，但实际含义是有区别的。我的单位里有一派喊出“打倒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的口号，明确要求推翻或罢免他。另一派则喊出“炮轰陈毅”（有时甚至说“油炸陈毅”）的口号，似乎更加厉害，实际上却只是要求对他进行批判和谴责。一般说来，说大话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往往如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老领导约翰·L．刘易斯的做法。他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曾对他的支持者吼叫：“把我们对立面的肢体撕碎！！！”接着用低得多的声音补充道：“这是打个比方。”这成了他的名言。不过，在“文革”中，对立双方都有扩音器，所以，说话声音之大远非刘易斯所能及，甚至远非他所能想象。

※　※　※

内部的对立两派虽然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它们之间的斗争却比举两面不同旗帜的两种敌对势力更加猛烈。所有各派宣布的目标是相同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由于每一派都自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对方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毫无调和妥协的余地，总有一方是必须打垮的。尽管毛泽东号召要使用“辩论”而不是动武的方式，周恩来总理拼命做工作，但暴力越来越升级。起初主要是对个人施暴，后来是大规模冲突，有的甚至使用致命的武器并造成大量伤亡——小范围的内战。

“大辩论”很快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是敌对派别之间的相互控诉，力图用更大的声音来压倒对方。倾听对方的论点、看看有无可取之处——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被抓去“辩论”的人，从无说理的机会，要么认罪或承认错误，要么——如果有足够勇气的话——保持沉默。

※　※　※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曾经宣示，“文革”的目的是根除资本主义倾向。他建议的方法是：尽可能广泛地实现群众性的团结和行动，以巩固社会主义；发展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加快实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但实际情况却是：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的分裂的派性不但滞缓了物质上的建设，并且打碎（不是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本来应该是这场运动的动力）。

更有甚者，另一个罪恶的因素越来越膨胀——斗争不是为了观点，而是为了权力，并且变得毫无原则和日趋剧烈。

随着派性的加强，每个原来很小的组织都竭力到外面去寻求支持。过去往往只是有关的单位之间串联，这样“交流经验”对彼此还可能有点好处。但现在只看要联络的对象有没有被对立面拉过去，因此“造反”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以至于全国。唯一的辨认标准是：“谁不参加我们这一派，就是我们的对立面！”

初露头角的各派头头常常以被压迫阶级的天生代表自居，所以领导权自然就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个人野心也就不断膨胀。但巨憝首恶是暗地操纵的“中央文革小组”高层人物。江青毫无顾忌地把对立各派都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让它们彼此牵制或相互残杀，然后从中（或从其他地方）捧出几个人来，这些人都只忠于她自己的那个小集团。

※　※　※

在斗争中，毛主席语录——不管来自“红皮书”或其他出处，也不管是否用得恰当——当然是最主要的武器。引用的语录可能是断章取义的，但若有人指出来，那就会有被斥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小爬虫”的危险。林彪宣讲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自己曾取笑这句大话，但别人谁敢说呢？！）所以，如果有人用一句“语录”来攻击你，最保险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句“语录”回敬，因为所有的“语录”都是“最高指示”，并且不管任何时间地点，永远是“绝对真理”。但你如果在抄写“语录”时少写一个逗点或缺了一笔，那你就倒霉了。这常常会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你对革命和毛主席心怀仇恨，要深查你的根源——思想上的、历史上的，甚至于要查到你的祖宗三代。

关于查清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人经历，常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如同我女儿六岁时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所发生的情况。她问我：“爸爸，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见过。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抓他？”我解释说，那时的时机不对。她的小脸上立时显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又问道：“他看见你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抓你？”她追问道，迷惑变成了怀疑。

※　※　※

有时——特别是在运动初期——争论和控诉达到了荒唐无稽的程度。有一张曾被广泛传抄的大字报把“停止交通”的红色信号说成是资本家的一个计谋，公然污蔑作为革命象征的红色——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红色应该表示“前进”而不是“停止”。同样被斥为资产阶级阴谋的是车辆“靠右边走”的规定，因为“左”是前进的唯一正确路线。

这样的“理论”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苏联朋友、新闻工作者雅沙明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他年幼时住在一个少数民族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在俄国内战时期常成为红军和白军进行拉锯战的地方。一位红军政委喜欢他，送给他一本书，让他长大了研读。这本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村子里几位半文盲的老人告诫他道：“红军来了，把这本书藏起来，因为他们恨资本主义。白军来了就让他们看到，他们喜欢资本主义。”幸运的是，没有为此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日本人在“二战”中占领香港时也有过这种无知的“逻辑”。他们规定，我们这些被关进赤柱拘留营的外国人不得携带有红色封面或书名中有“red”（红）的书籍，即使这本书的书名是《红色威胁》也不行。

※　※　※

但是，“文化大革命”除了这些奇谈怪事之外，在它原来的冲击中包含着（甚至于推进了）共产党历来所教导的某些好的品质，如：没有贪心，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已谈到过到处可见的互助行动、偷窃案件的锐减、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不顾疲劳和危险纷纷志愿为减轻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而努力——即使在首都北京，也有几百万人好几个月住在街道上搭建的临时帐篷里，他们仍然努力工作。

虽然中国的经济到“文革”末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不能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毫无成就。在南京建长江大桥是筹划已久的事情，美国工程师也曾参与，但因江面太宽而未贸然从事。在“文革”期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是完全由中国工人和中国工程师用中国自制的材料、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样由中国自力完成的还有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制造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这些在和平

建设和国防上的历史性的“第一”，应该说是因“文革”推动而成，还是应该说不受“文革”的影响才得以完成，这在“文革”后是有争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成就以及它们所激发的热情是实实在在的。

※　※　※

人们也不能忘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苏联和美国的严重的战争危险（有一段时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曾谈论过要联手对中国进行一次导弹攻击，以摧毁中国小得无可比拟的核武器库，尽管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那段时期，中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能源和经费，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深挖洞”（称为“人民防空工事”，其规模之大为世所罕见），以便居民在遭遇核攻击时有疏散隐蔽的地方。同时还花费同样大的力量进行“三线建设”，把工厂迁入地下或在伪装下搬迁到遥远的后方。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中国要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并向未来的共产主义过渡，“文化大革命”不是办法。尽管在很多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心目中，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次政治运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具有破坏性的。

正规教育因为要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造，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有好几年，孩子们上不了学（即使很小的孩子也会在老师背上涂写“资产阶级权威”这样的字眼）。中学里十几岁的学生殴打他们的老师，有时其至把老师打死（早些时候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曾痛斥这样一桩极端恶劣的案例，并谴责一项侮辱老师的公开展示，但并不能阻止这种恶行）。大学教育实际上停顿了十年之久，一直受人尊敬的教授受到虐待和侮辱（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不堪凌辱，和夫人双双自

尽），或被送到农村去服劳役，接受“再教育”。即使各大学名义上恢复上课，一般并不进行考试。有一个报考者交了白卷，却在全国报纸上大受表扬，誉为进步的模范。在教育和培训人才方面的“断层”现象，将需要至少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补救。

大批男女青少年在全国“大串联”，在一段时期里乘火车不用买票。他们有的到革命圣地，有的去增援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有的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参加“红卫兵”的大聚会。这样的大会举行过几次，每次都有上百万人参加，向毛泽东欢呼，接受他的检阅（他也戴着“红卫兵”袖章）。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真诚的。群众对领导人的亲切感也是真诚的（特别是在早期）。我在被捕之前曾在很近的地方亲眼目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走进广场，坐在石板上，四周围满了欢呼雀跃的青少年。

当然，也不能说教育事业受到了全面的损害。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们长时间脱离社会。在“文革”期间，大量城市青年和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主动地或被动地下放到农村中去，亲自经历了农村生活、体验了农民的贫困。有些人是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被送下乡的，但他们也同样和农民结下了真正的友谊。这些青年学生，哪怕是年轻体壮的大学生，在农村劳动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作为教师、助理员、会计，他们却很为农村所需要，并且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工作。在物质生活和身体方面，他们是吃了苦，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离开农村时对那里的人民都怀着很深的感情，对那一段经历永不能忘，一回忆起来就十分动情。但从反面看，“文革”产生了一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淡漠心理。这是“文革”十年中过度使用并经常高喊政治口号的反效果。

※　※　※

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长期领导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成效卓著，为什么对后来的形势发展会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也许是因为，他过去的丰功伟绩使他以为，只有他才能领导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业，所以要在他有生之年，定下前进的路线并扫除前进的障碍。而人们也因他过去的功业而普遍地相信他能够这样做。但事实上，由于年老体衰，他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深入基层、根据第一手材料来衡量一切的非凡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他又自感来日无多而变得急躁，随着他的视野和接触面不断缩小，他除了最接近他的亲信之外对什么人都不再信任。

因此，“文革”发动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对局势失去控制。1971年，他所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阴谋加害于他，事泄秘密出逃，机毁人亡。这件事对他是特别沉重的打击。接着，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以毛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手中。这个专施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小集团，并不是像他们口头所说的那样支持毛泽东，而是企图等他死后夺取一切权力。

※　※　※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还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这里我只再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本章的结束吧。

罗斯·史密斯出身于世代工人家庭，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工作（一度在《中国建设》和我共事过），是一位年长而精力仍然充沛的新闻工作者。在国际共运论战中，她是倾向于中国一边的。“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使她伤心，只要有机会，她

总要呼吁团结。有一次，她看到一位中国同事被对立面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团团围住，看样子要把他绑架走，同他“辩论”，还可能要狠揍他。史密斯立即把我的妻子邱茉莉叫来帮忙。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妇女走进包围圈，一边一个像两堵墙似的把这位矮小瘦弱的挨整对象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2)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出身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工人。他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之一。

(2) ［译者注］本章在翻译中曾得到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彭健飞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第二十八章　狱中岁月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直支持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上一章里已经谈到的，在工作单位里，我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同志们组成的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国基层农场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贴出大字报，呼吁允许在华的外国人参加运动。在外国人中，我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们的。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志愿参加者成立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我是头头之一。这个“造反团”的两个积极分子（都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确实是在我们之前就被抓起来了，但其中一位——外国语学院的英籍教授柯鲁克是在校内打派仗时企图平息争斗而被一派抓走的，看来是个偶然事件；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李敦白是美国人，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居于高位，他的地位远在我们这帮人之上。

我对于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并没有警觉。他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出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我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康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全国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又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后台。至少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康生的矛头会指向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加是毛泽东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出于革命的国际主义。

因此，当1968年3月18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香港的日本拘留营中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

这一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香山学员”（外文局在“文革”前招收了一批复员军人，在北京香山为他们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这批“香山学员”在“文革”开始后先后被分派到外文局各单位，包括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在这样一个时间谈话，我们有点踌躇。但是日夜不停“干革命”是当时常见的政治热情的表现，所以我就说：“请他们来吧。”那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客气地说，到办公楼去谈（我们所住的专家楼和办公楼都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穿衣时感到有点疑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来自我的“对立面”（同我们参加的造反组织对立的另一个组织）。下楼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就更犯疑了。邱茉莉穿着浴袍站在楼梯口，我从下面回头望去，她的身材似乎更显高大。她看来很不放心。我对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我骗出去，同我“大辩论”（当时所谓“辩论”就是把一个人围起来，迫使他聆听别人对他的控诉，不许还嘴，他一开口大家就喊口号把他的声音压倒）。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重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我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

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我相聚。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的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国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的，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却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　※　※

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

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他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他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我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霉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他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

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1)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　※　※

我对这间牢房变得多么熟悉啊。墙壁的下半部是暗绿色的，积满污垢；上半部是灰白色的，也积满污垢。昏暗的电灯光长明不熄。在一面墙上，有人用手指甲刻出一条条斜线，我数了数，20条、30条、4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40天，我大概也会在这里待上这么多天吧。牢门每天打开一次，去把便桶里的粪便倒在粪池里。一天三顿饭，早上玉米粥，中午和晚上是窝窝头和萝卜汤（这些萝卜已经快腐烂了），在中间大厅里有人用长柄勺子舀稀的、用手拿干的。每两周可以到院子里单独放风十分钟，放风时院子里看不到别人——显然，放风是一个号子一个号子轮流的。

牢房里不许阅读任何东西，只能瞪着眼看墙壁。墙上发潮的水印似乎慢慢变成图案，像两张脸，一张是侧影，另一张是半正面的，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古怪的名字：“阿尔杰农”和“马默杜克”。我又看我伸开的两手手背，忽然发现一个小指关节上的皱纹变成了第三张脸——小眼睛、扁鼻子、嘴唇弯弯的大嘴巴，表情带点嘲弄但没有恶意。我给“他”取名“麦洛”(2)。

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多年来我热心支持中国的革命，不少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同我有多年私交，我又是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刊物的编辑，我对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转折都是紧跟的，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我

毫不怀疑地投身进去，参加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之一，我常常被邀请到这个或那个造反团的大会主席台上就座，所有造反团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但突然我来到了这里——这是监狱，而且是革命派的监狱，不是反动派的监狱。如果我被关进反动派的监狱，这是我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一个犹太小人物被关押在囚室里，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景。在自虐式的尖刻讽刺的瞬间，我只有抱怨自己。

但这种宿命论的阴暗心理很快过去了。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张要常常问“为什么”，但我很少这样做，或者把问题很快就撇下了。）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这么多老革命最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行刑队的子弹或刽子手的绞索中丧生？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偶然也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思索、思索、再思索。

但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是只求走出囚室，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叛徒或间谍扔出国境——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最大的厄运，是生不如死的“咒逐”(3)，是永远被开除出世界革命队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的队伍——我所要参加的队伍）的最严厉的惩罚，那将使我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遗臭万年”。

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

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的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宁肯死。

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我曾讲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向日军投降后，我曾打定主意，如果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受酷刑致死，就是向侵略者揭发我的朋友、为敌张目，那么我就用刀片割腕自杀。同那时的心态截然相反，这次我没有自杀的打算（虽然在情绪最低沉的时候，这样的念头曾在心头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论我将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再能回去）也是这样。

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我是否能活到这一天很难说，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心潮澎湃，但这一主流思想使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年月里保持清醒。

※　※　※

在这个位于城区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是用来长期关押并教育改造作为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场所。现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对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对过去那些老的“人民公敌”。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在经历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而是“为了进行审查”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亲友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我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称，我常常听到的粗暴的话是：“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

从城区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路上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我使劲地但又非常小心地（免得挨骂）望着车外，押送我的人大概想到我将很长时间看不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以对于我的这种表现也没多加干涉。

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年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它在1949年的解放使我欢欣雀跃，感到这是它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春天。

但我从吉普车车窗里也瞥见了刺眼的新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傅崇碧！”杨是一位长征英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自从关进了城区监狱之后我就被剥夺了看报（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些标语对我来说都成了谜团。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打倒”那么多人呢？

最后，吉普车转上一条小路，驶向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在这座小山背后——可能是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高墙围住的一排排兵营式的建筑物，样式和楼层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秦城监狱大院。进了有栅栏的大门（它使我意识到这是监狱），车子开到一处底层门外，我被交给监管人员。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疲惫之色的中年警官，我站在他面前。他命令我脱掉衣服。我的个人物品全部交出——自来水笔、记事本、钥匙、皮带、钱包、现钞，还有一把小

小的金属铰刀（我尽力向他们解释并使他们相信，这只是我用来清理烟斗的小工具）。他把这些东西一一登记，封存在一个口袋里。发给我的黑色囚服，我怎么穿都不合身，尺码大的太长，长度合适的尺码又太小。他们要我记住，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不准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报号码。号码是五位数，前面两位数是68（表示1968年），后面三位数表示在这一年里我入狱的序号（由此可见，已有几百人在这一年的头三个多月里先我而至了）。

接着，我被带着走上三层楼梯，楼梯旁都张着铁丝网。我猜想这是学苏联的监狱，因为我记得鲍里斯·萨文科夫（原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后为英国干涉军充当特务）就是在“格伯乌”一座主要的监狱里跳楼自杀的(4)，所以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以免囚犯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来消灭证据。到了三层楼上，走进一座铁门便是一排囚室，我被押进了其中的一间。

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说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在以后的年代里，曾经有一部短纪录片《洋人在中国》（Round Eyes in China）讲到我的生活经历，摄制者根据他的想象，把一处布满蜘蛛网、墙壁发霉的地牢说成是曾关过我的囚室，而那个场景实际上是从美国加州蒙特雷一座从西班牙统治时期以来就已荒废的古老牢房里拍来的。

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像中国火车上常见的那种），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

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洁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里，我们曾要求同担负同样工作的中国干部享受同样待遇，大多数成员都自动减薪。）囚室墙壁一片洁白，只在一面墙上有一处污迹，显然是一个血手印留下的。是不是有人企图自杀？还是遭到了毒打？多年以后，我在一位曾蹲过秦城监狱的人（同我不在一层楼）所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的囚室里也有这样一处印迹，那么也许这是故意留下来吓唬人的。

从窥视孔里，我常看到的只有值班看守向内注视的眼睛。但有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的话，我也能从这小小的洞孔里，通过它所正对的外面的大窗户，看到周围田野的一点缩微景色——特别是在秋天，当柿子树的枝头挂满果实，在阳光中闪着金黄色时，那景色真是美丽极了。

我一到就被告知各种规矩。那扇活板门除了送饭以外，还用来把写好的交代材料传递出去；每晚睡觉之前我得把眼镜也从这里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镜片割腕（或者别处的动脉）自杀。（过了几个月，看来他们认为我不像会自杀的样子，所以允许我不用再在睡前交出眼镜。）如果病了或者需要什么得到允准的东西，我得大声喊：“第×××××号报告！”然后就会有人过来。如果服药，我得当着看守的面把药片如数服下，看守注视着我的喉结上下移动，以确认无误。

囚室的房顶灯是日夜不关的，灯泡外面有铁丝网，晚上的灯光起初很亮，后来多少暗下去一点。我是一个睡觉好手，灯亮着对我毫无影响。就寝和午睡时间都是硬性规定的。在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依然有很大影响，所以午睡无论对自由人还是囚徒来说都被认为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睡觉时必须侧身睡，而且要面向大门上的窥视孔——这可苦了我，因为我习惯于右侧睡而现在必须改为左侧睡。还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以便看守能够看得清楚——大概也是为了防止囚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自杀。

伙食很简单，仍然像城里监狱一样，窝窝头或棒子面粥，有一小块腐乳（它富含维生素），偶然有一点肉。大概逢年过节时，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温暖的想念，从而保持希望或决心悔过。这样的伙食安排可能还是从“文革”前延续下来的，还考虑到犯人的营养。对我们的味蕾来说，唯一的佳肴就是蔬菜，在当令时非常鲜美，不需要加任何作料。而且这里的蔬菜就是在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所以甚至于比我们家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也没有在城区监狱里吃烂菜的情形。我想，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食用这样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始终还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

※　※　※

在心理上，初到秦城的那几个晚上是最难熬的。我自己没有挨骂或受摆布，当时和以后也从没有挨过打。但从周边的囚室里传来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被推倒在地上，夹杂着粗暴的命令声：“跪下！”从更远处，通过开着的窗户，传来一个年轻妇女不停的尖叫声：“我要回家！”

几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似乎我刚来时所听到的声响是故意安排来吓唬新到的囚犯的。只是在夏天，当各处的窗户都打开时，我才听到从附近审讯室里传来审问者大发雷霆的问话声和受审者常常带着哭泣的答话声，但他们说了些什么则听不清楚。

很快我就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听到走廊上看守的脚步声伴随着腰间钥匙串的铿锵声和囚室门闩的开关声，我的耳朵就竖起来。他们是在提审什么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吗？今天会轮到我吗？

当时和以后，他们都不准我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把一个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拿进来，让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反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叫，我对他那像乌鸦叫似的噪音越来越觉得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情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但在监狱的其他区域，高音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我使劲地听，有时能听到一点儿广播的内容——不能让我们这些单独监禁的囚犯听到的内容。自从发报纸给我们阅读之后，我能知道新闻了，就只注意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有一天，我听到除了那“老三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外，又添了第四句：“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我知道这是一道新的分水岭，不但点了名而且有了具体的罪状，答辩是不可能的，打倒的对象只能遗臭万年。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决定，或者说是一次中央全会奉命作出的决定。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儿童剧中的台词：

“我将是法医官，我将是陪审员。”
狡诈的“复仇之神”说道，
“我将审讯整个案子，
并将你判处死刑！”(5)

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听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在单独监禁的最初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被剥夺阅读的权利可能是使人在单独监禁中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

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印刷品是监狱发给我的牙粉的包装纸。十分幸运，包装纸是五颜六色的，我把它放在墙上有点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仅有的艺术欣赏。

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每室读半小时；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又过了一年，到1970年，发给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发书时，给了我这样一个警告：这不是一般的书，你要认真学习，以提高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部书。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摞起来的这四本“毛选”上，给值班看守从窥视孔里看到了，他当即厉声责骂，接着又请来一位上级，处理我这一“大不敬、充满敌意”的行为。这位上级怒气冲冲地把我训了一顿。

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书籍。

※　※　※

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大唱《国际歌》，特别着重以下这一段：“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但我注意到报纸的头条标题或消息中林彪的名字不见了，我感到奇怪。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对此表示了关切。林彪是不是病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毛主席身边少了他指定的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是不是担子更重了？接着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不管过去或是现在，这是一条爆炸性的大新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在毛主席那里失宠后想加害毛主席，事败后乘飞机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境内。多年以来，人们天天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任何对林的中伤，如同对毛一样，都是弥天大罪！

我对林彪这个人不感兴趣。1969年中共“九大”不但宣布他将继承毛主席（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在报上看到一张大会的照片，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对党章作相应的修改，我当时就感到事情已经越出了常规，甚至于已经不顾体面。但我又转念一想，是不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为了避免局势恶化而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的情况说明，我的第一个反应比我第二个反应更具理性。

人们应该想到，“文革”并不仅仅是口号、冲突、危机。它开始的时候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尽管事实证明“文革”这种办法是实现不了这些期望的。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值得记住的成就。中国把它自己制造的地球卫星送上了天，从空间轨道上胜利地传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在南京，在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架起了大桥。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桥梁已经规划了很久，起初有美国专家，后来又有俄国专家参与

其事，现在完全由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建造成功。中国保卫了它同苏联接壤的边境，即使武力较量也无所畏惧。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力量被迫远离中国大陆的南方一侧。在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热心地提供了起决定作用的票数，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久被剥夺的席位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由台湾的国民党残余以中国政府自居的闹剧终于收场。最后，美国政府在长达22年的扼杀、破坏和打击均告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立，并将会长久屹立下去——因此，尼克松到北京来了。

林彪垮台以后，我阅读的范围又扩大了一点。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你想看什么书？"我说，我想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者是较为通俗的著作，后者则是相当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家里有这两本书的英文版，所以我先是请求他们把这两本书从我家里取来，但后来我收到的却是两本新买来的中文版。这使我读起来要比读英文版慢得多，但也因此读得更加仔细透彻。

我习惯于在读的书上作记号和作注解，但在囚室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笔和纸只有在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批评时才给，而且写完了就交还——写错了字的纸或用不完的纸也统统要交还。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标记一些重要的段落。我把手纸撕成小条，弄湿了贴在这些段落所在的页边上，干后很易取下，以防检查。幸运的是，他们没来检查过，所以这两部书连同这些手纸小条至今我还保存着。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彻底粉碎了他挑选出来的论敌的论据，而且用正面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难得如此清晰的阐述，

即使在进入论文主体之前，当我读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时，我的内心就感到既伤痛又欢欣。恩格斯谈到在负责任的论战中应有的道德，以及对于在辩论中已被击败的论敌应持的态度。他说：

> 现在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做彻底的修订……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做任何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么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6)

这里所说的“人所共知的情况”是指大学当局因为杜林批评了他们的某些作为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报复。杜林失明的个人不幸，加上这样一件事实，即在他被辞退时，对一个不合格的落选者恩·施韦宁格授予教授职位，就因为这个人是普鲁士政坛领袖俾斯麦的私人医生。

恩格斯的这段话同中国在“文革”中对付“批判”对象所用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是何等强烈的对照！滥施辱骂，把对方从一出生起就说成是个罪犯，满嘴是“砸烂你的狗头”这种语言，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经常迫使人脱离工作单位、家庭和亲人，把他们送去劳改或蹲大狱，尽管像斯大林统治下那种公开的杀害较为少见。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他在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又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平和人道方面，作出了典范，从而加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　※　※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这样一位一生反共的人物来访，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是合理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迫于国际形势的现实。尽管二十多年来，美国——特别是尼克松一类的政客——作了相反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坚如磐石。美国曾经试图从外部加以扼杀，结果在朝鲜遭到挫折、在越南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任何一个自由派或“粉红色”的政治人物，如果同新中国达成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都难免会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化”。所以，只有一个像尼克松这样的老牌右派才可能这样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但要我接受这一现实是很艰难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为工会工作的老记者来说，尼克松就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晚期限制工会权利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而且我一度曾成为麦卡锡分子打击的目标。我不能忘记尼克松是认同这一反动狂潮的，包括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国会议员时抹黑进步候选人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7]的卑劣做法（我在美国时见到过海伦，很喜欢她）。但尼克松确实是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在中国，他都因有助于在两国间架设沟通的桥梁而受到赞誉。

在此之前，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这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信号。欢迎尼克松以官方或私人身份（由他自行选择）访问北京，这是毛对斯诺说的。看到斯诺在听见尼克松的名字时有点惶惑的样子，毛解释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转圜，只能靠有关国家的当权派。同情者虽然能影响舆论，但只有当权派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斯诺在中国的重新出现以及稍后（尼克松访华之前）一些美国老朋友（谢伟思、格兰尼奇夫妇等）的访问新中国，都被狱中审讯人员作为对我进行教育的材料。“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实际上，斯诺和他的妻子洛易斯在私下里曾对毛主席提起我和邱茉莉都被关在狱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此事，将查问一下。但这一谈话是否对于改善我在狱中的待遇以及后来的释放起了作用，很难说。我们的境遇看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全面的举措。我们和夏庇若(8)素无瓜葛，但都在1968年3月被捕，到1973年1月释放。柯鲁克(9)同我们更是毫无关系，但比我们稍早一些时候被捕，也在1973年1月13日释放。

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几个月，确实对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检查。1972年，前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上书毛主席，申诉她的丈夫无辜入狱并受到虐待。毛主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时命令公安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况，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允许犯人控诉。”(10)

邱茉莉和我在狱中并没有听到这一文件，可能因为我们在1973年1月就获释，距这一文件下发不足一个月。稍后获释的人确实听到了这一文件的传达，也有人提出申诉，但由于心有余悸，申诉的人并不很多。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从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对我写出交代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这样的标题几乎是非写不可的。如果我把标题写成"我的海外旅行"或"我和×××相识的经过"，那么换来的很可能是这样的责备："谁管你上哪儿、同谁认识，你要交代的是你的罪行！"

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墙上贴的是号召脱离蒋介石阵营，归向人民一边的一条语录。我说，这条语录对我是不适用的，尽管我为人民服务得不够好，但我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你仍然不认识你自己的错误或你的本质。"另外一次我表示不承认时，他们对我这样分析道："你想不出什么你犯下的罪恶？不奇怪，因为在你心里一定还认为是好事。根子就在于你的顽固的反动立场。这正是你必须改变的东西。回去好好想想。"

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审讯是在一间空屋子里进行的，办案的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稍稍高出地面。受审的人坐在下

面，他的座位是一只上釉的陶瓷圆筒，圆圆的、滑滑的、分量很重，这样可以防止被拎起来当作武器使用。

有时，我被带到一个很闷的小房间里——我心里称之为“恐吓室”。除了惯常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外，还有一些更具威胁性的标语，如“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很明显是以死刑来威胁。虽然我从未挨过打，但有一个面容冷酷的年轻军官（审讯组的成员）曾经在离我头部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动他那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对我说：“赶快供认，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见到过的比你更死硬更骄傲的人多的是。可是到拉出去枪毙时，他们的两条腿都动弹不了了，得把他们像拖沙袋似的拖出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个子军人时，他的眼眶有两个黑圈，是过度疲劳造成的，我对他很同情。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在我这样的案件中受那么大的辛苦？这样的心理反应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被自己人抓起来当罪犯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的。

（很久以后，一位获释的难友告诉我，当她看到一个审问她的安全官员穿着一双磨破了洞的鞋子时，她感动极了，因为这显示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清贫、忠于职责、不计较个人生活。这可以证实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心理反应。）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威胁对我们所造成的精神伤害都不及嘲讽式的排斥那么厉害。当我称审问我的人为“同志”时，他马上回答：“谁是你的同志？！”或者，当我说，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是因为曾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做过一点工作而感到快乐，他们就大声呵斥：“你还敢把你和革命人民混为一谈、侮辱革命人民！”

我们获释后，邱茉莉对我说，她也受到过死刑的威胁，但她没有细说，因为我们很快就不再去回想狱中那些事情，因为我们重获自由后有那么多的“课”要“补”，有那么多新的工作要做。

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审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所有这一切都根据经常重复的那两条原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定。

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插曲。《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同事陈春英被召去参加对我的审问。他对我大声斥骂道：“你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特务。你别想抵赖。证据都在我们的档案柜里。”几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他当时说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他答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这样说的，我也不敢多问。”我们相对一笑了之。

※　※　※

愤怒和压抑只是牢狱生活的一部分，多数时间里是单调的重复，周而复始，所以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叫人高兴。譬如一个月可以向看守要一次指甲刀，用心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同样地，一个月可以刮一次胡子、理一次发，这两件事是用剪子同时进行的，头发和胡子差不多长。一个月冲澡一次或两次，轮流去洗，快洗快回，所以不管是洗澡前后或其间，谁也看不到谁。四年多时间，我甚至于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脸，直到释放前一天才给我一面镜子，让我自己刮胡子。

许多人（不光是邱茉莉和我）怎么能够在长时期的单独囚禁中活下来？当然，有人因沉重的、残酷的虐待而导致健康损坏（有时甚至造成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能够活下来，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是给自己规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经常去做，像吃饭睡觉一样。在体能方面，我打太极拳，这是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学会的。还有“陆上游泳”，弯腰，做自由式游泳动作，有时还把头“伸出水面”去呼吸，可惜不能蹬腿。在心理方面，我不但回想我的全部经历以应付我的“案件”，还在记忆中“重温”那些影响我的主要书籍，甚至于复习我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好几个星期我试图回忆求平方根的方法，但没有成功）。为了娱乐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讲笑话（大多是犹太笑话），还哼歌曲，尽量不出声，因为那些警觉性很高的看守一再告诫：笑和唱歌或哭泣一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企图用一些无聊的举动或自我怜悯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罪恶。

我还玩一些“精神游戏”，其中之一是回想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带Mac（麦克）的名字，按字母次序，从MacAdam（麦克亚当）到MacWhirter（麦克沃特）。另外一个是从事语言学的探索，找出英语词根同法语、德语和俄语词根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游戏”的范畴是无限宽广的。可惜我在下棋和打桥牌这两方面都非常蹩脚，所以不能在自己脑子里玩这两种游戏。但回想我“下臭棋”和“打臭牌”的情形也是极好的自娱。在打桥牌方面，我记得曾对自己开玩笑：我常把朋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就赶快转过身去，把背对着牢门上的窥视孔）。在下棋方面，我记得曾把自己吹嘘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证据是：我对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解释了走法之后，我赢了第一盘而他则赢了第二盘！（这是真事。）

※　※　※

没有人做伴，我在两个小小的活物身上找到了乐趣：一只苍蝇和一只壁虎。我发现这只苍蝇是在星期五，所以就给它取名为“星期五”。我对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那敏捷的活动能力，恨的是它在飞到马桶边沿上之后又飞到了我喝水的杯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想用毛巾或报纸把它扑杀，但始终没有成功。也许因为长度或我的恶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几亿中国人拿着蝇拍打苍蝇，已经使这个国家的苍蝇非常擅长于巧妙的躲避。最终使“星期五”覆灭的还是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无声无息的犯人，他拿着装满杀虫剂的喷雾器。我悲哀而又恭敬地拾起我这个朋友的遗体，放进抽水马桶，付诸东流。

壁虎和我的友谊更为短暂。它常常在天花板上某个它所喜欢的地方猎捕蚊子和小虫，这是既有益又好看的动作，使我对它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有一个做清洁工作的犯人奉命来清扫房顶电灯上的灰尘，在挥动手中的长把扫帚时，把它从天花板打落到地上。它又愤怒又惊慌，急急忙忙从门缝里逃往走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使我十分遗憾。小动物没有了，我转向花草。夏天，我可以在一处四边围起来的小空地上活动身体。在围墙上有往来巡逻的卫兵，我趁他向别处注视的时候，迅速摘一片草叶或一朵小小的野花，藏在上衣里，偷偷拿回囚室，然后偷偷地拿出来欣赏，直到它枯萎，最后像“星期五”那样水葬。这些是我在接触生命上所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人的生命。

※　※　※

最苦的是没有事做。除了保持衣服、床铺和囚室的清洁之外，什么也不准我做。我听见门外有人在打扫走廊，便请求让我去做，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普通犯人可以做，“单独监禁的犯人”不行。我又提出让我去给看守和警卫教英语或者俄语或者两者都教，但也遭到了回绝。

对我提出的这一类请求，回答总是这样一句话：“别去想这些事情，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焦急地想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同样碰了钉子。我无时不在想念邱茉莉和孩子们，回味他们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情。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梳着辫子的小姑娘的照片，那个小姑娘就会变成同样年纪时的我的女儿“妹妹”。儿子“弟弟”在我心头掠过时，他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抓蝈蝈，就是在为一个什么有趣的念头而开心地微笑。有一次，我满含热泪地低声呼唤“英格利”——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犹太依地语词，意思是“小孩”，我母亲在我幼小时常这样呼唤我，但我已经40年没有听见或想到过它了。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直到在狱中的最后一年，我才较为详细地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过得很好。

※　※　※

再简单谈一谈监狱中除了审讯者以外的人员。

正规的看守多数是中年人，在“文革”前受过训练。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多说话，但不作威作福。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推推搡搡，也不嬉笑怒骂。

牢房的警卫大多是年轻的兵士，每隔数月轮换一次。从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有的我听不懂），他们好像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的性格也各异，有的安静，有的爱耍威风。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或者是全部）不知道我的姓名、不了解我的任何情况，只知道我是一个敌人，有一个固定的号码，对我必须加以监视和监督。他们除了从囚室上的窥视孔观察我的动静外，不来打扰我。但偶然有一两次，他们会对我大声呼喝，罚我站两个小时。他们这样做除了要我规规矩矩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沮丧地想起一个父亲的故事，他每到星期六就要把他所有的儿子都狠揍一通。有个朋友问他："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这个父亲一边继续打，一边回答道："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做了错事。"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善意的表现。当我从一所楼房转移到另一所楼房去时，一个警卫不声不响地帮我拿行李，很明显是出于对我这个老年人的敬重或是同情。邱茉莉告诉我，她那里有一个警卫曾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她说：你看起来是个好人，有没有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设的圈套？如果他是对一个他认为无辜的人表示同情，那么她就应该感激他。或者，他本身有反革命的倾向，所以同情一个被称为反革命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应该去举报他，因为他是她所信仰的事业的潜藏敌人。这些问题使她困惑了很长时间。

※　※　※

我不能参加任何公众的庆祝活动，就自己想办法过节。每逢五一节，我肃立着用英语、俄语和汉语低声唱《国际歌》。我在囚室里像在游行那样走来走去，哼着《华沙进行曲》（又名《危险的旋

风》），这是我父亲参加俄国（包括波兰）1905年革命示威游行时唱的歌，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我唱美国工人的歌曲《乔·希尔》或者诵念我在纽约参加游行时所呼的口号：

一二三四，我们不要再打仗！
五六七八，我们不要法西斯国家！

在公众悼念时，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也自己作悼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70年逝世时，我默立致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斗争经历，也回想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星期二邱茉莉和我就会去帮助她印发《中国通讯》的情形。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我也为他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

我接着又为龚澎默哀，她长期受迫害，但在临终前，周总理亲自到病榻旁去探视了她。

※　※　※

前面已经谈到，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女儿“妹妹”我上次见到时是16岁，现在18岁了，看起来身体不错，更高大丰满了，当然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但儿子“弟弟”要是在马路上见到，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离开他时，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的12岁男孩，

现在他比过去好像长高了一英尺，像一只望远镜一下子拔出来一样，成了一个瘦长、匀称的漂亮小伙子。为了纪念这次欢乐的重逢，带他们来的老同事陈春英（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参加审讯我的那位）和蔼地为我们在一起照了相。“妹妹”还在外文局干校（位于北京南面的河北省固安县），是专门到北京来看我的。“弟弟”早些时候已回城，进了一所中学。我同孩子们一直谈得很开心，但当我说（这是监管人员要我这样说的）“为了得到宽大处理，我决心承认和彻底坦白我的错误”时，孩子们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认为我既然无罪可言，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样子来呢？

后来，“弟弟”自己又来看望过我一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妹妹”去看过邱茉莉了，她很好！

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一天，陈春英又来了，还带来北京最好的西服店“红都”的一位裁缝。在量腰围时，陈悄悄对我说，很难买到适合我的裤腰带了。我开玩笑说，最好把我放进一个拉长机里去把我拉拉长。陈对那位裁缝说：“他还是这样幽默。”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了。

※　※　※

后来，我父亲和邱茉莉的妹妹罗丝[(11)]告诉我，我和邱茉莉在狱中时他们曾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父亲曾写信给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回音。他的信是否送达，很难说。但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国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如果认为有此必要）；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象让我赴美将引起的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直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积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了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这对于我和父亲都是安慰，尽管母亲是否知道已不清楚——她已经快到灯尽油干的地步了。妈妈！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邱茉莉也被关押在这里。我说，她同我的父母关系很亲密，可否请她在我给父母的信上写几句附言。这个请求也被准许了。我由此证实，她关押的地方一定离我很近。她看到我写的信，也会知道我离她很近，虽然我不能直接给她写信。

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不像另外一些遭遇麻烦的人，我从未请求他过问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在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我起初并不知道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危险之

中）。更晚一些时候，斯诺的遗孀洛易斯对海外的友人说，她同斯诺在1970年访华时曾同周恩来谈到我和邱茉莉的情况，周告诉他们，我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狱。我们出狱的时间虽然没有那么快，但这个消息传到了邱茉莉妹妹罗丝那里，使她产生了希望。是不是这个消息又传到了我父亲那里，他才给周总理写信的呢?

直到2001年，也就是这封信发出40年之后，我才看到这封信的副本，是在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遗物中发现并由她的长女寄给我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删节）：

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问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上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对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他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　※　※

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说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至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家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后的获释。

（沈苏儒　译）

(1) ［译者注］卡夫卡（Franz Kafa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先驱，作品象征20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词有恐怖、怪诞、神秘的含义。

(2) ［译者注］麦洛（Miol），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摔跤能手，多次获奥林匹克比赛捧跤冠军。他的名字代表力量。

(3) ［译者注］原文anathema是宗教用词，意为“用诅咒逐出教会”。

(4) ［译者注］鲍里斯·萨文科夫（Boris Savinkov）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中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分子首领，行刺列宁的手枪就是由他交给刺客的。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20年后在波兰组织了三万人的反动武装，在捷克成立“绿卫兵”。他又是小说家，邱吉尔称他为“精通文学的杀人犯”。1924年在偷越苏联国境时被捕获，初判死刑，因坦白交代改判十年徒刑，1925年在监狱中跳楼自杀。“格伯乌”（GPU）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俄文名称缩写，1922年成立，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会。

(5) ［译者注］这段台词来自全世界最流行的最著名的童话之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说话的是一只名为“复仇之神”的狗。这部童话的作者是英国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此书于1865年出版。

(6) ［译者注］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9—50页，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

(7) ［译者注］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当时美国一位有进步思想的电影明星，曾参与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尼克松用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谰言对她进行攻击。

(8)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新华社工作的老专家。

(9)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老教授。

(10) ［译者注］据《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2页《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972年12月18日致李震、杨杰、吴庆彤》，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11) ［译者注］罗莎蒙德的昵称。

第二十九章　重获自由

出狱以后，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才慢慢地适应自由的生活。在生理方面，由于长时间不走路，我们的两条腿受到暂时的损害，上楼梯（我们的家在三楼，办公室在四楼）或在户外稍作走动，肌肉就颤抖、发僵或者痉挛。在心理方面，我们无休止地来回谈论我们在监牢里的遭遇。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再说，适度的惩罚对两者都有好处，对无辜者来说可以弄清他们的问题，还其清白。我们还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争论。邱茉莉主张把过去的东西和书信文稿统统销毁——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则比较保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满地狼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她要我“挑出来烧掉”的书信文稿——重新一一归位。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俩都没有因为蹲了几年监狱而心存怨恨。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信中，我们一如既往，热情地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邱茉莉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

> 艾培、弟弟和我去了一趟河南省，参观了全国闻名的红旗渠。这是条人造河流，浇灌着全县范围内昔日荒凉贫瘠的土地。它好似在一尊顶天立地的石头巨人身上安了一副血液循环系统，令人叹为观止。而最为壮观的部分，也许要算是从太行山下的一条河里引水上山，以及河水顺着愣是在坚硬如铁的岩坡上凿出来

的渠道流淌。犹如血液突然注入人体流遍全身一般，大地顿时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碧绿的麦苗和年轻的果木。

不久，邱茉莉接受了一件她喜欢的新工作——教我们杂志社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她对教学工作知之甚少，就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中国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语法规则的学究式老方法，是学不到新鲜活泼的语言的，因此她说："如果你们能把你们对直接教学方法的体会、意见和效果告诉我，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想尽快找出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年轻人……"她还说："改稿和教书这两样工作比较起来，我更愿意选择教书，因为你们才真正贴近人民。"

她对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兴趣始终如一；又因为这期间有过一段空白（我们在狱中同外界隔绝），所以兴趣更加浓厚。她写道：

> 我刚读完一本描写1968年（法国）学生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书。整个运动的规模之浩大，我现在才算有了更多的了解。看来，这场运动势如暴风骤雨，猛烈冲击旧秩序，吓得当权者们六神无主。

以及：

> 昨天晚上，我们同几位来访的美国朋友讨论了水门丑闻的后果以及尼克松被弹劾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可能。他将跟各种势力，左的和右的，达成一连串的交易。但（他）正坐在火山的边缘上……不知"狡猾的狄克"将怎样摆脱这一困境！用艾培的话来说，他还能依靠基辛格这张皮子坚持多久？

她也关注苏联的情况，对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行为不能保持沉默。1974年2月，她在给我们的朋友耿丽淑的信中写道：

> 我读过他的作品和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讲话……他是一个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试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

邱茉莉对农业始终一往情深。阳早和寒春当时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工作，邱茉莉给她的亲戚写信，向他们咨询购置新设备的情况。阳早是纽约上州的一个世袭牧场主，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寒春在大学里读的是原子物理专业，成绩优异，但她不愿为美国的军工厂制造武器，宁愿到中国来养牛。邱茉莉的一位妹夫是英国农民，她向他打听现代化的电力和真空搏动挤奶机，还询问每种机器的挤奶管与奶牛场的输奶管道的接头是什么模样。

一年后，我们到美国和英国旅游时，给阳早和寒春带回了成熟公牛的干冰冷冻精子。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我们遇上了反恐怖分子的紧急戒严行动，险些失去它。手提卡宾枪的士兵驾着摩托车，在机场的室内区域来回巡逻，检查人员连旅客的相机镜头都要打开，查看胶卷盒里是否藏有爆炸装置。幸运得很，当我们说是“精子”时，德国检查人员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居然没有坚持要我们打开冷冻罐。也许他们当中有一位是农家子弟吧——谁知道呢？

在我们出发旅行（探望我在纽约的老父和邱茉莉在英国的众多亲戚，仅罗莎蒙德妹妹一家就有八个子女和几个孙子孙女）之前，我们还参加了一次体力劳动。当时，机关干部轮流参加劳动的规定还没有取消，我们一向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写道：

……艾培和我即将去参加劳动——为我们外文局新的职工住宅挖地基。基建任务很繁重——住宅楼、办公楼、道路、下水道等等。

我还参加过挖地下防空系统的劳动，这一点邱茉莉在信里没有提及。当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一旦遭到核打击，北京市民便可以从这些四通八达、互相连贯的地道里撤走。我们的儿子艾颂平（小名“弟弟”）正在进行半工半读。邱茉莉在给她英国亲族的信里写道：

弟弟在技术学校里学习冶金机械制造。目前全校师生正在农村向农民学习，期限半年。他情绪很好，每月回来休息四天。

为了给这次出国旅行做准备，邱茉莉申请办理中国驾驶执照——一种能为英国等国家承认的国际旅行驾驶执照。虽然她从十几岁起就开车，但那些执照早已老掉了牙，因此申请碰到了困难。她在信里写道：

一般来说，他们（中国）不给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颁发驾驶证。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在英国旅行没有车是多么困难……上次访问英国时，我们在那里总共待了四个星期，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浪费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

实际上，当她重新把握方向盘的时候，发现她的老经验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了。车速、车辆本身、交通规则等如今都已大不一样。她的农夫哥哥为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车，供我们暂时使用。我们开着这辆车，有一次险些被后面一辆快速行进的豹牌汽车撞出路面。总算没有被撞上，万幸。

在出狱后回到北京家里和工作单位的头几个月里，邱茉莉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关心公共福利。在给我们出版社领导的一封信里，她写道：

> 在（外国专家居住的）东楼，每星期四、六下午4点30分至5点30分供应热水……只在上班时间供应。这就意味着家住东楼的同志们要么洗不上澡，要么利用办公时间去洗澡。有些同志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锅炉房的工作时间必须跟办公时间一致。这似乎很不合乎情理，就像炊事员要求他们的工作时间跟办公时间一致一样。

这一情况表明，即使是我们这些享受特殊待遇的外国人，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是何等艰苦。但她并不是要为自己争特殊待遇，而是一如既往为他人争取公平待遇。她继续写道：

> 第二点，东楼每星期供应两次热水，而（中国职工居住的）西楼一次热水都没有。听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煤炭。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把这些烧热水的燃料平均分配。把东楼的热水供应由每周两次减为一次，而给西楼每周供应一次热水。与此同时，调整供水时间，使之更加方便职工。

在家务琐事方面，我们的大女儿艾颂雅（小名“妹妹”）正在学习编织工艺品。邱茉莉给她的妹妹写信说：“要是你手头有编织之类的书籍，请寄来。”

综上所述，拉拉杂杂，可以窥见我们正在迅速而全面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钱雨润　译）

第三十章　我失去了邱茉莉

邱茉莉是1984年9月24日去世的，离她的79岁生日只差几天。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

头天晚上，在医院里，她显得神志清醒、安宁，甚至于可以说心情愉快。第二天一早5点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入弥留状态，等我赶到时，她已经走了。

我们共同生活了41年，“形同一体”，心心相印，这样的共同生活现在突然中断了。我们两人已变得如此密不可分，朋友们和同事们在说到“邱茉莉和艾培”时，几乎是当作一个人来称呼的。

现在，我们被分隔开了。从我们结合（那时我26岁）到她离我而去（我已69岁），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音符，现在消失了。

护士对我说，在她回光返照的瞬间，她曾呼唤我。使我终身抱憾的是，我没有在她身旁，没有握住她的手、帮她闭上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并且亲吻它们。见到她的遗容，我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回家以后，有两天两夜，我不停地阅读她所喜爱的两位作家威廉·布莱克和威廉·莫里斯[1]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最早启发她的心智，去追求社会公正和进步。她给我朗诵这些作品的声音顿时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又找出她过去和最近给我的信札来翻阅。

她的遗体火化后，我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去做她会要求我做的事情——继续完成我的（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不到一星期我就乘车去武汉，按原定计划，在纪念我们的友人史沫特莱的集会上发表演

讲。史沫特莱为人坦率，有时非常严肃，有时却又非常爱开玩笑。在这次会上，她似乎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和邱茉莉）的面前，我们曾经共同为之奋斗的一切似乎也都活生生地重现了。回来之后，我不再流泪——除非有时突然悲从中来，泪水会在我眼中滚动。

※　※　※

我们也许不能共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我们曾经想到过的。最初，邱茉莉是不大愿意同我结婚的。她说，她比我大九岁，她会比我先老，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又比我先死，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后来我们终于结了婚，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我们就不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改变了。她设想，我们会在一起度过晚年，像一条河边的两株古树。再后来，癌症摧毁了她的结实的身体，但始终没有影响她开朗的精神。

※　※　※

邱茉莉在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显得光彩照人。

我记得1944年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次聚会上，房间里烟雾腾腾，她从斜对面走来，那时她30多岁，一个同事看见她时忽然说道：“她多美呀！”

我们的老朋友、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久在海外，1984年重访北京，到医院里来看望她。

这时她已年近80岁，重病在身，万徒勒里一见她却大声说道：“你多美呀！”这时，她为欢迎老友而显露出来的无力的微笑不但使她满脸生辉，而且似乎也使满室生辉了。

※　※　※

邱茉莉自己体质很好，所以她过去总不愿意承认她会病倒。我有点什么病，她总是说：“别愁眉苦脸，向疾病开战！”她的话总是会对我产生“药到病除”的作用。有一天，她说起在一个乳房里似乎有点什么东西，她觉得有点奇怪，但不是害怕。我坚持要她去医院检查，她最后勉强同意了。检查结果发现，有一个相当大的肿块，医生决定要给她动一次切除乳腺的大手术。手术前一天，她同我一起去参观为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而举办的展览会，她同老朋友们一起回忆斯诺，意兴盎然。术后，医生告诉我，预后不好，淋巴腺也有问题。但她很快就起床了，并且又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开始时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们到福建去旅行，她在爬山时走得比我和别人都快。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去北戴河海滨度假。虽然她因长期治疗稍感疲惫，但我们还是一道游泳和长时间散步。

后来，骨痛和长期化疗对身体的损害出现了，她开始连续几个月卧床。

当她感到看书有困难时，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朋友们从美国纽约寄来的录音读物。我们在一起听，欣赏和讨论各种不同的作品——从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到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2)

直到临终，她没有感到疼痛（曾出现过的骨痛，时间不长就靠放疗止住了）。当我们把一个新生的孙子抱去给她看时，她的笑容仿佛是明媚的阳光。经常有中外友人和同事们来看望她——外国朋友来自许多不同国家，西方的、东方的、中东的。她的妹妹罗莎蒙德同丈夫从英国飞来。客人们说，他们本来是来慰问她的，结果却反而是她的开朗使他们得到了安慰。

直到最后一息，她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新闻以及她所献身的事业。使她在卧床的最后几个月里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工合”恢复了活动，在“二战”期间她曾长期为之努力工作。在接受被提名为“工合”促进委员会成员时，她说：“我还想再干点什么。”

为邱茉莉诊治的吴蔚然大夫是世界知名的外科专家，负责中国重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其他“中国通”（同中国革命共命运的外国人）的好朋友。只要事关保健，再小的事他也关心，再大的事他也会给你帮助和勇气。

对邱茉莉的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同她相识多年的几百位生前友好前来参加。在送往火葬场时，按照中国现代的习俗，应由长子或长女手捧逝者的照片，走在最前面。我们的养女颂雅年纪比养子颂平稍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颂雅表情严肃，忍着眼泪，颂平由于悲伤，本来很高的个子显得有点弯腰屈背了。（邱茉莉给颂平取了一个英文名字Robin，但他很少用。）

我和邱茉莉婚后没有生育，曾经为她做过手术补救，但失败了。对她来说，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热爱的对象。她曾帮助过北京的一所小学。在她病中，小学生们经常到她的病榻旁来看望她，她总是快乐地接待他们。他们送给她手工制作的花环，她请护士把它放在她从床上可以望得见的地方。他们送给她的一条少年先锋队红领巾，作为青春和世界更美好的象征，最后被放进了她的骨灰盒，安置在八宝山。

她的骨灰有一部分由她的妹妹罗莎蒙德带回英国，安葬在祖籍约克郡勃兰斯比村教堂墓地她父母的墓旁。

正是在悼念她的时刻，她的一些少女时期的朋友回忆起她的性格、她的善良的内心、她的天真的幽默感所给予她们的深刻影响——这些在前面第三章中已经述及。

邱茉莉留下来的遗作，有关于中国的许多文章、“中国工合”的工作报告、许多信函和笔记（笔记多数是速记的，她有速记的专长）。

她的人生之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深邃宽广的。

※　※　※

我在30年中曾四次访问西藏，第三次特别带有个人感情的回忆，因为邱茉莉与我同去。她是那样坚强，令我敬佩，所以我在《西藏的变迁》一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献词：“献给邱茉莉，她勇敢无畏，世界屋脊何所惧！没有她，我什么书也写不出来。”

的确如此，那时邱茉莉已经七十多岁了，心脏不好，而且摔了一跤，刚刚恢复过来。她是为一个朋友送药，追赶公共汽车，踩在冰上滑倒的。她摔坏了踝骨，刚去掉夹板不久，行走仍需拄拐杖。但是，她仍然坚决要去西藏。

一到了西藏，她尽量隐瞒自己在3000至5000米以上的高度时出现的高山反应。在这方面，她得到了一个陪伴她的年轻医生的帮助。这个医生看到她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非常尊敬她，表示愿意负责她的安全。（如果邱茉莉到拉萨的医院进行检查，那些关心爱护她的医疗专家们，为了“确保外国专家万无一失”，会立即把她送回北京的。）她坚持着，喘着大气，不断从氧气袋里吸氧，从年轻医生的医包里拿药吃。她扔掉了原先细细的手杖，换了一根像童子军棒那样又粗又长的

拐杖，咯噔咯噔地吃力地走着，跟我们一起在西藏度过了六个星期的愉快时光。

在我的心中，邱茉莉同西藏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我们的共同生活一样。

※　※　※

她未能活到80岁（我70岁），只差不到一年光景。我70岁时，邓小平和邓颖超亲自前来参加生日聚会，使我倍感荣幸。

当时邓小平已81高龄，兴致极高。他问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我说差不多有五年。他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指他被罢黜、放逐和软禁加在一起的时间。）我六岁的外孙宁宁扑进他的怀里，他亲吻了宁宁。（我写本书的时候，宁宁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体重200磅，身高四英尺。）他替我点烟，我们一起抽烟。这件事招来了第二天我接到的一个电话，责备我：“你和邓小平给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你们在电视上抽烟。”（我戒烟已多年了，但不是由于这个电话。）邓颖超在会见时又提起了大约40年前我们从天津一起逃出日本魔掌的往事。

我为中国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而得到荣誉，其实我做的好事中有许多是同邱茉莉一道做的。她如果健在，一定会为这样的生日聚会感到高兴，特别是聚会的那种非正式的轻松气氛。

这是人民共和国所发扬的国际主义传统。在早些年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每年生日，周恩来总理总要以私人的方式到斯特朗家中去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斯特朗80寿辰，毛主席宴请了她和她的

朋友。马海德医生祖籍黎巴嫩，很早就志愿为中国红军提供医疗服务，后因在中国防治麻风病卓有成效而蜚声国际。他原为美国籍，后改入中国籍。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合作社的组织者，作家、诗人。为他们两位都举行过全国性的祝贺招待会。这些表示赞扬的活动只为国际友人举办。对本国党员，中国共产党禁止为他们举行公众的祝寿活动或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任何地方，甚至于一条街道。

※　※　※

邱茉莉品格高洁，性情率直。她受了伤，从不哭泣，尽管有时泪珠会在眼眶里滚动，但也不是自怜。有争论时，哪怕争得面红耳赤，她如果赢了，也从不自夸或耻笑对方；如果事情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她不会用那种“我早就对你说过”的口吻说话。她从不板着脸对人。

对于那些被压迫的、不幸的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成功的人，她充满同情。这种同情心从这样一件身边小事上也表现出来：她只要看见瘸腿的小狗在栅栏前爬不过去，总要主动地去扶它一把，不管这样做是否值得。她的同情心升华为她的政治理念。

她经常是先人后己。有一次她患急症就医，我回想当时情况，写下了这样几行诗句：

当医务人员在你身旁，
为挽救你危险中的生命，
紧张地交谈和操作时，
你却说：“请小声一些，
别打扰了邻室的病友。”

关于她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写了这样几行：

为了中国人民，
历经四十个春秋，
你献出了你的全部心血。
现在你自己在向死神抗争，
中国儿女的鲜血，
不断地流进你的血管。
在你体内，
东方和西方的精华，
汇聚成一道长河。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我的邱茉莉那样生活下去，像她那样忠诚，并且用她那种乐观的坚毅精神去面对危险、疾病和死亡。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同情美国独立战争，支持法国1789年革命，歌颂人道和社会主义。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被公认为19世纪伟人之一。

(2) ［译者注］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Mother Courage）于1949年在东柏林首演，获得成功。巴尔齐尼（Luigi Barzini），意大利当代作家、记者，《意大利人》是他的文集之一。

第三十一章　夕阳之歌

在我生命的夕阳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1/5，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作出贡献的。

很久以前，也就是1947年，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所说的革命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1949年完成了。但这只是一个阶段——尽管是如此重大和具决定性的阶段。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它只是通向未来若干新阶段的入口，这些新阶段也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及其延伸。

个人的生命同民族和社会一样，在物质上它们都会终止，但影响会留存下来，成为更大潮流的积极或消极成分。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人类活动——个别的或集体的——都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它有多个阶段，这些阶段本身可能成为主要的历史分水岭。

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就标志着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它不但对占人类1/5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次胜利，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次胜利，因为中国革命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中国革命把这个巨大的国家从一百多年的屈辱中解脱出来，取得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平等的地位——无数爱国志士为此前仆后继地流血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斗争的舵把，并把斗争引向胜利，这个目的才最后实现。

对中国人民来说，到21世纪初，这一革命已使人们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70岁以上，婴儿死亡率从全球最高下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每年以8%左右的增长率发展，其速度居全世界首位。这里仅举一例：中国的钢年产量现在已达两亿吨，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成就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在1949年它的产量只有100万吨。当然，总产量并不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中国在若干质量方面尚有待于提高（如高品位钢尚需大量进口），中国在技术层面上的进展也是很可观的。

在高科技的研究和技术方面，新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在国防方面，他们迅速地获得了核能力，从而遏制了经常出现的核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航天方面，中国已居于世界前列。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并在遨游地球14圈后，在16日安全、准确地降落在内蒙古草原。中国继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

中国的农业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工业，但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仍在增加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富余作为储备粮。这一成绩是在不同

地区经常遭受各种不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有些地区易涝，有些地区易旱，有些地区旱涝相继。为了应对这些自然灾害，许多巨大的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即将上马，其中有全世界最高的长江三峡大坝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在此期间，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这些农村人口正逐步向大大小小的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达40%以上。今天，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在城镇长期或短期就业，城镇中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都主要是由“农民工”建成的。政府现正设法帮助这些“农民工”解决他们在城市合法居住、按时领到工资、参加工会、子女就学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设法避免了出现城市中摩天大楼被无数贫民窟所包围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是常见的，令人感到沮丧。继续保持社会不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是对中国领导层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项考验。

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在社会和个人生活方面畸轻畸重的局面。例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变，传统的邻里关系削弱了。孤居独处的程度越来越高，住在高层公寓里的人家往往连隔壁的邻居也不认识。志愿组成的居民委员会正在努力创建一种社区生活的体制。在我家所在的公寓大楼里就建立了这样一些服务，包括为全楼雇工（主要来自农村，有的从未上过学，有的只念过几年小学）开办一所学校，教师大多是居民中的退休人员，他们是义务工作的。

从建筑及社会的角度看，北京传统民居的消除有时显得过分了一些。除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迹以及一般的中文牌匾之外，人们在北京会感觉到如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北京的特色似乎消失

了。但是，有些对“过去的好日子”的怀旧感——特别是在本地的英文报纸上——使我这个经历过新旧两个北京的人感到是摆错了位置、是为旧统治者唱赞歌，甚至令人厌恶。是谁的“好日子”？当然，一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它的历史氛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地由旧统治者来决定的。但革命不应消失在过去之中，因为革命本身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最新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或者，如同一句中国古老谚语所说，“饮水莫忘掘井人”。

新中国的成长从来不是易事，它不仅把福祉带给中国人民，也带给全世界。

新中国对和平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人们只要思考一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诞生、没有生存下来、没有保卫住自己并繁荣起来，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中国被日本征服，会怎么样？是不是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会变得有利于法西斯轴心国取得胜利？

或者，如果在冷战时期，中国被“半永久性”地分成两半，分别属于当时两大超级强国的势力范围（如同朝鲜半岛为38度线、越南为17度线分成两半，在疆域辽阔的中国，这条分界线可能会沿黄河或长江绵延数千公里），引发不断的冲突，直接增加了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后果又将如何？

幸运的是，上面说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立、巩固和保卫了新中国，维护了在上个世纪屡遭践踏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带来的福祉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中止，反而以各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为了减轻全球人口对地球资源的压力，中国现在要求全国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

※　※　※

中国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所出现的其他变革——包括国内的改革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自然也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

我更多地去外国旅行，恢复老的关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关系。

我的私交中新增加的重要一员是史迪威将军的家属。1947年，在他去世后不久，我把那一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献给他和另外一些为世界人民共同进步而携手的先进分子。现在，在新中国，在公开场合，我同另外一些怀念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旧友一起，举行了纪念他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在山城重庆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重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首都，史迪威将军在这里的故居已改建成他的纪念馆。在这些活动中，我是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参加的，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团体的副会长。

我去了两三次英国，同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大家族（八个子女和几十个孙辈）恢复了联系，他们不分老少都称我“艾培叔叔”。

在中国，我愉快地重新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恢复得到了多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赞助，其中有长期关心合作社事业的陈翰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促进

者之一薛暮桥等人。在外国成员中有主要负责人路易·艾黎（他已年届高龄）、海伦·斯诺（最早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邱茉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同这一事业有关系）和我自己。邱茉莉一向致力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社事业。当时，她已因病卧床，但她仍然坚持要分给她具体任务，不愿意只是挂个空名。

埃德加·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次新闻同业赴瑞士的访问中，以及60年代中期他重访中国时，我们都曾亲切地重逢。他那次重访中国后撰写了《大河彼岸》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已不再像在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可以做白宫的座上客，而是为华府所藐视——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对他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几年以后，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地在北京出现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斯诺，对他关于重建中美关系的先见之明大加赞美。当时斯诺已病入膏肓，他大概想到尼克松过去在这方面长期的负面作用，所以没有作复。不过，如果他身体还能支撑的话，他一定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庞大记者团中居于显要的位置，因为促使美国和新中国和好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前所述，美中关系的改善过程不可避免地但缓慢地在前进，导致下一个重大步骤——1979年两国建交。

在多次访美中，我恢复了许多老关系，其中有休·迪恩，他成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市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在纽约时几乎都在他那里住。在访问加州时，我和浣碧经常受到定居旧金山的鲍惠尔夫妇的热情款待；在洛杉矶，我们住在嫡堂妹比巴家；在弗里蒙特则住在女儿颂雅家。

美国华裔杨孟东在“二战”时期是美军军官，曾任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他和他的夫人海伦都是新中国的友人。他们曾在北京住过，海伦对长征中的女红军做了很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选择革命——长征中的女战士》一书，由伊利诺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英文著作。我在他们居京期间以及我访问美国西海岸时，多次同杨孟东聚谈。

※　※　※

在北京，我仍忙于《中国建设》（1990年后易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工作（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并同宋庆龄继续保持经常接触。

宋庆龄在“文革”期间曾被迫保持缄默长达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她个人经历了多少可怕的震撼，包括她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被破坏、被发掘——“红卫兵”这样胡作非为的借口是：他们是蒋介石的岳父母。“四人帮”垮台之后，她不顾自己已届80高龄、又体弱多病，以新喷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从事写作和其他活动。她更多地为《中国建设》写稿。她仍像往常一样，在原则性问题上坚定不移，在个人方面则非常谦逊。她听到有人传说，她的文章是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的，为此十分生气，写信告诉我，她对于任何改进的建议都是热诚欢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她在上海居留的时间较长。她创立的“中国福利会”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里曾处于半瘫痪状态，她使之恢复了生气。她把这个过去主要是地方性的事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值得注意的还有同台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交流活动，这是对国家统一大业的贡献。

她对新技术以及儿童早期课外活动的强烈兴趣特别值得称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就曾陪同我和邱茉莉去参观过上海儿童文化宫的计算机房——在当时设备是相当好的。更有重要意义的是，邓小平有一次到上海视察时，她设法安排他去参观这些设备并同在那里学习的孩子们谈话。他这样做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孩子们加以鼓励。后来，这些孩子们中间出了好几位计算机高级专家。

中福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现在它又努力使少年儿童能在将来担当起现代化的重任。

在那些年里，中福会还发起了多项中国和外国少年儿童的交流活动，包括青少年戏剧和音乐的演出。人在少儿时期记忆力最好，并且容易形成终身的爱好。所以，这样一些交流活动会激发相互欣赏的兴趣，为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播下种子。

※　※　※

宋庆龄因患白血病不幸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6月1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节），我悲哀地获得了同她另外一些老朋友一道为她守灵的特殊待遇。

同一天晚上，我写了一段短短的散文，题目是《为宋庆龄守灵后的感想》。这一作品的原稿失落了很久，后来才找到，下面是中译文：

她安卧在花丛中，仍像生前那样沉静。

她的沉静完全不是来自对现实世界及其纷争的逃避。

在过去的70年中，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是亲自参加的，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以她的努力和勇气作出贡献。

在斗争中，她从不躲在别人背后。她总是勇敢地走在最前列，去帮助和保护别人——这已成了她的本能和习惯。

也许正是这种沉静——它来自一个战士对斗争胜利的信心，使她看起来并未受到衰老和疾病的摧残。

她已近90高龄，但看上去永远绽放着青春的柔和光辉，不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

真的，她即使是在长眠中，看起来仍不过像是闭上眼睛作片刻休息。

她会重新睁开眼睛，再次用她那温和而清晰的声音讲话，再次用她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写作，再次用她那果断的精神和高效的速度去斗争——更主要的是——去工作！

这种精神和速度作为她的个人作风，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日子。

看到她安卧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红旗，我没有想到要对她说："安息吧！"我能说的只是："工作下去，战斗下去，无与伦比的同志。"

这是她肯定会做到的——在熟悉她的那些人心中，在今天"六一"儿童节前来向她告别的千万儿童的心中，在尚未出生的许许多多孩子的心中，在未来无数代人的心中。

1981年6月1日

我后来又写了一首诗，以寄托我对她的怀念之情，那是在1984年1月27日在上海参加她的雕像揭幕仪式时所作（这座雕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中）。当年第5期《中国建设》各文版以《宋庆龄颂》为题刊载了这篇诗作，纪念她逝世三周年，中译文如下：

怀念你啊，已经三易星霜，
你以美、勇敢、坚贞，
为我们的时代增光。
艰难险阻中的一盏明灯，
胜利中的一部欢快乐章。

上海姑娘，
热情、沉静、闪闪发光，
你的成长多么不寻常。
受的是外国教育，
却终身为的是祖国家乡，
选择的是斗争道路，
尽管在安乐中生长。
跟前线的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共患难的则是地下的共产党，
你的一切都为了人民、革命、儿童、未来的希望，
当空是启明星的曙光。

谦虚，却受到全世界的景仰；
优美，却永远不屈不挠；

温和，却像钢铁一样坚强。
比你的汉白玉雕像还要持久，
你那压制不住的精神力量，
纯洁、不知疲倦、无畏，始终一样，
点燃起新的、年轻的心，
为新的世纪增色生光。

1975年，宋庆龄要我在她身后写她的传记。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同我谈话——这本来是写她的传记所需要的。尽管如此，我花了大约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1992年11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1)一书出版。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虽然没有被译成其他西方国家文字，却有日文版和朝文版，而且中文版经北京人民出版社授权台湾日臻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在写作本章的时候，由泰国方面建议，泰文版正在出版过程中。很显然，宋庆龄作为一位亚洲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在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受到注意和景仰。

※　※　※

1979年，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胡耀邦——一位在许多领域倡导改革的勇敢的先驱者——扩大了中国许多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在对外宣传系统，他的一项突破性改革是请有外国血统并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来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最好地为外国读者写作。

他在1979年3月13日的指示是这样说的：“外国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同志长期无动于衷，应从根本上考虑专家的职权问题。可否先搞一

两个刊物，请他们作主编，我们的人改作顾问，试它半年，然后再定办法。”(2)

根据这一批示的精神，我在当年5月被任命为我们的刊物《中国建设》（现更名为《今日中国》）的总编辑，负责业务工作。我不是唯一被赋予负责岗位的外国人，但只有我接受了这样的职位，其他人都还心有余悸。因为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在“文革”时期，人们的职位越高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批斗和被推翻。我从开会宣布对我这一任命的房间出来后，在楼梯上就听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表示高兴和友好，也有人嘲讽说：“爱泼斯坦一定还想回去蹲大狱！”

我把这一任命看作一项荣誉，尽管我在“文革”前曾任刊物的“执行编辑”，日常工作同总编辑差不了多少。我的新闻工作经验以及我支持中国革命的记录，受到了宋庆龄和社内外许多人士的重视。

我出狱以后并没有立即回《中国建设》工作。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为外文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务是英文改稿和给年轻同志上英文课，这对我是新鲜事。我从中学到的一条是：他们对英文文法知道得比我多。我们在书上碰到一个英文句子，一个年轻人说，“这是nominative absolute（分词的独立主格）。”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仍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对他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　※　※

1976年初，当时“文革”已进入尾声，但尚未完全结束，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这是群众自发的活动，延续了好多天。广场逐渐为花圈所覆盖，大多数用的是白色（在中国，丧事用白色）纸花或绢花，工厂工人则用金属制作的花。在广场内和四

周，挂满了无数悼念的诗词，有的是专业作家写的，但多数是普通老百姓的创作。由于“四人帮”的煽惑（“四人帮”是这些悼念作品的矛头所向），广场上所有悼念的花圈和诗文突然被清除，群众十分气愤，引发了多起冲突和逮捕事件。官方把群众的情绪反应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场抄录这些悼念诗文的北京市民被强行制止，拍摄现场照片的被勒令交出胶卷——我也未能幸免。人们佩戴的黑纱要拿掉——有人不听。多年以后，这些悼念的诗文结集出版，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怀念。

1984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毛泽东就是在政协的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在其后的五年中，它是中国最高的人民代表组织。1954年制订宪法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政协”仍然存在，但其性质变为广泛统一战线的“智库”，可向政府提出建议——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合。为此，它吸纳了各界的专业人才，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在“文革”期间，由于政协委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作“臭老九”，只配去接受“再教育”——因此连开会都不准。后来政协恢复，它的工作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全部致力于为委员们进行政治上的平反。之后，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包含了广泛的智力资源——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大发展中培养出来的。在政治上，它继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时候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所占的名额不超过1/3，其他的成员多数来自曾在革命中支持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还有一些人士（其中有人曾在旧政权中居军政高位）经各种途径达到了同样的立场。这可以作为周恩来在1944年对我和邱茉莉所作预言的实现。当时他对我们说，不管有没有他（指蒋介石）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一定会在中国产生。

事实上，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对他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他的许多部下最后已经这样做了）。蒋却宁肯躲在美国舰队的屏障后面，在台湾苟安。但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需要多长的时间，历史的逻辑终究不会允许继续把中国一分为二的。

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过程颇为奇特，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早在1966年初，我的老友、30年代“保盟”同事廖梦醒打电话给我，对我即将参加全国政协表示祝贺（她本人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直到5月份“文革”开始时，我也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全国政协本身瘫痪了。我再次听说将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是十年之后。但我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是在1984年，起初是全国政协委员（共约2000人），后来是常委（共约200人）。政协有各级组织，从全国委员会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委员会，各级政协委员会的总人数当时共有30万，现在大约已增至50万。它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员平均年龄则越来越低——在开会时，人们会看到60岁以上头发花白或秃顶的人越来越少，40岁或小于40岁的黑发人则越来越多了。

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国事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建议和意见。我口头或书面提出过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

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支持许多委员会的下述要求：对于因贪污或其他腐败行为而导致的行政渎职罪行，政协应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

在多次政协会议上，有时同别的委员联名，有时单独提出，我促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合作社法”。中国虽然多年来在宪法中把合作社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农业合作化曾推行过（匆促地推进到人民公社这一高潮），后来就放弃了。但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如运输和销售，合作社仍是很有用处的——许多国家都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自己曾长期参与中国“工合”运动，还参观过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企业和社区，获得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从小作坊逐步发展成采用现代技术的产业。我始终认为，创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对中国是有益的。

全国政协除不断扩充成员外，也进行一些自我整肃的工作，如清除侵吞公款等弊端。

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随着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的增加，一方面有力地促使物质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却也滋生了许多弊端，腐败现象不幸随之加剧。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相对来说较为贫穷，但极诚实。国民党的腐败和胡作非为，人们对之记忆犹新，清除这些弊政成了广泛的自发的要求，如同人人把手弄脏了就要洗净一样，所以促使大家严格要求做到忠诚老实。

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也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在旧中国，卖淫主要是由于贫穷。经常的饥荒使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把女儿卖掉，以免饿死。现在卖淫重新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在吃饱穿暖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花，包括极少数大学生，她们想“傍大款”、进入高消费阶层。这同两性关系有更大自由是两码事，后者是随

中国妇女在取得平等地位上总体进步而取得的，尽管这方面也有起伏和需要改进。

再回头来谈全国政协。政协委员中女性约占10%。这个比例当然远远小于毛泽东所说的妇女是“半边天”。而且这些女委员集中在全国妇联、医护界和演艺界。在早些年里，在更高级别的人员中，妇女人数比现在要多一些，这是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情况。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多年来曾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担任，她本人也是党的中央委员。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似乎也在出现妇女们头上的“无形的极限”。她们在就业方面——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常遇到困难，原因是常见的赢利要求，因为妇女结婚后会怀孕、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会影响工作。

当然，这些情况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关键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妇女从半奴隶状态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公民权，以及农村土地分配、婚姻自由、享受带薪产假等权利。

2003年，在全国妇联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上，集中注意到了这个“无形的极限”问题。

※　※　※

在全国政协，人们普遍赞赏国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过去遗留或延续下来的贫困落后的问题。在城市里生长的委员们去视察边远而贫困的农村地区时，一方面为所看到的消极情况所震撼，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提出改善的建议。现代的中国，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

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快速进步造成并扩大了这种差距），委员们对此有明确的了解。

在固有的革命传统中，有一些渐渐褪色，也有一些坚持下来或重新激活。发生自然灾害时，军队总是立即到达现场，帮助人民。比较新的是青年志愿者运动。到西部去的风气也正在形成，虽然刚开始不久，但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雁南飞”（到更舒适、更富饶的地方去）现象显示出强烈的对比。这种风气也使我个人受到了一点影响。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编辑在北京一家一流的出版社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但她放下了出版我的一本著作的中文版的工作，到西藏支边去了——一去好几年。

在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其发展中的部分和欠发达的部分之间，以及所有国家的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化鸿沟”，有的根本没有计算机，有的虽然有计算机，但已年老不能适应。与此相对照，也有戏剧性地跃过时空的奇迹。大约20年前，我就在西藏看到有人用计算机书写藏文。

在精神上和社会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快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有时会使人迷失方向，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老共产党员，也会迷信或成为“法轮功”这类荒唐却有蛊惑力的邪教的俘虏——“法轮功”的一些痴迷者甚至为了达到“圆满”而自杀或杀人。

这一邪教还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规定了自己的纪律。我家的一位朋友，是共产党员，她的丈夫去世后，我们邀请她到我家来住，她表示拒绝，因为她“未能获准”。需要谁的准许呢？需要“法轮功”的准许，因为她已成为“法轮功”的一名职员。

这就是某些人精神空虚的表现，他们所持的理想已经消失——或者说，从未真正扎根，他们是在思想混乱的状态下寻求某种新的寄托，不论这种寄托是如何虚幻。

※　※　※

以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平息骚乱为高峰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造成这一事件的内部原因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外部原因是敌意的挑动。

这一危机始于4月，到6月爆发。国际上集中注意到这一危机主要是由于两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对于在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的大规模悼念活动。第二个巧合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5月中旬的对华访问，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视听和出版媒介的大量新闻工作者，如果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本来是不会有这么多传播报道的。

4月26日，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示威行动是反革命。虽然社论公开表示，其矛头所指是据说存在的煽动者，但学生们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从而产生了刺激的作用。示威继续扩大，一波大过一波。

我当时正在写宋庆龄的传记，每天去宋的故居，因为就气氛和静谧来说，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佳场所。在早去晚归的路上，我看到街上正在发生的情况。示威行列起初都是步行的，后来有一些快速的摩托车手成群结队参加，手持标语牌或旗帜。另外一个变化是：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步话机，这在当时还很少为私人所用，听说都是来自香港的。（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手机。）

新出现的还有在天安门广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的帐篷，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这里露营，比城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显眼，用扩音器播放的演讲也更清晰。外国记者每天都记录这些演讲、拍摄这些场景，向全世界播发。政府起初没有采取具体的干预行动。相反地，它还提供了卫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在这一阶段，外国传媒的评论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这样做。

对于这场危机，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周恩来还健在，它是能避免的。他的声望和化解尖锐矛盾的能力已多次显示过。如果周在位的话，4月29日一些学生代表对当时的政府领导人那种侮辱性的引入圈套的做法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舆论所容忍的。

除了内部原因之外，“六四事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它的国际背景。一些著名的参加者相当容易地（显然是有人帮忙的）很快到了美国。美国当局还得意洋洋地宣布，已经在美国的学生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请，均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在当时，如果拒绝，那就会为美国当局所不喜。

同时，来自西方国家的专家、留学生和其他侨居中国的人，都收到了本国驻华大使馆劝他们离华的通知。绝大多数人走了，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有的一去不回。

在这场危机中，存在着外国浑水摸鱼的情况，而且已知的表现还仅是冰山一角——这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具体细节的揭露还需要一段时间。更早一段时期中反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现在已从各种不同的渠道陆续泄露出来，包括一些特工人员及其幕后操纵者所写的坦率（甚至有点自我吹嘘）的回忆录。这里只需要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行动处创建人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就够了：

（自1948年以来，秘密行动处被授权进行）任何有关宣传的隐蔽活动，包括对地下抵抗运动团体的援助，以支持本土反共分子……这些活动的计划和组织必须做到……如一旦被发现，美国政府能够言之成理地推卸掉任何责任……

很难相信，在这样一种心态下，特工人员会不去抓住他们在1989年中期所必然看到的事态发展中的机会。即使他们的政府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将会不可避免地兴奋得非投身进去不可。如果成功，他们将成为政府所吹捧的英雄；如果失败，他们可以让那些帮助挑起事端的人为后果负责，而他们自己假使不被当场抓住，则可以退入隐蔽的暗处，等待下一个机会。或者，在几十年之后写出回忆录，把这场赌局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自己一方或对方）头上(3)。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无疑还会不断重复。

如果这次运动取得成功、党和政府步步后退，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类似于导致苏联垮台的那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

学生们的要求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座用轻型材料在天安门广场树起来的巨大的“自由女神”像，确切无疑是仿照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制作的。如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山或白宫前，示威人群安营扎寨好几个星期，并且树起了毛泽东的巨像或新中国的其他象征，还阻挡美国军队开进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又将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

※　※　※

1989年以后这些年里中国的情况如何？

上个世纪90年代和后来这段时期，中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提高全国的生产力，取得的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在发展的速度方面跃居世界前列。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概括为“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言，而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它的要素是：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此，资本主义也如此，发展到顶峰就是社会主义和最后的共产主义，作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所有组织形式和思想意识，使这一归宿成为可能——实际上不可避免。这些变化因各个国家发展的环境和程度不同而异，还要看各国人民对于这些变化的可能和必要的认识。社会发展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的。

即使在那些不同意马克思的人中间，马克思也被广泛地推崇为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家之一，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实。

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传媒对马克思均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常见的论点是：即便他没有预言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他对资本主义肯定是十分了解的。

※　※　※

现在谈一点中国的近事和新的考验。

2003年，中国成为一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SARS）的灾难的发源地和战胜这场灾难的战场。在这一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特别是在全国的医护人员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表现。他们有力地制止了掩盖消极面的官僚主义倾向，果断地给那些责任者以降级或撤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平易近人的新总理温家宝出现在被划定的危险区域，不戴口罩（在这些地方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戴口罩），这对于当时普遍的惶恐心理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保证食物、药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疫情严重的地方，迅速地建起了隔离医院。

我当时正住院做手术后的复查。预防“非典”的措施是如此严格，医院内部相互之间都要实行检疫，往来均须穿上隔离服。在更大范围内，有几个月人们不能进出北京。

一个显著的进步是注意到了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在这一时期，人们想起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曾实行过好多年，但后来被“遗忘”了。现在人们开始谈论恢复这一制度。

中国在这些和其他一些方面，常常出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摇摆现象。当各种设施——即使还很低级——大家都能享受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倾向，把追求高质量指斥为崇尚奢华。当质量和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的时候，群众性这一因素又会得不到重视。现在，正出现一种对于一度被称为“两条腿走路”的原则重新认识其价值的苗头。随着更先进的科学手段和更深的理解，很有可能在较高层次实行这一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特别是患大病时）为一般人所无力负担。尤其是在医院和诊所争相购置最先进的、最昂贵的

医疗设备的情况下，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头上，而他们之中大多数是付不起的。现在，政府已采取行动，降低某些药品价格，但还不够——类似的其他措施正在考虑之中。2003年新上任的共产党和政府的新领导班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敏感、更加积极。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它正在开展一个全国性的防止艾滋病扩散的运动。

显而易见，已退下来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在任期末段，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都为人民的健康做了许多事情。在北京，户外健身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许许多多地方出现，免费提供给人们使用，从小孩子到七八十岁高龄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欢它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她）的健身器械，包括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全民健身热潮有益于城市居民的形象是显而易见的——从前，学者和职员都有点驼背，一眼就能分辨，并且一直被认为是有书卷气的表现，现在他们的腰板都直起来了。所有这些改变的成果，必将在2008年奥运会上，在运动员和千千万万新的运动爱好者身上显现出来。

另外一个趋势是全国工会重新活跃了起来。在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初期，工会曾经劲头十足。后来，政府实行了固定的八级工资制，工人按年资和技术分成八级，工资、住房、其他福利都因级别而异。按照这个制度，实际上所有城市居民都有工做，这当然使他们得到了必要的生活保障。但工会组织却因此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作用。连它们一向主管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功能也逐渐淡化，对工人的福利原来管得很多，后来缩小得只剩下分发免费电影票和组织假日旅游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工会组织已无足轻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私营或股份制企业（包括部分或全部由外国公司投资的企业）的发展，工会组织又变得需要了。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对这一点给予很大的重视，这在中华全国总工会2003年的大会上充分体现了出来。

※　※　※

写到这里，我的回忆录就将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提到中国常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脑海。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中，还没有一个词能更好地表达人类心灵广泛而又复杂的运动——有时深不见底，有时又浪高千尺；有时安静无声，有时又怒涛汹涌。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从不认为有灵魂这样的抽象要素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精神世界的通俗迷信存在，思想活动——如同其他人体表征一样——一直归因于某一身体组织，尽管在更古老的传统中，这个身体组织是指心脏，认为它是理性和良心的所在。

一个人的“脑海”可以被看作用来记录经验、对各个层次的各种刺激作出个人的反应，因为海洋既可以反映海洋之上天际的色彩，也可以反映海底深处岩层的寒冷和火山的炽热。

※　※　※

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

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2003年11月

（沈苏儒　译）

---

(1) ［译者注］这是中文版书名，英文原版书名为Woman in World History-Soong Ching Ling（Mme．Sun Yatsen），中文版由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2) ［译者注］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①》，第331页。

(3) 美国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A．Tom Grunsfeld）教授2003年在《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Routledge USA）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上帝，我们玩够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及中美关系》（God We Had Fun：CIA in China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文章引用了以下几本书：

默里·艾伦（Maury Allen）著《中国间谍：休·弗朗西斯·雷德蒙的故事》（China Spy：The Story of Hugh Fancis Redmond．New York：Gazette Press，Inc．，1998）；

弗兰克·霍洛布（Frank Holober）著《中国海岸的袭击者：朝鲜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Raiders of the China Coast：CIA Covert Operati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1999）；

约翰·肯尼思·瑙斯（John Kenneth Knaus）著《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的求生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9）及其他两本关于在西藏的秘密行动的书。

译者后记

我们怀着敬爱的心情完成了爱泼斯坦同志所委托的任务——他的回忆录的翻译工作，感到十分欣慰。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增进了对爱老的思想、经历和业绩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名利的淡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育。相信读者在读了这本回忆录后一定也会有和我们一样的感受。

爱老一生跨越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发展中十分重要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十分重要的时代。爱老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这一历史发展的洪流。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待中国历史发展的，同时又把中国历史发展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视点高、胸怀宽。他对中国的热爱出自肺腑，但他对中国的热爱不只是由于对中国的认同而产生的“一家人”的感情，而且是同他的国际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对爱老的思想感情必须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这是我们通过翻译他的回忆录所得的一点体会。

爱老经历丰富、知识渊博。他从15岁起就从事新闻写作，所以他的英文文字功夫是很深的。他能既概括又生动、既主题鲜明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任何复杂的思想和事物。他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一个词、一句成语或一个比喻来恰当地描述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状况。他又富于幽默感。这就使我们的翻译工作面临很大的考验。我们不敢说已经通过了考验，只能说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我们按“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力求用地道的、流畅的中文来充分表达原文的意蕴，并保持原作的风格。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优越条件——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可以随时去向爱老请教。即便如此，我

们深知译文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以至错误，恳切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此外，我们对中文版读者一般不太熟悉的人、事、书、史，作了一些译注，希望对读者的了解有所帮助。

林戊荪、张庆年、张彦同志和爱老的夫人黄浣碧同志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以很大的关心和帮助，谨此致谢。还有许多同志和友人也给了宝贵和热情的帮助，其中有的已在各章分别注明道谢。这部回忆录是送给爱老89岁华诞的贺礼，我们期盼着这一欢乐时刻的到来。

沈苏儒　贾宗谊　钱雨润

2003年除夕

爱泼斯坦作品集

《人民之战》是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的第一部，记录了他对中国抗战前两年的观察与思考。从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直至广州，爱泼斯坦一路跟踪采访，留下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奋起抗日的重要历史记录。宋庆龄在读过本书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则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也是爱泼斯坦早期作品。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的身份，赴敌后根据地采访，写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并被国际媒体广泛转载传播，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此次采访报道，也因此成为中国抗战新闻传播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是爱泼斯坦在美国完成并出版的作品，也是他记者生涯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作者曾长期追踪采访中国抗战，无论是对正面战场还是对敌后战场，均有深入实地采访，因而本书深具权威性与可读性，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该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后，迅速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着重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用可

信的事实和生动的笔触，概括了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民族解放的恢弘历史。这部视野宏阔、观察深刻的著作，也成为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收官之作。

《西藏的变迁》是爱泼斯坦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1955年、1965年和1976年三次进藏，以记者身份采访了西藏各行各业的民众近千人，采访笔记约百万字，最终成就这样一部全景式的西藏社会实录。全书以朴实的语言，再现了西藏地区在社会制度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巨大转变，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可感、不断进步的西藏。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是唯一得到宋庆龄本人授权的传记。爱泼斯坦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在整理吸收大量材料特别是外文史料、采访众多相关人士的基础上，历经十载艰辛而成。本书全面记述了宋庆龄的非凡经历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书中关于宋庆龄的史实极为丰富，材料多是作者在与宋庆龄长期交往中亲身经历的或宋庆龄晚年亲自向作者提供的，因而真实可靠。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是爱泼斯坦的自传，记载了他投身中国革命与建设，亲历中国从民族解放到改革开放的传奇一生。在这本回忆录中，爱泼斯坦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他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This file was downloaded from Z-Library project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e singlelogin.re go-to-zlibrary.se single-login.ru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